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遗物事典



出版前言

1990年，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中南海数千件毛泽东遗物回归故里，由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珍藏。为保护好这些遗物，湖南方面先后拨出数百万元专款修建了设备先进、功能齐全的文物库房。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为进一步保护好这些遗物，以发挥其社会教育作用，多次派人赴北京等地调查遗物的来源、使用等情况，并邀请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举行座谈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与此同时，还请国家和省文物局的专家对遗物进行了鉴定、分级，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较完备的遗物档案。1992年，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遴选部分遗物对外展出。展览开办以来，共接待观众近百万人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与支持，并成为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堂。

在征集、收藏、展览毛泽东遗物取得丰富的经验和巨大的社会效益的同时，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在馆藏的5000多件毛泽东遗物中，挑选出数百件精品，在采访了许多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知情人士，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

《毛泽东遗物事典》的许多资料来自于中南海工作人员、毛泽东家属和其它知情人的回忆，并经多方考证落实，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纠正和澄清了以往一些书中的错误和谜团。希望本书的出版，对毛泽东的生平、家世、思想的研究能提供一定的帮助，并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份高品味的精神食粮。

1996年10月

毛泽东遗物事典

人际交往篇

重庆谈判时郭沫若送的手表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的一次舞会上，结识了江西农垦文工团的演员邢韵声，交谈中，小邢惊讶地发现主席手上戴的那块表又老又旧，表壳上的镀铬都快脱光了，表盘上的刻度模糊不清。小邢问：“主席，这表这么旧了，您怎么不换一块呀！”

“喔，这可不能换。这块表跟了我几十年哩，为我立下了大功呢！”毛泽东连连摇头，又深情地抚摸着那块表。

这是一块非同寻常的表。

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居然没有一块手表！

这块表就是郭沫若当年在重庆机场送给他的。

1945年8月28日这天，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消息，早已在山城掀起了一股“旋风”。蒋介石自然不会“屈尊”到机场迎接，迎候在九龙坡机场的是一批渴望和平的民主人士：郭沫若、邵力子、雷震、沈钧儒、张澜、黄炎培……郭沫若以他诗人的敏锐捕捉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银机降落，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出现在舱门口，他头戴盔式帽，身穿中山装，足踏黑皮鞋，举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郭沫若发现，毛泽东手腕上没有戴表。

那个年代，手表已非常时髦，不光实用，且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欢迎毛泽东赴渝的各方贤达几乎都有一块高级手表或怀表，陪同毛泽东的赫尔利、张治中更是如此，可是毛泽东竟然连手表都没有。一方面，郭沫若深感共产党人的清贫、艰苦；一方面预感到毛泽东即将在重庆度过的险恶的日日夜夜，没有一块表是极为不便的。

毛泽东走下飞机，受到重庆各界的热烈欢迎。郭沫若此时感到，毛泽东在重庆不能没有一块手表。

毛泽东走下舷梯，与潮水般涌上来的人群握手，当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视线相遇，如同多道溪水的交汇，立刻激起一朵浪花——这两位故交知己，一时竟说不出话，郭沫若激动之时，忽然从自己腕上摘下一块表，双手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却未感意外，欣然接受，似乎不用言语，心已相通。

如此场合，公开地赠送礼物，且礼物价值不菲，送者和受者都是那么坦然，旁观者也是那么坦然。这其中蕴含了非同一般的交情。

毛泽东、郭沫若此前只在武昌见过面，但两人一见如故。共同的信念，共同的兴趣，使他们心心相印。

应该说，毛泽东、郭沫若的深厚而长久的情谊，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的深刻的理解上的，如他们都对中国历史和诗词有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彼此人格的敬重，特别是事业上的互相支持。

1937年抗战爆发后，海外游子郭沫若从敌国日本返回祖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这位大诗人、大学者，以其神来之笔，写出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和大量诗文，鞭挞国民党、蒋介石祸国殃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行径。这些历史剧在重庆等国统区上演，引起民众强烈共鸣。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称赞：“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郭沫若写成《虎符》

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后，该剧明显含有影射之意，因此仅演一次就被勒令停演。毛泽东却请董必武转交郭沫若一封电报：“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此后不久，即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纪念明末李自成起义失败300周年的《甲申三百年祭》。此文一出，引起很大反响，毛泽东在当年11月21日亲笔致信郭沫若：

“……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3年多后，郭沫若又出现在迎接毛泽东进驻北平的民主人士中。

毛泽东很少写长信，而这封信颇长，且言辞切切，足见毛泽东与郭沫若情谊的深厚。就在写这封信后七八个月，毛泽东来到了重庆，毛、郭二人获得了互相渴盼已久的第二次见面机会——这也是久别近20年之后的再次相见。因此，那一块手表成了毛、郭此次相晤的信物。

这块不寻常的表，外壳为圆形，系机械表，表径4厘米，字型“12”数字下有“ ”符号和OMEGA字样，表带为棕色牛皮制。产自世界钟表王国瑞士。关于这表的来历，一说为郭沫若游历欧洲时所购，一说为郭沫若访苏时，苏联友人赠送。本来，毛泽东是不轻易受人馈赠的，即使接受了礼品也大多交公，可是这块表却陪伴毛泽东到临终，也就是说，毛泽东戴这块表长达30余年。

虽然，毛泽东这30年间，一直将欧米嘎表带在身旁，但使用频率并不很高，因为手表不可能改变毛泽东昼夜颠倒的生活习惯，特别是他连续工作几天几夜时，手表更被遗忘了。

再说1961年9月中旬，毛泽东要离开庐山了，小邢颇有些难舍难分，送点什么东西给主席作留念呢？她想起了毛泽东那块老掉牙的手表，心想：主席日理万机，年龄越来越大，眼睛越来越不好使，需要一块好表。她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表。这是块英格纳表，是她参加工作时，母亲用多年积蓄的200元钱给她买的，平时她格外爱惜，一般时候不戴。现在，她毅然从手腕上摘下表来，双手递给毛泽东，说：“主席，没什么东西送给您，这块表就给您作个留念吧！”

毛泽东有些惊讶，但看到小邢这么真诚，他非常感动，略微迟疑了一会便收下了。小邢又说：“主席，我有点要求，你到了北京，不要忘了江西还有我这个老百姓。还有，您不要忘了给这表上弦。”

毛泽东连说：“不会，不会。”他又拍了拍上衣的左边口袋：“这表我放在这里。”

毛泽东可不愿白受人家的礼，只听他对小邢说：“你是个大方人啰，我也不能小气。”

他走到桌前，从一叠他练笔时写下的诗词墨迹中抽出《红军不怕远征难》等，说：“就送几首诗给你吧！”毛泽东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将诗稿小心包好，吩咐说：“好好放好，不要让人家看见，我是作为朋友送给你的。大家都没有，你有，人家会嫉妒的，将来对你不利。”

到了1962年3月，毛泽东南下视察战备工作至南昌，他没有忘记小邢，他们再次见面时，毛泽东发现小邢的手腕仍空着。“小邢，你把表送给了我，你自己还没有买表啊，这对工作学习不利，还是得有块表……我一定要回送你一块表。”5月份，毛泽东在上海，小邢也到了上海。毛泽东又想起了表的事，特意叫人打电话到北京瑞士大使馆定购了一块表，然后叫吴旭君专门送到小邢家。

毛泽东手书《长征》诗（局部）

当然，小邢送给毛泽东的表，毛泽东只是作为一份友谊珍藏着，他平时使用的仍是郭沫若送的那块表。

欧米嘎在他的手上戴久了，表底发黄，字母模糊，表带也破了，工作人员建议毛泽东换一块，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放到表店修一修，换根表带还可以戴。”后来，表的机件失灵，恰逢瑞士友人送给毛泽东一块金表，工作人员趁机要给毛泽东换表，毛泽东只得将金表戴在手上，但感觉太重，只戴了几天就取下来，吩咐上交国库，并要求将欧米嘎表再修一次。于是这块瑞士表重访北京亨得利钟表店，修好后，毛泽东继续戴着，直到1976年9月逝世为止。

齐白石送的“片真老空石”砚台

毛泽东一生与砚台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他总是喜欢用毛笔写诗作文。毛泽东遗物中就有不少是砚台。其中有少年时代在韶山用过的第一方石砚，有井冈山时期用的腰圆形青石砚，更有进北京后，晚年的铜墨盒和齐白石送的石砚。这些至今仍保存完好的砚台，在毛泽东遗物中弥足珍贵。

毛泽东少年时代用过的砚台与《算术》课本。毛泽东的第一方砚台是一块由韶山本地材料制成的青石砚，呈长方形，底面凿有条痕，台面四周阴刻4道条框，前端略凹，以便磨墨，后端有一斜槽，深约1.8厘米，为积墨之用。这方砚长有19厘米，宽有12.5厘米。就是这方砚台，陪伴毛泽东度过了“6年半孔夫子”生涯，并用它打下了最初的书法基础。我们从保存于韶山的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诗经》、《论语》二书封面的题签上即可看出其使用毛笔和砚台的痕迹。

在井冈山茅坪八角楼，有一个直径达26厘米的腰圆形青石砚，这是毛泽东用过的最大且形状也最奇特的砚台。因为他通常用的都是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砚台。

毛泽东晚年为了省事，不再用砚台，而使用铜墨盒。这个大墨盒就是毛泽东从杭州汪庄招待所用自己的小墨盒换回的。

到了晚年，毛泽东生活相对稳定，需坐下来办公的时候更多，因而用毛笔与砚台的频率也更高了。每次出巡，他总是得带上他的砚台，但石砚较易碰坏，因此他便改用铜墨盒。60年代，有一回巡视到杭州，他随身带了一个小的铜墨盒。到了汪庄招待所，毛泽东发现所方已为他准备了一个大的墨盒，他将墨盒放在手上把玩，爱不释手，当时就将自己那个小的弃之不用。临走，他还提出要拿自己的那只小的换招待所大的，服务员说：“主席需要，拿去就是了。”毛泽东说：“那可不行，我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我只能跟你们换。”就这样，毛泽东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小铜盒留在了杭州，换回了大的。

现陈列于韶山的一只铜墨盒，就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用过的，为一个边长为10.5厘米，高3.8厘米的正方形黄铜砚。有盖，盖上有王寿彭恭录楷体：“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的铭文。铭文及盒四边和底部均生了铜绿，盒内墨汁干结呈疙瘩状，盒口内缘断掉了6厘米。该墨盒已被定为二级文物。

毛泽东的砚台中最珍贵的当推齐白石送的那方雕花砚。因为这方砚蕴含了双重的价值：既留下了国画大师齐白石亲刻的铭文和齐大师使用过的印痕，又染上了一位政治巨人毛泽东的旧迹。而且还珍藏了毛泽东与齐白石个人之间的深情厚谊，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之间沟通的绚丽光华。

齐白石与毛泽东是湘潭老乡。民间曾风传湘潭近现代出了青、乌、白三龙，即指韶山的毛泽东、乌石的彭德怀和白石铺杏子坞的齐白石。他们的确是现代中国乃至世界令人瞩目的三位巨人，其成就涵盖文、武两域。其中齐白石重于文，彭德怀偏于武，毛泽东则是文武全才！有趣的是三人皆以石为名，毛泽东乳名石三，彭德怀自称石穿，齐白石则以白石为雅号。毛与彭相识较早，在上井冈山之后，并且共事数十年，而与齐白石交往则较晚。

齐白石于1864年1月1日（农历1863年11月22日）出生在距韶山冲

约 50 公里的白石铺杏子坞，其年龄比毛泽东的父亲还大 6 岁。比毛泽东则大了 29 岁。毛、齐二人虽为同乡，而且互相倾慕已久，但前半辈子无缘会面。齐白石最初是从另一位湘潭同乡，亦是毛泽东的老师与故交黎锦熙处对毛泽东有所了解的。1949 年 4 月，毛泽东进北京后亲笔致信齐白石，邀请大师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不久，齐白石即出席了周恩来主持的各界人士招待会。

1950 年夏，毛泽东又派秘书田家英到跨车胡同看望齐白石，详细询问了老人的健康和生活情况。齐白石对此深有感慨，叹道：“已卜余年见太平。”接着毛泽东又派人派车把白石老人接到中南海，作促膝长谈达数小时。其时风和日丽，鸟鸣啾啾，两位同乡，两位巨人，携手品茶赏花，好不惬意。朱德元帅也来了，他是毛泽东特意请来的，三人共进晚餐，完全撇开了世俗功利，只是知心朋友的共聚，心灵互相默契。毛泽东不住地给白石老人敬酒、夹菜。餐前，毛泽东还特意吩咐厨师把菜煮烂些，以便老人食用。老人深感毛泽东的敬老尊贤、平易近人之风。毛泽东还告诉齐白石，政务院将聘请他担任文史馆馆员。

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片真老空石”砚台。齐白石曾在砚台上刻了“是吾子孙不得与人”的家训，但一年后自己就食言了。

齐白石与毛泽东的密切往来，由此揭开了新篇章。开国大典前夕，齐白石曾精雕细刻了两方“毛泽东”朱、白文寿山石名章，请著名诗人艾青献给毛泽东主席，到了 1950 年国庆前夕，齐白石又从自己珍藏多年的国画精品中选出《鹰》送给毛泽东，这是一幅立轴，作于 1941 年；同时齐白石还将作于 1937 年 7 月的一幅对联“海为龙世界；云为鹤家乡”相送，并特意加上“毛泽东主席庚寅十月齐璜”和“九翁齐白石藏”的题款。此次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中，特别为毛泽东看重，并留在身边使用的唯一一件就是一方青石砚。

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众多画作之一。但毛泽东的礼品大多都上交国库了。

此砚为湖南产花岗岩质地，石质坚硬。长 26 厘米，大的一头宽 15.5 厘米，小头宽 14 厘米，厚 2 厘米，外面还套着一个精致的楠木盒子。砚的表面约一半面积微凹，用于磨墨，其余部分雕花，如烟雨云蒸，意韵悠绵。齐白石对此砚极为珍爱，生怕丢失，又担心他

百年之后，子孙将其转赠于人，于是亲手在砚体上刻下一行小字：“片真老空石也，是吾子孙不得与人，乙酉八十九岁，齐白石记于京华铁栅屋。”

“士为知己者死”，齐白石认定毛泽东是自己的知音，遂自己违背“不得与人”的规约，将该砚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收下这些礼物，也很感动，派人回赠了老人一笔丰厚的润笔费。以后，齐白石知道毛泽东喜欢他的画，每年都有赠送，如 1950 年送了立轴水墨《芭蕉图》，1951 年送了《松鹤旭日》图、《菊花》图。1951 年还专为毛泽东画了《梅花茶具》图，与徐石雪、于非闇等联合创作了巨幅国画《普天同庆》。毛泽东每次都致函或请人代表谢意，并不时给以回报。

1953 年 1 月 7 日（农历 1952 年 11 月 22 日），齐白石 89 岁，按湘潭习俗，“男进女满”，白石老人的亲友为他做 90 大寿。中国美术家协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艺术家”的称号。毛泽东没能赶上拜寿，不久即派人送给齐白石老人 4 样礼品：一坛湖南特产茶油寒

菌，一对湖南五开文笔铺特别长锋羊毫书画笔，一支精装东北野山参及一架鹿茸。

1957年齐白石病重，此时老人已是94岁高龄，但头脑仍清晰。毛泽东特别关心，派田家英前往探视，齐白石喃喃地说：“我病好了，还要去中南海，跟毛主席照一张像。”

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大量礼品，毛泽东绝大部分上交了国库，唯独留下那方“片真老空”石砚，使我们今天能一睹其形质，以回味两位历史风云人物交往的动人故事。

出自名家之手的毛泽东印章

毛泽东的个人爱好是多样的，把玩印章，便是他的众多雅好之一，这也突出体现了毛泽东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深厚。

从战争年代到建国之后，有许多文化界著名人士，深知毛泽东这一爱好，曾精心为毛泽东治印，由此，在印的背后，留存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毛泽东使用私人印章，目前所见较早的资料，是1936年7月15日，他在签署派代表到国统区协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事宜的介绍信上所铃“毛泽东印”朱文。次年7月13日，即抗日战争爆发后第六天，毛泽东就对日作战总方针题词，又一次用同一枚印章，庄严盖上“毛泽毛泽东为卢沟桥事变题辞时庄严东印”。地盖上了“毛泽东印”。

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的较早的毛泽东印章之一。泽东写信给柳亚子，说：

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他在随信手书的《沁园春·雪》上，又郑重铃上两印，其一为篆体阴文，即浑厚古朴的“毛泽东印”四字。柳亚子看到毛泽东喜爱印章，于当年便又送给毛泽东两枚，毛泽东在1946年1月28日写信表示感谢：

亚子先生左右：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印章二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

在这里，印章成了毛泽东与民主人士交往的媒介与桥梁。柳亚子，原名柳慰高，又名弃疾、人权，字安如，人称三吴才子，又与宋庆龄、何香凝并称国民党三贤。他1905年就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还是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他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因反对蒋介石而受到通缉，流亡日本。回国后继续进行反蒋活动。

毛泽东与柳亚子的交往是从1926年开始的，那是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二届全体会议上。在广州举行的这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炮制的整理党务案，柳亚子愤然，以祖母病重为借口，会议未结束就走了。毛泽东对此印象极深。

20年之后，即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与柳亚子重逢在山城。柳亚子特意到曾家岩桂园毛泽东住地拜会了毛泽东，他当即写下一首七律《赠毛润之老友》，又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于离开重庆前4天即10月7日，将《沁园春·雪》一词抄录给柳亚子，柳亚子读罢，慨叹：“展读之余，以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乎，虽苏、辛犹未能抗乎。”柳亚子助兴也和了一诗，毛词、柳诗一起登载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上，引起巨大轰动。

建国之后，毛泽东与柳亚子多有诗词唱和，1950年，柳亚子迁居北京紫禁城西北长街，毛泽东特为柳的居所题写了“上天下地之庐”。毛泽东为私人居所题词，此为仅有。

以印为“媒”，与毛泽东交往的文化名人还有许多。如1948年，“篆刻王”谢梅奴用家藏上等寿山石治了两印，一方是阴文“毛泽东印”；一方是

阳文“润之”印。前者为回文排列，笔划间架松而不散，紧而不板，有如汉印；后者仿周秦小玺，细文粗边，字秀笔圆。两印均高两寸半，有钮，印面纹2.2厘米见方，嵌藏于一个红木锦缎盒内。1951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这两印呈献给毛泽东，现藏国家博物馆。

毛泽东还有一枚“毛氏藏书”印章，他的所有藏书，他都要亲自盖上这印。该印乃系著名金石家吴朴堂所镌。

1963年，毛泽东与全国工商联首席代表陈叔通叙谈，说自己很想请人刻一枚藏书印章，无论阳文、阴文均可。陈叔通立刻想到了他多年的故交、上海的印家吴朴堂先生。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陈叔通到上海，于高楼林立中寻访到吴朴堂。两人相见甚欢，陈叔通说：“毛泽东主席想请你治一方藏书印。”吴朴堂当即应允。陈叔通又说：“我这次在沪逗留时间不长，过几天我就来取，再带北京面呈主席。”吴朴堂深感时间紧，但同时又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能为当今中国第一人治印，特别是能为知识分子的这位知音——毛泽东治印，确是使他觉得荣幸的。

吴朴堂当晚就命笔起草印稿。“毛氏藏书”这四字刻起来不复杂，但要刻出最佳艺术效果，就不容易了，因为前两字笔划太简单而后两字又太繁复，如何才能恰当处理疏密，使之达到和谐统一？另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的藏书印，还得考虑主人的独特气质和所处的高贵地位，必须刻得雍容大雅。

毛泽东与全国工商联主席陈叔通在欣赏自己的竹拐杖，毛泽东的藏书印，就是陈叔通找上海著名印家吴朴堂治的。

吴朴堂颇费思量。他查阅了一大堆古今印谱，反复推敲，反复琢磨。终于认定了最佳方案：使用铁线篆！

吴先生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次日夜，喧闹了一天的大都市沉寂下来，吴朴堂的印屋更是情静宜人，最适于艺术的创作。妻子王智珠素来是吴印的第一位观众，此时她又在一旁观摩。只见吴朴堂微举刻刀，凝神定气，至深夜才长舒一口气。末了，他还发了一通感想：

“毛主席身为国家领导，所藏书籍难以数计。书多，盖印多，印面容易磨损，必须深刻，上下线条又要一致。”

的确，这铁线篆是最难刻的，因为线条细，需要特别的细心，小心加耐心，还得靠眼力和手上功夫；稍不留神，不是断就是裂。

著名篆刻家邓散木为毛泽东治的印。

受到毛泽东的喜爱。

吴朴堂如期刻好了印，陈叔通将其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爱不释手，从此养成一个习惯，看书时，往往喜欢先仔细欣赏一番，然后运力，小心翼翼地书页上加盖“毛氏藏书”……

毛泽东诸多印章中，有一枚堪称“文物极品”，这就是现珍藏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由著名篆刻家邓散木刻的一枚“毛泽东”龙纽大印。此印呈立方体，石制，明黄色，顶部镂空琢双龙，印的一侧，有邓散木亲刻的字样：

“1965年8月，敬献毛主席，散木缘时六十有六”。

此印现已陈列出来，供人们欣赏。

宋庆龄送的鸭绒枕头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人称“国母”。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女革命家，毛泽东是非常尊重的。毛泽东与宋庆龄，曾经有很长一段动人的交往，他们互有礼品赠送，宋庆龄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中，有一件是一只高级鸭绒大枕头。

宋庆龄何以送毛泽东一个枕头？原来她了解到毛泽东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喜欢躺在床上批阅文件和看书。到过毛泽东卧室的人们说，毛泽东睡的是一张宽大的木板床，且一边高一边低，低的一边放满了书，高的一边就睡人。毛泽东的床上用品极为简单，被褥是里外白布，睡衣、毛巾被补了又补，而枕头则是用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一床旧军毯搭在床栏上，那只荞麦皮枕头就塞在军毯下。

像这样的枕头，毛泽东通常同时用3个，分别用来枕头、靠背、垫肘。

宋庆龄听到这样的描绘，心灵震撼了，一位共和国的领袖，竟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她亲自上街购买了一个高级大枕头，托人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与宋庆龄有长达数十年的从相识、相知到相互尊敬的过程。

从年龄上来说，宋庆龄生于1893年1月27日，只比毛泽东大11个月，但她的革命经历却比毛泽东要早。她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早年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1908年，当毛泽东尚在韶山冲务农时，她便远涉重洋到了美国梅肯市威斯理安女子大学，1913年，宋庆龄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回国，到孙中山身边作秘书；这时毛泽东到了长沙。

宋庆龄与孙中山是1915年10月25日结为连理的。从此更紧密地支持和参予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她对丈夫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极表赞成，并有深切理解，这也正是她在丈夫去世后，仍然坚持与共产党的合作，并与中共领导人长期交往的基础。

毛泽东与宋庆龄初识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可贵的是，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本质，毅然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包括毛泽东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8月1日，她又与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揭露蒋、汪叛变行径，并成为革向委员会7人主席团成员。

从这以后，毛泽东与宋庆龄分别长达18年！他们在两个不同的战线开展与蒋介石的斗争。1945年8月，毛泽东飞临重庆，宋庆龄设法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亲自到上清寺桂园张治中公馆拜访毛泽东。毛泽东走出客厅门口迎接，两人紧紧握手，坐下后畅谈中国革命的形势，彼此发现，他们都对未来充满信心；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由相识到相知了。临别，毛泽东送孙夫人到大门外，直到宋庆龄坐车消失在视线之外。

毛泽东在延安时乘坐过的这辆汽车就是宋庆龄送的。

190年4月，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杭州、南昌解放了！月27日，上海也解放了！此时，宋庆龄就住在上海，她亲听了人民解放军威猛无比的炮声，感到一个崭新的时代来到了。

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派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去上海迎接宋庆龄北上。毛泽东还热情洋溢地写了一封信，说：“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毛泽东翻看着日历,计算着宋庆龄的行程和到达北平的时间。8月28日,毛泽东一早吃过饭,就穿好那套平时不穿,只有迎送知名人士才穿的浅色衣服,提前到火车站迎候。同往迎接的还有朱德、周恩来等80余人。专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上车去,亲自欢迎宋庆龄下车,他握着她的手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欢迎她前来共商国事。建国后,毛泽东与宋庆龄,各人都日理万机,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可以说,这时他们已建立了诚挚的私人友谊。宋庆龄每年总是给毛泽东寄去贺年卡。1956年元旦,毛泽东又收到了宋庆龄的贺卡,毛泽东回信,称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并致问候:“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十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1958年毛泽东和宋庆龄在一起。

语气平易而更见君子之交。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宋庆龄也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回国时,毛泽东与宋庆龄坐同一架飞机,毛泽东请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毛泽东说:“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1961年,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曾亲自到宋庆龄家中探望。宋庆龄也非常关心毛泽东的健康,每次从上海到北京,都要去问候毛泽东,并送一些礼品。

1957年冬,我国北方贮菜时节,毛泽东派人给宋庆龄送去一些山东大白菜,宋庆龄非常高兴并复信致谢。

敬爱的毛主席:

承惠赠山东大白菜已收领。这样大的白菜是我出生后头一次看到的。十分感谢!

您回来后一定很忙,希望您好好休息。致以敬礼!

宋庆龄

毛泽东尊重宋庆龄,宋庆龄也关心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她听说毛泽东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后,立即派人给毛泽东送了个高级大枕头。毛泽东没有收礼的习惯,所以不收。但当来人走后,忽然又想到不收不好,又派工作人员追了上去,把枕头收了下來。但他更爱用大众化的东西,只是因为宋庆龄是国母,却之不恭才收下;在床上摆了两天,毕竟享受不了,于是细心地收藏起来。他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了自己那个白布养麦皮枕头。他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

宋庆龄知道了,对此也表示理解。

全国政协第 1 号出席证

毛泽东遗物中有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代表证、出席一届三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出席证和毛泽东佩戴过的政协徽章。

在人际交往中，毛泽东尤其注重与民主人士的交往，他极为看重汇聚天下朋友的政协会议，他亲任第一届政协主席，临终前还担任全国政协名誉主席。

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证。

1949 年春，在新政协一次会议前，毛泽东欢宴政协筹备会的代表，他高兴他说：我们第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

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前清翰林陈叔通，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和华侨老人司徒美堂，的确，毛泽东平生是花了最大力气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早在 1919 年，他在《湘江评论》2、3、4 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这洋洋洒洒万余字，可视为毛泽东的人生理想和他从政的宣言，《论联合政府》一文，是他的统战思想乃告成熟的标志。到了 1949 年初，他进入北京，所作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筹备新政协，他把这作为建立新中国的理所当然的第一步。

各界人士为筹组新政协，纷纷应毛泽东之邀，辗转前往北平，汇聚在毛泽东周围。

司徒美堂当时正在香港。他不顾危险，毅然经台湾海峡乘船北上。行程 6 天 6 夜，终于安抵天津塘沽港，当他第一眼看见一位正立于码头值勤的解放军战士，心里就踏实了；他弃舟登岸，随即坐车前往北平。

张澜于 1949 年 6 月从上海乘火车赴北平，他此时已是 77 岁高龄，留一挂长长的胡须，一脸的老人斑。抵北平后次日，毛泽东就会见了。毛泽东派车去接，叮嘱司机：“爬坡时慢点稳点，那是一件珍贵文物，千万别碰坏了。”毛泽东笑着说。张澜一下车，就见毛泽东已迎候在门口，毛泽东上前几步，伸手搀扶住，真像捧着一件“珍贵文物”。毛泽东亲切他说：“我要你保重身体，我们要共同合作，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

为了保障北上代表们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安排有关人员，每一位代表都必须谨慎化装。周恩来专门布置了跑“买卖”的华润公司，还借来了跑运输的苏联货船。华润公司在香港注册，专门“经营”民主人士，大老板是来自解放区的钱之光。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则往返于香港、塘沽间。李济深、茅盾、罗培元、蔡廷锴……就是乔装打扮后由“阿尔丹”送到天津，而后至北平的……

各路代表都到齐了。毛泽东非常开心。萦回于他脑际近半个世纪的“民众的大联合”理想就要实现了。

1949 年 9 月 6 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举行。民主人士看到的毛泽东是那么真诚又那么神采奕奕。

政协一届会议前两天，即 1949 年 9 月 19 日，毛泽东偕部分民主人士程潜、张元济、陈明仁等游天坛。选择在政协会前的这个日子，显然是大有深意的。毛泽东知道，天坛乃是古代中国帝王敬天的祭坛，而现在，他与他的战友和朋友们，又要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了，这可谓“替天行道”。在祈年殿，毛泽东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我们应该向老天、向庶民三鞠躬……

在祈年殿，毛泽东与众人合影。照片上除了民主人士，还有陈毅、粟裕等共产党的高层人物。毛泽东对陈明仁说：“最近外面谣言不少，说共产党惨无人道，把被俘的杜聿明、王耀武等都杀掉了，还说你也被我们杀了。”

陈毅说：“蒋介石才是十足的刽子手呢，你把这张照片寄给你的黄埔故旧看看，请他们不要轻信谣言。”

毛泽东说：“也请他们不要继续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害人害己，劝他们及早归来。当然，爱国不分先后，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我们欢迎，什么时候想走就走，我们欢送。这叫做来去自由。”

陈明仁说：“照片我一定寄回去，还要好好写几封信。”

游天坛后两天，即开国大典前10天，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各路诸侯汇聚。毛泽东当选为第一届政协主席。

毛泽东出席一届三次政协会议的出席证。席次为“001号”。

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保存的毛泽东遗物中，毛泽东出席新政协会的代表证编号为“001号”。证上写着：

姓名：毛泽东

单位：全国委员会

职务：主席

席次：第001号

毛泽东出席政协会议的这些证件已成为他与民主人士友好相处的见证。

尼克松送的名片和酒杯

1972年2月，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带来了一批礼物。作为向这个古老国度的献礼，尼克松向周恩来提交了一份特别的“礼品”清单，清单上写着如此多的“礼品”：

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的宝石15万克拉，美、英、香港货币数捆，工艺品40箱，锡3000吨，铝2000吨，钛8000吨，橡胶、2000吨。此外还有2009个日本人的遗骨。

所谓“特别”，是因为这与其说是一宗实实在在的数量惊人的礼品，毋宁说是一份珍贵的经济情报。原来，1945年，日本法西斯的一艘战舰“阿波丸号”满载着掠夺来的巨额资财送回国内，美军潜水艇跟踪将此舰击沉。美国的卫星后来探测出沉船的准确位置，即台湾海峡北端平潭岛附近。

尼克松此次访华，把这份资料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这确是一份厚礼！中国政府据此从1977年1月起进行打捞，只有金锭、白金未发现，其余与“礼品单”相符。而中国政府又将日本人的遗骨、遗物如数还给日本，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代表死者亲属深表感谢。这是后话。

除此，尼克松还代表美国人民向中国人民赠送了一对产于北美寒极的稀有动物麝香牛；中国人民则向美国人民回赠了两只珍贵的大熊猫玲玲和星星。

除了国礼，尼克松还带来了一批私人礼物。首要的便是送给毛泽东的礼物。尼克松送给毛泽东的有象征和平的瓷制天鹅和水晶玻璃花瓶。这两样礼品，毛泽东欣然接受，但事后却上交了国库；他留下的只有另外两件，即名片和酒杯。

1972年2月21日，北京时间11时27分，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0时30分，美国电视转播的黄金时间，千百万美国观众，看到他们的总统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尼克松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稍事休息，他吩咐身边人员将所带礼品清理好备用，他亲自动手，又一次检查了一下自己随身带的名片盒，他一想到他将把一张美国总统的名片，历史性地递交给一位中国首脑，不由得微笑起来。

当尼克松跨入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大门，与这位东方巨人握过手时，他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毛泽东很喜欢这张名片，他放在手心里把玩良久，面部表情陷入沉思。

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件尼克松的礼品是一个高脚酒杯。

那是2月25日晚，尼克松举行告别答谢宴会。宴会一应物什都是从美国带来的。尼克松高举酒杯，频频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敬酒……毛泽东年近80，身体虚弱，没能出席这个宴会。尼克松回国后，参加了宴会的唐闻生、王海蓉去见毛泽东，他们带给毛泽东一个刚刚由尼克松赠送的白宫专用的酒杯，上面还有尼克松亲笔签名。毛泽东拿过这个杯子，仔细端详，爱不释手。这个酒杯便留在毛泽东这里。

毛泽东也送给尼克松几样礼物，礼尚往来嘛。只是毛泽东送给尼克松的礼物却大有深意，简直是一个政治与哲学之谜。他挥毫泼墨，书写这样的几个条幅：

“老头坐凳”，“嫦娥奔月”，“走马看花”

当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后，毛泽东却几次通过来访的外国要人传话，邀请尼克松访华。1975年12月31日晚，毛泽东在新年到来的前夕，会见了美国第34届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戴维·艾森豪威尔和第37届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这在毛泽东个人交往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显然，接见美国前总统的儿女，是因对前总统的特殊礼遇和私人友谊。毛泽东问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我欢迎他到中国来。”又说：“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来爬长城呢。把我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当戴维告诉毛泽东，尼克松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时，毛泽东说：“我习惯这样叫他。”他又轻描淡写地谈到水门事件：“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再次转向朱莉，说：“马上给你爸爸写信，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戴维说：“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毛泽东说：“好，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

1976年2月21日至29日，几乎与4年前同一时间（尼克松有意选择了这一天），尼克松夫妇再次访华。尽管他已非总统，毛泽东仍按总统的“规格”会见了。毛泽东不顾重病，与这位老友长谈达1小时40分钟。尼克松引用了毛泽东的名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展望未来中美关系。毛泽东虽步履维艰，说话也困难，但精神集中、思想活跃，纵论国际问题。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一位前外国元首了。仅仅半年之后，毛泽东溘然长逝。尼克松为之洒泪。他于9月9日当天发表声明说：

1972年在北京会见时，我们两个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和观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对我们两国利益同样是必不可少。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中美两国自那时起所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这不是溢美之辞，而是发自内心的话。在尼克松图书馆，竖立着10尊与真人大小一样的世界政治人物雕像，这是尼克松最为钦佩的政治家，其中排在最前面的是身着中山装、穿圆口布鞋，坐在沙发上健谈的毛泽东……

会见尼克松时坐过的沙发

1972年2月21日，病中的毛泽东，清晰地记得这是一个什么日子：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将抵达北京。毛泽东得了一场大病，持续了一个月。然而，憔悴的毛泽东，头脑是清醒的，尤其一种内在的精神，仍强大地支撑着他的病体。毛泽东不时地问尼克松专机抵达的时间和到京后的情况——已经有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见的这项日程，但未定具体时间。中午，毛泽东突然提出：当天就要会晤尼克松。

周恩来将此通知了美方。无论基辛格还是尼克松本人都深感意外，又惊又喜！而这却忙坏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赶紧整理会客厅和卧室，还得给毛泽东作修饰整理。于是，理发师给毛泽东剪发、剃胡子，并擦上头油；工作人员给毛泽东换上了那套灰色中山装。

引人注目的是，客厅内摆上了一溜沙发，毛泽东将坐在其中一个特制大沙发上会见一个超级大国的首脑。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毛泽东的住所。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陪同下走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室。

基辛格后来这样描写这次历史性会晤的场所：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

基辛格特别注意到了室内的那排沙发：

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

毛泽东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一个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而这两个国家曾经严重对峙了多年，有硝烟弥漫的战争，也有暗藏刀枪的冷战。但两位首脑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先是右手，后来左手也搭了上去。他们俩人都笑了，握手的时间大大超出了正常礼节握手的时间。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见，两只扭转化坤的大手握在一起。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毛泽东以病弱的身躯，甚至站立都要秘书搀扶。但他使来访者感到了一种具有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的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他与尼克松的会晤，原定只有15分钟，但实际却持续了65分钟。毛泽东虽已说话困难，但他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幽默和机智。这些话，后来为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读来十分有趣，充满哲理。就是在这种轻松气氛中，中、美两大国交往的大门打开了！半个多月后，基辛格在白宫他的办公室细细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发现毛泽东实际上已勾划出上海公报的内容，他注意到，

公报里每一个段落，在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

在这次历史性会晤之后半年多，同年的9月25日上午11时半，日本政府代表团由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率领抵达北京机场。第三天，即9月27日晚饭的时候，日本客人得到通知：“毛主席说想见一见诸位，请马上做好准备。”

当田中、大平、二阶堂分乘三辆轿车抵达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已站在门庭外等候。在大门口，毛泽东与客人握手，田中开口第一句话却是：“请借厕所用一用。”田中由工作人员陪同上厕所，直到田中回来，毛泽东一直站在那里等着，这让日本客人很受感动。

进入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指着周恩来说：“田中先生，同我们这位吵完架了吗？不吵架不行。”毛泽东在那只大沙发上坐下来，与客人随意攀谈起来，但并没有深入地谈政治问题，他谈到小时候受过父亲的严格教育，他说：“孝敬父母还是需要的。”毛泽东又指着廖承志开玩笑说：“把他带回去，立为你们国家参议院选举的候选人吧！他会当选吧！”田中应酬说：“廖承志先生很熟悉日本情况，从早稻田附近的小饭馆到酒店，他全都知道。”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谈笑风生。将近一个小时，临别，毛泽东送了一册中国古诗集，毛泽东说：“田中先生，我也患神经痛，腿脚也不好使，不久就要见上帝了。”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了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三次重要的会晤，毛泽东都是坐在一个十分奇特的大沙发上进行的。这个沙发，也就成为毛泽东晚年遗物中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即毛泽东打开中美、中日关系大门，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物证。

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原来多半是俄式的，既大又高。毛泽东常常感叹：“做沙发的人不考虑中国人个子矮的多，只考虑高的人。”的确，就是毛泽东这样高达1.83米的魁梧身材，晚年也不适合坐这种高沙发了。70年代，毛泽东已日见衰老，“9·13”林彪事件，对他的打击特别厉害，他几天睡不好觉，吃两次安眠药也无济于事。他在沙发上也有些坐不稳了，因为无法把握自己的重心，身子便不由自主往下滑。但他必须在沙发上坐，因为行动不便，户外活动减少，他一坐就是一天甚至几天，皮肤上长起了褥疮。卫士、护士、保健医生都对此深感忧虑。

人们决心为毛泽东重新做一个沙发，还就此向主管部门打了报告。中央警卫局毛维忠副局长亲自到北京南郊木材厂加工了一个样品。这个样品改变了原来的弹簧垫而用乳白色海绵，下面钻了许多蜂窝状小孔，以减低臀部接触处，便于通风透气，高度为1米，长0.7米，宽0.9米，基本适合老年人坐。为了装饰，又将底座蒙上褚红色毛料布面，木脚架上刷了阳干漆，外面套上米黄色布和绿黄相间的草席，虽显土气，倒也实用。

徐涛、吴旭君夫妇采访曾在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担任翻译的王海容。

毛泽东坐在这个沙发上，发现身体不再下滑，摇了摇身躯，高兴他说：“这种沙发好多了！”

毛泽东诸事关心他人，坐沙发也不例外。在会客室，他总将在传统礼仪中属于“上位”的沙发留给客人，大有礼贤下士之风。他这次得到了一个合意的沙发，立刻想到了周恩来，他想到周恩来个子比他矮，坐那种俄式大沙

发，会更不舒服，因为除了身子下滑，腿还得悬着，久了会发麻。毛泽东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不久周恩来也有了一个与毛泽东的一样的沙发，这个沙发在周恩来去世后曾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

毛泽东遗留下的沙发除了上文介绍的这个特制沙发，还有他在中南海丰泽园故居会客厅的几只绿色沙发，即本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坐过的沙发。

丰泽园会客厅是毛泽东吃饭、会客的地方。毛泽东起床后，洗漱完毕，往往要在客厅沙发上坐一会儿，稍事休息，再到饭桌前吃饭。

这是几只木沙发，绿色的木底架和扶手，沙发底座、座垫、靠背均蒙有墨绿色灯蕊绒；宽边扶手呈弧形弯曲。相对前文提到的那个临时做的沙发，这几个沙发要小，长 72 厘米，宽 97 厘米，高 87 厘米。无论形状、颜色、大小都更有韵味，坐在上面，如拥绿茵。

菊香书屋客厅一角摆有 4 张沙发，左边第二个沙发为毛泽东的“专座”。其他沙发，孩子们、工作人员随意坐。唯有这个沙发谁也不去坐，虽然毛泽东从未作过规定不准别人坐，但久而久之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很少有人被请来客厅坐，1960 年以后，只有曾志有过这种殊荣，毛泽东和她在这里谈了话，并请她在这里吃饭。

毛泽东住处的沙发，留下了多少遗闻逸事，意味绵长。

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包

毛泽东 1970 年以前用的是一只棕色牛皮公文包。有三边金属拉链，左上角还缝了提带，脊背上部有金属扣，用于扣住拉链上的金属锁，包内共有 5 层，有两个插笔圈。

西哈努克因对毛泽东的慷慨支援无以为报，为了略表心意将自己的公文包送给了毛泽东。

有些人使用公文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抖派头，过过“官瘾”或者显示自己是个“大款”。毛泽东用公文包却纯粹是“实用主义”。他的公文包用途甚至超过了一般的装文件的范围。而成了外巡或开会时的百宝箱，从里面找到铅笔、放大镜，还有烟、茶叶、牙签甚至食盐。毛泽东坐汽车时，公文包便放在他身边，随时取用其中物品，爬山时则由工作人员拿着。

因为什么东西都装，加上使用时间长，毛泽东的公文包多处磨损了，表皮发了毛，脱了漆，连拉链提手也断了，提带缝线亦脱落。毛泽东“恋旧”，不同意换一个新的公文包，工作人员劝说也没用，越俎代庖则会挨“骂”。

终于，一个能让毛泽东换公文包的人出现了——这个人是毛泽东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的交往可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那时，新中国如处在襁褓中的婴儿，以美国为首的几乎所有西方大国，都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可是，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却能坚持中立，支持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毛泽东正是由此了解西哈努克的为人的。在以后的数十年，毛泽东给予了西哈努克巨大的支持和无私的援助。

1956 年 2 月，西哈努克首次访华，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作了第一次会晤。在西哈努克眼里，毛泽东身材魁梧，气度恢弘，慈祥而又富表情的面孔闪烁着智慧、沉着与坚毅。毛泽东说：真正独立的国家不要让别的国家控制；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毛泽东赞赏柬埔寨采取中立是最好的立场。

西哈努克代表柬埔寨王国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授予毛泽东一枚最高勋章。西哈努克说，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古老的关系已经有了大约 1000 年的历史。由于我们取得了完全的独立，今天我们才有优越的条件前来同柬埔寨最古老的朋友——中国重建友好关系。

中、柬两国的友谊在 70 年代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1970 年，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将西哈努克亲王废黜，3 月 13 日西哈努克访问法国之后到了苏联。

3 月 19 日，西哈努克离开不愿收留他的莫斯科抵达北京。毛泽东特派周恩来来到机场迎接。3 月 23 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建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西哈努克任主席。从此，西哈努克以中国为大本营，领导着国内的复杂斗争。

4 月 30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派遣美军和南越伪军侵入柬埔寨，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西哈努克感到十分愤怒和焦灼。而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上，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毛泽东的用意是明显的：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支持西哈努克的态度。5 月 1 日傍晚，西哈努克的座车驶入天安门，西哈努克登上了城楼，毛泽东已等候在会

见大厅，他站起来，向西哈努克伸出那扭转乾坤的大手。

此次，毛泽东与西哈努克长谈将近两个小时。毛泽东显然已显苍老，但记性仍很好，他提到了西哈努克 1956 年、1958 年和其他几次访问中说过的原话；他对柬埔寨的事态发展了如指掌，他严厉谴责朗诺的背叛，表示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抗美救国。

西哈努克不安他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行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

毛泽东说：“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愈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的确，毛泽东给西哈努克的不仅仅是声援，而且有物质上的无私援助。中国将宽敞漂亮的前法国大使馆交给西哈努克作官邸，还给予了西哈努克大量经济、军事支援，当西哈努克提到偿还时，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军火商。”

5 月 5 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成立，西哈努克亲王任国家元首，宾努亲王任首相，乔森潘任副首相。5 月 20 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21 日，北京举行数十万群众的集会，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与西哈努克叙谈。之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走上天安门城楼，几十万群众齐声欢呼；会上宣读了毛泽东的“五·二 声明”，巨人之声响起来了：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西哈努克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北京举行 150 余万人的声援游行。

1970 年 10 月 1 日晚，毛泽东又一次与西哈努克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1 周年庆典。天安门广场华灯照耀，城楼上 20 盏巨大宫灯红光四射；礼炮齐鸣，礼花绽放。毛泽东询问着柬埔寨战场的形势，西哈努克告诉毛泽东，他的国家已有 2/3 以上的国土获得了解放，民族解放军已包围了金边，金边已陷入孤立。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我打了 20 多年的仗，也不是从书本上学的，而是通过斗争学的。当时我没有要求打仗，是蒋介石要我打的。第一是蒋介石帮忙，第二是日本人帮忙。毛泽东的话给了西哈努克亲王以极大鼓舞。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在陈毅元帅及夫人的陪同下访问韶山，在故居前合影留念。

从 1970 年开始，西哈努克长居北京；他的国家，经过 5 年多浴血奋战，终于在 1975 年 4 月 17 日解放了金边，4 月 19 日取得全国胜利。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的交往，可称晚年毛泽东人生中一段瑰丽动人的篇章，从中折射出毛泽东一如既往的无私博大、慷慨大方、同情弱小、不畏强暴的高尚人格。应当说，毛泽东对西哈努克和弱小的柬埔寨倾注那么大的热情，一方面出自毛泽东人格深处固有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反映了晚年毛泽东的激越情怀；他事实上领导了一场第三世界国家对第一世界的两个超级大

国的伟大斗争，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也就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当时，西哈努克对毛泽东和中国的援助没齿难忘。当然，他是无法回报的，毛泽东也是不需要回报的。西哈努克看到会见他的这位世界巨人，身边带着的一个公文包已磨损得很厉害，为了聊表心意，将自己的一个公文包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不忍拂了老友的一番心意，接受了这件礼物。

这是一个黑色牛皮公文包，为法国制造，宽 43 厘米，高 40 厘米，厚 10 厘米，带锁上有两个提手。来到韶山的人们，参观《毛泽东遗物展览》，看到西哈努克送给毛泽东的这个公文包，不能不使他们回忆起那段已逝去 20 多年的历史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送给毛泽连的旧皮箱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陈列着一只破旧的皮箱，长 70 厘米，宽 36 厘米，高 18 厘米，系棕色牛皮制成，内层为纸壳。衬白布底，边角无破损但箱面下塌。这只皮箱为毛泽东用过，1949 年 10 月，他将其送给了堂弟毛泽连。

毛泽连是与毛泽东血缘关系最近，建国后尚健在，1995 年才去世的一位堂弟。毛泽连字咏发，其父毛贻经，字蔚生，其祖父毛恩农字嘉宾，号德臣，其曾祖父毛祖人字四端，毛祖人也就是毛泽东的曾祖毛泽东将自己用过多年的旧皮箱，送给堂弟毛泽连。毛逝世后，泽连老弟将皮箱捐赠给韶父，这就是说毛泽连山毛泽东陈列馆，现已成为革命文物。是与毛泽东共曾祖父的堂兄弟。

毛泽连世居韶山冲滴水洞口的东茅塘，1888 年以前，毛泽东的上辈人也一直居东茅塘。清·光绪四年（1878），他们的曾祖父毛祖人买下上屋场东边 5 间半茅草房，先由毛泽连的祖父毛德臣住。光绪十四年（1888），毛祖人的两个儿子分家，次子毛翼臣即毛泽东的祖父分得上屋场，这样毛泽东的父母便随毛翼臣离开了东茅塘，而毛泽连仍祖祖辈辈、子子孙孙居东茅塘。

毛泽东与毛泽连堂兄弟共有 10 个，毛泽东排行第三，毛泽连则为第九，人称“毛九阿公”。

毛泽连虽为“皇亲国戚”，但丝毫未因此得到毛泽东的庇荫。韶山冲的人们能经常见到这位身材消瘦，脸膛黝黑的老人，时常拄着一根拐杖，微驼着背，无言地走出东茅塘那一担柴式的老旧农舍，独自来到毛泽东的铜像前伫立一会，然后“囊囊”的拐杖点地声渐渐远逝。这是细心的人们直到 1995 年尚能在韶山看到的一道风景。唯一引人注意的是，老人的身高足在 1.8 米以上，这是毛家遗传的结果。

毛泽连患有眼疾。那是青年时代留下的。一日，他夜行归家，手上拿的火把突然熄灭，冷不防摔了一跤，左眼被柴草扎了一下，顿时鲜血直流，因家贫无钱医治，化脓致残，从此左眼失明。以后几十年，毛泽连靠着一只眼，熬过了人生无数的艰难。他曾抱怨自己因眼疾而未能多为革命做一些事，三哥毛泽东劝慰说：“没入党不要紧，只要你的思想好就行。”

1949 年 8 月，毛泽东的大军经过韶山，浩浩荡荡直下衡（阳）宝（庆），韶山获得了新生。当时的报道说：

在湘乡，我们和坚持地下游击战争的湘中第一支队第五团的同志们会师了。18 日，他们派人从离湘乡县城 50 里的韶山冲，热情而兴奋地接来了毛主席的堂兄弟和两个侄子。

“堂兄弟”就是指的毛泽连。该年 9 月，毛泽连与一位表兄弟李轲结伴到北京，去见他的三哥。毛泽东与毛泽连分别已 22 年了（还是在 1927 年 1 月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曾相会）。兄弟俩非常高兴，毛泽东见堂弟左眼失明，右眼也有病，即叫来儿子毛岸英，并请了田家英一同陪他到协和医院治疗，还让李敏、李讷照顾这位家乡来的堂叔的饮食起居。医师给毛泽连动了手术，术后，毛泽东来到协和医院看堂弟，毛泽连问：“主席三哥，医师讲要给我换上一只假眼珠，你看换还是不换？”毛泽东知道九弟的眼病拖得太久，已无法复明，他说：“换只假眼睛也只是个摆设，还是看不见。”如此，毛泽连的左眼便一直空着。

这次毛泽连在北京治病兼疗养，颇住了一段时间。毛泽连住了一个月，没料到三哥对他说：

“九弟，你的眼病北京治不好，你还是早些回韶山。”

毛泽连虽然有点想不通，但也只好默默地打点行装。倒是李轲又去见了毛泽东，代毛泽连诉说了生计艰难。毛泽东说：“泽连的困难我晓得，但比起全国人民的困难，就不足道了。”话虽这么说，毛泽东还是将堂弟的困难放在了心上。10月初，毛泽连遵嘱离京，临行，毛泽东打发了不少东西，其中就有那口皮箱，箱内装满了蚊帐、棉衣、棉裤和衬衣。

毛泽东不愿徇私情，但他又是一位人情味很浓的领袖，特别看不得人家受苦。他便采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这种情愫。堂弟离去后，他怅然若失，想起当年父亲毛顺生趁泽连的父亲家贫，将其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乘机“兼并”过来，“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心中对毛泽连顿生怜悯。于是毛泽东从自己稿费中支出200元补助堂弟，这成为以后每年毛泽东定期必做的事，一直延续到1958年。后来中央办公厅每月寄20元给毛泽连，连着寄了好几年，毛泽东知道了，便让工作人员以自己稿费补交了。

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连共到北京去了11次。这11次都是事先经毛泽东同意的，每次，毛泽东都抽时间与堂弟叙谈。1954年，毛泽连又准备去北京。毛泽东在信中叮嘱：“要自己准备路费，不要麻烦政府。”毛泽东还记得4年前送给堂弟的那只皮箱，似乎对以一件旧货送人有些歉意，打趣他说：“润发，那次没给你买新皮箱有意见吧！这次买口新的带回去。”毛泽连忙说：“三哥，老弟穷了半辈子，哪里还能讲排场。”毛泽东未食言，真的买了口新皮箱送给泽连。

可是，并不是堂弟每次上京的要求都得到了允许，有好多次，毛泽东却是近乎“无情无义”。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与多亲们的合影，右一是他的堂弟毛泽连。

毛泽连的母亲，即毛泽东的婶婶陈氏患病，1950年先后到湘潭医院和长沙湘雅医院治疗，但都不见好转，毛泽连通过在长沙的房侄毛远悌写信给三哥，提出想送母亲上北京治病，半个月后，毛泽东即亲笔向信不同意他们来京。1952年6月，陈氏去世，毛泽连曾想上京，因为除了眼病，他又得了脚病，毛泽东回信，一面对“慰生六婶”的去世表示哀悼，并寄了旧币3百万元（合300元）给毛泽连，其中100万元为安葬费，200万元给毛泽连治病。一方面又说：“不要来京。”1952年1年，毛泽东就3次直接给毛泽连或者在给毛字居的信中对堂弟的困难表示关心，但要他不要上京。

对三哥的这种劝慰，毛泽连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渐渐明白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并以之作为谆谆教诲。他在土改中分了田，他带领全家参加互助组、高级社，他带病参加集体劳动，从不以“皇亲国戚”自居。默默地将其余生，挥洒在故乡热土上。

毛泽东送给毛泽连的那口皮箱，毛泽连一直用着，虽然后来又有了一口新皮箱，毛泽连还是用着。直到毛泽东主席去世后，毛泽连将旧皮箱献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作为文物收藏。

李讷迟到的生日贺礼

1955年2月初，毛泽东收到小女儿李讷的一份迟到的生日礼物——“寿桃”，这不是真的桃，而是一幅桃画。

毛泽东开心地拿着这份特殊而精致的礼品：

但见两只鲜艳的桃子，还带着绿叶，清新可人。桃子一个大一个小，两桃中间偏上方，写了个“寿”字。桃是画在一页裁成圆形，边上带齿的粉红色纸片上的；在桃的外围，女儿用小巧的手，精心编织了蓝色的绒线网。翻过来，见背面清秀的钢笔字写着：

送给亲爱的爸爸

女儿李讷

随“寿礼”还有一封“祝寿信”，信说：

亲爱的爸爸：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的，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李讷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送给父亲生日的礼物——寿桃。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上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爱的小爸爸，永远年青、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

热烈爱着你的女儿李讷

1955.2.8

李讷是毛泽东的小女儿，1940年8月生于陕北延安。毛泽东与李讷，父女之间，一往情深。

毛泽东是近50岁得女，自然视为掌上明珠。那时正是战争年代，毛泽东运筹帷幄，日理万机，但他喜欢把女儿带在身边而没有让李讷进保育院。闲暇，父女逗乐，毛泽东喊她“大娃娃”，李讷则喊父亲“小爸爸”，引得毛泽东哈哈大笑。毛泽东还不时带女儿散步，教女儿认字，给女儿讲故事。李讷很顽皮，当父亲在院子里李讷在毛泽东生日写在父亲的贺信。独自沉思踱步时，她也学着毛泽东的样子，背着手，跟在后面走——一般情况下，父亲都不会发现，因为他正陷入沉思。可是有一天，走着走着，毛泽东突然返身捉住李讷，做出吓人的样子，李讷“咯咯”笑起来，原来毛泽东这次是有意“假散步”。

1947年3月，毛泽东和党中央撤离延安，父女就要分别了。隆隆的炮声中，毛泽东问李讷：“飞机轰炸，你怕不怕呀？”李讷说：“我和阿姨跑到防空洞里就不怕了。”毛泽东又问：“现在，敌人离延安不远了，正在往这里打炮，你怕不怕？”李讷说：“爸爸不怕，我也不怕。”毛泽东说：“很好。看看飞机轰炸，听一听炮声，这也是对你的锻炼呀。大人需要锻炼，小孩也需要锻炼。”

的确，毛泽东对儿女是既疼爱但又不溺爱。转战陕北期间，父女俩分别达半年多，再见到女儿时，李讷明显地黑了、瘦了。毛泽东一把抱起李讷，又亲脸蛋，又拍她的后背，拍一下念一句：“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

哟！”“娃娃，我的好娃娃，好娃娃。”李讷也高兴地嚷起来：“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她从父亲怀里钻出来，给爸爸表演了一段京剧“打渔杀家”，毛泽东看着看着，眼圈红了，湿了。

1947年冬，毛泽东带着女儿住在杨家沟，其时，粮食紧张，基本上是吃晋绥军区老根据地支援陕北的黑豆。有一次，李讷见大家吃饭时嘴都是黑的，她笑了，对毛泽东说：“爸爸你看，阿姨，叔叔的嘴都是黑的。”毛泽东一听，严肃他说：“不要笑。前方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饭打胜仗。黑豆好吃，吃了黑豆也能长胖长高。你也该带上碗筷和阿姨一起去吃黑豆饭。听爸爸的话，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孩子。”此后，7岁的李讷便也去食堂吃起了黑豆。

1953年，李讷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上面我们提到的寿桃，就是在这所中学读书时，她精心制作送给父亲作生日礼物的。1959年，李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她大病一场，1961年不得不在家休学，而这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无暇多过问女儿的情况，她为此感到苦闷。1962年元旦，李讷给父亲寄去了一张贺年片，毛泽东1月9日复信说：

李讷：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用写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1962年1月9日

毛泽东这封信亲切、平易，甚至有些孩子气，女儿看了，苦闷顿消，她与父亲心心相印，所以立刻理解了这段时期父亲对他关爱较少的缘故。这以后，她便随时给父亲写信了，因为她知道这可以使父亲从紧张的劳累中走出，从女儿的温馨中得到慰藉。毛泽东也经常给她回信。1963年1月4日的一封信可谓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如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1月4日

15日，毛泽东在给女儿的信中鼓励她：

“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交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毛泽东特别注意培养女儿的意志力。他深知女孩子通常意志力较差，他

不仅仅在与女儿的交谈中培养女儿的心理素质，更通过实践的考验来培养她，后者比前者更显得有效。他曾多次带女儿到大海游泳，当李讷套上救生圈，毛泽东立刻叫她拿掉，交给旁边的工作人员；有一次，从拂晓5点多，毛泽东与女儿一直游到11点多，李讷游得精疲力竭，但有父亲的鼓励，一直坚持了下来。

1958年初，李讷因急性盲肠炎动了手术，同时取出小时候打针断在肉里的针头，不慎感染发烧。毛泽东于工作紧张中十分惦念女儿的病，2月3日通晚未眠。中午他服了安眠药，临睡前给女儿写了一封长信，着重谈到“意志力”的问题，毛泽东说：

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

李讷接到父亲的信，果然精神为之抖擞，很快战胜了疾病。

毛泽东爱子深，教子严：公私分明，原则问题不马虎。李讷在北大读书，他反复叮嘱她不要将自己特殊化，应视为普通一员。李讷与一般同学一样，吃、住在学校，只有周末才回家，路上要花一个小时。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曾瞒了毛泽东派车去接，毛泽东知道了，大发雷霆：“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从此，卫士再也不敢去接了。李讷因此在校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知道她是一位“公主”。

三年困难时期，李讷——毛泽东的女儿，也与全国人民一样饿肚子。她一个月只有27斤口粮（这是她自己为分担国家困难主动报的，毛泽东也不许她从家里带东西。李讷曾带去一包奶粉，毛泽东很不高兴；卫士有一次去看李讷，顺带了一包饼干，毛泽东发了火。他说：“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如此，李讷周末回家，都成了“打牙祭”的机会，她一上餐桌，每每风卷残云，狼吞虎咽，连泔盘子的水也不放过……看到女儿饿成这样子，毛泽东心里也难过。他喃喃地说：

“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

致毛家亲友的信件

毛泽东写给韶山毛家的信件（不含给毛岸英、毛岸青等的信）。现存有37份，可惜的是致其父母的信至今尚未找到。所存年代最久远的是1938年5月26日写给毛宇居的信，建国前仅存此一封，余为建国后的信件。其中1949年有5封，1950年有10份，1951年有3封。1952年有4封，1953年有3封，1954年有4封，1955年有1封，1956年有5封，1958年有1封，此后与韶山毛家便几乎没有通过信了。这些信件基本上都保存完好。

毛氏家族在韶山一带是一个大家族，目前韶山市有毛姓3400余人（1990年统计）。这个家族在韶山冲尤其首屈一指，按其内部结构分为震、鉴、深、璫、石羊五大房（前4房以祖宗名命名，后一房以居地命名），在韶山冲至今保存了三座祠堂即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毛鉴公祠。毛泽东属长房震房，世居韶山冲滴水洞外的东茅塘，1888年，其祖父、父亲搬到上屋场。

不过，毛泽东没有强烈的家族观念，他一生有意识地打破这种观念，事实上，“家族”概念，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基本上消失按亲疏，东茅塘诸毛姓与毛泽东关系是最近的，这中间，与毛泽东通过信的有毛泽连、毛宇居、毛泽嵘等。其中写给毛宇居的信最多，达10余份，写给毛泽嵘的也有至少5份。此外与毛远翔、毛泽青、毛照秋、毛贻华、毛春轩、毛逸民、毛爱桂、毛远悌、毛泽益、毛桂昌，毛岳乔、毛月秋、毛少贤、毛笔珠、毛春秀等近20位关系或远或近的族人都有过书信往来。

与毛泽东通信最多的毛宇居无疑是与毛泽东关系最亲密的族人之一。毛宇居与毛泽东为堂兄弟，毛泽东以上历代先人为毛贻昌（顺生）、毛恩普（翼臣）、毛祖人（四端）、毛祥焕，毛际耀……毛宇居的历代先人为毛贻谋（福生）、毛恩甫、毛祖基（兰芳）、毛祥瑞、毛际耀……

毛泽东与毛宇居的亲近，除了族缘关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曾经来往十分密切，尤其是毛宇居曾当过毛泽东的私塾先生。毛宇居在毛泽东出乡关之后，给毛泽东帮过不少的忙，如照料毛泽东的父母、帮毛泽东料理父母后事、1925~1927年辅佐毛泽东在故乡开展农民运动，乃至护卫毛泽东祖坟等。他还保护过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并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建国后，毛宇居主动积极地充当了故乡人民与毛泽东之间的信使，向毛泽东反映乡情，或亲上北京拜见毛泽东。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给毛宇居的信说：

宇居兄左右：5月10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自省。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此复，即颂时绥！

弟毛泽东

5月26日

远耀等在此甚好。

这是现存毛泽东写给毛宇居的最早的一封信，写作于抗战爆发之初；毛宇居视为珍宝，冒着生命危险将信藏于墙壁夹缝，解放后上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46军南下衡宝，途经韶山，派人到韶山冲寻找毛泽东的亲属，毛泽连、李轲随即去北京见毛泽东，毛宇居托毛泽连，李轲带去一信，并写了《七律二首·导师颂》献给堂弟，诗云：

一领青衫运远谋，手无寸铁敌王侯。
拔山立海翻天浪，斩草除根解逆流。
饥溺为心能得众，黔黎请命矢同仇。
最难主义坚金石，百折不回气愈遒。

毛泽东于 11 月 28 日回信说：

禹居家兄：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

毛泽东

1949 年 11 月 28 日

毛泽东与故乡一别达二三十年，20 多年中与族人几乎没有联系，那是因为关山远隔，更因为政治的阻绝。当故乡族人知道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古旧的观念复苏：皇帝老子登基了。这种观念存在于当时不少毛氏族人中。他们纷纷向毛泽东写信，或要求上京一游，或要毛泽东帮助解决工作，对此，毛泽东总是耐心劝导。

毛远悌，字乙夫，是毛泽东的六代堂弟毛泽癸之子，毛泽癸曾参加过毛泽东组织的农民运动，后在外失踪，留下毛远悌兄弟三人与母亲辛酸度日。1940 年，毛远悌到《力报》社印刷厂做工，此后直到解放初都在印刷行业。1950 年初，他写信给毛泽东，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要求到北京学习，他在连写了两封信后，毛泽东于 1950 年 5 月 12 日回了信。

远悌贤侄：两次来信收到了，很高兴，你做印厂工作极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时再说。远翔是否尚在革大学习，有信请转交。远翔略历我忘记了，便时请告我。此祝进步！

毛泽东

1950 年 5 月 12 日

毛泽东要毛远悌搭给毛远翔的信写于同一天，内容也是要其不要来北京：

远翔贤侄：两次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顺，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进益。……

毛远悌、毛远翔在接到毛泽东的信后，遵嘱留在湖南，未再提去北京的要求。

毛森品既是同族人，又与毛泽东是湘乡东山高小和驻省中学的同学，其兄毛钦明亦是毛泽东的同学，1927 年还陪同毛泽东考察过湘乡农民运动，1928 年为革命献身。毛森品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家乡情况，并要求毛泽东为他推荐工作，1950 年 4 月 18 日，毛泽东复信说：

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一面婉言拒绝为毛森品推荐工作，一面又体谅老友困难，他先后三次给毛森品寄去 550 元钱。

毛泽东 50 年代初致故乡族人的信，大多很简短，其中心内容和最为闪光之处都是不让族人产生“荫庇”心理。如 1950 年 5 月 7 日给毛贻华的信说：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尚祈鉴谅。5 月 8 日给毛春轩的信说：去年 12 月来信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浪秋、迪秋诸位均宜在家工作，

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1951年2月15日给毛岳乔的信说：你的生计困难，甚为系念，但我不便有所介绍，仍望在原地自己设法解决。1956年12月13日毛泽东回本族姑妈的信说：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乞谅为荷。

毛泽东对待像上面这些提出要求引荐或解决工作的族人，均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拒绝方式，不让他们存留幻想，效果很好！但同时，毛泽东也是看重乡情、亲情的，他往往用寄款赠物资助或答应一些族人到北京小住的方式安慰他们。

如1949年11月28日，毛泽东复毛泽荣的信中就提到“托毛李（指毛泽连、李祝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次年5月12日回毛泽益的信中亦有“兹寄上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合250元），以应急需，收到时请告知为盼”的句子。1952年10月2日致毛宇居的信说：“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然而毛泽东也并非有求必应，因为他一己之力，要完全用自己的稿费解决百姓的生活困难，事实上是不可能的。1950年5月8日他给毛逸民的信件中说：

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对于族人上京的要求，毛泽东采取区别对待。如上文所述，对欲借毛泽东威名谋职，或想长居北京当“食客”、“门人”的，毛泽东坚决回绝；而对想借上京之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或者一般的短住游历的，毛泽东表示欢迎；从时间上来说，愈到后来，毛泽东愈难随便答应族人上京了。

1951年9月4日毛泽东写给

毛宇居的一封信说：

接到梅清、有成二兄的信，想来京一游，我认为可行。如禹居兄有兴趣，亦可同来一游。来者以三兄为限，他人不要来。到京大约可住一个月至两个月，太久则不方便。如三兄同意这几点，即可偕我这里派的同志一道来京。

1952年7月11日毛泽东复毛宇居信说：“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

毛泽东的原则性即使对于至亲亦不轻易改变。毛泽连身患眼疾，曾多次上北京，得到毛泽东的悉心照料。然而从毛泽东的信中看，也有多次不让他来北京。1951年12月11日信说：

泽连、远悌：来信收到。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后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长沙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

1952年10月2日毛泽东又要毛宇居转告毛泽连“请告他不要来京，可

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

从 50 年代末起，毛泽东与故乡族人通信日见稀少，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日理万机，已无法过多分心于写家信；另一方面也因为族人通过近十年与毛泽东的鸿雁往来，了解也理解了毛泽东不愿徇私情的脾性，因而他们也很少写信给毛泽东提个人要求了。第三个原因，与当时政治的从紧和毛泽东形象的“神化”亦不无关系。

致文家亲友的信件

毛泽东与外祖文家的长期交往，可写成一篇篇动人的佳话。鸿雁传书，有几多悲欢离合，凡人泪，伟人情；不违原则，不徇私情，有时还近乎严厉……

发人深思的是，毛泽东致亲人的信件中，最早最完整的就是写给外祖家诸位亲人的8封信。

文运昌，名士苻，字运昌，又作润昌、咏昌，排行十六，乃是毛泽东八舅父文玉钦的次子，毛泽东称他为十六哥。文运昌与毛泽东关系极为亲密，且对少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当毛泽东出生时，文运昌已有9岁，是名符其实的大哥，对小弟，运昌有过长达近十年的用心呵护，因为幼年和童年的毛泽东，直到1902年，差不多全部时间都是在外祖家与诸表兄共度的，这也是毛泽东人生之初一段无忧无虑，没有任何压抑的美好时光。最重要的是，当1910年，毛泽东面临失学并断送前途的险境时，文运昌给毛泽东指引了一条路：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去学习。这是毛泽东人生第一次大转折，从此他挣脱故乡的束缚，开始展翅高飞。此时，文运昌26岁，已从湘乡东山高小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毕业，他向东山学校引荐，并亲自陪同毛泽东进入该校。

毛泽东走出韶山冲，眼界大开。此后，他与文运昌关系更密切了，从一般的玩伴而上升到知己和学友。文运昌关心毛泽东的成长，借了不少时论新书如《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给表弟看。

对这段经历，毛泽东在后来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多有提及，足见印象之深。不过，在20年代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有些疏远了。

1922年11月11日毛泽东给文运昌的信说：

运昌姻兄：来示接读。刘君实在无法安置，今刘回乡，情形请面询之。弟在此无善足录，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舅父母一函请面呈。各位表兄嫂同此问候。有暇盼兄时赐教言。即颂 乡祺！弟泽东上

11月11日

原来，在毛泽东略已成名，事业有起色时，文运昌仗着与弟的情谊，有求于他，想让他帮助安排同乡“刘君”的工作。这样的情况，以后几十年，特别是建国后，还发生过多次。然而毛泽东却不愿为此询私情，有时甚至显出不高兴。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又一次接到文运昌的引荐信，毛泽东为此于11月27日写了一封颇长的回信。

运昌吾兄：莫立本到，接获手书，本日又接11月16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俸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并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毛泽东这封“家书”，既无情又有情，堪称中外古今名人书信的典范，其大公无私跃然纸上。

毛泽东与表兄文运昌最后一次书信往来是1950年4月19日，信很短，云：

运昌仁兄如晤：接到了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顺颂安吉毛泽东 1950年4月19日

毛泽东是个 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致文运昌信手迹。多情男儿，一方面铁面无私，而对过去情谊深铭于心。此信发出后，他惟恐文运昌收不到，又分别写信给其他几位表兄弟，询问文运昌的情况，当年5月7日和12月在给文润泉、文南松的信中都谈到：“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直到文运昌来信，他才放心。

不过，对毛泽东的“情”与“无情”，文运昌及诸兄弟一度未能很好把握其中的“辩证法”。建国初，文运昌曾给毛泽东身边的田家英写信，开列了14个人，均系毛泽东外祖家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毛泽东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1950年5月12日，他复文南松的信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从1910年毛泽东出乡关到本世纪50年代初，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写给文家亲人的信件现存共约20封，其中建国前8封，建国后12封。建国前的信除给文运昌的3封，还有给七、八两位舅父的4封信。这4封信分别写于1918年8月，1919年4月28日，1922年7月5日和1922年11月11日，均发自省城长沙，内容是一般的寒暄、问好和家常。这是毛泽东保存至今的年代最久远的信件，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

而最富有教育意义的信件则是建国之后的。粗略统计，1949年有致文南松一封（11月28日），1950年则有致文运昌（4月19日）、文润泉（5月7日）、赵浦珠（5月7日）、文润泉（5月7日）、文南松（5月12日）共5封。1951年到1958年，计有致文梅清（1951年9月4日）、文炳璋（1951年10月10日）、文润泉（1953年9月8日）、文九明（1953年10月25日）、文平山（1954年4月21日）、文炳璋（1955年5月1日）6封。

建国后毛泽东致文家亲人的信一句古诗可概而括之：“道是无情却有情。”

毛泽东外祖文家，是个大家庭，支系庞大，四世同堂。毛泽东外曾祖父叫文作霖（1797~1824），外曾祖母贺氏（1882年去世），生有三子即文绵薰（1821~1888），文绵芳和文绵姜，文绵薰又名芝仪，即毛泽东的外祖父；毛泽东未见过外祖父，他在毛泽东出生前5年就去世了；毛泽东的外祖母为贺氏（1826~1909），她是一位极慈祥而又好强的女人，毛泽东童、幼年时期得到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于奠定毛泽东乐观、奋发的人生观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贺氏生有三子三女，即毛泽东的舅父文玉瑞（1853~1920：名正义，字勃生，毛泽东称七舅和干爹），文玉钦，名正莹，毛泽东称八舅，丈正材（早夭），毛泽东的大姨妈钟文氏、二姨妈王文氏和毛文氏即毛泽东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位舅母均姓赵。

毛泽东与外祖文家表兄嫂、姨表兄王季花等在中南海合影。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两位舅父比毛泽东的父亲分别大了 17 岁和 11 岁，当毛泽东在家受父责逃避至舅舅那里时，总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毛顺生虽有些专横，但对年长 10 多岁的妻兄是很尊重的，特别在 1910 年毛泽东面临人生选择时，两位舅父更起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外出不能照顾家庭时，母亲重病亦曾回娘家，得到两位舅父的悉心照料。八舅父还因与毛泽东的关系被捕坐牢以至病贫而亡

毛泽东除了亲舅父，还有两位叔外公所出的几个表舅文正儒、文正美、文玉森。

毛泽东的表兄则更多了，七、八舅父所出的有：文谷香，文润泉，文梅青（七舅之子）、文泮香、文运昌、文南松（八舅之子）。其他表亲还有文凯、文东仙、王星臣、王季范、刘霖生、赵浦珠等。

毛泽东与诸表兄弟自幼玩耍，儿时友谊长存于心。毛泽东人主北京后，多有书信往来，有的多次上京见毛泽东。

1950 年 1 月，文润泉曾写信给毛泽东，请其为自己本家好友文凯介绍参加工作，5 月 7 日，毛泽东复信：“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1953 年，文润泉又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要去北京并要介绍其岳家赵氏一个亲戚到北京读书，毛泽东复信说：“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办法。”

毛泽东虽然与外祖家感情深笃，但对外家亲人要求甚严。文润泉等多次上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一面热情招待，还给他们添制衣服或赠送钱物，一面对他们的非份要求，如要坐飞机，要做长袍，或要留下长住或替人介绍工作，毛泽东则婉言回绝，甚至发了脾气

1954 年 4 月 29 日，毛泽东给中共石城乡支部、乡政府关于严格要求他的亲属“勤耕守法，不应特殊”的信。

1954 年秋，文运昌在北京舍不得走了，毛泽东竟下了“逐客令”，说：“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

毛泽东 1953 年 10 月 25 日给文九明（毛泽东的表侄）一封信说：

九明同志：10 月 2 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

毛泽东的亲戚要上京，毛泽东一般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不允许长住或有其他“小九九”，他往往还叮嘱“不要带任何礼物”，在这句话下加上着重号。又嘱“其他的人”即预先未做计划的人“不要来”。

毛泽东不但通过直接与外祖家的亲人的对话敦促他们不要以“皇亲国戚”自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还要求当地政府不要对文家另眼相待，如 1950 年 5 月 27 日，他曾写信给湘乡县县长刘亚南。

亚南同志：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坪助文氏兄弟四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

毛泽东与文家亲人的一封封信件，翰墨留香，这不仅仅因为毛泽东的这些手书灵气飞动，为其书法成熟期的佳作，更主要的是，信的内容无处不显出一位伟大人物在处理公与私、国与家之间关系时的高度原则性与艺术性。

致韶山友人的信件

毛泽东与家乡故交旧友也有不少书信往来。时间跨度是1949年11月到1957年6月。如将致韶山及湘潭、湘乡当地政府及有关地方领导的信包括在内，共有的50余份，超过了致毛家或文家的信件的数量，与后二者的总和大致相当。仅从数量的统计也看得出，毛泽东并没有将自己的亲戚与故乡的上般乡亲另眼相待，而是有意一碗水端平。

这些信件，按受信人身份和信的内容约略可分成这样几类：

与早年的同学、儿时伙伴的信，如1949年11月28日致邹普勋信，1950年8月29日，1954年10月29日两次致郭梓材的信；与早年师长的信，如1950年8月23日、11月12日、1953年8月27日、10月16日致李漱清的4封信，1954年3月31日致彭石麟的信；与烈士家属的信，如致柳直旬烈士夫人李淑一的信，致烈士李耿侯之弟李介侯的5封信（1949年11月17日、1951年4月2日、6月23日、8月10日、11月18日），1951年12月8日致钟志申烈士之弟钟志刚的信，1950年8月23日给蒋梯空烈士的兄长蒋浩然的信等；与曾经给予毛泽东帮助或与毛泽东一同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些故乡人的信，如1949年11月17日给张四维的信；1950年3月14日致郭士逵的信；1950年4月19日致贺晓秋的信。

毛泽东早年的朋友、同学颇多，如住韶山冲大冲的张有成、与毛泽东的家里屋场紧邻的邹普勋、在井湾里私塾同过学的郭梓材，还有谭熙春、毛裕初等。

邹普勋，自幼与毛泽东在一起玩耍，后又同在邹春培（邹普勋的父亲）处启蒙，二人感情甚笃，毛泽东1949年11月28日写给邹普勋的信还极亲切地称其为“亨二哥”（邹普勋小名亨二，实际比毛泽东小7岁），还关心地询问：“听说你身体不大好，甚以为念。希望你好生保养，恢复健康。”1959年6月毛泽东回乡，还问起“亨二哥”，可惜邹已在两年前就去世了，毛泽东为此沉吟半晌。

另一位毛泽东称之为“张四哥”的是张有成，他们少年时不但常在一起玩乐、砍柴，1925年至1927年张还积极帮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并曾将毛泽东藏在家中，以避追捕。毛泽东不忘旧谊。1951年9月4日，他邀请张有成上北京：“接到梅清，有成二兄的信，想来京一游，我认为可行。”但他又嘱：“来者以三兄为限，他人不要来。到京大约可住一个月至两个月，太久则不方便。”张有成接信后非常高兴，与毛字居、文梅清结伴于9月18日从韶山动身，23日到达北京，毛泽东也很兴奋，设宴款待，又将岸英、李敏、李讷叫来，要他们喊三位老人为“伯父”。毛泽东又派人陪三人游览北京名胜，在中南海含和堂前，毛泽东与他们合影留念。临别，毛泽东送给三位老友一些礼物，有皮箱、衣服、鞋帽。张有成爱喝酒，回乡后，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乡间歉粮无酒喝，毛泽东1952年7月7日回了信劝慰他。

前后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你于阴历五月初一给我的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况。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乡里禁酒是因缺粮，秋收后可能开禁，你们也可以喝一点了。……

相对毛泽东的亲戚来说，故交旧友一般较少提要毛泽东推荐工作或谋其他私利，多数去信仅是叙叙旧情和反映民情，毛泽东对此持欢迎态度，回信

也勤，写得也较多。

毛泽东与李漱清一家的交往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李漱清与毛泽东的关系有双重的意义：李漱清既是对毛泽东少年时代发生过深刻影响的一位先生，又是烈士李耿侯、李贡侯的父亲。李耿侯是毛泽东 1925 年回乡开展农民运动依靠的骨干和亲手培养的韶山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李贡侯则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李漱清，又名劫，家住韶山冲，距毛泽东家仅 3 华里，清末毕业于湖南政法专科学校。他回到故乡，主张废庙兴学，提倡破除迷信，毛泽东少年时代常到李漱清处求教，深受这位“过激派”先生的影响。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李漱清，认为对自己的成长关系很大。李还积极支持自己的几个儿子参加革命，乃至有两子为此献身。

1949 年 11 月 17 日毛泽东致李耿侯烈士之弟李介侯的复信。李耿侯 1925 年由毛泽东培养入党。在给故乡友人的信中，毛泽东给李家的就达 9 份，其中写给李漱清的有 4 封，给其子李介侯的有 5 份。

1949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给李介侯的信说：

介侯先生：惠书敬悉，深感厚意。耿侯兄自 1928 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

李漱清共有 4 个儿子，即耿侯、贡侯、亮侯、介侯。到新中国成立时，已只剩下亮侯和介侯。除了为革命献出二子，他的长孙李德深即李耿侯之子亦于 1928 年牺牲，可谓忠烈之家。受父亲、兄长影响，亮侯、介侯亦参加了革命。毛泽东是了解这些情形的，他对李家因此也格外倾注关怀。仅 1951 年，毛泽东写给李介侯的信就有 4 份，而且破例几次为李介侯推介的人引荐工作。1951 年 4 月 2 日的信说：

介侯兄：请持此信去统战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办法为你妹妹找一个免费的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产科、护士或其他学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应当替她解决学习和工作问题的。

6 月 23 日复李介侯的信说：“介侯兄：李君有空军技术，可持此信去空军领导机关试行接洽，看可以收录否？因我不明李君的政治经历，要他自己向空军部门去说明一切。”11 月 18 日的信说：“10 月 15 日来信收到。汤臻真兄家属善后事，已与师范大学当局商妥，予以照顾。”

1952 年 7 月和 8 月毛泽东两次写信给毛宇居，邀请李漱清上北京。李漱清与邹普勋于 9 月 20 日乘京汉直快列车，于次日抵京，政务院交际处派了专人专车迎接，并将他们安排在远东饭店，住头等房间，吃小锅小灶。25 日，毛泽东派叶子龙和警卫处长王敬先到李漱清处，陪李、邹到王府井各做了一套呢子衣、一件大衣、一双皮鞋。26 日上午 11 时，李漱清、邹普勋、张干、罗元鲲这几位故交、师友乘车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说：“老朋友来了，欢迎，欢迎。请坐！请坐！”

这次，毛泽东与这几位老人畅谈达一个多小时。几时往事，家乡近况，天南海北，无所不叙。毛泽东说：“我小时候受到您许多教诲，您还是我的民主思想的启蒙老师呀！”李漱清则说：“太公八十遇文王，如今盛世升平，我这老朽也是人寿年丰精神爽啊！”

叙谈之后，毛泽东按乡里习俗为李漱清、邹普勋等设宴，共进午餐；晚

上，客人回到饭店，毛泽东又派人给每位送来一份礼物：盖被、褥子，布毯一条、枕头一对，枕巾、面巾各一条，还有袜子、香皂、牙膏、牙刷等。10月1日，毛泽东安排他们参加了国庆观礼。10月19日，李漱清、邹普勋第二次进中南海见毛泽东，次日，毛又派叶子龙送给李、邹、张、罗皮箱各一口；一日，李漱清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便条：“主席，余年八十，欲试航空，不知可否？请主席批准！”李漱清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满足。11月8日，毛泽东派叶子龙又给四人送去零花钱，每人150万元（台现币150元）。下午，第三次与李、邹、张、罗相聚，席间，毛泽东婉言问到客人的归期，说：“现在我也不留你们了，如果回去，就告诉秘书，做好三件事，每个人做一套制服，一件呢子大衣；衣服已经做了，你们穿在身上，再送你们每人人民币100万元（旧币），……”又说：“如今我并不富，不像过去的皇帝，要什么就有什么。你们来京的一切用费，都是用我自己的钱，用我的稿费开支的。”毛泽东与四位师友合了影，还给邹普勋的一本《社会发展简史》签了名。

毛泽东对待故交旧友确是颇着重的，一般来说，对长者，先生，尤其民主人士，均表现得极为尊重，而对晚辈则相当严格，即便如此，毛泽东不徇私情的原则仍不能变。如1953年10月16日他给李漱清的信就说：“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尚祈谅之。”

郭梓材是毛泽东的少年同学，并且曾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1950年他曾去信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婉劝“北京人浮于事，吾兄工作问题，还得就当地熟习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愚见如此，尚祈斟酌。”

虽然毛泽东不愿为郭梓材出面谋职，但他又是非常关心这位老友的。从1950年到1962年，毛泽东先后4次亲笔写信给郭梓材、刘天民夫妇，并请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复信7封，赠款6笔，计1700元。

建国初，毛泽东与故乡友人的交往，堪称人类交往。史上一段佳话。毛泽东以其博大无私的胸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回韶山招待乡亲的菜谱

毛泽东遗物中有一份独特的菜谱，那便是1959年，他回到阔别32年的桑梓，在韶山招待所请故乡人吃饭的菜蔬名单。看到保存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这份菜谱，仿佛几十年前发生的那一幕又展现于眼前。

那是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坐一辆灰色吉姆车，经湘潭而来，6点45分他抵达韶山冲。

故乡的招待所用了这样一些菜为他接风：

辣子鸡、炒腊肉、炖羊肉、烧水鱼、蒸青鱼、炒空心菜、烧豆腐、煎苦瓜和炒辣椒

同来的罗瑞卿、王任重等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有幸同享韶山的风味。

此次毛泽东在韶山活动了两天，住了两晚。他拜谒了父母的墓地，探访了友好的邻家，又走进自己的故居；他还到滴水洞畅游，最让人难忘的是6月26日那一场晚宴。

按照韶山乡俗，毛泽东25日一下汽车，就安排了请客吃饭。这一方面为了感谢故乡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他毛泽东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他要借此倾听群众对当前农村工作的意见。毛泽东共请了8桌客，有七八十个人。包括毛泽东的本家和外祖家亲戚如堂弟毛泽连、表兄文涧泉、文梅清、表侄文九明等；烈属贺菊英等；乡亲毛顺清、郭伯田、谭熙春……以及当地各级负责人和随行人员。

宴前，毛泽东召集一些年老的乡亲和当地社队干部开座谈会。只听毛泽东说：“我离开韶山30多年啦，今日子请大家来，想听听列位的意见，想请你们对我，也对政府提些意见，尽量提，放心讲。”

一听这话，乡亲面面相觑：给“皇帝老子”提意见？叩头喊万岁还来不赢呢！难堪的沉默。终于有人说：“搭帮您老人家翻了身，我们没得什么意见……食堂也办得蛮好，每餐三菜一汤……”这夸赞的话似乎说得很勉强。

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

时与乡亲们亲切交谈。

毛泽东忽然收起了他的笑容，变得很严肃：

“我不回，你们望我回；回哒，又不跟我讲真话！”

众人一听，毛泽东确实实是来听逆耳之言的了。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如春水冲开了闸门。毛泽东则似宽阔的湖海，尽纳心胸。他的心情变得很沉重，他看到了农村干劲冲天的背后的隐忧。老百姓们一旦放下恐惧与胆怯，便无所顾忌，用词也不加修饰而显出尖锐，比如一个老人竟质问道：

“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历来是各家各户，夫妻一起居住，互相照顾，现在男女要分开，像个什么世道？请问到底是主席搞的还是谁搞的？”

毛泽东说：

“办食堂是不符合实际的，将来要停办，要让夫妻住在一起。要使群众满意。”

他又说：

“你们的意见提得好。像这样的话，只有在家乡，在韶山才能听到，在中央，在其他地方是听不到的。”

毛泽东为了表示对“逆耳忠言”的鼓励，还特地让摄影师为他和几位敢

“直谏”的老人单独台了影。最后，毛泽东作总结道：

“乡亲们，你们提意见是对党的热爱，对政府的支持，希望你们今后还多提，大胆讲。回到北京后，中央要开会，好好研究，向全国下个文，统一解决食堂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才搞，没得经验，出了问题，中央要负责，特别是我负责。”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招待乡亲们的菜谱。毛泽东又虚心请当地各级负责人谈了谈他们的各自的看法。这个时候，有人喊“开餐”了。毛泽东也不忍心再让面黄饥瘦的众乡亲继续饿着肚子提意见。他要好好犒劳犒劳乡亲们。

韶山招待所的餐厅内，各色人等汇聚，从党和政府的最高首脑，各级要人，到卷着裤管赤着脚的乡里汉；从白胡子老倌到年轻后生，这恐怕是毛泽东主持过的人员最复杂的宴会了。但在这个宴会上，人们充分享受了平等。毛泽东致祝酒辞，没有文绉绉的话语，而只是一口未改的乡音：

“离开韶山几十年啦，我请列位吃餐便饭，敬大家一杯酒。”

一共摆了8桌，根据6月26日晚餐毛泽东菜谱的原始记录所载，宴会用了这样一些菜：

杂烩、木耳炒鸡、回锅肉、炒鸡杂、烧鲜鱼、烧丝瓜、炒豆角、菜心汤、排骨、香肠、咸蛋、卤味。

主食是米饭、稀饭、卷子。

没有山珍海味，都是韶山夏令家常菜，但对于饥肠辘辘的众乡亲来说，已是够丰盛的了。韶山冲的人们，起先还有些拘谨，毛泽东为了让大家放松，讲了古代一个百姓不敢见皇帝的笑话，大家便放开手脚夹菜、喝酒，不免也有因太饿而狼吞虎咽以致失态的。毛泽东回想宴前座谈会人们关于饥饿与办公共食堂的“控诉”，心情又沉重起来。他有些勉强地笑着对大家说：“慢点吃，慢点吃，还有菜。筵（筵）席筵（筵）席嘛！”可是，人们还是吃得很快。

毛泽东与他的先生毛宇居及烈属贺菊英、沈素华等老人在一桌，还有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等作陪。毛泽东起身向毛宇居敬酒，毛宇居连忙谦让：“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毛泽东又到各席去敬酒，一位乡亲说：“主席，我们已经喝过酒了，没有陪您老人家。”毛泽东笑道：“喝了酒可以继续吃饭，吃了饭也可以继续喝酒，要打破常规。”毛泽东的话引来阵阵笑声。

毛泽东频频向人们敬酒、夹菜，这一顿自己却并没吃什么。饭后，在松山苍松翠竹间，在那栋灰砖平房前，毛泽东与群众合影留念。他上身穿一件白衬衣，下身是一条灰布裤。当摄影师按下快门时，毛泽东的脸部显得有些严肃，他头脑中仍在想着乡亲们饥饿的情形……

饮食起居篇

普通而独特的毛氏菜谱

毛泽东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字：简单。在饮食方面，毛泽东的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毛泽东生前没有为后人留下“起居录”之类的东西，但工作人员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他的菜谱。毛泽东菜谱起始于1956年6月（此前阙如），终止于1976年9月8日，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一页页泛黄的故纸记录着一代伟人平凡的饮食生活，折射出毛泽东独特的饮食之道。

毛泽东的日常菜谱。

毛泽东菜谱由保健人员、卫士、生活管理员、厨师共同制订。据说，菜谱有两份，一份由厨房保存，便于厨师做菜；一份留存备用，以便下一步制订新菜谱时作参考。毛泽东本人对于保健医生制订菜谱的做法素来不怎么满意。他不愿按照菜谱吃饭。因为他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和个人喜好。工作人员制订的菜谱一般只注重营养的合理搭配，而无法完全照顾毛泽东那独特的饮食喜好。

徐涛从北京医大毕业分配在北京医院工作，不久便调到毛泽东身边作保健医生，他就曾无数次地饱尝毛泽东抵制菜谱的滋味。有一次，徐涛主持制订了一周的菜谱，毛泽东却极不领情。当时，毛泽东已两三天未吃上“正经饭”（一般只吃麦片粥、烤芋头甚至玉米、战争年代毛泽东吃的压缩饼干压缩饼干）。李银桥听说毛泽东饿了，想吃“正经饭”了，便跑去对毛泽东说：“徐医生早就定好了菜谱，就是没有机会做……”毛泽东不等他说完，打断说：“我不要他的食谱。你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并将大手一挥：“弄好了再叫我。”江青知道了此事，便有些恼火他说：“不要弄，吃什么东西不比红烧肉好？又不是没有东西吃。弄些鸡肉或者鱼都是可以的嘛，都比那个红烧肉强嘛！”尤其她听说毛泽东已好几天都在吃麦片粥后，生气他说：“你们就是不会办事！看我什么时候把你们那个电炉子、菜缸扔到外边去！”她吩咐卫士：“你们去厨房，要他们照厨师定的食谱做。徐医生说了，他定了一个礼拜的食谱，你们连三次都不能保证！”的确，毛泽东常常不按菜谱吃饭。对此，工作人员尤其是保健人员颇有意见，常常跟毛泽东讲理，但没有一次能说服毛泽东。有一次徐涛跟毛泽东“说理”，毛泽东听罢说：“你的话不听不行，全听全信我也要完蛋！照你那么多讲究，中国几亿农民就别活了。人生识字糊涂始，你懂吗？”还有一次，徐涛又跟毛泽东讲营养平衡，毛泽东听得厌烦起来，说：“我已经习惯了。凡事都讲一个平衡，我有我的平衡，你有你的平衡，你非要打乱我的平衡不可，不是搞破坏吗？”毛泽东还常常对保健人员说：“你讲我吃的没道理，实践检验真理，我身体不好吗？你搞的那一套也许有你的道理，但你到了我这个年纪未必就有我这个身体！”总之一句话，毛泽东是不完全同意采纳保健人员提供的食谱的，他喜欢随心所欲，顺其自然。因此，作为遗物保存至今的毛泽东菜谱大多已非保健人员的杰作。于是，菜谱便更能反映出毛泽东的饮食特点。

毛泽东生前使用过的糖果盒

从毛泽东菜谱看，毛泽东无疑深具中国传统农民的饮食习惯和特点。他不是根据口味吃饭，而依据生理需要吃饭。他吃饭无时间规律，全凭饥饿感而定。有时，他两三天不吃一顿“正经饭”，中间仅以麦片、玉米、芋头等

充饥。他一生大都未曾一日三餐，一般是一日两餐或两日三餐，而且吃饭时间日夜不定，完全可以说哪个时辰都吃过饭，哪个时辰都睡过觉。饮食的极无规律，在一般人肯定会受不了，不患胃癌也会闹出胃病，但毛泽东却一直什么事也没有，而且能以 83 岁高龄寿终正寝，这不能不令人惊奇万分。

毛泽东在日常饮食上保持着湖南人的习惯。他喜欢吃辣椒，几乎每顿“正经饭”中都少不了辣椒。有时，四菜一汤中是一盘辣椒酱，有时则是一碟干焙辣椒，其中干焙辣椒都是整个儿焙熟的，身边工作人员无人能咽一小口，毛泽东却能一口一个，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毛泽东还把辣椒与性格与斗争精神联系起来。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说：“大凡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曾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所以吃辣椒的人也爱造反。我的故乡湖南出辣椒，爱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多。”

毛泽东晚年依然未改食辣习惯，其时，他罹患多种顽疾，连吞咽都已十分困难，但他还时常想吃一点儿辣椒。于是工作人员使用筷子在辣椒酱里沾上一点点，送到他嘴里。这时，毛泽东便会把嘴巴吧嗒几下，高兴他说：“好香噢，一直辣到脚尖了！”

毛泽东还像许多湖南人一样，特爱吃苦瓜。在湖南，苦瓜是农民们夏季常常吃的家常菜。这种蔬菜一般种在房前屋后，生命力很强，根本无需耗费农民大多精力。毛泽东曾对工作人员说：“苦瓜这种菜，我的家乡很多。有些人吃不惯，是怕它的苦味。我不但吃得惯，还一生都爱吃，就图它这个苦味。我这个人一生没少吃苦，看来是苦惯了，以苦为乐了！”

毛泽东对苦瓜的性能很了解。有一次，他同工作人员一起用餐，菜中便有一盘苦瓜炒鸭子。这是他很喜欢吃的一道菜。他劝工作人员多吃，千万不要怕苦。他说：“凡苦的东西，对人体都有好处，苦能去火明目嘛！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上火，有时生气也上火，这叫虚火。这种人吃点苦很有必要。我这个人也爱上火，所以命中注定要吃苦罗。不如主动去吃，免得火气太大。火气大，不是伤人，便是伤己噢。至于明目，更是它的大好处，我现在有点老眼昏花了，时时吃一点，免得看不清事理噢！”

湖南人喜欢吃腐乳。在湖南，腐乳又叫“霉豆腐”，显然是经过霉变的食物。毛泽东很喜欢这道具特产。叶子龙做毛泽东机要秘书时，因会作腐乳，于是常常替毛泽东制作这道菜，后来，负责毛泽东生活的一组工作人员还曾从京西宾馆请师傅传授腐乳制作技艺。然而，保健人员对此却极为担忧，因为从医学上看，霉变过的食物是不宜进食的。有一次，医务人员私下里将毛泽东吃的腐乳送去化验，结果发现其中细菌含量大大超标。于是，他们将化验报告上呈毛泽东，建议他从此不要再吃这种有害无益的东西，可是毛泽东依然如故，坚决不肯放弃这一美味。他说：“人感到好吃也爱吃的东西还是能吃的。爱吃一定是人体有这种需要，这也许是一种什么潜在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不过，世界上的事，说不清的也太多。这也是好事，都说清了，科学还研究什么，不研究了，还有发展吗？”

辣椒、苦瓜、腐乳都是口味浓烈的食品，其实毛泽东是一个口味清淡的人，这些口味重的食物在他只是当作调味品来吃，而且并非顿顿都吃。他喜欢吃青菜，即纤维含量丰富的蔬菜。众多蔬菜中他喜欢冬寒菜、青蒿，还有一般人不大当作菜来吃的碗豆苗、马齿苋。总之，毛泽东尽管不是素食主义者，但他对吃素还是颇为首肯的。毛泽东在谈到吃百合、豆制品时就说过：

“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象百合、山药、山楂，连葱姜蒜都可治病。你们医生可不要过分迷信药物，不要轻视饮食治疗。”还说：“豆腐、豆芽、皮旦、北京烤鸭都是中国特有的东西，有些地方的小吃也很有特色，应该国际化，可以出口。”

毛泽东饮食偏素，但他从不拒荤。相反地，他对一些荤菜还情有独钟。如他喜欢吃红烧肉，至死都不改变这一嗜好。在肉食上，他不大愿意吃牛羊肉。因此，毛泽东的荤菜搭配的菜谱中常常是以猪肉为主。

毛泽东终生都爱吃鱼。早年特爱鲤鱼。在陕北杨家沟时，卫士们常去附近河沟里捉鲤鱼。有一次，远在河东的贺龙还专门为他捎来几条大鲤鱼。毛泽东喜吃鲤鱼的习惯甚至连外国人都广为知晓。据说，毛泽东两度访苏时，苏联“老大哥”都想方设法为他弄活鲤鱼。

晚年时，毛泽东很喜欢吃“胖头鱼”（即鳙鱼），而且特别爱吃鱼尾上那段肉。毛泽东常喝用胖头鱼熬的汤。有一次，毛泽东望着汤碗里那又肥又大的鱼头，很幽默他说：“这条鱼比一般的鱼头大，不知它比别的鱼聪明不聪明。想来是大脑发达，应该聪明吧。多吃这种大鱼头，一定会使大脑发达。”

毛泽东还喜欢吃鱼冻，而且都在每顿用餐的最后才吃。这种鱼冻比鱼肉要腥，一般人还真忍受不了。鱼冻是鱼汤冷却凝结而成的，腥味自然要重得多。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员不解地问毛泽东：“主席，您吃的那种鱼冻腥哩吧叽的，有什么好吃的啊？”毛泽东笑着说：“你算说对了，我就是要吃这种腥味呢。鱼不腥就不是鱼了，鱼腥肉香，都要领略。吃一口鱼冻，饭就一下子都顺下去了。”

毛泽东常常吃鱼，一生不知吃过多少鱼。有一次，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太多，我死后就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当然，这是毛泽东的玩笑之言，但从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对吃鱼的喜爱程度。毛泽东菜谱中，鱼的做法也多种多样，除了上面说到的鱼汤、鱼冻，还有许多制作花样，如红烧、清蒸、油炸等等。从菜谱看，毛泽东生前除了喜吃鲤鱼、鳙鱼外，还常吃边鱼、鳊鱼、青鱼、火焙鱼、苏联小鱼等。

毛泽东晚年多病，那是老年人常患的病，如慢性气管炎、白内障、肺心病、脑血管疾病等。同时，毛泽东尽管思维依然敏捷清晰，但身体其他元件毕竟明显衰老了。70年代以后，毛泽东已老态龙钟，步履艰难，甚至连吃饭也很困难了。这时，毛泽东虽然还保持着自己独持的饮食爱好，如吃辣椒、腐乳等。但已不如以前那么量多频高了。毛泽东垂暮之年的饮食基本上听凭保健人员、厨师的安排，开始注重营养平衡，科学搭配。从保存下来的菜谱来看，毛泽东这一时期的饮食以高蛋白、高能量、低脂肪、低胆固醇为主。这是很适合高龄老人的饮食，对于维持毛泽东“年迈羸弱”之躯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1973年以后，毛泽东已不能自己进食了。这时，工作人员便给他喂饭。毛泽东对此很不习惯，也极不情愿，但已无可奈何。

毛泽东的饭量本来不大。以前尽管每餐四菜一汤，但大都是小碟盛菜，小碗装汤，一盘菜一筷子便可挟完。此时此刻，毛泽东的饭量更小了，工作人员常常好不容易才让他吃进一点东西。毛泽东患过一次中风后，吃饭便更加困难了。

毛泽东执拗的个性已尽为人知，愈到晚年，他的脾气愈加执拗。这在许多高龄老人都是如此。毛泽东只让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侍奉喂食，一旦更换便表现得十分不高兴，甚至拒绝用餐。当时，喂饭的工作由两位女服务员负责。毛泽东与他们相处甚久，彼此十分熟稔亲近。他在心中把她们当作女儿对待，喂饭时便不再有任何不适应感。

毛泽东生病卧床后几乎未在餐厅吃过饭。他的饭菜都由工作人员用竹制饭篮提到卧室来吃。卧室木板床边有一个小方桌，简陋的饭菜就搁在方桌上。毛泽东一般就躺在木床上，由服务员一勺一勺地喂。

临终前，毛泽东已无法吞咽食物。这时，医疗组便为他改用流质食物。在特制的一张病床边，摆着氧气瓶、流质瓶。毛泽东静静地病卧床头，鼻子下插着氧气管、流食管。后来，流质也无法下咽了，一进喉咙便呛住，引起心脏不适。于是医护人员便为毛泽东作了胃管进食。食物由医疗专家、营养学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精心配制。胃管进食的管子一直在毛泽东嘴旁插着，护理人员隔段时间便把食物往管子里注入一次。从保存下来的菜谱看，临终前毛泽东的饮食情形是：1976年7月11日前为鼻饲；7月12日至9月8日为胃管进食。其中8月1日~13日进食情况较好；9月3日已进食一般；其余时间均较困难。

1976年9月8日，工作人员依然为毛泽东配制好了胃管进食食谱，但毛泽东此时已昏迷不醒，处于弥留之际。这位垂暮老人从此再也不需要任何食物了……

毛泽东去世时享年83岁。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巨人为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可谓车载斗量，而其个人生活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高尚情操更是堪可启迪后世！

60年代初的西餐菜谱

毛泽东推崇中国菜，终生喜欢中国菜，但这并非说他反对西餐，拒绝西餐。60年代初，毛泽东在吃过几种西菜后，突然对西餐中的几种菜肴感兴趣起来。他想，原来西餐中也有许多菜肴的制作方法妙不可言啊。

大概从60年代初开始，工作人员开始为毛泽东物色精通中西菜肴制作工艺的厨师。当时，毛泽东聘请的一位姓陈的厨师擅作西餐，毛泽东对他的手艺常常赞不绝口。江青很欣赏西餐，有一次在吃过陈师傅做的几样西菜后，称羨不已。她对毛泽东说：“陈师傅的手艺还真不错，我那边的师傅没一个比得上！”毛泽东听罢便对她说：“如果你想要，就把陈师傅调到你那边去好了。”江青闻言大喜过望，最后真的毫不客气地将陈师傅要过去了。

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但已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毛泽东晚年生活遗物中，尽管餐具品种丰富齐备，但没有一套完整的西餐具。

毛泽东喜欢吃色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毛泽东对于用西餐方法制作出来的鱼虾感到十分新鲜惊奇。他常常在吃上一段中餐方法制作的鱼虾后吃上一次西菜鱼，以此换换口味。其实，他吃的鱼虾大多是国产货。比如他常吃的小虾就是中南海产的。工作人员休息时做上几个小箱，里面放上一些饭粒，丢进中海里，第二天取箱时一般能捞上一小碗小虾。毛泽东很喜欢吃中南海出产的这种小虾，有时他用中国菜的做法做了吃，有时也用外国的方法做来吃。

毛泽东吃鸡，但谈不上特别喜欢。西餐中鸡的做法比中餐要多，因为西方人以肉食为主，因此制作花样代代相传，推陈出新，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这些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毛泽东对上述西菜鸡并非样样都喜欢，但偶尔吃上一顿也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毛泽东不大喜欢牛羊肉，也许他有些嫌弃牛羊肉的膻味。他在诸多肉类中独独对猪肉钟情不悔。他喜欢红烧肉，倘若一段时间未吃还真有些嘴馋，往往主动提出来“打打牙祭”。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这一特点，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俄~~ 俄 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至于牛羊肉类，因为毛泽东不是很喜欢，因而只是偶尔掺杂一些品种进去。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毛泽东喜欢喝汤，几乎每顿饭菜中都有一小碗汤。西餐中汤类品种丰富，而且各具特色风味。毛泽东 60 年代吃过的西菜汤有，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

毛泽东 60 年代对西菜感兴趣，但他很少正正经经吃过一顿纯粹的“西餐”。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口味，还是营养，中国菜都远远超过西菜。当然，西菜中也有不少极品，也有不少值得中菜借鉴学习的地方。然而，如果让他每日吃西餐，他就不会愿意。因此，毛泽东在吃西菜时一般都是与中菜和合在一起吃，即是说，他每天的饮食还是以中菜为主，其中也夹杂上几个西菜，或是西菜肉类，或是西菜汤类。

毛泽东对中菜、西菜有着十分独特而精辟的认识。有一次，他在与保健医生徐涛谈起中西菜肴的比较时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菜饭。饮食也是文化。全国有多少省和地方，菜饭有多少种？中国地大物博、宝藏很多，可开采及生产的有限；土地多但可耕地少，大家只好暂时少吃一点；中国是东方国家，习惯上吃得素一些。本来在中国古代，佛教僧侣终年吃素食。据说南朝梁武帝终生都吃素，影响较大。后来素食由寺庙传到宫廷又传到民间，不过我们并不是全素，吃得素一些对健康有好处。西方人食物里脂肪多，越往西越多，他们得的心脏病也比中国多。”毛泽东还常说：“中国饭菜合理，在对人的健康方面比西餐要好很多。”平心而论，毛泽东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工作人员为毛泽东制订菜谱的目的也是一个加强平衡的问题。可毛泽东一生艰苦节俭惯了，对于饮食营养平衡的繁琐搭配素来并无好感。他认为这样做未免显得多此一举，因为一则麻烦，造成追求享受和奢侈；二则违背了个人的饮食习惯和偏好。所以毛泽东对任何有计划的菜谱都是坚决反对的，他不愿意在吃饭方面也受约束，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别具一格的马齿苋菜谱

马齿苋，《辞海》(1979年缩印本)是这样描述的：“英文名称 Por-tulaca oleracea，马齿苋科，为一年生肉质草本植物，通常匍匐，无毛；茎常带紫色。叶对生，倒卵状楔形。夏季开花，花小型，黄色。蒴果圆锥形，盖裂。生于原野，我国分布甚广。茎、叶可作蔬菜或家畜饲料；中医学上以全草入药，性寒、味酸，功能清热、解毒、消肿，主治痢疾、疮疡等症。”

马齿苋与毛泽东并无有机联系可言，然而因为毛泽东对马齿苋这种平常无奇朴实无华的野生植物格外垂青，并且视之为无上“佳肴”，于是这二者之间便有了深刻的关联。在毛泽东菜谱中，马齿苋这种野菜到处可见。

1959年6月，毛泽东南巡至湖北省会武汉。24日，毛泽东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的工作汇报。汇报中间适逢开饭，毛泽东便留下王任重共进晚餐。从毛泽东菜谱上我们找到了当日厨师制作的这样七道菜：“炒鳝片、烧萝卜、炒马齿苋、炒鸡蛋、肉片汤、铁板里几、炒海带。”毛泽东很少留客人吃饭，尤其是对于党内的同志。这次毛泽东的热情相邀，使王任重倍感亲切温暖。据说席间毛泽东还为王任重挟菜，但挟的是一大筷子马齿苋，并对王说：“不要小看这道菜，它还是一味很好的中药，可以清热除湿呢。”

也许只有毛泽东才会以野菜来招待客人。不过，我们追查了毛泽东菜谱，未曾发现第二次以马齿苋待客的记录。但于事见人，毛泽东对马齿苋的钟爱是何等之深！

毛泽东的饮食习惯自然地带着中国传统农民的色彩，而这种浓厚的色彩归根结底来自于韶山农村的生活。毛泽东喜辛辣，这是湖南人的一大特色。他甚至以吃辣椒来比喻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说过“不吃辣椒的人不革命”的谚语。他还偏爱湖南农村的霉豆腐、酸泡菜。在毛泽东菜谱中，这几样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菜一直是毛泽东的钟情之物。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尽管家道在韶山来说还算宽裕，但父母的节俭之极使他们兄弟几个一直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毛泽东母亲文七妹聪明贤慧，勤劳能干，善于持家理财。她几乎熟稔韶山农家妇女所有的理家本领。每年，文七妹都要制作大量的酸菜、泡菜、霉豆腐。毛家菜地田旁的各种野菜她也会一一采撷起来(其中包括马齿苋)，或晾干制作成酸菜，或用来饲喂猪狗鸡鸭。在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里，文七妹当年制作霉豆腐、酸泡菜、马齿苋的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至今依然保存完好。毛泽东就是吃着母亲制作的这些“坛子菜”长大的。受母亲的耳濡目染，毛泽东很小就熟悉了这些“坛子菜”。还是在他启蒙读私塾时，他就能以“马齿苋”来应对塾师邹春培出的对联。当时，毛泽东趁邹先生外出，带头下塘游泳。邹先生回来后大发雷霆，他决心惩罚一下带头的毛泽东。但他知道，对于毛泽东这个倔强聪颖的孩子，不能来硬的。于是邹先生便对毛泽东说：“你今天犯下弥天大错，本不可饶恕，但念你幼小无知，我出个对子你来对，若对上了则免除惩罚；若对答不上，则要打手心。”邹先生手中晃动着竹篾片，摇头晃脑出了上联：“濯足。”毛泽东一听便知道邹先生的喻意。原来先生还是气恼不过他们上课时间游泳这件事啊。毛泽东思忖片刻，应对道：“修身。”邹先生两眼一瞪，真想发火，但毛泽东的应对却是如此地对仗工整天衣无缝，他怎能找碴呢。于是，邹先生只好想一个复杂的对子来为难毛泽东。他思索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上联：“牛皮菜”。毛泽东一听愣了，这个

对子难对呵。他沉吟不语，搜肠索肚，半天未能应答。邹先生得意地举起了手中的竹蔑片，只等毛泽东伸过手心来。毛泽东的眼睛掠过挂在屋梁上的饭篮，同学们的午饭全挂在那里呢！毛泽东想起自己饭篮里的菜，马上脱口而出：“马齿苋！”邹春培怎么也料不到小小年纪的毛泽东会如此聪明伶俐，只好悻悻作罢，饶过了毛泽东。这一回，平凡的野菜马齿苋解了毛泽东的围，使之免除了一顿皮肉之苦。

毛泽东对马齿苋的钟爱当然并非出于对马齿苋“救驾”的感激，而是少年艰苦生活磨砺的结果。

延安时期，由于敌伪的封锁，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毛泽东饮食习惯中的几大偏好，如辣椒、霉豆腐、酸泡菜并非时时能够得到满足。只有生命力极为顽强的马齿苋，即使是在陕北贫瘠干旱的黄上高坡上亦能偶尔觅到。这种生长在沟畔路旁的小生物，在异常艰难的岁月里的确给予过毛泽东以无比的安慰。当时，工作人员时常为毛泽东千方百计寻找辣椒、霉豆腐，用以改善领袖的生活。毛泽东也把辣椒看成宝贝，每次都是匀着点吃。有一次，毛泽东食剩的一盘辣椒变质了，江青知道后便自作主张倒掉了。第二天，毛泽东寻找这盘辣椒。江青告诉他，因为馊了就倒了。毛泽东听后很生气，大发了一通牢骚。好在毛泽东还能经常吃到马齿苋之类的野菜，这对于他来说不啻为美味佳肴。

解放后，毛泽东进驻北京，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这位亿万穷人的领袖，却不好山珍海味，依然钟情于霉豆腐、马齿苋等“土产”。从香山搬进中南海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由中央办公厅统一管理。毛泽东被理所当然地编在一组。于是一组的生活管理员便经常要为毛泽东的独特饮食爱好奔忙。开始时，一组的工作人员不大会制作霉豆腐、酸泡菜。后来他们拜师学艺技术大有长进，但毛泽东总觉得味道不是很正，与他母亲的制作技艺更是相距甚远。1963年，医生发现毛泽东口水太多，怀疑饮食消毒不严，于是取了一些食物化验，果然在自制的霉豆腐中发现了超量的细菌。工作人员为了毛泽东的身体，便自作主张停止了霉豆腐供应。毛泽东有一段时间未能吃上霉豆腐了，他感到奇怪，于是便主动问起缘由来。工作人员想蒙混过关不行了，便照实说了出来。毛泽东为此大发脾气，说：“哪个菜里没得细菌？我还是不吃菜好了。”后来，工作人员打听到京西宾馆有位师傅制作的霉豆腐很好，便去弄了些来化验，结果果然比自制的要卫生许多。于是，便与京西宾馆联系，由京西宾馆常年供应。从京西宾馆到中南海丰泽园，往往返返，麻烦无数。一组的同志感到这样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们便派人去京西宾馆拜师学艺。然而，学习引进过来的手艺终究赶不上正宗的，好在毛泽东从来不是什么“美食家”，对于正宗与否并不十分计较。

毛泽东对于马齿苋的偏爱自然抵不上辣椒和霉豆腐，但他却常常主动提出要吃。这种野生植物，老百姓的菜园子里是从来不会种植的。一组的同志为了保证毛泽东的不时之需，便与京郊的农场联系，要求农场落实种植计划，每年种植少量。在1967年5月13日中南海《对农场种植计划的要求》中，一组将“马齿苋”列于“重点保证供应的蔬菜”一栏的首位，要求平均日产1斤，“常年供应，肥嫩，没有籽。”这样，毛泽东便能天天吃上肥嫩的马齿苋了。

在毛泽东菜谱中，马齿苋作为主要蔬菜时常可见。然而，并非每一个厨

师都对这种植物的学名十分熟悉。于是便出现了许多音近字异的称谓，如“马生苋”“马子苋”等等。甚至还有一位厨师为马齿苋取了一个洋绉绉的名字：马斯汉。当然，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从未正式称呼过这种植物的学名，而一直袭用韶山人对它的称谓：马屎苋。这个俗称当然不及学名高雅，但在韶山，即使在餐桌上亦是如此称呼。原来，这种野生植物在马屎堆里生长得极为茂盛，因而得了这样一个极为不雅的名字。

韶山民间食用马齿苋的习俗由来已久，时至今日韶山的大小集市上都还时有出售。但韶山人很少有用马齿苋鲜炒来吃的，一般是晾干切碎制作成酸菜。韶山的老人们说，只有旧社会那些没田没土没菜地的人才用马齿苋当鲜蔬菜。然而，早年毛泽东的家庭却习惯于鲜食，毛泽东本人则更乐于鲜食。他不仅自己吃，还劝江青也吃，说：“马屎苋既可做菜，又可入药，对身体大有好处呢。”有一次，毛泽东特意吩咐工作人员采集了不少野菜，开了一个“山珍会”，请子女、工作人员共餐。众多的“山珍”中就有一大盘马齿苋。毛泽东带头大口大口地吃，李讷、李敏、毛远新和一些工作人员尝过一两筷后怎么也不敢再挟。毛泽东一脸不悦，借此作了一番忆苦思甜式的革命传统教育。

毛泽东食马齿苋的独特习惯令保健人员不安，生怕这种植物对领袖的身体有害。于是他们偷偷地拿了些马齿苋请有关部门化验，并查询各种中草药书籍，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言，马齿苋不愧为一剂良药。毛泽东有便秘的毛病，而且还偶感风寒，哮喘咳嗽。既然马齿苋在药理上可去燥除湿，清瘀解毒，不象霉豆腐一样，不好闻不好看还有细菌，工作人员便放心大胆地让毛泽东吃，有时毛泽东不提要求，他们也时常主动炒上一盘马齿苋敬上。

1961年，因为天灾人祸，国民经济进入十分艰难时期。这一困境，持续达三年之久。身为领袖的毛泽东为此常常寝食不安。工作人员为了保重主席的身体便格外注意饮食营养。毛泽东察觉后很生气，特别叮嘱工作人员注意节约，并提出要每月检查一次家庭生活帐。这在毛泽东是破天荒的事。这位伟人平生最讨厌跟钱打交道，以至于后来连钱都不愿碰一碰。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就立下过“三不主义”的宏誓：不谈金钱，不谈女人，不谈琐碎之事。1963年，毛泽东决意与人民同疾苦度难关，对工作人员提出新的三不主义，其中便坚决强调“不吃肉”。从此，毛泽东四菜一汤的简单饮食中便很难见到一丝肉末。这使厨师们深感为难：“无肉怎么炒菜？”厨师们绞尽脑汁，希望从小菜中寻找出路。他们知道毛泽东喜粗食喜辛辣。于是，冬寒菜、空心菜、雪里红等毛泽东乐于接受的小菜在厨师们的精心烹制下各个花样翻新，变幻无穷，马齿苋自然地也由单纯的清炒翻样出了搅蒜泥、卤辣酱等新花样。毛泽东见此，高兴非常，胃口反而更佳。毛泽东菜谱中有这样两份菜单：“1962年6月10日早，番茄、雪菜、炒苋菜、烩芦瓜。烧饼、米饭。”“7月7日早，雪菜笋丝、炒海带、炒苋菜、生边豆芽。汤面。晚未吃。”这就是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典型伙食。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健康并非为他一个人所拥有。工作人员感到毛泽东夜以继日的工作，一天只能睡上4、5个小时，而饮食营养却跟不上，长期下去终究会出大问题。于是，他们便时常变着法子偷偷炒些荤菜端上桌来。毛泽东发觉了，很是生气，命令马上撤下去。有时，工作人员好言相劝，毛泽东烦了，便以“罢吃”相抗。

毛泽东晚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不可能再进食辛辣的粗食了。有时，这位伟大的老人很想再品尝一次马齿苋，厨师便精心制作了盘端上来，但毛泽东却无力咽下去了。1976年后，毛泽东开始进食流质食物，临终前则完全依靠鼻食来维持他那伟大的羸弱之躯。也许，此时的毛泽东依然留恋着马齿苋的清香，但这股子浓烈的泥土清香离这位伟人已愈来愈远了……

平常无奇的生日菜谱

生日，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节日。古今中外，只要有人的地方，便有形式多样的生日庆贺。人们庆祝生辰，一则为纪念慈母的分娩之苦，二则为纪念自己的成长进步。毛泽东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他也需要像平凡人那样年年有生日，年年庆生日。然而，毛泽东一生却很少正儿八经庆贺过自己的生日。毛泽东生前保存了大量生日菜谱，但这些生日菜谱均十分平常无奇，与平时饮食并无多大不同。

毛泽东如同他的同龄人一样，年年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生日。作为拥有至高无上权位的领袖，毛泽东本可以每年过上一次热热闹闹，丰盛无比的生日。然而，毛泽东从延安时代起，便倡导党内“不祝寿，不送礼”；解放后，他更是以身作则，严厉禁止党内祝寿送礼之风。因此，毛泽东宁肯平平淡淡过生日，决不开“祝寿送礼”之风。

毛泽东少年时代原本也度过一个个热热闹闹的生日。那时，毛泽东尚且依偎慈母身旁，其生日由母亲操持。韶山人很看重生日，无论是大人小孩的生日，常常是宾朋满座，献筹交错。毛泽东在这种很有情调的地方氛围中度过了自己一个又一个的生日。参加革命后，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纵横驰骋，不停地忙碌奔波，很少再有时间和精力庆贺自己的生日了。从此，热热闹闹的生日便与他再也无缘。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生活相对安定，但每年的生日，他也只是在家中加上几个菜，一家人快快乐乐吃上一顿生日饭。1943年12月26日，毛泽东五十岁生日。在中国，五十岁生日可谓大寿，延安城内有人准备为毛泽东搞个庆典，但毛泽东严辞拒绝。因此，毛泽东的五十寿辰就在战火硝烟中悄悄地度过了。1953年12月26日，毛泽东六十岁生辰。这是花甲之寿，中国人自古至今均极为重视，毛泽东也看重这一转变，因为自花甲往后，他就可以称老人家了。但是，毛泽东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自个儿庆贺一番。

毛泽东不是不想热热闹闹过生日。他是中国人，也很重视这一节日。但他觉得自己是领袖，不能在生日这件事上带头搞庆典。因为在他看来，国穷民困之际大吃大喝无疑是伤天害理，而且中国人重视生日送礼，如果党内盛行此风，也会败坏党风、政风。因此，从延安时期起，毛泽东便公开反对搞生日庆典活动。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庆贺生日不会使人长寿，因此并无必要庆贺。”在党内，他多次告诫党员、干部：不要搞生日宴会，不准收受礼品，不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毛泽东这么说了，不仅是要求别人，更是要求自己。因此，他一贯反对人们为他祝寿。

毛泽东的生日是平平淡淡的。他不请客，也不收礼。如果说每年生日与平时有所区别，多些热闹的话，那就是这一天工作人员必定应邀陪他吃饭。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6岁生日。这一年，国内经济形势十分紧张，各地传来粮荒死人的消息。毛泽东从大清早起便愁眉不展，心事重重。这天是卫士封耀松值正班，他照顾毛泽东穿衣起床后小心翼翼地问：“主席，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毛泽东摇摇头，然后坐到沙发上不断地吸烟。小封想：“今天是主席生日呀，主席这么不开心，今年可又砸了。”突然，毛泽东对小封说：“你去把银桥、高智、敬光、林克和东兴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小封一听，顿时高兴起来。他想：“主席今年可又要请生日饭了。”

然后，他跑去叫人，并告诉厨房，准备做饭。

客人到齐了，厨房也送来了饭菜。这天的主食是红豆米饭，一共有六道菜，即：奶油鱼头、拔羊肉、干边豆角、炒瓢儿菜、小干鱼、炒腋芥菜。菜不是很丰盛，但在当时看来已很不错了。因为此前毛泽东已立下了规矩，要求从今年起要同全国人民一起定量吃饭，并宣称实行“三不主义”：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因此，今天的生日饭菜，厨师们也不敢违反规定，只是做菜时特意多放了一些油。

开饭时，大家没有象往常那样在欢声笑语中祝贺毛泽东生日。因为整个饭局气氛都很是沉闷，毛泽东不断讲全国形势，并要求大家下乡调查。

晚上，毛泽东吃过饭后给林克、高智等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去河南信阳调查。在信的结尾，毛泽东附上这么一段话：“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过了三个生日。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三个生日都过得很简单，与平时没有多少区别。三个生日宴上，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氛围。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吃了一缸麦片粥。早餐时，毛泽东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里鲤白、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国民经济逐渐好转，毛泽东的心情也开始好了起来。1965年12月26日，毛泽东72岁生日请了许多工作人员一起吃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次生日，毛泽东吩咐上了几瓶红葡萄酒，并带头喝了一杯。从这天的菜谱来看，比以往要丰盛多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显得与过去不同。这天的菜有：“红苕烧冬笋、卤猪肝、虫毫、油焖鸡、百荷、炒盖兰菜、燕菜汤、小青椒、腊八豆、腊肉、王瓜、叫化鱼、米粉肉、茄子、娃娃菜、素菜汤、炒菊红、糖醋菜、肚尖、王瓜炒小虾、滢菜。”

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毛泽东八十岁后明显地感到自己老了，将不久于人世了。因此，这几年的生日前后，毛泽东总不时地谈起生死问题。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七十二、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也是从八十岁后，人们越来越重视毛泽东的生日了。在国内，人们不敢公开为他祝寿，于是便悄悄地在家庆贺；地方不敢为毛泽东献礼，但变着花样转达对毛泽东的祝福。毛泽东去世前的几年里，他的家乡湖南年年12月26日都要专程送上些长寿面之类的东西。对此，毛泽东一反常态欣然接受。在国外，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年年12月26日都会送来一些诸如工艺品，食品等礼物。毛泽东面对纷至沓来的生日贺电贺信礼品，心中尽管时有不悦，但又无可奈何。

1975年12月26日，往年那种热闹场面又出现了。毛泽东不再亲自过目那些礼品贺电，只是例览一下贺单。他不再需要这种热闹缤纷，他需要宁静。

这天，毛泽东特地请来了以前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一大早，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等和吴旭君、俞雅菊，李玲师等都来到了中南海游泳池。顿时，毛泽东卧室里传出了欢声笑语。

临近中午，与毛泽东分居已久的夫人江青也来了。这些年来，江青已很

难见到毛泽东。特别是半年前，毛泽东还特意吩咐：“没有我的同意，不许打开铁门！”毛泽东所说的铁门是指其住宅外面的最后一道大门，据说，毛泽东这一命令便是专门针对江青的。但今天毛泽东生日，江青还是设法进了铁门。江青来时特意带了两道菜：胖头鱼汤、肉丝炒辣椒。这是毛泽东很爱吃的两道菜，是江青在钓鱼台她的居所做好后带来的。

生日宴上，菜肴比往常丰盛。毛泽东喝了胖头鱼汤，高兴他说：“胖头鱼汤好香噢！”并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这顿饭，毛泽东吃得比平时格外高兴……

毛泽东的生日是最热闹最欢乐的，同时又是平常无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生日与寻常百姓比较，似乎更少一些隆重丰盛。然而，毛泽东一生对此都十分的知足。如今，毛泽东生日菜谱保存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成为一代伟人平凡伟大生活的真实见证。

湖南特制的双面梅花瓷碗

毛泽东晚年遗物中有力数很多的各种餐具，如各式瓷碗、瓷碟、搪瓷碟、砂锅等。在众多餐具中，毛泽东最喜欢家乡湖南出产的双面梅花瓷碗。

毛泽东在生活上素以随便简朴著称，无论衣食，还是住行，一生中从来没有向人提出过任何过分的特殊要求。毛泽东生前身边的任何一位工作人员部对此记忆犹新。然而，毛泽东在生活上也有着自已的一些个人喜好。比如说他在使用吃饭的瓷碗方面，尽管对碗的质量不是很讲究，但还是偏爱那种印有梅花图案的小瓷碗。这是他个人的一点偏好，工作人员了解他这一喜好后自然得满足他这一小小“要求”。当然，毛泽东从未明说，更未发布“指示”。但工作人员领会到了，于是便做了。毛泽东对此未加任何表示，也可以说他是默许过了。

起初，工作人员与江西景德镇联系制作了一批日用瓷碗。瓷碗边缘印上粉红的腊梅花，而且不止印于瓷碗的外边缘，还将红梅印在了碗内。当这种瓷碗制作出来后，毛泽东很高兴。他就喜欢这种梅花碗。此后，他这一习惯便未再改变过。

据说后来毛泽东在谈到瓷器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湖南有个醴陵，也产瓷器。”没想到，毛泽东的这句话给湖南醴陵这个偏远小镇带来了繁荣。当这句话传出后，湖南人便开始关注醴陵的瓷器工业的发展，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和人力。到了70年代，醴陵的瓷器已发展到相当规模，许多产品可与景德镇的名瓷相媲美。醴陵成为中国第二大瓷都。

毛泽东终生不忘家乡。尤其到了暮年，对家乡思念更深。他常常想回湖南小住，在这块他早年成长奋斗的热土上感受一番逝去的“峥嵘岁月”。当时，湖南省委接待处负责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接待处招待所里使用的瓷器都是景德镇产的红梅瓷碗、瓷碟等。这使湖南人觉得大为不妥。他们想：毛主席回到家乡了，为什么不用家乡的泥巴做的碗呢？于是他们将自己的想法向有关部门汇报，得到支持。

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肖根如接受了去醴陵为毛泽东制作日用瓷器的任务。为了慎重起见，接待处邀请了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吴连登同行。因为吴连登一直管理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由他监制能够保证万无一失。肖根如、吴连登手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办公厅的介绍信到了醴陵，联系了瓷厂，提供了样品。后来，在醴陵瓷厂的制作过程中，他们又几度上醴陵，解决一些细节问题。不久，第一批试制品出来了，肖根如、吴连登带了试制品回长沙征询意见，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然后便开始正式生产。

醴陵生产出来的这批梅花瓷器十分精美，无论是图案，还是瓷质、烧制工艺，均可堪称上乘之作。毛泽东见到这批瓷器时，真是高兴异常。此后，毛泽东便改用家乡产的这种梅花碗。

毛泽东钟情梅花碗，自然基于自己对梅的钟爱。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梅花是其歌咏赞颂的主题。梅花的高洁雅致，傲骨凌霜的风韵，无时不激起毛泽东磅礴诗情。他在赞梅词中曾赞道：“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

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毛泽东人生的最后几年里，自己已不能端碗吃饭，都是身边工作人员端着梅花碗，一勺一勺地喂他。此时此刻，瓷碗周际的红腊梅依然那么艳丽迷人。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走到了自己辉煌人生的终点。伟人去世后，其晚年生活遗物全部保存在丰泽园仓库。1990年，毛泽东生前用过的梅花碗连同其它生活遗物运回韶山故里，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永久珍藏。

与寻常人家无异的竹木筷

筷子是中國人在飲食上區別於歐美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國人使用筷子的传统与其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一样长久。自古至今，中國人在筷子的使用上也显示出阶级、阶层的巨大差别。总的来说，國王君亲，王公大臣等贵族阶层大部使用精美绝伦贵重无比的金銀筷，象牙筷等；平民阶层，尤其是那些贫苦民众，限于地位和财富的制约，只能使用由普通材质制作而成的竹筷、木筷等。这种差别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甚至被统治者上升至礼法高度。严禁逾越。毛泽东位高权重，在一般人眼中理所当然的是锦衣玉食。然而，恰恰相反，毛泽东一生俭朴清贫，从不贪图享受。毛泽东一生只用竹筷、木筷吃饭挟菜，坚决反对使用任何在他看来可谓高级精美的餐具。毛泽东去世后遗留于世的大量生活遗物中，餐具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就有许多普通的竹、木筷子，但未曾发现一双用名贵材质做成的金銀筷或象牙筷。

金銀筷、象牙筷即使在新中国依然没有消失。以毛泽东的权力、地位，完全有条件使用这些名贵的筷子。然而，毛泽东一生部在拒绝这种似乎能象征权力、地位的东西。毛泽东一生从来不曾忘记自己农民的出身。因此，他一生都致力于使自己在生活上保持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殊化，拒绝任何形式的感官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确是“甘心做平民，不愿当天子。”

1949年9月，毛泽东住进北京城不久。他的饮食依然如战争年代一样，并无多大改变。但环境毕竟变了，毛泽东的应酬多了，时常要陪客吃饭。有一天，毛泽东突然吩咐卫士：“今天我要在家招待客人，是国民党的起义将领，中午就在这里吃饭，你们准备一下。”毛泽东很少留客吃饭。更少亲自吩咐工作人员提前做准备。这次如此重视，来客自然有些特别。不一会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给卫士们布置任务。他对李家骥说：“你叫厨房多加几个菜，让招待科帮助搞好一点。”他还对小李说：“你到招待科弄些好点的餐具来。”小李一听忙摇头摆手，说：“主任，主席反对摆阔呢！”杨尚昆说：“这次例外么，不然后人家会笑话我们的。”杨尚昆这么说自然有其道理，因为毛家的餐具也实在难登大雅之堂，几双竹筷子霉变后黑乎乎的，怎么也洗不干净。

李家骥感到事关重大，于是跑到李银桥那儿汇报。李银桥是卫士长，听了他的汇报也很为难，他说：“既然杨主任这么说，我们还是服从吧！”于是李银桥与李家骥一道去招待科借餐具，招待科借给他们一套新碗筷，其中筷子是象牙做的。

开饭前，毛泽东突然来到东房餐厅，似乎是特意来巡视检查的。他见餐厅布置得井然有序，不禁微微点头。突然，他见到了餐桌上的象牙筷，于是脸色一沉，大声说：“谁让你们摆象牙筷？赶快给我拿下去！”李家骥在毛泽东走进东房时心中便一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现在见毛泽东生气，更是紧张得很。他硬着头皮解释说：“主席，这是从招待科借来的……”毛泽东未等他说完，马上大声打断说：“我叫你撤你就撤！”说完拂袖而去。

李家骥感到颇为委屈难受，他遵照毛泽东指示换上了黑乎乎的竹筷子，然后跑去向李银桥汇报。“刚才主席为摆象牙筷的事发火了。你看，我当初就说过不能摆的嘛！只怪杨主任呢，现在主席火了，怎么办？”李家骥说。李银桥听了，也感到大事不妙。他安慰小李：“我去跟主席解释清楚。”于

是便朝毛泽东办公室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对小李说：“你回去准备吧，就要开饭了。”

李银桥见了毛泽东，先是自我批评一番：“主席，象牙筷是我让借的，您要批评就批评我吧！我当初考虑主席平常很少在家里招待客人，不搞好一点会让客人笑话，再说来客也不一般呢！”

毛泽东本来余怒未消，现在见李银桥来陪不是，心中火气顿时消了一大半。他用缓和的口气说：“这件事么，我也有责任，怪我没有交待清楚。不过，我今天再重申一次，今后不管来客是谁，都要讲节约，不能摆阔气，不能大吃大喝。而且，今后无论是待客还是自家吃饭，都一律用竹筷子！”

毛泽东的话向来说一不二，关于这一点，大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十分清楚。因此，每每为毛泽东办件事，他们都得考虑考虑“老头子”的态度。毛泽东对于象牙筷已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了，但个中原因大家都是不甚了解。有一次，卫士长李银桥在与毛泽东闲聊时又说起象牙筷的事。李认为毛竹筷容易长霉，主席平时使用的竹筷就长霉，黑乎乎脏兮兮的，很难看。如果改用象牙筷就没有这个问题。毛泽东听罢，说：“我从小到大都是用毛竹筷子呢，已经习惯了。”他还一语双关他说：“象牙筷子么，那是有钱人用的，太贵重了，我毛泽东拿不起！”当然，这只是毛泽东的一种托辞，并非触及其中的深层原由。作为至高无上的人民领袖，在以往那些剥削阶级看来，权力无疑就是财富，平日里用金筷银筷象牙筷，自然就是一种地位和权势的显示。毛泽东一生代表着千百万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一直坚信自己的权位是人民赋予的，因此终生拒绝享受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悬隔的生活。在他看来，象牙筷不是劳动者用得起的，倘若他使用象牙筷，不是与劳动者脱离了吗？不是高高在上了吗？同时，从毛泽东本人看，他生活恬淡，不务奢华，实际上也根本适应不了那种锦衣玉食荣华富贵的生活。

于是，工作人员便从此只给毛泽东用竹筷，不曾再让他接触那些金筷银筷象牙筷。5、60年代，毛泽东外出频频。短短的十数年间，他的足迹可谓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每次外巡，工作人员除了为毛泽东准备好床上用品、水箱拐杖等“行头”外，还得为他准备一双竹筷或木筷。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习惯使用自己的东西，除非不得已，这一习惯很难让他改变。

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时，工作人员便特别为他准备了一双木筷子。因为苏联人吃饭用刀叉，如果毛泽东到莫斯科唇苏联老大哥没有为毛泽东准备筷子那可怎么办？因此，出访前，工作人员便考虑得为毛泽东带双筷子去，做到有备无患，万无一失。

毛泽东乘坐中国专列至中苏边境，从那里改乘苏方迎接的专列。在中国专列上，陈伯达、师哲、李家骥等随行人员尚未感到生活上的任何不适，因为他们仍然在中华大地上，仍然用中国的习惯吃着中国的饭菜。在中苏边境换车后，大家才真正感到走出了国门，改变了环境。这时，无论是列车车箱设施，还是列车服务人员，都已是十足的“俄罗斯化”了。对于俄语翻译师哲来说，这种变化在心理上并未引起太大震动，因为他毕竟不是初出国门。而对于毛泽东、陈伯达、李银桥、李家骥等人来说，这一环境的突然变化给他们的心理感受就很大了。坐在苏联专列上，呼吸着异国他乡的空气，他们的感受毕竟有些不同。待到在苏联境内吃第一顿苏式饭菜时，大家的感受便

更加丰富起来。就餐前，苏方服务人员鱼贯而入，手中托着盘子刀叉利索地摆上了餐桌。大家看到这一阵式，心中不免感慨万分。毛泽东也瞅着满桌西式佳肴和锃亮锃亮的刀叉，显得若有所思。这时，中方工作人员在琳琅满目的西餐具旁为毛泽东摆上一双木筷。毛泽东落座后，右手拿起木筷，左手抓起一把叉子，很认真地对大家说：“你们说说看，这两样东西哪种好？”

师哲就坐在毛泽东身边，他第一个搭上腔，说：“我看，用习惯了两样都好。”

毛泽东侧过脸，问坐在另一边的陈伯达：“你说哪种好啊，陈夫子？”

毛泽东问话时陈伯达正在艰难地用刀叉分割一块肉，而且口中已含了一大块。他抬起头，吱唔着说：“筷、筷——子——好呢！”

毛泽东拿起一块餐巾擦了一下嘴，说：“对，我认为也是筷子好。”然后他掰着手指头细数起筷子的好处来。“第一，筷子经济。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不愿意买么还可以用一根树枝或竹子修一下就是一双筷子。筷子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精神。第二，筷子大众化。中国老百姓吃饭都用筷子，而且连日本人也用筷子。第三，轻便好带，不怕丢失，不怕被盗。有这么多的益处，你们说是不是筷子好？”

毛泽东的“筷子理论”自然有些精辟独到，大家听罢纷纷说：“对呀，还是筷子好呢！”并向卫士索要筷子，卫士急了，忙说：“没有了呢，我们只给主席带了一双，要不你们向苏联老大哥要吧！”大家一听，尽管失望得很，但也只得悻悻作罢。

毛泽东两次访苏，除了自带被褥、拖鞋等日用品外，都特别准备了自用的筷子。据说，苏方服务员对毛泽东自带用具的习惯很是惊讶不解，但毛泽东却一生处之泰然，我行我素。后来，毛泽东巡视国内时，工作人员从来不敢忘带筷子。当然，因为毛泽东常常雷厉风行，说走便走，根本不给工作人员准备行李的时间，有时，在匆忙之中，工作人员也会忘记带上筷子或其它什么东西。

1956年，毛泽东去广州，真是说走便走，随行工作人员没有时间作行前准备，只得背起平时就准备好的行李跟着上路。

这次外行由卫士封耀松负责打点行装。封耀松匆匆忙忙准备东西，没有时间细细思量。登上专列后不久，毛泽东开始用餐时，小封才发现忘记为毛泽东带筷子了。他感到大事不妙，大有罪责深重之感。然而，事已至此，也已无可奈何。于是，他便去专列招待部门借了一双筷子。招待部门只有象牙筷，小封心中惴惴不安。开饭时，毛泽东一眼便看到了这双象牙筷，顿时脸色阴沉，火冒三丈，对封耀松大发脾气。其他同志见毛泽东如此生气，便极力婉言劝慰，希望毛泽东能将就着吃完这顿饭。可是，毛泽东任凭大家怎么规劝，就是不肯用餐。他开始像孩子一样赌气“罢饭”了。没有任何办法了，小封只得硬起头皮说：“主席，我去服务员那儿借吧，看能不能借到？”毛泽东听后半天才吱声，说：“你去吧！”于是，小封就如获大赦似的立刻跑到专列服务员值班室借筷子。然而，年轻的服务员们一般用勺子吃饭，很少有使用筷子的时候。他们听了小封的诉说，颇为同情，也深感为难，但还是答应想办法帮他找一找。服务员都去找筷子，费尽几番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一双早已弃之不用，而且长短不齐粗糙不堪的竹筷。她们无可奈何地问小封：“这能行吗？”小封满脸颓丧他说：“有什么办法，先试试看吧！”然后转身便跑。封耀松没想到，毛泽东见了这双霉变丑陋的竹筷，顿时眉开眼笑，

连声说：“好，好，我就习惯用竹筷子！”

毛泽东在使用筷子方面的故事多得不计其数。据说，毛泽东使用筷子的技术十分精湛。饭粒掉到桌面上，一般人很难挟起来，而毛泽东却能一粒粒将小饭粒挟起来送到口中。此时此刻，工作人员常常惊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一生都用竹、木质地的普通筷子吃饭挟菜，尽管也偶尔用刀叉吃过西餐，但毕竟次数有限，他更喜欢中餐和筷子。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在了解到毛泽东这一生活特点后便特意为他制作了一些漂亮的木筷送到北京。当时，他们派了专人专车去湘西寻找一种黄羊木。因为他们听说这种黄羊木质地细腻，做出来的筷子不仅美观耐用，而且无论使用多长时间也不会长霉变色。经过苦苦寻觅，他们终于在一个老乡家门口找到了这种木材。在这个小山村里，人们不仅用这种黄羊木制作筷子，也用它来制作梳子。他们花费几百元买了老乡家的木材运回省会长沙，由木工赶制了一批木筷，然后派人专程送往北京。毛泽东用过这种木筷后，感到很是满意。此后，毛泽东便一直使用家乡父老赠送的这种木筷。毛泽东辞世后，人们清理遗物时，发现这种木筷尚且留下不少。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噙着热泪说：“这是主席一生中用过的最高级的筷子！”

独特的方型小餐桌

毛泽东生前遗物中有一张独特的木餐桌，说它独特，是因为这张木桌下方有一块 10 公分宽，75 公分长的踏板，踏板呈 45 度角倾斜。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这个踏板是毛泽东生前用餐时踏脚用的。

毛泽东晚年坐在床沿上用餐，小餐桌便摆放在紧靠床头的地方。晚年毛泽东因健康原因，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那张大木板床上度过的。他在床上办公、学习，也在床上见客、娱乐，甚至连吃饭也在床上进行。

毛泽东每日两餐，有时甚至只有一餐，中间饥肠辘辘时便以麦片粥、烤芋头、压缩饼干等充饥。每次开餐，工作人员都是用一个提篮提到卧室，然后一碟一碟地端上床头的小餐桌。于是毛泽东便开始一天的正餐。当他餐后准备睡觉休息时，工作人员便会在饭前让他先服几片安眠药。

毛泽东用餐是他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因为他吃饭很不“老实”，一边挟菜扒饭，一边双脚在地板上不停地拍打。有一次，卫士对他这一习惯不甚理解，便问他：“主席，你为什么每次吃饭都踩地板呀？”毛泽东回答说：“这是锻炼么，可以帮助消化。”而且，毛泽东为他这一独特的锻炼方式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擂鼓”。的确，每当毛泽东“擂鼓”时，虽不说惊天动地，但响声之大，节律之快，就连在大门口值外勤的警卫战士也能清晰听到。后来，毛泽东住地附近的不少人只要一听到“擂鼓”声，便知道毛泽东开始用餐了。

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一个小藤桌上用餐。这个藤桌四条腿绞在一起，不太高，毛泽东坐在床沿上吃饭时，双脚不仅踏不到藤桌隔条上，脚后跟着不了地，而且身子还要稍稍前倾一些才行。坐在这样的桌子前吃饭“擂鼓”确实令人痛苦难受。

1961 年，年轻的理发员周福明调到毛泽东身边卫作。他不仅做毛泽东的理发员，而且兼做卫士和其它杂勤。小周年轻胆大，脑筋灵点子多。他见毛泽东喜欢吃饭“擂鼓”，而藤桌又太小太矮，便想为毛泽东做一个较合适的餐桌。有一天，毛泽东请小周陪他一起吃饭，小周见机会来了，便一边吃饭一边与毛泽东商量起来。小周说：“主席，我帮你设计一张新桌子吧？你这么吃饭多累呀！”毛泽东听罢，有些怀疑他说：“你行吗？”小周说：“我试试看吧。”毛泽东不大相信小周会做桌子，但他还是同意让他试一试。于是小周对他说：“主席，您坐着，我来量一下尺寸。”然而，小周身边未带卷尺，毛泽东卧室里也没有尺子，于是他便就地取材，拿起一张《参考消息》报纸做起了尺子。小周陪吃完饭后便立刻奔回值班室，用卷尺重新量了尺寸。

小周设计新餐桌时考虑到毛泽东坐在床沿上吃饭，而床沿比一般的凳子要高出许多，于是便相应地将正在设计的桌子抬高了几公分。同时，他还在桌下设计了一块尺来宽的木板，该木板呈 45° 角倾斜，离地几公分。小周想，主席吃饭“擂鼓”时就可以双脚踩在这块木板上了。设计好后，小周便把制作任务交给了中南海木工班。不久，木工班就按照小周的设计做出了新餐桌。

新餐桌搬进毛泽东卧室时尚未油漆。毛泽东坐上去试了试，感到甚为满

意。从此，毛泽东便一直坐在这种造型独特的餐桌上吃饭、擂鼓。不过，工作人员都觉得，新餐桌也带来了“副作用”，因为毛泽东“擂鼓”的声音更大了……

毛泽东很喜欢这种独特的一人餐桌，工作人员为此多做了一张以作备用。后来，摆放床头的那张小餐桌刷上了阳干漆，刷亮亮的，很是醒目。毛泽东每天就坐在这张餐桌旁用餐，因为饭菜碗碟温度高，时间一长刷亮的餐桌上便烙下了许多具印痕。工作人见此，便准备在上铺上一张桌布，但这一变换必须首先征得毛泽东同意。毛泽东听罢建议，立刻一口谢绝。他说：“这样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变？每天吃过饭，只要用抹布一擦，干干净净的，多方便多省事，不要浪费那个桌布钱了。”

毛泽东去世时，中南海旧居里保存下来几张这种小餐桌。1990年，其中一张餐桌由北京运回韶山故里，为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珍藏。

外高里低的木板床

吃饭、睡觉、工作，可谓人生三大事。对于一般人如此，在毛泽东亦不例外。毛泽东一生艰苦朴素，自甘清贫，在生活起居方面素以简单随便著称。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便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喜好和特殊要求。相反地，毛泽东对于“睡觉”便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讲究”。

1949年3月，毛泽东挥师离开西柏坡，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起初，毛泽东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第一次走进双清别墅自己的卧室时，毛泽东便对身边工作人员发了一通脾气。原来，毛泽东对卧室那张弹簧床极不满意。其实，这间卧室的摆设十分简单，除了几张凳子、一张书桌、一张床外并无多余的东西。室内唯一显得豪华气派的家具就是一张弹簧床。这是以前的主人留下的，警卫员布置房间时并未动过。警卫员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床，坐在上面就象是坐在沙发上一样，厚软舒坦。他们觉得这个床要比毛主席在农村时睡的任何一张床都要高级。现在解放了，生活条件好了起来，让毛泽东睡得舒服一些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还认为凭毛主席的贡献和地位，早就该有这么一张床了。然而，这只是他们的想法，毛泽东却并不这么想。当他走进卧室时，第一眼便看到了这张床。他对此很恼火，声音很高地对工作人员

说：“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的床？这床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我睡木板床已经习惯了，觉得睡木板床就很好，我不喜欢这个床。”他指示卫士赶忙撤走弹簧床，并说：“我还是睡木板床舒服。”

毛泽东发火引起许多人恐慌。因为双清别墅没有木板床，而毛泽东以前睡的木板床又没有带来。这可怎么办？大家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劝毛泽东暂时先在弹簧床上睡一觉，第二天再想办法。卫士武象廷将大家的意思转告了毛泽东，并告诉他，已叫管理科的同志弄木板床去了，但现在马上换来不及，要等明天再说。

毛泽东正在伏案工作，听了武象廷这番话，他头也不抬他说：“弄了木板床来后我再睡。”显然，毛泽东牛脾气来了，如果不能弄到木板床，他显然是不肯睡觉休息的了。大家对此束手无策，焦虑万分。最后，他们只好又去找管理科联系，将毛泽东的态度告诉了他们。管理科的同志也深感为难。他们说：“没有现成的木板床了，到哪儿去弄啊？”卫士们说：“没有现成的也得赶忙想办法做啊，要不主席怎么休息？”于是，管理科无可奈何地立刻请木匠，紧锣密鼓地为毛泽东赶做了一张大木板床。毛泽东见了这张床，感到很满意，于是便上床休息。后来，毛泽东搬入中南海丰泽园时，工作人员便将这张床也搬了过去。

香山双清别墅发生的“木板床风波”使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了毛泽东不愿改变睡木板床的习惯和原因。后来，毛泽东本人亦对所睡的木板床提出了自己的特殊要求。他对工作人员说：“人生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至于我更是比一般人在床上度过的时间要多。因此，我的床一定要搞舒服一些。”毛泽东这么说乃是因为他喜欢卧床办公、看书、学习。因此，他要求木床能够放上一些书，使他能随手拿到。于是，后来人们便对木床进行了改进，使之能符合毛泽东的要求。毛泽东用过后深为满意，感到真

正是“舒服之极”了。改进后的木板床有三个特点：一是普通，毫无刻意雕饰，与一般人家使用的木板床并无区别；二是宽大，足可以容纳下两个象毛泽东这样身材魁梧的人；三是倾斜，木床一边高一边低，造型奇特，其中高的那边睡人，低的那边放书。此后，毛泽东便一直睡这种木板床，从来未曾改变过一次。

居家时毛泽东有自己的木板床，外出后情形却有时大为不同。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莫斯科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盛情和尊敬，特意安排了豪华别墅，其中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张高级弹簧床。一走进这间房，毛泽东便看到了这张床。他伸手按了按床，又看了看床上那套高级被褥，皱着眉头说：“我睡不了这种床，把我用的东西和书拿来。”毛泽东说完又使劲按了按床上的鸭绒枕头，风趣他说：“这能睡觉？头都看不见了。”卫士在一旁插话说：“主席，我们把垫子掀了，铺上块木板就行了。”毛泽东听罢连连点头，但嘱咐说：“不能去麻烦人家。我们自己想办法。”卫士说：“可以请大使馆的同志帮忙解决。”毛泽东表示同意。

毛泽东走进苏联同志为他准备的办公室看书看文件，卫士则在床前忙开了，反来复去地量尺寸，然后由叶子龙送往大使馆。

傍晚，大使馆派人送来一块新做的木板。于是，大家一起将苏方准备的被褥、弹簧床垫撤掉，换上了木板和毛泽东自带的旧褥子、白床单、灰毯子、毛巾被、荞麦皮枕头等等。

中国同志的做法让苏方服务员看到了，她们很不理解，甚至认为是自己招待不周，引起毛泽东主席不满，于是甚为难过。后来，翻译师哲费了一番口舌才使她们解除了误会。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苏方派了札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陪同杨尚昆、叶子龙提前仔细查看了一下毛泽东的住处。这次，苏方特别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张木板床，并对原来的蹲式马桶进行了一番刻意改造。毛泽东下榻后，对于苏联同志的悉心照料深为感谢。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外出频频，足迹几乎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万水千山。每每新到一地，毛泽东几乎都碰到过“床铺问题”。因为地方上开始并不知晓毛泽东有睡木板床的习惯，往往竭尽所能为其提供他们认为高级、豪华的床铺。有一年，毛泽东参加广州会议后到武汉，湖北省委在东湖安排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张最高级的弹簧床。毛泽东住下后不声不响，卫士们也感到颇为奇怪。第二天，人们推开房门一瞧，吓了一跳。原来毛泽东竟然通宵睡在地板上！

毛泽东对卧具的要求实际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他只要一张既能睡人，又能放书的大木板床。他不要地方为他提供被褥、枕头、忱席、床单。每次外巡，他都是自带卧具，除了木板床不能自带外。其余的一切卧具，他都是随身带着。地方同志见到这一情景，都感动得要落泪。毛泽东毕竟是领袖呀，他怎么就像一个外出打工的“民工”呢？如果连毛泽东需要一张木板床的要求都不能满足，那还像话吗？于是，凡是毛泽东常去常住的地方，人们都仿照毛泽东中南海那张大木板床的样式，为他做了一张木板床。人们希望，毛泽东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睡到哪里，都能时刻有一种“身在自家”的感觉……

补丁重重的毛巾被

毛泽东对卧具的唯一要求便是两个字：舒适。他认为睡木板床舒适，于是终生只睡木板床；他认为盖毛巾被舒适，于是拒绝盖厚重暖和的棉被。毛泽东遗物中有好几条毛巾被，这些毛巾被上补丁叠补丁，显然足以说明主人喜爱的程度和使用的历史。

毛泽东晚年怕冷怕热，因此，他从不使用棉被。毛泽东卧室里时刻准备着棉被和毛毯，但毛泽东从未使用过。他认为棉被太重，睡在里面喘不过气来。于是，毛泽东一年四季只盖毛巾被。工作人员为避免毛泽东冬季里着凉，便时刻注意使其卧室里的气温保持在 22 左右。

毛泽东外出时也部随身带着自己的毛巾被。他不愿意使用地方提供的东西，即使是全新的也为愿意使用。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习惯用自己的东西。”有一年毛泽东到重庆，四川同志为他安排了一套崭新的绸缎被子，毛泽东走进房间便皱起了眉头，吩咐卫士把被子撤走。晚上，他便盖着自己那条陈旧的毛巾被过夜。

毛泽东恋旧的心理可谓众所周知。他不仅在友谊上恋旧，而且在使用的物品上恋旧。他不愿随便扔掉不能再穿的旧衣、旧鞋，更不愿舍弃一条盖了多年的毛巾被。毛泽东这种恋旧节俭的心理是与他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紧密相连的。在他眼里，凡是尚可利用的物品，不能大手大脚随意抛弃，而要有效地利用起来。他一年要用破几条洗脸毛巾、擦嘴面巾，但他不会同意扔掉这些破毛巾、破面巾，因为他认为还有使用价值，可以用来缝补枕巾、毛巾被。毛泽东生前使用的许多枕巾、毛巾被都有用破毛巾、面巾缝补过的痕迹，其中有一条毛巾被便打有形形色色的 52 个补丁。

有一次，洗衣工人为毛泽东洗一条毛巾被，一不小心便搓破了。他们觉得这条毛巾被不能再用了，于是便建议让毛泽东换一条新的。可是毛泽东任凭工作人员怎么劝说也不同意更换。他总是那句话：“补一补还可以用嘛！”工作人员无奈中只好继续给他补。这样，毛泽东又能用上若干年。毛泽东为此感到特别高兴，但工作人员却叫苦连天。因为这条毛巾被实在太破旧了，根本无法正常洗刷。好在工作人员脑筋灵活，他们不再送到洗衣工人那儿洗，而是自己泡上一盆肥皂水，将毛巾被放进肥皂水中浸泡一下，然后再到水中漂一漂。漂洗时，为了不致弄破毛巾被，他们一人抓住一个角儿，轻轻地在水中来回晃动。这种方法先出来的毛巾被自然不及搓洗过的干净，但毛泽东从不计较。他是一个十分随便的人，尤其是在诸如此类的生活小节上。

毛泽东的破旧毛巾被还曾送到上海毛巾厂织补过。每次毛泽东去上海，工作人员都要仔细地考虑一下是否有东西要送到上海去缝补。有时他们带去一件棉毛衫，有时带去几双棕色长筒衫袜，有时则带上一条破了的毛巾被。工作人员认为上海工人手艺好，不仅做出来的毛巾被好看耐用，而且织补过的东西精致，于是便经常带上这些破旧物品去上海。当然，上海的工人师傅是不会知道这些破旧物品的主人的，否则不知会令他们惊讶到何等程度呢！

织补过的毛巾被比缝补丁自然既要美观，又要耐用，每每织补过一次，毛泽东都能再用上一段不短的时间。工作人员对上海工人的手艺称颂不已，毛泽东见了也赞不绝口……

毛泽东生前使用过的毛巾被均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其中现存韶山毛泽东

同志纪念馆的一床毛巾被打有 54 个补丁，已成为国家二级文物。

靠背用的旧军毯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来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中国汪洋恣肆的军事史海中重重地涂抹上了恢宏巨笔。然而，毛泽东虽然戎马倥偬，纵横捭阖大半生，却从来未曾在硝烟弥漫的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过。于是，有人便说，毛泽东其实并非一介“武夫”，而是一位足智多谋、风采儒雅的“儒将”。烽火连天的战争已成为辉煌过去，但战争留给一代巨人毛泽东的记忆却是鲜叫而深刻的。毛泽东生前遗物中，战争年代的纪念品并不乏见，其中那床陈旧的军毯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他最为心爱的纪念品了。

作为遗物保存下来的军毯显然已十分陈旧，但从暗淡的草绿色中依然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当年战争岁月所留下的痕迹。毛泽东当年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这床军毯是在西柏坡时使用的，至于添置年代自然更早一些。很明显，毛泽东曾带着这床军毯转战黄土高原，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最终率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对于一般人而言，毛毯的功能也许只限于保暖御寒，但在毛泽东这里却并非全然如此。毛泽东有许多独特的生活习惯，表现在毯子的使用方面便也显得与众不同。他不喜欢盖厚重的棉被，延安时期，即使是寒冷刺骨的严冬，毛泽东也只愿意盖一床旧棉被。有时实在太冷，他便在棉被上加盖一件军大衣或一床军毯。毛泽东一直认为，健壮的体魄是革命的本钱，必须时时刻刻经受风霜雪雨的锤炼。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便十分注重体育锻炼，常年坚持洗冷水浴、风浴、雨浴，还曾为当年名噪一时的时代杂志《新青年》写过一篇题为《体育之研究》的长文，阐述自己对体育的全面看法。因此，毛泽东后来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好，很少生病吃药，御寒能力特强，一般情况下无需盖棉被、烧炕烤火，而只凭一床军毯也能平安地度过一个个较为寒冷的冬夜。

解放后，毛泽东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后来家中还有了暖气，再也不必畏惧寒冬了。当时，他在战争年代使用过的军大衣、军毯依然完好如初，整整齐齐的摆放在卧室里。军毯的颜色虽然有些褪落，但尚未见有破损。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做了一个新的草绿色布套，将旧军毯裹了起来。1949年、1957年，毛泽东两度访苏时都曾带着这床里旧外新的军毯随行。

毛泽东极为珍视这床军毯。他生性恋旧，用得越久的东西感情越深厚，更加不能随便舍弃。解放后，军需部门有了丰富的物质，崭新的军毯堆积如山，但毛泽东丝毫不为所动，从来未曾有过换床新军毯的念头。他的大儿子毛岸英结婚时，毛泽东心中总想送点什么作为礼物，但想来想去他只是送了一件旧军大衣，连这床旧军毯也未能舍得给儿子。他对儿子说：“大衣白天可以穿，晚上也可以当被盖。”拳拳慈父心，尽在不言中。

晚年毛泽东因为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开始畏冷畏热，但他依然未能改变过去不睡棉被的习惯。工作人员在他的卧室里准备了一床保暖性能良好的棉被，还有两床厚软的毛毯，但毛泽东从来没有使用过。他认为年纪大了，盖棉被感到太沉重，会睡不安稳。于是，春夏温暖时节，毛泽东便盖着一条毛巾被过夜；秋冬寒冷时分，他便偶尔在薄薄的毛巾被上加盖一床毯子。这一独特的生活习惯，毛泽东一直坚持到临终之际。毛泽东生前，工作人员常常为他的这一习惯多耗费不少精力。因为毛泽东毕竟已是高龄老人，如果因为

冬寒着凉生病，那责任可是够大的了。因此，后来人们便在毛泽东居处安装了保暖设备，每到冬季便时刻保证毛泽东卧室、办公室、客厅的供暖。在保健人员的指导下，卫士们在毛泽东活动的这些房间里都装上了温度计，卫士轮流值班，保证室内温度不低于摄氏 22 。这样，毛泽东便只需盖上一床毛巾被亦可安然过冬了。

毛泽东的军毯已失去了原来的保暖功能。但他依然需要军毯。原来，毛泽东有卧床办公的习惯，于是军毯便常常用来热背。毛泽东晚年因为年迈体弱，更是很少坐到办公桌前办公、学习了。70 年代后，毛泽东连户外活动都渐渐减少，成日里卧床学习、工作、休息。他在宽大的木板床上办公，文件就堆放在木床上、床头木桌上；他侧着身了看书，半边木床上的各种书籍堆积如山。然而，宽大的木板床适宜放书放文件却不适合老年人靠背。于是，毛泽东便利用起枕头、军毯，将军毯搭在床端木架上，背部、手肘部位塞上枕头，做成一张具有沙发功能的“软靠背”。毛泽东就这样每天背靠在木床架上工作、读书，工作人员每每见此，都想劝毛泽东做一个特制海绵垫靠背，但毛泽东不同意，常常说：“这样很好，不要改变了，已经习惯了，很舒服呢！”后来，江青请人设计了一张能够升降自如的床，工作人员觉得这种床很适合毛泽东用，也想为毛泽东做一个，但毛泽东坚决反对。

毛泽东去世后，人们清理遗物时发现，当年的旧军毯除了布外套褪色外，其它的依然保存完好。如今，这张旧军毯陈列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遗物展室中。

奇特的凹字形沙发枕

毛泽东遗物中有一种凹字形沙发枕，外罩为灰黄色卡叽布面，枕蕊由海绵制成。这种形状颇为奇特的沙发枕头是工作人员为方便毛泽东躺在沙发上工作、学习而设计的。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一般在办公室工作、学习。办公室里有一张很大很大的办公桌，桌面上堆放着许多文件、书籍和文房四宝。那时候，毛泽东常常坐在办公桌前，孤灯作伴，废寝忘食。办公室旁有一间小客厅，里面摆着好几个高大的沙发。有时，毛泽东在紧张工作一段时间后，常常走进客厅，在大沙发上小憩。这时，他会听上几段音乐，或者看上一段轻松的文字。

这种凹形沙发枕是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特制的。

毛泽东的一天是紧张忙碌的，但他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晚年时，毛泽东的身体健康已大不如前，但精力依然充沛得惊人。当年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同志说，古稀之年后的毛泽东依然常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他的一天不是一般人的二十四小时，而是三十六小时，甚至48小时。然而，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毛泽东尽管在平常人看来属于一个特殊的人，但他也有感到疲困不堪的时候。不过，毛泽东不仅善于工作，同时也很善于休息、调节。每次连续工作时，他常常在困倦时稍作休憩调整。他常对工作人员说：“文武之道，有张有弛。”这时，他便会坐在沙发上，随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本书（或经典哲学、或古史文集），聚精会神地读上几段。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一种休息，他称之为“换脑”。然而，毛泽东毕竟太疲劳了，这样坐在沙发上看书，时间稍长一点便会不知不觉睡着了。有一次，凌晨四、五点钟了，毛泽东突然坐到沙发上看起书来。这天是卫士封耀松值班。毛泽东拿起书后叫小封弄点吃的东西来。显然，工作一天下来，毛泽东感到有些饥肠辘辘了。不久，封耀松端来6个小芋头，但毛泽东此时却躺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小封不想惊扰了主席，将芋头放在暖气片上烤着。便轻轻退出了门，十几分钟后，小封在门外听到毛泽东的咳嗽声，赶忙端起芋头走进去，一边走一边轻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毛泽东说：“噢，想吃了。”说完从盘子里拿起一个，一边剥皮一边往嘴里送。一个芋头还未吃完，小封便感到房里情形异样，因为他听到了毛泽东发出的鼾声。他走上前去仔细地瞧，发现毛泽东的确是睡着了，而且口中还含着半截烤芋头。这时，毛泽东的鼾声越来越不正常，口中那半截芋头随着他的呼吸声不停地抽动。封耀松见到此情此景，鼻子不由得一酸，泪水哗哗直落。他赶忙蹲到毛泽东身前。用手轻轻地去抠那半截露在外头的芋头。半截芋头被抠了出来，但毛泽东亦被惊醒了，他睁着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盛怒地盯着小封大发雷霆：“怎么回事？！”小封满脸泪花，手里捧着那抠出来的半截芋头，嗫嚅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毛泽东这时叹了一口气，说：“我不该对你发火。”小封回过神来，感动他说：“您太累了，必须休息，必须睡觉了！”

其实，毛泽东吃东西时不知不觉睡着的事情时有发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一项不为常人所知的本领，那就是在毛泽东吃东西时睡着后为他小心地抠出口中尚未来得及吞咽的饭粒。这是一项艰苦而细致的工作，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大都精于这项工作。这种情形一般发生在大木床上，但有时也在沙发上出现过。为了使毛泽东在沙发上睡着后能睡得舒适安稳，就必须保证他

的头部不致于两边倾斜，左右摇晃。工作人员为此想方设法，最后决定为他制作一种可以固定头部的沙发枕。于是，毛泽东家里便出现了一种造型奇特的“凹”字形沙发枕头。

凹字沙发枕做出来后，毛泽东夸奖工作人员有办法，肯动脑筋。此后，他躺在沙发枕上睡觉的时候便更多了。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在沙发上睡觉竟然可以不再需要安眠药，而且睡得更香，睡得更为安稳……

毛泽东用过的这条沙发枕巾，上面的大补巴、破洞、缺口清晰可见。

1973年12月26日，毛泽东80岁生日。据说，就在生日后不久毛泽东大病一场。从此，毛泽东便羸弱不堪，更显老态龙钟。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了。这时，他把工作、学习的场所从办公桌、沙发上，完全转移到了大木板床上。当然，毛泽东从此不再需要这种奇特的沙发枕了。不过，工作人员依然未将沙发枕收进仓库，因为毛泽东有时还会下床活动，而这种沙发枕正好适于高龄老人使用……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猛然长逝。不久，毛泽东生前遗物大都搬迁至仓库，这种凹字形沙发枕终于告别主人，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如今，凹字形沙发枕陈列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成为一代伟人平凡而伟大生活的历史见证。

保暖用的绿色热水袋

毛泽东遗物中有好几个普通热水袋，普通的橡胶，普通的布套，与寻常人家老人使用的并无不同。这些热水袋是毛泽东冬季寒冷时分办公、学习时使用过的。现存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热水袋为北京橡胶厂制造的“双鹿”牌，生产年代大约为60年代初，成色已较为陈旧，外套有磨损痕迹，体现了主人对其的喜爱程度。

在没有空调的年代里，热水袋是毛泽东冬天暖手暖脚的唯一用品，其实，毛泽东是一个怕热不怕冷的人。年轻时的体育锻炼使他终身受益非浅，战争岁月的艰苦磨砺更是使他能抵御酷暑严寒。解放后，他常于秋冬季节去江河大海游泳。寒冬腊月，一般人少穿几件衣服便会直打哆嗦，但毛泽东却能赤身跃入冰冷的水中而不皱一下眉头。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随着年龄越来越高，身体日益羸弱，毛泽东晚年时却突然畏冷起来。晚年毛泽东因为年迈体弱，很少走出房去活动了。他每天蛰居斗室、办公批文，浏览经史文集，忘却了外面世界的喧闹，也忘却了自身的悲欢喜痛。他卧在床头，或俯伏案头，或挥毫疾书，或凝神遐思，时间久了，他感到有些冷。此时，他便问工作人员：“今天怎么这么冷？”工作人员赶忙去查看挂在墙壁上的那个温度计，瞧一眼后大惑不解：“室温没有降低呀，主席怎么感到冷？”于是他们去抚摸毛泽东的手脚，发现冰凉冰凉。后来，他们才恍然大悟：“毛泽东已经真的老了，血液循环已大不如前了。”于是他们便为毛泽东想办法，一定要保证他手脚不凉。当时，毛泽东所居之处使用的是单暖空调，由专人负责看管小型锅炉，二十四小时保证为毛泽东卧室、办公室等处供送暖气。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卧室、办公室、客厅等他常常活动的地方的室温都能保持在22℃左右。据说，这是毛泽东最能接受的温度。如果高于这一温度，毛泽东便会受不了，工作人员就得手忙脚乱开门撬窗为之降温。十多年来，毛泽东在这种环境中已习以为常，现在却突然觉得冷起来，工作人员还真觉得不知如何办才好。“能不能将室温升高些？”有人提议。“不行，主席怕热！”大家纷纷表示反对。最后，又有人提出买热水袋，这是一般老人冬季里常备的保暖工具。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也许行得通。因为毛泽东只是感到手脚冷么，热水袋正好解决这个难题。于是，工作人员便将添置热水袋的想法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听了，觉得这个办法好，欣然同意。

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工作人员马上为毛泽东购置了几个热水袋。此后，毛泽东冬天办公学习时，工作人员便在他手、脚处摆上两个热水袋。毛泽东坐在办公桌旁，双脚踏在热水袋上便不会再感到冷。后来，毛泽东觉得办公时间久了，胸口、背部也有些觉着凉，于是工作人员便为他多添了一个热水袋，挂在椅背上暖背，而手肘边那个热水袋亦可暖心。毛泽东对放热水袋的做法甚为满意，觉得既不多花钱，又能解决问题。

此后，每逢冬季，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毛泽东都带上热水袋。坐车去开会时，热水袋便放在脚底下、坐垫上；会场上，他的双脚便踩着热水袋。60年代，毛泽东有一次坐敞篷吉普车接见红卫兵，因为天气特别冷，工作人员在他的脚下还多放了一个热水袋……

小小热水袋曾陪伴一代伟人走过了最后一段平凡而伟大的岁月。如今，

这些普通热水袋作为珍贵文物保存下来，成为一代伟人辉煌人生轨迹的真实见证。

高丽参浸泡的茅台酒

毛泽东遗物中有一罐玻璃缸盛装的茅台酒，重约4公斤，酒中浸泡数支高丽参。据说，这是毛泽东晚年体弱多病时工作人员特意为他泡制的。然而，毛泽东生前却从来未曾喝过。

毛泽东终生不善饮酒，这在党内外不算是秘密，甚至连许多平民百姓都知晓。在党内，周恩来的酒量是不错的，毛泽东真是佩服之极。因为他本人太不能喝酒，无论心情好坏、身体如何，只要喝酒他便准会脸红——从脸上一直红到脖子上。有时，毛泽东甚至会被一小盅白兰地醉倒床上。

毛泽东深知自己的“酒量”，也深知酒精的危害性，因此他一贯反对喝酒。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喝酒会误事，不能喝的人最好不要喝；能喝的最好少喝。”然而，作为领袖，毛泽东总有应酬。在中国几千年灿烂文明中，酒已成为应酬场合中一种奇怪的文化。因此，毛泽东在各种应酬场合上便不得不随大流，喝上几杯。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白天，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夜晚，毛泽东便时常接受在渝民主人士的邀请，出席各种宴会。

有一次，毛泽东去知名人士鲜英家私访。鲜英很好酒，家中常备大量好酒。凡有来客，他便以酒相待。毛泽东知道他的这一嗜好，但鲜英却不知道毛泽东不善饮酒。这次鲜英特意取出封存多年的自制枣子酒招待毛泽东。毛泽东在这种场合，尤其是与党外人士相处时，是非常讲究礼貌的。他认为不能有拂主人一片盛情，于是便一杯接一杯地对饮起来。他们一边饮酒，一边赋诗，同时如侃大山般交流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当然，不善饮的毛泽东这次尽管借着酒兴尽情潇洒了一回，但他却平生第一次大醉而归。不过，他很高兴；鲜英也很高兴。

后来，谈判结束前蒋介石也举办了一个招待宴会。宴会上，蒋介石举杯向毛泽东敬酒，他在宴会上一直显得很开心。但毛泽东却并不领他的情。他只是礼貌性地与蒋碰了杯，却未喝一口酒。也许，这也是毛泽东的一种性格，一种“不逢知己酒不香”的性格。

解放后，毛泽东很少喝白酒。1949年10月1日，是毛泽东最高兴的一天。这天，他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晚上，中国共产党举行重大庆祝宴会，招待来自苏联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晚宴会后他们还要前往天安门城楼观看盛大的焰火、游行晚会。宴会前，负责中央首长工作、生活安排的中央办公厅很担心有的中央领导会喝醉。因为苏联人很能喝酒，恐怕没有哪位中央领导能够与苏联来宾中的任何一位媲美。于是，中央办公厅指示保健医生、首长贴身卫士用茅台酒瓶装了白开水为一方人员斟酒。宴会上，毛泽东喝的是红葡萄酒。工作人员便以红茶水代替葡萄酒给毛泽东斟了一杯又一杯。毛泽东对此很满意。因为他已喝过几杯真正的葡萄酒了，如果再不玩点“名堂”，结果难以预料。当然，苏联人并不知道这一内幕，他们在酒意朦胧中只觉得眼前的中共领导人一个个都很善饮，个个都是“海量”……

跟一般人一样，毛泽东在高兴或痛苦的时候也能喝些酒。在庐山期间，毛泽东心情极不好。苦闷中他曾约请周小舟、田家英、周惠等喝过一次茅台

酒。当时，毛泽东想听听他们对形势的看法。这些同志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交谈时便毫无顾忌，许多观点与毛泽东大相径庭。毛泽东的本意是带了耳朵来听的，但俗话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毛泽东却越听心里越难受。畅谈中，毛泽东突然吩咐服务人员：“来，我们喝点茅台酒以助谈兴。”服务员马上提了一壶茅台酒来，给每人都斟了一杯。毛泽东拿起杯子，说：“我们边喝边谈。”说完便一饮而尽。说话结束时，毛泽东已喝了好几杯酒。这位很少沾白酒的伟人，这次却喝了好几杯茅台酒。但奇怪的是他却没醉。当然，酒后毛泽东还是睡了一个好觉。

1959年8月28日，毛泽东的长女李敏结婚。这天，毛泽东非常高兴。他亲自吩咐工作人员在颐年堂准备了三桌酒席，亲自圈定了许多来宾。女儿婚宴上，毛泽东显得满面春风，情绪高昂。他与蔡畅、邓颖超、王季范、王海蓉、孔从洲等同坐一桌，一杯接一杯地为这些亲朋故友敬酒。当然，毛泽东喝的是红葡萄酒。他喝了好几杯，但丝毫没有不胜酒力的迹象。

毛泽东平时不喝酒，也规定身边工作人员不准喝酒。但遇上什么节日，他也很体谅地网开一面。有一年毛泽东生日，李银桥想为他庆贺一下。他对毛泽东说：“主席，今天是您生日。大家辛辛苦苦又跟您干了一年，您也该有所表示啊！”毛泽东笑着说：“银桥啊、你这不是变着法子敲我的竹杠吗？”毛泽东当时为党内立了“不祝寿”的规矩，以往生日从来未曾庆贺过。现在李银桥拐了弯儿提出来，毛泽东思想也是应该“意思意思”。于是毛泽东破天荒的同意了，而且主动提出备些酒。李银桥欢天喜地领命而去。他能喝几杯酒，但自从跟了毛泽东后便很少喝酒了。毛泽东也许是出于这个缘故，便主动提出上酒。

生日宴上，卫士们准备了白酒和红酒。白酒自然是李银桥等男同志喝，红葡萄酒则是为毛泽东和女服务员准备的。毛泽东举起杯子为大家敬酒：“大家又跟我干了一年，我借这杯酒感谢大家。”于是，他轻轻地在酒杯上抿一口，便放下了酒杯。服务员姚淑贤见状忙说：“不行，不行，主席这杯酒一定要喝掉。”毛泽东说，“你们知道我不能喝酒么。咱们定个协议好不好？你们喝酒我吃辣子。”姚淑贤不同意，说：“主席，酒和辣子不是一回事呢！”毛泽东说：“白酒辣但辣不过辣子，你不同意么，那你吃个辣子我喝一杯酒行不行？”毛泽东知道姚淑贤吃不得辣子便故意“将军”，小姚当然不会上当。毛泽东见大家都不饶过他，便很认真他说：“我还是吃辣子罢，多吃辣子能成事，酒喝多了会误事。”刚说完，毛泽东也许觉得说漏了嘴，于是又马上说：“今天例外，你们尽兴喝，误了事不怪罪！”毛泽东毕竟是主席，他坚持不喝酒，大家也不好过分勉强他。最后大家还是只好同意他多吃辣椒少喝酒。这次，卫士长李银桥平生唯一一次喝醉了酒。毛泽东有言在先，没有表示不高兴，还亲自与大家一道张罗着给他打水，递毛巾……

70年代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甚至睡眠也更加困难。他又不愿意吃“补品”，很让人担心。后来，工作人员为他用高丽参浸泡了两玻璃罐茅台酒，希望他能每次在睡前喝上一杯以滋补身体、促进入睡。但毛泽东任凭怎么规劝就是不肯喝酒。当然。他还不知道茅台酒里加了人参呢，否则说不定还准会大发脾气。结果，这两大玻璃罐人参浸制的茅台酒他一口也未喝过。毛泽东去世后，中央办公厅组织专人清理他的遗物时有人喝掉了其中的一罐。因此，毛泽东遗物中便只剩下一罐人参茅台酒了。如今，人们用蜡密封了这罐茅台酒，当作珍贵文物保存起来。

破旧不堪的毛巾和小面巾

毛泽东在日常生活中素来十分随便，不拘小节。就拿洗脸之类的日常小事来说，毛泽东可谓随便之极，节俭惊人。毛泽东去世后留下的数千件遗物中，有无数破烂陈旧之极的白毛巾、小面巾，这些日常用品都极为普通，与寻常百姓家使用的没有任何不同。

毛泽东偏爱白色的毛巾。这并非因为白色看上去显得干净，不易藏污纳垢，而是因为毛泽东个性恬雅，偏爱素雅颜色，不喜华靡艳丽。因此，毛泽东遗物中的所有毛巾、面巾一律都是白色的。

毛泽东的洗脸毛巾晾挂在卫生间。工作人员为他在墙上牵了一根铁丝，高度适中，毛泽东取挂毛巾时极为方便。建国初期，毛泽东身体尚很健康，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自己亲自做，从不麻烦身边工作人员。他拒绝由工作人员帮助洗脸。后来，随着年事渐高，腿脚越来越不灵便，毛泽东的日常起居渐渐无法自理。此时此刻，他才同意接受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然而，即便如此，当工作人员为他洗脸时毛泽东仍然感到局促不安，过意不去。

除了洗脸毛巾外，毛泽东生前还使用面巾。这些面巾也是纯白色的，一般置于卧室、客厅等他常活动的地方。面巾都消过毒，用一个小碟盛放在茶几上，毛泽东取上取下时十分方便。毛泽东在饭前饭后常用面巾擦嘴擦手，天热出汗时也用面巾揩汗。起初，毛泽东常常感到这样做过于麻烦，但保健人员要求这么做，并以“病从口入”的医训相劝，毛泽东便也无可奈何。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毛泽东便渐渐适应了。

毛泽东一生倡导勤俭节约，反对任何形式的浪费。他在使用毛巾和面巾时向来崇尚节俭。他不允许一次添置太多毛巾、面巾，认为需要多少便买多少，不要多买，免得有浪费。毛泽东的毛巾也比一般人的“结实耐用”，因为他反对洗脸时在毛巾上打肥皂，主张清水洗濯。这样，他的毛巾便减少了肥皂的腐蚀，比一般人的要耐用许多。

毛泽东出身农家，深受农家勤俭美德的陶冶；同时，他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岁月的磨砺，更知艰苦奋斗的重要性。因此，无论生活环境变化多大，毛泽东节俭的品性从不移易。延安时期，毛泽东只使用一条毛巾，无论洗脸擦脚，都是这条毛巾。1947年，转战陕北前，李银桥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看到这一情景，未免大吃一惊。他想：“毛泽东是主席呀，怎么就只有一条毛巾，这多么不卫生啊。”有一天，毛泽东洗完脚，拿起毛巾来便擦。李银桥感到很是过意不去，忍不住对毛泽东说：“主席，买条新毛巾吧，擦脸擦脚还是分开的好。”毛泽东听罢，反问说：“银桥，我们每天这么行军打仗，你说是脸辛苦，还是脚辛苦？”李银桥想了想说：“当然脚要辛苦！”“这就对了，既然是脚比脸辛苦，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分开就不平等了嘛！”毛泽东风趣地说。李银桥扑哧笑出声来，说：“那就不用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洗脸。这样脚就不会有意见了。”毛泽东听了，摇摇头说：“帐可不能这么算噢，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还很穷，我多用一条毛巾算不了什么，可是全军如果每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的钱，我看就够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此时此刻，李银桥方才彻底明白，毛泽东并非不讲卫生，并非生性小气，而是心中算着一笔大帐。

生活条件艰苦时，毛泽东拒绝享受，这可以说是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精打细算，似乎还情有可原；然而，全国解放了，物质条件改善了，毛泽东依然拒绝享受，依然安于清贫，不务奢华，却是难能可贵之极。还在西柏坡时，面对进城的现实，毛泽东常常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党的各级干部：我们进京是“赶考”，不能学李自成，一定要考出好成绩。后来，住进北京城，身边工作人员常常在他身边念叨改善生活条件，毛泽东听了都极力反对，当面批评。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条件时不讲究，这一条容易做到；有条件讲究时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他的生活水平是低的，仅仅保持着一般中国人的水准；他的生活习惯是传统农民式的，一直坚守清贫节俭之风；他对于享受素来厌烦之至，劝多了便大发雷霆，往往甩给人们一句话：“几十年我都是这么过的！”“我习惯了！”“你们不要再啰嗦了！”诚然，毛泽东的农民出身在他的性格、习惯以至思想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毛泽东那农夫般的节俭和固执常常弄得工作人员难堪。他不允许随便添衣置被，否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他不许扔掉一条破毛巾，否则让你捡回来，还要批评一个够。毛泽东一生用过不知多少毛巾、面巾，但从不允许工作人员扔弃一块。这些破旧毛巾、面巾自然无法再用以洗脸、擦脸了，但毛泽东认为还可以用来缝补毛巾被、枕巾，甚至毛巾睡衣，枕席等。因此工作人员得为他保存起来，以便有不时之需。毛泽东遗物中的几条毛巾被都曾用破面巾、旧毛巾缝补过，现存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一条毛巾被上就曾用这种破毛巾缝补了54个补丁。毛泽东喜欢用那种柔软的枕巾，因此他感到“新不如旧”，——旧枕巾越用越柔软。当枕中破烂时，毛泽东不准扔掉，吩咐工作人员找来破面巾缝补上。毛泽东遗物中有好几条枕巾都是补丁叠补丁，而这些补丁都是用破面巾、破毛巾缝补的。在一般人眼中，使用缝缝补补的东西显得寒酸之极，非到贫困交加、迫不得已时才如此作为，但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使用破旧的东西不仅感到比用新的舒服，而且也是一种节约行为，是共产党人时刻保持劳动人民阶级本色的标志。

毛泽东家里的餐桌、茶几、办公桌上，
随处摆着几块这种面巾，以便毛泽东擦汗、擦嘴用。

毛泽东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恋旧情结”自然并非仅仅原于一种政治情绪，同时还与他的个人习性有着深刻联系。他不喜欢穿新衣认为新衣硬糙，不及旧衣穿起来舒爽；他不穿新鞋，认为新鞋夹脚。

因此，毛泽东反对不时添用新毛巾，更反对随便扔弃旧毛巾。这是毛泽东独特的个人习惯，但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自然不言而喻。勿庸讳言，毛泽东平凡而伟大的一生，通过大量普通却弥足珍贵的生活遗物铸造了一座深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神丰碑，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用秃了的牙刷与用惯的牙粉

毛泽东有许多令常人看来不可理喻的奇怪习性，比如他终生不用牙膏，只用牙粉，而且还要使用普通廉价的牙粉。在他去世后，这种灰白的牙粉还剩余不少。

毛泽东用牙粉的习惯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今天，在依然保存完好的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厨房的墙壁上，至今仍悬挂着一个用楠竹节制作而成的竹筒。毛泽东故居解说员说，这个竹筒是毛泽东家用来盛牙粉的。不过，据地方史料记载，当时的韶山，除了少数极富裕人家能够在漱口时用上工厂生产的牙粉外，大部分人只能使用草木灰烬作的“牙粉”。毛泽东的家庭在韶山本地仅属中等富裕家境，是否亦能用上当时尚且极为时髦的牙粉，我们不得而知。

1910年，毛泽东17岁时便离开韶山去外地求学。此后，无论是在长沙，还是在北京、上海，作为一介贫困书生，毛泽东只能一直使用十分普通廉价的牙粉。

正因为这种艰苦的生活经历，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时即使偶尔遇上高级牙粉，他也从不使用。据说，当时的江青就很不习惯与毛泽东共用一种牙粉。作为演员出身，无论是在山东、济南，还是上海十里洋场，江青都能用上较高级牙粉。毛泽东对江青这方面的生活小节时有责难，曾多次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情调”。

解放后，特别是进入60年代后，牙粉渐渐地为牙膏取代了，市面上牙粉亦极少有出售的了。但毛泽东还在用牙粉。于是，工作人员不得不每次为他多贮存一些。同时，他们也希望毛泽东能够改用牙膏。

有一次，毛泽东在卫生间洗漱完毕后，李银桥对他说：“主席，现在已很少有人使用牙粉了，您以后也用牙膏吧？”

毛泽东说：“我不反对你们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的么。都不用生产还能发展吗？不过，牙粉也可以用嘛。我在延安就是用的牙粉，已经习惯了噢。”

毛泽东就是这样，对于自己已习惯了的从来不肯轻易变更。穿惯了的衣服、鞋袜他不准丢弃；使用多年的笔、砚台不准更换；对于使用牙粉之类的习惯亦是如此。工作人员与他相处久了，也便能够理解他了。“毕竟是老头子嘛。”他们习惯这样称呼他。

随着工业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牙膏生产已相当普及化，而牙粉则大有被淘汰之势。工作人员时常私下议论：“如果没有工厂再生产牙粉了，主席是否会使用牙膏呢？”有一次，他们带着这个疑问与毛泽东讨论。毛泽东笑着说：“牙粉还是会生产的，因为还有人用么。至于我么，今后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用上牙膏了，我就会不再用牙粉了。”

当然，直到毛泽东逝世，牙粉亦未从中国大地上绝迹，而毛泽东自然也未能用上牙膏。

如果说毛泽东终生只用牙粉是个人习惯问题，那么，他对牙刷的使用则可谓近乎“吝啬”。他一生用过的牙刷并不太多，因为他能一把牙刷使用多年，一直到变成“不毛之地”时才最终放弃。

有一次，工作人员见毛泽东的一把牙刷已秃得不像话了，便去请示毛泽

东。因为不经他本人同意，他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动的。“主席，这把牙刷实在不能用了，还是换把新的吧？”毛泽东当时正在看书，也许书中内容极为有趣，因此显得很高兴。他听了这位工作人员的话后说“我看还能用呢，新的还不如旧的好用，不要急于换嘛！”工作人员无可奈何退出了他的房间。后来，这把牙刷又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秃头秃脑时毛泽东才提出换把新的。

工作人员觉得毛泽东这些生活习性十分有趣、可爱，而且也很感人，于是他们很有心计地保存了几把毛泽东用秃了的牙刷。这些已变成“不毛之地”的牙刷如今仍然保存完好。

其貌不扬的棕色肥皂盒

毛泽东的农民出身可以说影响了他整个一生。尽管他在人生漫漫旅程中，曾经经过由农民到知识分子，由知识分子到政治家的重大转变，但他与生俱来的许多农民性格、农民习惯却从来未曾改掉。毛泽东生前遗物中有一个普通的肥皂盒，为浅棕色塑料制品，既不美观，也不高雅。这是毛泽东生前置于卫生间盥洗台上用来洗手用的，也是他一生清贫俭朴生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一生从来未曾使用过香皂。他洗脸洗脚都用清水，拒绝使用香皂。有时，新来的工作人员感到不理解，劝他用香皂洗洗，毛泽东总是笑着说：“我不习惯。”其实，他并不是真正难以“习惯”，而是认为大可不必。他曾说：“我用清水洗了一辈子，效果蛮好，为什么非得用香皂呢？”

毛泽东不仅不用香皂，而且连一般肥皂也很少使用。他一般只用清水洗手，只有当饭后手上沾了油污或写字后染上墨汁才使用肥皂。他常与笔墨打交道，而且习惯使用毛笔。解放初期，他还时常研墨。这样，他的手难免为墨汁弄脏，有时还会弄脏了衣服。只有这个时候，他才用肥皂洗洗手。

有一次，毛泽东练完书法后手上沾了不少墨汁。他走进洗手间洗手。他擦上肥皂，认认真真洗起来。洗毕，他用毛巾擦干手。这时他发现手上还残留有墨汁痕迹。后来，他试着用洗衣粉洗墨汁，发现效果还真不错。

毛泽东在生活上十分讲究节约，即使是在肥皂的使用上亦如此。他反对浪费。他生前都是亲自洗脸洗手，从不让人帮忙。他用肥皂洗手时从不大把大把地擦，而是轻轻沾上少许。有时，一块肥皂洗了很久，只剩下一小块了，他也不允许换上一块新的，而是直到彻底用完后才同意更换。从延安时期起，毛泽东的衣服便一直由身边工作人员洗。那时，他便规定工作人员不要一洗衣服就用肥皂。他说，比较干净的衣服用清水洗一洗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用肥皂。还说，我们后方的同志要时时处处注意节约，一个人节约一块肥皂、节约一条毛巾微不足道，但一千个人、一万个人都来节约，就可以多造许多枪炮子弹。工作人员听了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此后，他们便按照毛泽东的话去做。毛泽东见了，很满意。解放后，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依然保持着延安传统。而且毛泽东喜穿的衣服中，许多都已十分陈旧，也根本不能沾上肥皂搓洗。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许多工作人员参加了对毛泽东遗物的清理。当他们清理毛泽东用过的肥皂盒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主席这个人哪，别看他地位这么高，可一生中还真从来没有享受过！”他们都这么说。

晚年常伴常随的灌肠器

毛泽东生活起居中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那就是大便困难。毛泽东在其它小疾小患方面极不愿寻医问药，但在便秘上却每每主动垂询。然而，医生面对毛泽东这一痛苦也无可奈何。毛泽东生前，工作人员一般用最原始同时最有效的办法帮助他度过便秘难关。毛泽东遗物中，当年使用的灌肠器依然保存完好。

毛泽东便秘的毛病由来已久。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便秘已十分严重。当时，贺子珍常常劝毛泽东少吃辣椒，因为辛辣食物易使人上火，造成大便秘结。红军长征时，毛泽东因患重病，只能坐在担架上行军。其间，因为劳累和饮食不正常，毛泽东便秘十分厉害。李银桥说，部队里常常为毛泽东拉出屎来而欢呼雀跃。

便秘之症与人的生理状况关系极大，同时亦与饮食习惯有关。毛泽东口味重，喜酸辣，无疑对他的便秘有极大影响。然而，毛泽东便秘不能完全怪罪于他那湖南人的饮食习惯。因为毛泽东犯这种病时一般是情绪特坏的时候。因此，有人说，只要胜仗一打，毛泽东便能吃能睡能拉。红军到达延安后，革命形势大变，毛泽东便秘毛病便日见缓和。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后，江青时常为他的便秘发愁。转战陕北时，毛泽东便秘严重，江青急坏了，经常带着警卫员，骑着贺龙给的那匹铁青马到山上寻找野生酸苹果。因为她听医生说，多吃水果、蔬菜对便秘有好处。

解放后，医疗条件、饮食状况均有所改善，但毛泽东便秘的毛病却并不见好转。1953年2月，毛泽东南下视察长江。陪同视察的有杨尚昆、罗瑞卿、铁道部副部长武擎天，以及汪东兴、叶子龙等。在江苏南京，毛泽东登上“长江”舰，沿长江航线逆流而上。有一天，随行保健医生王鹤滨走进毛泽东房间，准备为毛泽东作身体例行检查。检查完毕，王鹤滨正准备走。这时，毛泽东叫住了他。

“王医生，我忘记告诉你了，有好几天不大便了，有什么办法吗？”毛泽东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最好还是灌肠。”王鹤滨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

“那好，如果明天屎先生还下不来，就灌吧！”毛泽东叹气说。

诚然，对于保健医生来说，治疗毛泽东便秘的方法可谓少得可怜。一般来说，吃泻药可以缓解一时的便秘之痛，但泻药不宜用在毛泽东身上，因为它太让人难受。因此，在别无选择之卜，灌肠是最好的办法了。

毛泽东起初使用的灌肠器比较老式，后来出了新产品，工作人员建议换掉老灌肠器。毛泽东欣然同意。新式灌肠器有刻度表，操作行可以看见皮管里的空气是否排除干净了。因为灌肠时不能将空气带进腹腔。当时，一般的灌肠器都是使用钢管作插口，工作人员认为毛泽东年事已高，钢管的刺激性太大，于是便改用中号导尿管作插口。

灌肠工作由卫士进行。毛泽东一直认为这是一件羞于见人的事，从不让女同志来做。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两手绝活，一是按摩，二是灌肠。前者是帮助毛泽东睡眠；后者是解决毛泽东的便秘。每当卫士为他灌肠时，毛泽东总是很难为情。有一次，他对卫士李家骥说：“李家骥啊，我这个家和我本人都离不开你们，要不然我就成废人了，无法生活和工作了。你们做了我的孩子们都难以做到的事。”也许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毛泽东对待身

边工作人员常常显得十分亲近，其亲密程度甚至超过他对子女的感情。他常对工作人员说：“我们朝夕相处，比我和孩子们的感情还要深噢。”

毛泽东每周一般要灌肠2~3次，有时也有过八天十天灌一次的，晚年那几年，消化功能不行了，灌肠的次数便更频繁些。给毛泽东灌肠很有学问。因为要考虑到使毛泽东不难受，因此水热了不行，水凉了不合适；动作快了不行，动作过慢也不适宜，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每次灌肠时，工作人员得准备一大盆凉开水待用，他们不用肥皂水，只用凡士林。毛泽东有时相当配合，而且大概因为“久病成医”的缘故，他本人对灌肠器的操作十分在行。

每次灌完肠，工作人员便叮嘱毛泽东躺上床，耐心地憋上一会儿。这时，毛泽东一般很听话很配合。不久，毛泽东的肠道通了，人也舒畅了不少。工作人员为了使毛泽东灌肠后解手方便些，发明了一种大便盒。毛泽东常嘱咐工作人员将大便倒到花园或菜地里去。有一次，工作人员汇报说，大便已在后花园里挖坑埋了。毛泽东听罢很风趣他说：“我去世后，你们就在那儿插上一块牌子，写上‘是毛泽东之粪’。”如今，牌子尽管未插，但那个粪坑仍在。

毛泽东灌过肠后常对工作人员说：“我现在没什么用处了，如果说还有一点用处，那就是为人民积点肥。”

1971年后，毛泽东大便日见困难，灌肠后都效果甚微。有一次，毛泽东在便盆上蹲久了，怎么也站不起来。后来，工作人员只得让他坐着，最后连坐也不敢让他坐了。因为他们担心出意外，厕所里去世的大有人在。毛泽东在厕所里要呆上较长时间，他大便困难时常常因为太使劲而憋得满脸通红。有一次，工作人员站在旁边对他说：“主席，我跟你讲了多少次啦，叫你不要使劲，慢慢来，太使劲对心脏不好。”毛泽东说：“那多臭呀！”并说：“你出去吧，到房子外头去，这里太臭了。”工作人员说：“我不怕臭呢，如果怕屎怕尿我就不学医了。我们学医的就得通过看屎看尿发现问题呢！”毛泽东听了这番话，乐得直笑。

毛泽东临终前大小便失禁，每天要弄脏不少毛巾。这时，毛泽东神智还十分清楚。有一天，他对工作人员说：“便毛巾要由你们洗啊，不能拿到外面洗。”他担心麻烦外面的洗衣工。于是工作人员只好自己洗，先在厕所里洗一遍，然后才拿到外头去薰蒸消毒。

毛泽东一生部是宁可苦自己，不肯苦别人。在工作上如此，在饮食起居方面亦然。这是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的风范。

菊香书屋里的红色电话机

毛泽东遗物中有若干部电话机。电话作为现代通讯工具曾在毛泽东的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保持日常联系的便捷途径。毛泽东生前很少打电话，这项工作一般由秘书进行。但他常常亲自接电话，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的电话，他一般情况下会亲自去接。

还是住在双清别墅的时候，偌大的院子里仅装了一部电话机。这部机子就安装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因此，这部电话并不是毛泽东的专用电话，而是用于一般的工作。毛泽东外出时，电话铃只要响起来，在院子里站岗的警卫员就可以跑去接电话，有什么事，找什么人，毛泽东的警卫班完全可以代办。但是，毛泽东要是在办公室工作或休息，电话铃即使响个不停，警卫员也就不方便进去接。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但那些打电话的却不管毛泽东正在干什么，反正大小事情一律往这部电话机打。所以，毛泽东办公室里的这部电话机便没日没夜响个不停。

那时，每当电话铃响起来，毛泽东总是亲自跑去接。接电话之前，毛泽东自然弄不清是找谁的，因此常常出现毛泽东喊人听电话的现象。这对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显然产生了很大影响。工作人员每次进办公室接电话时心中都感到十分愧疚。他们私下里多次商议着要将电话机挪个地方，这样既方便了毛泽东又便利了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然而，毛泽东本人不说，他们也不能随便去搬迁。

有一天，毛泽东刚送走了客人，又回到办公桌前集中精力办公。这时，忽然电话铃响了起来。毛泽东刚刚坐下，听到电话响只好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接。原来，这电话是修建科打来的，要找正在双清别墅做工的工人。毛泽东有些愠怒的放下电话，走出门去告诉警卫员去找那个工人来接电话。

那个工人接完电话后走了。这时毛泽东把卫士武象廷叫到跟前，指着电话机说：“这个东西不好，请你把它给我挪走。”

本来，工作人员早就想把它挪走，现在毛泽东发了话，他们便马上通知了电话局，经过同他们商定，这才把电话机拆移到了警卫班。

不久，毛泽东离开了双清别墅，搬入中南海丰泽园居住。丰泽园的条件显然比京郊的双清别墅好了许多。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丰泽园安装了好几部电话机。其中毛泽东卧室、办公室以及秘书室、卫士值班室都装了电话。

毛泽东日常工作中的来往函件一般由机要秘书拆阅、处理，重要的才送毛泽东批阅。打给毛泽东的电话也由机要秘书接。任何打进毛泽东丰泽园办公室的电话，总机总是先接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那里。机要秘书听后，倘若认为必须由毛泽东本人接听，那就走了过去，通报一声。这时，毛泽东便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耳机，那电话便会接了进来。有时，电话内容紧急，而毛泽东正在睡眠，机要秘书便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叫醒他听电话。

直接打给毛泽东的电话并不很多。经常来电话的是周恩来。周恩来一般在夜里 11 时或 12 时来电话，这时毛泽东正在工作或学习，而白天尤其是上午毛泽东睡觉时，他很少打电话过来。而且，几十年来周恩来形成了一个惯例、电话接通后的第一句话都是问机要秘书：“主席睡觉了没有？”机要秘书一听到这声询问马上就知道是谁。周恩来的电话毛泽东总是马上接听。

毛泽东去世前几年，极少直接听电话了。这时，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整日卧在床上，行动也极为不便。于是来往电话便完全由机要秘书处理了。张玉凤是毛泽东最后一个机要秘书，她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接听电话，然后再向毛泽东汇报……

格外钟情的单株兰花茶杯

毛泽东生前遗物中有不少茶杯，其中主要为景德镇制造的单株兰花杯和双株兰花杯。这种茶杯制造精良，外观素洁高雅，为景德镇日用瓷之精品。

毛泽东平生并无太多特殊嗜好，惟有吸烟喝茶乃其终生最大的爱好。他每天要喝很多茶。据说，一天下来喝光一、二瓶开水在毛泽东乃“家常便饭”。毛泽东喝茶有专用的茶杯，尽管这种茶杯并非厂家为其特制，但工作人员在他使用的茶杯上做了记号，决不会出现乱套情况。

建国初期，江西景德镇为了庆祝新中国诞生，专门设计了一种瓷器，包括餐具、茶具。这些日用瓷上印有“开国纪念”字样，因此叫作“建国瓷”。当时，人民大会堂等接待场所均使用这种“建国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使用的也是这种瓷器。

1965年初，毛泽东家仍然在继续使用“建国瓷”；但数量减少了，式样成色也已很旧了。于是，中央办公厅一组工作人员决定为毛泽东弄套新茶具。大约3、4月间，汪东兴与江西联系，希望由景德镇设计一套餐具和茶具，其中要求茶杯外观上印上兰花。设计兰花茶杯时，为了使毛泽东自用杯和待客杯有所区别，便设计了单株兰花和双株兰花两种花纹图案。

1965年8月，毛泽东派身边工作人员汪东兴、吴旭君等到江西上饶参加社教工作。1966年1月1日，毛泽东南巡经南昌时患病，于是决定将汪、吴等接回南昌为他治病。社教结束后，汪东兴等人顺道参观景德镇，并将当初预定的瓷器接回北京。

瓷器运进中南海，毛泽东过国后格外垂青这套瓷具中的茶杯。因为，毛泽东一生爱兰，而这套茶杯上的兰花是那么栩栩如生，尤其是泡上龙井茶水后，更显得高洁动人，富于魅力。毛泽东选择了其中的单株兰花杯自用。从此，他便一直使用这种单株兰花杯，而双株兰花杯则用来待客。

在毛泽东的常用器具中，除了香烟外，茶杯的使用率可谓是最高的了。毛泽东起床前必须先喝一杯浓茶。这杯茶是毛泽东睡前工作人员就已沏好的，当他睡醒后打铃时便马上端给他。毛泽东喝过茶，读过报后才起床、吃饭，然后开始一天紧张忙碌的工作。工作时，毛泽东案头时刻摆着一杯热气直冒的酃茶。工作人员隔一段时间进房一次，主要工作是清扫烟灰、增沏茶水。

毛泽东一生主要喝龙井茶叶。龙井清香甘醇爽口，但茶叶无论放多放少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够浓酃。毛泽东喜欢喝浓茶，后来便试用其它茶叶，如豫毛峰、梅家坞、铁观音、碧罗春、云川沱茶以及汉阳峰、毛尖等品种，但结果都不是很理想，最终还是以喝龙井为主。

毛泽东每月的茶叶费是笔不小的开支。他很节俭，但在烟、茶方面却不怕花钱。毛泽东每月喝掉三、四斤茶叶是很正常的，有时还会更多。他喜欢吃茶叶，因此每杯茶水都须新放茶叶。毛泽东不愿让公家掏茶叶钱，常常嘱咐工作人员：一定要在自己的生活费中开支，不得揩公家分毫油水。

毛泽东外出开会视察时都是自带茶叶、茶杯。他常回湖南家乡小住，每

次回乡都带着一个单株兰花杯。家乡人民热情好客，待客上茶十分殷勤热心。毛泽东每次在长沙住下时，喝的第一杯茶都是家乡的“君山毛尖”。君山在长沙以北的岳阳市，素以出产毛尖茶叶著名。毛泽东平时很少喝君山毛尖，但回乡时每次都会喝上几杯家乡茶。毛泽东喝过地方上提供的茶叶后一般都会付钱。当时中央还有规定，即使是公务活动中在人民大会堂、怀仁堂、钓鱼台等地喝茶，均须按一毛钱一杯茶付款。这些地方均有记录中央首长喝茶吸烟的登记本，每月结算一次。毛泽东很注意以身作则，从不破坏规定。

毛泽东晚年依然喜茶。为了保证毛泽东每日能吸收到充分的营养，工作人员开始在茶水中掺兑葡萄糖、柠檬汁。毛泽东常吃的葡萄糖是北京果脯厂生产的，十分普通；新鲜柠檬则产自海南。毛泽东起初对在茶水中加兑葡萄糖、柠檬汁并不习惯，后来多喝几次也便习以为常了。这一习惯一直保持至临终之际。

中国乃茶叶之乡，自古以茶道著称于世。但到了近代，中国人都对深富古文化底蕴的茶道文化淡然起来。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对茶叶历史及茶道文化均十分熟稔。他曾跟工作人员多次谈到过大中华泱泱文明占国的茶文化，但在生活中却从来没有真正讲究过。茶道很注重茶具、礼仪，毛泽东却终生使用一个普通的茶杯，更未追求过任何茶仪。他在日常生活上主张简单随便，反对繁文缛节、铺张浪费。毛泽东去世后，人们清理其生前遗物时，发现他竟然只有几个兰花茶杯，连一个像样的茶壶都没有！毛泽东终生喜茶并善品茶，可茶具如此之简陋，自然会令某些人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香烟盒与烤烟箱

芸芸烟民世界中，毛泽东无疑算得上为中国头号“瘾君子”。毛泽东的烟龄长，烟瘾大，常常手持一柱，不绝如缕。毛泽东生前遗物中，有不少的烟具，如各种香烟盒、各式烟嘴、独特的烤烟箱、大量的空火柴盒等等。

毛泽东是从何时起开始学会吸烟的，这个问题至今尚无考证，其本人亦不曾公开讲过。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烟瘾已相当之大了。

战争年代，毛泽东吸烟并无保障。那时，香烟的一大来源还是国民党军队的“进贡”（战利品），他们是红军中无数烟民的“供给部长”。因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其他共产党烟民，所吸的香烟牌子自然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毛泽东曾戏之为“吃百家饭，抽百家烟”。在生活条件极度艰难的情形下，毛泽东时常也吸吸当地农民自种自晒的“旱烟”。这种旱烟劲大油重，常常伴随着一股异味，但毛泽东抽起来还是那么津津有味。尤其是当他下乡与农民开会、交谈时，抽当地产的旱烟亦不失为一种接近群众的方式。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吸烟更多了。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条件改善了，香烟来源稳定；另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工作更加繁重，需要以香烟来作为所谓的“神经缓冲剂”，常常一边工作一边吸烟，休息时也点上一支烟，一边吸一边思考问题。他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便是在烟雾缭绕中油然而生的。

毛泽东吸烟不讲究品牌质地，只注重香烟是否劲大味重，他好味重的香烟。美国产的“555”牌烟劲大，一般人一抽便呛得受不了，但毛泽东却很喜欢。50年代时，毛泽东便抽铁罐装的“555”。这一癖好，无疑与战争生活有关。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全靠美国人资助，甚至连香烟亦由美国提供。毛泽东喜抽“555”的习惯便是那个时候养成的。

继抽“555”之后，毛泽东抽“熊猫”、抽“中华”。这两种国产烟在当时都很有名，毛泽东抽过后也很是满意。后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抽这些国产香烟，不再抽进口的“555”了。

毛泽东生性节俭，很怕花钱，更怕浪费。但抽烟所造成的浪费他却很大方。“熊猫”“中华”等国产烟在当时还算价高位尊的，一般人还真负担不起这笔消费。毛泽东有时也感到吸烟花的钱太多，但上了瘾，一时是戒不了的。有一次，毛泽东去武汉，听武汉一位同志说湖北生产一种“珞珈山”牌香烟，烟味很好，价钱却很便宜。毛泽东听罢便托人弄了几条“珞珈山”香烟，试抽后觉得的确名副其实，于是多买了几条带在身边。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韶山时，随身带的就是“珞珈山”香烟。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时常外出，各种会议也很多。每次外行，工作人员都要帮毛泽东带上足够的香烟。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居家时，毛泽东的香烟一般放在办公室、床头等伸手可及的地方，但外出后则行踪难以预料，便出现了携带问题。毛泽东登山、游历、访问时，香烟或自己放在口袋里，或由随行人员装人一个公文包里。有时，毛泽东鼓捣着摸出烟来时，发现烟盒挤皱了，工作人员见了很是不安。后来，工作人员找来天津卷烟厂生产的“双猫”牌金属烟盒，将烟卷一支支装进去，从此便不必再担心弄皱烟卷了。

冬天里，气候干燥，烟卷水分蒸发后干得几乎掉渣，吸起来平淡无味。有一次，毛泽东抽烟时对工作人员说：“在我们南方，冬天切烟丝时要喷上

几口水，要不然就不好抽。”还说：“你们帮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卷烟弄湿一点。”工作人员大都不吸烟，没有“实践”经验，实在是想不出好点子。后来，他们终于从“老烟民”处得到一个办法：在烟盒中放上些新鲜油菜叶，上盖下垫，能保证烟丝不干。毛泽东抽了这个法子保管的烟后很高兴，对工作人员大加称赞。

1968年，毛泽东患了一次重感冒。病中，毛泽东依然想抽烟，但一抽便咳嗽不止。他感叹道：“人病了，烟都没味。”工作人员劝他就此戒烟，但毕竟烟瘾太大，即使病中亦无法戒掉。此事被李先念知道了，他建议毛泽东抽一种特制的“雪茄”烟，说：“这种烟既可以解瘾，又不会咳嗽。”毛泽东听罢将信将疑，于是要机要秘书徐业夫试抽。徐有气管病，且相当厉害，而烟瘾却并不比毛泽东小。徐业夫遵示试抽了一段时间，感到的确如李先念所言，于是便在毛泽东面前“吹”。毛泽东便说：“拿咯个烟来，先试一试！”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这种雪茄烟倒真是特适合患有气管病的烟民抽。从此，毛泽东便开始抽特制雪茄。

这种雪茄本来产于四川，当毛泽东等喜欢上该烟后，有关部门便在北京南长街81号开了一个分厂，烟叶和技术人员都是从四川过来的，卷烟的封口设备则来自越南。该烟包装普通，外观仅为白纸制成，毫无装饰，而且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暂停未吸20秒后便可自动熄灭，不致于因乱丢烟头引发火灾。

毛泽东原来抽烟从不用烟嘴。只是后来保健人员认为他抽烟太多，对身体危害甚大，才弄了一些烟嘴给他，并说：“主席，你以后还是用烟嘴吧，这样可以过滤一些尼古丁。”毛泽东听后尽管不很乐意，但还是采纳了，并且慢慢地习惯了。

1961年6月，工作人员打听到国外有种烟嘴可装过滤药物，大大减少了尼古丁等有害物质的吸入，于是便委托外交部购买了两打。这年7月1日，外交部便买到了这种烟嘴。外交部派了专人将烟嘴送至中南海，同时交给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一张《往来款项结算通知书》：“我驻日内瓦使馆转来委托外交部收款书第49号单据共4张，计欠165.60法郎，按0.569折人民币94.23元。兹将上项单据随函送上，即请将款交还本部财务科，以便转还使馆。”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想在招待费中报销这笔开支，但毛泽东坚决反对，表示自掏腰包。管理人员将事情上报中央办公厅，中办领导考虑再三，认为还是从主席稿费中报销为妥。

此后，毛泽东吸烟便用这种烟嘴。工作人员还制作了一个小木箱，专门用来放烟嘴、过滤药物，以及为烟嘴清洗消毒的酒精、镊子、棉球等工具。毛泽东用过烟嘴后，工作人员都要将用过的过滤药物用镊子挑出来，用酒精擦洗消毒，然后重新装上新的过滤药物。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工作人员都要带上小烟箱，每天把四、五个带有过滤器的烟嘴拿出来擦洗消毒，以备毛泽东随时使用。

毛泽东晚年抽上特制雪茄烟后，工作人员又多了一项烤烟的工作。因为，雪茄烟在春季、初夏季节极易受潮。有一年夏天，毛泽东在江西庐山视察。庐山气候温和凉爽，自然风光美不胜收，但是多云多雾，非常潮湿。因此，毛泽东携带的特制雪茄香烟大都受了潮。工作人员很着急，于是每天在煤火、白炽灯下烘烤香烟。

毛泽东还常去北戴河海滨小住。这里温和凉爽，但空气湿度也很大。有

一次，毛泽东吸了上潮的香烟后感慨他说：“烟有些上潮了，吸不动，你们想想办法。”然而，工作人员还是得在白炽灯下烘烤。烤烟是一项特别细心的工作，稍不留意便会烤糊烤焦，工作人员为此颇伤脑筋，但一时又无计可施。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员在白炽灯上烤烟时突然受到启发：“白炽灯可以烤烟，为何不做一个木箱呢？这样白炽灯的热量不是更加集中吗？”于是，他便试着制作了一个小木箱，中间用铁丝作隔层，箱底安装白炽灯，而受潮香烟则放在铁丝栏栅上。做好后，工作人员试用几次，发现果然不仅省事，而且效果也不错。从此，毛泽东便有了独特的烤烟箱。

夏季，雪茄烟容易受

潮，抽不动，需要烘烤一下，工作人员制作了这只烤烟箱，大的在住地用，小的在外巡时带上，每天烤上几支，以保证需要。

毛泽东抽了一辈子烟，可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打火机。他习惯用火柴。因为毛泽东每天吸烟量大，因此火柴消耗特多。也许他也意识到了这点，于是便十分注意节约使用，从不浪费。

毛泽东吸烟都是自己点火，很少让工作人员帮忙。他擦划火柴的习惯也与众不同。一般人用火柴点火时大都在火柴盒两侧磷皮上随意擦划，而毛泽东则有意从磷皮两端擦起。这样，一盒火柴棍擦完后，磷皮的中间部分可能还完好如新。有一次，一位新到的工作人员在收拾毛泽东的物什时，不知毛泽东有保留火柴盒的习惯，便随手将一个空火柴盒扔进了垃圾桶。毛泽东发现后叫他将火柴盒捡回来。这位工作人员不解地问：“主席，空盒子还要啊？”毛泽东说：“凡是还可以用的，都不能丢掉！”事后，这位工作人员闲聊时说起丢火柴盒的事：“一盒火柴一分钱，空盒子留下来干什么？”

毛泽东用过的火柴

盒也不准丢掉，以便买来散火柴装上再用。图为毛泽东反复用过的火柴盒。上面都有工作人员的编号。

扔了就扔毛泽东用过的火柴盒也不准丢掉，以便买来散火柴装上再用。因为毛泽东反复用过的火柴盒。上面都有工作人员的编号。了呗！”刚好这话让毛泽东听到了，他很生气，叫来这位工作人员谈话，说：“你这么说是错误的。我们国家还很穷，凡事都要讲节约，浪费不起哟。火柴盒确实不值钱，但它是用木材做的，丢掉它不就是丢掉木材么？”这下，工作人员都能理解了，他们十分细心地将毛泽东用完的空火柴盒保留下来，然后去北京火柴厂买回大量火柴棍，重新装上再使用。一只空火柴盒往往反复使用多次，直至完全不能使用时才扔掉。

打火机是比火柴更进步的现代火种。可是，毛泽东拒绝使用打火机。也许，毛泽东是为了节俭，因为打火机价高；也许是因为毛泽东闻惯了火柴燃烧时那种独特的松香味。毛泽东丰泽园生活资料保管室那个特制匣子里就留下了许多空火柴盒。这都是工作人员精心保存下来的，原都是预备着为毛泽东回收利用的，如今却成为一代伟人清贫节俭生活和精神风貌的历史见证。

穿戴修饰篇

总后特制的 8 套绿军装

毛泽东通晓兵法，运筹帷幄，从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总结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原则，如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以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成功地指挥了数以百计的战斗，但他一生中很少穿军装，而且从不佩枪。

1936 年在延安时，埃德加·斯诺提出给毛泽东拍张头戴缀有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而毛泽东没有，还是斯诺把自己的帽子戴到毛泽东头上，才拍成了这张具有经典意义的照片，同时，也是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毛泽东戎装照片之一。

“文革”初期，解放军总后勤部为毛泽东特制的军服。

1928 年 4 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两支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部队改编，毛泽东兼任第十一师师长，第一次挎起了匣子枪，他显得异常兴奋，诙谐他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但很快毛泽东就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以后也不再佩枪。

新中国成立后，曾发给毛泽东一份《持枪证》，但毛泽东实际并未佩枪。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的毛泽东却不喜欢带枪，也许这就是这位巨人性格的一大特征。

朝鲜战争签订停战协定后，毛泽东认为可以脱军装了，于是把所有的军装，甚至连黄颜色的衣服也视为军服（包括开国大典上穿过的礼服）都送给了卫士。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穿的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的军装，虽然是一号，但毛泽东穿上还是显得小了些，以至许多群众写信，责问为什么给主席穿那么小的衣服。于是，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根据不同季节为毛泽东特制了八套不同质地、厚薄各异的军装。有的确良的、棉布的、马裤呢的；有棉军大衣、厚绒夹大衣、棉军装、单军装。毛泽东分别穿着不同的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于 8 月 31 日、9 月 15 日、10 月 1 日、10 月 18 日、11 月 3 日、11 月 10 日至 11 日、11 月 25 日至 26 日，7 次接见红卫兵。“文革”之后，毛泽东就很少穿军装了，他的这些军衣军帽基本上也处于“退役”状态。现在这 8 套军服都完好无损地收藏在韶山毛泽东遗物库房之中。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再度穿上军装，频繁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反映出他当时的思想和心境，而这段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动荡的历史更值得我们深思，引以为戒。

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

毛泽东对于穿着，一贯都很不讲究，只要宽松就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周福明、吴旭君等回忆：“主席穿衣一定要大，不喜欢紧身，喜欢空荡。”因而，毛泽东在室内办公时最爱穿宽大的睡衣，随意，不受束缚。清理毛泽东遗物时发现长的、短的，厚的、薄的，好的、破的各式各样的睡衣有 20 多件，夏天穿薄的，其他时候穿稍厚的，再觉冷时，便套上厚棉毛假袖、护膝套，或披条毛巾，讲究的就是宽松、随意。

最引人注目，故事最感人的是一种白色泛黄的睡衣，这就是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这件睡衣是 50 年代初，北京东交民巷雷蒙服装店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做的，木薯棉质地，夹层，香蕉领，有两个口袋，长 141 厘米。从那时一直到 1971 年，毛泽东春秋两季都穿它。

毛泽东对这件睡衣也是越穿越有感情，衣服也越穿越破。60 年代初，睡衣的肘部、领部、袖口都有了破洞，开始，工作人员还能缝补一下，到后来实在无法再补，工作人员向主席请示，换件新的，因为没有他的同意，谁也不能擅自为他添置东西。毛泽东扫视了一眼，说：“还是不要换，再请人补补吧！”工作人员只好送到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那儿补，刘师傅真是高手，找了同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毛泽东见后可高兴了，于是以后破了补，补了又穿破，以至工作人员洗这件衣服，都不敢用手搓，只能放点洗衣粉，稍稍浸泡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轻轻地清洗。

一次，工作人员趁毛泽东休息之机，给他换了件新睡衣，醒后，他发现睡衣被人换了，就很不高兴，一再追问旧睡衣哪去了。工作人员只好把旧睡衣拿出来，毛泽东接过睡衣，边穿边说：“习惯了，还是这件补丁叠补丁的睡衣好穿。”

到 1971 年，睡衣已到了稍不留神，就会脆破一个大口子的程度了，实在无法再穿了，毛泽东才同意换件新的。

此时，睡衣已是面目全非”，领子全换过，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看不出本布，仔细数数，整件睡衣竟有 73 个补丁，真可谓“百衲衣”恐怕就连寻常百姓家也找不出这样一件“稀世珍品”吧？！

毛泽东时刻不忘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原则。从 1953 年到 1962 年，毛泽东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工作人员看到他的衣服破了，劝他换件新的，他说：“我们国家穷，发的布票少，你不也穿着补丁衣服吗？我为什么就不能穿？因为我是主席？我看还是应该节省点，不要做新的，破了再补嘛！”

1942 年调到延安给毛泽东当警卫员兼马夫的辛克回忆：“我给主席洗衣服，出于好奇心，一边洗一边一块一块地数着衣服上的补丁，大大小小足有 16 块。尽管我小心翼翼地擦搓，一不注意，还是又给搓出了一个洞，衣服干后，我再给补上了第 17 块补丁。”

毛泽东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旧得没法补了，旧衣就变成补丁布。在陕北杨家沟时，卫士拿着一件补丁叠补丁的衣服给毛泽东看：“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作手势，它就会裂成布片呢。”

毛泽东接过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说：“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

还有一次，一位卫士看到毛泽东的一件衬衣因穿的时间太长，已薄如蝉翼了，加之他洗时不小心把背部撕了个大口子。正好有位同志的爱人生了小孩，这位卫士把这件衣服给了小孩作尿布。谁知，主席竟还一再追问衣的下落，卫士情急之中，撒谎说给小孩改衣服穿了，毛泽东听到没有随便扔掉，而是派上了其他用场才作罢。

斯诺在《今日红色中国》中写道：“我认为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是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生活方式时用的‘铺张浪费’一词的。他的‘享受’大致等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所享受到的东西。”

毛泽东曾说过：“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从这件睡衣，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伟人毛泽东，一个举世无双的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者的生活作风和思想境界。

战争年代穿过的羊毛衫

《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这张照片上，毛泽东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手握缰绳，目光炯炯，注视着前方。外衣敞开，露出里面穿的细线毛衣，这件毛衣就是现收藏在我馆的毛泽东延安时期穿过的浅黄色薄羊毛衫。这是一件无领圆口套头衫，前胸有16厘米开襟，上有三个扣眼，钉一黄一灰胶扣，另一颗扣脱落，领口左右两边均磨损脱纱线。右袖肘部补有一块浅灰色棉纱布，前后页有6处用棉线手工织补，整件衣另有10多处大小不等的破洞，衣后领缝有“惠罗公司标准货品”长形布条和“44”小布条。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蒋介石在他的美国主子援助下，不顾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强烈要求，撕毁《双十协定》，从1946年夏天起，悍然大举进攻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自然是他们进攻的重点。蒋介石指挥他的嫡系，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投入了34个旅共23万兵力，分5路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在西安集中了一支伞兵部队，企图突袭延安。从11月开始，敌机不断进入延安上空骚扰。延安的后方机关开始有计划地疏散。1947年3月8日，延安一万多军民在宝塔山下举行保卫边区的动员大会。3月12日，延安上空出现美制蒋记轰炸机，投下了进攻延安的第一颗重磅炸弹。3月13日，拂晓，胡宗南的14个旅分兵两路，同时由宜川、洛川一线分路向延安发动猛攻，同时，50多架飞机对延安实行狂轰滥炸，一整天没停歇。彭德怀紧急调来新四旅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灭敌空降兵，并亲自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及身边工作人员讲了两句话。

“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

3月16日中午，毛泽东正同周恩来、彭德怀谈话，“轰隆隆”一声巨响，两颗重磅炸弹在门前不远处同时爆炸。门窗玻璃全部震碎。气浪象强台风一样冲进来，窑洞受到震荡和冲击，嗡嗡作响。然而毛泽东用手在身上轻轻一掸，拂去烟尘，笑道：“他们的风不行，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我们的风起来就不得了，要将他们连根拔哩！”

1947年3月18日黄昏，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同第二纵队王震司令员谈话，东南方忽然枪声大作，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犯到延安附近的吴家枣园。

同志们都感到形势严峻，一再劝说主席立刻出发，尽快撤离，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稳坐在椅上问：

“机关都撤完了吗？”

“群众呢？”

当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满意地哼了一声：“好吧，吃饭！”

枪声已是近在耳畔，一阵紧似一阵，中间还夹杂了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同志们都火烧屁股一般急，而毛泽东却故意细嚼慢咽，“蘑菇”起来，心急火燎的彭德怀闯了进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吼起来：“主席你怎么还不走！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呆了，马上给我走，快给我走！”

毛泽东皱了皱眉，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幽默地说：“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带不了的书籍可以留下来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点马列

主义也有好处嘛！”

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

一天，毛泽东说：“不要几天，就会听到捷报。”

果然，3月25日，刚吃过早饭，突然枪炮声大作，但不到一个小时，又骤然沉寂了。

下午，秘书送来电报：“我军在青化砭设伏，歼敌31旅4000人，活捉旅长李纪云。”

转战陕北，旗开得胜。

4月9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留在陕北的通知，号召“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4月15日，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军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与敌周旋。“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的“蘑菇战术”。就在同一天，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主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羊马河一带彻底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135旅，活捉了代理旅长麦宗禹。

敌人不甘心，将主力都集中到瓦窑堡一带，企图寻找我主力决战。毛泽东一连两天没出窑洞，只有秘书拿着电报，跑进跑出，周恩来大部分时间呆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警卫员们猜测又要有更大的战役行动了。

5月4日，我军果然收复幡龙，全歼守敌1000多人，活捉敌旅长李昆岗，还用步枪打下一架敌机。

捷报传来，毛泽东叫人将帆布躺椅搬出窑洞，他甩去披在身上的补丁灰衣，穿着羊毛衣，在帆布椅上一坐，沐浴着明媚的阳光，轻松地说：“来，晒晒太阳，照张相。”

叶子龙举起相机，“咔嚓”，摁下快门，及时地留下了这张历史性的照片，这是三战三捷的证明和纪念。

延安时期用过的皮带

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两条很普通的棕色牛皮皮带，很旧，因使用时间长，都已呈黑褐色，其中一条皮带尾端贴一白纸条，钢笔写：“毛泽东在延安用过十几年的皮带”和“# 39”，纸已泛黄，字迹褪色，据考证，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所写。这条皮带长 112 厘米，皮带扣为镀铬铜扣，扣正面有树、山图案，带扣上有两个生锈的铆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的不断扫荡，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加上华北地区连续几年的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各解放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为克服困难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1939 年 2 月 2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开展生产运动，毛泽东身体力行，在自己的住处附近也分了一块荒地。勤务员们说：“主席工作很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毛泽东坚决他说：“不行，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毛泽东下午休息时，便拿锄头挖起地来，警卫员、勤务员跑来和他一起挖，毛泽东阻止他们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挖了，我没有挖的了。”蔬菜长出后，毛泽东又和勤务员一起抬大粪施肥。杨家岭村上一个不务生产，成天闲逛的农民看到毛泽东冒着炎热在地里劳动，感动得流着泪跑回家，提起锄头上山生产去了

困难时期，毛泽东与大家共艰苦，同劳动。一名警卫员回忆说：“他那清瘦的面容，高高的个头，普普通通的着装，要是事先不知底细，乍一看去，真与普普通通的战士一模一样。一件衣服已经穿了四、五年了，我们多次劝他换件新的，可他说：‘现在我们还很困难，还是不换了吧！’当时，生活条件虽是很艰苦，但作为主席，要穿得好点，用得好点，还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可主席说什么也不肯这样做。”

毛泽东说过：“没有什么困难、事情能够阻住我们去路的，问题只在坚持正确方针，艰苦奋斗，就能够达到目的。”

“艰苦奋斗”，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也是他一生都坚持的一条原则。

延安时期，一位刚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警卫员，还不太了解毛泽东的生活规律，只能把毛泽东办公室那盏油灯作信号。一天晚上，他见到办公室的灯暗了，以为主席要休息了，就走进去，却看到主席仍坐在办公桌前，他以为灯没油，转身出去取油，等回来时，灯却又亮了，这样反复了几次，他很纳闷，问老同志，才知道主席是为了节省灯油，思考问题时，随手把灯调暗，看东西、写文章时，再调亮。

毛泽东认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要从一滴油、一寸布、一根线做起，积少成多，把它们用在抗战上，就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于细微处见精神，这就是毛泽东的巨大的人格魅力。

这条从延安时期一直用到解放后的普通皮带，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一再证实是主席使用过的，谁又会相信这是国家主席的用物呢？换新皮带，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亦是区区小事一桩，作为国家主席却如此的“吝啬”。睹物思人，不能不肃然起敬。

第一次访苏穿过的黑呢中山服

1949年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访苏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等举行多次会谈，讨论了中苏双方有关的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大会并致祝词。毛泽东的这次访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出国访问。尽管毛泽东不讲究衣着，但这次还是同意为他做出国服装，大概考虑到事关国家形象问题。这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把关，叶子龙、汪东兴等筹办。当时，总理按照国际礼仪习惯，指示给毛泽东做黑色衣服和黑色皮鞋。

这是一套纯毛呢料中山服。衣长 77.5 厘米，裤长 110 厘米，腰围 108 厘米，上衣正身衬黑色斜纹羽纱，两抽里衬黑、白、浅棕相间竖条花纹羽纱。

毛泽东这次到苏联后，指示厨师：“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苏联人送来鱼，厨师一看是死的，马上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指示，拒绝接收。

于是，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了，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

其实，毛泽东在国内，死鱼剩鱼都吃，从不讲究，他只是讲究给苏联人看，这大概与 1949 年 1 月米高扬一行访问西柏坡有关。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图为中共代表团同斯大林等在一起。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之托秘密访问中国，他们带来了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挺洋气。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得很。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却都穿着没棱没角的旧棉军衣，毛泽东的衣袖上还赫然补了块补丁。在一次吃饭时，苏联人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吃。

这一情景，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反感，不能不刺痛他的心，因为当时中国还处在战争时期，前方战士在流血，老百姓还吃不上饭。

尽管时间快一年了，但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件事。

正是毛泽东的这种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赢得了斯大林的尊重，赢得了苏联人民的尊重，虽然在讨论问题中有过分歧和不愉快，但最终获得了访苏的圆满成功。

这次出国，毛泽东还做了另外几件衣服，一件蓝黑呢皮毛大衣和一件呢子斗篷，这是为了抵御西伯利亚的寒冷而做的。蓝黑呢皮毛大衣现存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毛翻领，双排扣、斜插隐口袋，正身衬里为蓝色羽纱，两袖衬里为黑缎，内胆为毛皮，与领毛皮相同，大衣长 135 厘米，后下摆开 40 厘米长衩。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穿着这件大衣拜见了斯大林。

接见艾德礼时穿的补丁裤子

1954年8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 1883—1967）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问中国。8月24日，毛泽东准备接见艾德礼，工作人员见他穿着一条屁股上轧满了罗纹补丁的裤子，劝他换一条。可毛泽东不同意换。他说：“不要紧，谁看我后边呀。”

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穿过的裤子，屁股上轧满厚厚的罗纹补丁。

这是一条深灰色派力司西裤，长110厘米，裤腰围为104厘米，建国初期由北京雷蒙服装店制作，除屁股上的大补丁外，裤腰的蓝、白、黄相间的竖条纹羽纱衬布也已多处磨破，显得丝丝缕缕，裤膝盖等处磨得发白。

穿着一条补丁裤接见外宾，在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当中，除了毛泽东外，恐怕很少有了。毛泽东就是如此一位有着鲜明个性的领袖人物。穿戴相当随便，只要他自己认为不伤大雅就行。

有一次，毛泽东和陈毅一起接见外宾，毛泽东穿着一双大毛窝鞋。这是中国北方老百姓穿的布鞋，陈毅说：“人家接见外宾都穿皮鞋，你怎么能穿个大毛窝呢？”毛泽东说：“我就穿这种，干嘛要跟别人穿得一样？我穿得舒服！”

1959年6月，毛泽东离开故乡韶山乘专列北上，当专列行驶在湖南空旷的山野中时，毛泽东突然吩咐停车，走下火车，深深地吸了一口山野清新的空气。目光停在一个石岗上。铁路道基下有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向石岗。毛泽东没有走这条路，而是踏着野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岗走去。他走的是没有路的野地，布满带刺的荆棘。有人劝他走那条小路，可毛泽东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然后他问身边的卫士：“你们怎么办？”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

毛泽东把大手比划了一下，概括了心里想的一切意思。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我朦胧感觉，这一幕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似乎有着某种关联。”

是的，毛泽东的独辟蹊径，不拘泥陈规旧俗的精神贯穿于他的一生，也体现在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穿着随便，不拘小节便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有天上午，毛泽东在书屋里接待胡志明主席，他只穿了一件补了又补的白衬衣，两脚跟着一双布拖鞋，粗线袜上的补丁分外醒目。不过，胡志明更有无产阶级“风度”，赤脚穿着一双越南有名的胶皮“抗战鞋”。

天气太热，没有空调，胡志明进屋时，衬衣已被汗水湿透。毛泽东一边同胡志明握手，一边替胡志明解扣子：“脱了吧，快脱了吧。”

“自己来，我自己来。”胡志明自己解扣脱衣，把汗湿的衬衣搭在沙发扶手上，连背心也脱了下来。

“擦擦汗吧。”毛泽东把一条热毛巾递给胡志明。转身朝外挥挥手，对那些记者们说：“你们去吧，他是应我私人邀请来走亲戚的，不发消息，也不照像。”

记者们完全被两位革命巨人的质朴迷住了，滞留在门外没有马上走。

光着膀子的胡志明与穿着补丁衣服的毛泽东，分坐两张沙发，纵横捭阖，说古论今。这样的情景很能使人联想起《西行漫记》中这么一段描述：“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子，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往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却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盒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一篇《毛主席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作演讲》回忆文章中写道：“毛泽东随便地站在那排土平房前面，面对群众，他穿着一套陈旧的灰色棉布服，裤管上有两块大补丁。”“在全世界的伟大人物中大概只有毛主席这位中国革命领袖穿着带补丁的裤子，在广大群众面前演讲，安祥自得，若无其事。这种艰苦卓绝，贫贱不移的革命气概，实非常人所能及。”

毛泽东一生酷爱自由，富于开拓进取精神，是一位浪漫、洒脱、豪放，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革命家、理论家。他出身在一个闭塞、落后的小山冲，出身在一个安于自给自足、安稳淡泊的小农生活的家庭，如果他沿袭父辈的路，他便只是一个泥腿子，顶多是个像他父亲那样精明的小商人，正是由于他骨子里那种不安于现状的因子，那种敢于叛逆、勇于挑战的性格，才使他跳出父亲为他划下的生活圈子，冲出了山沟沟，向着文明、进步勇敢地奔去，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中国，成为了泱泱大国的领袖、举世瞩目的巨人。

1942年，毛泽东穿着带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窑洞前给干部作报告。

百穿不厌的灰色“毛式服”

中山装，是一种翻折式立领的西式上装，由日本的学生装略加变化而成，因孙中山喜爱穿着而得名，辛亥革命后在我国流行，被视为中国典型的现代服装。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服被定为“国服”，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一般都穿中山服。

毛泽东对衣服要求不高，有什么穿什么，从不挑剔。但他对中山服的颜色却只认准了一个灰色。在他的遗物中，灰色中山装有10多套，灰色啥味呢中山服，灰色哗叽中山服，灰色派力司中山服，满目皆“灰”。大概是灰色显得庄重严肃，更或许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穿惯了灰色军服的缘故。从井冈山到延安到西柏坡，一直穿的就是深灰、浅灰的灰色系列军服。

普通中山服的衣领较高，领舌小。为了使毛泽东的穿着形象更完美，专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制作服装的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田阿桐经过多次修改，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把领放矮些，领尖阔而长，适合毛泽东高大的体形和非凡的气质风度，毛泽东穿上非常满意。于是毛泽东的中山服便不同于普通的中山装了。由于毛泽东偏爱灰色中山装，因而，他的中山服便有了一个专有名词：毛式服。田阿桐回忆：“主席比较喜欢灰色的中山装。春秋以中灰色为主，冬天则以深灰色为主。面料主要是啥味呢，因啥味呢比较柔软，显得干净。”

毛泽东的衣服基本是由红都服装店制作。红都服装店是一家由上海迁至北京的老店，它的前身叫雷蒙服装店。专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驻华外交使节等制作服装，它以历史悠久、技艺高超而著称。1989年2月，美国新任总统布什访问中国，他一步下总统专机，就翻开衣领对中外记者说，“红都！红都！”盛赞红都的精湛技艺。法国巴黎的皮尔·卡丹公司领导着世界时装的潮流，而皮尔·卡丹先生却在中国的红都服装店订制了一件开司米大衣，穿上这件出自中国同行之手的大衣，皮尔·卡丹满意地笑了。红都征服了这位著名的时装设计大师。的确，红都人是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对待每一件衣服的。田阿桐在为毛泽东缝制衣服时竭力在面料、色彩和款式上下功夫，操作中，常常甩开机器，用手一点一点扎，以使衣服更平整；领口开到46公分，让毛泽东感到舒适；前阔做得宽一些，后背稍宽一些，肩不要太宽；中腰稍微凹陷一点；后片比前片略长一点；袖笼提高一点……毛泽东穿上经过这番精心制作的衣服，伟岸的身躯更具魅力。

田阿桐为毛泽东做帽子也颇具匠心，帽子要圆顶的，而且顶要大一些，面料与衣服的相同，这样，毛泽东的衣帽相配，整齐划一，给人一种和谐美。

“毛式服”在国内外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一提到毛泽东，脑海中浮现的便是身穿灰色中山装，慈祥、和蔼而又让人无限敬爱的领袖形象。这是因为人们无论从电视、电影，还是相片、报纸上看到的毛泽东都是穿的灰色中山装；还因为他穿着灰色中山装会见了许多国家元首：金日成、西哈努克、斯大林、田中角荣、尼克松、卡翁达等等。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正在病中，全身浮肿，原来的衣服都小了，工作人员找了一套平时穿的“毛式服”，拿到红都服装店，请

他们照着放大一些。2月21日，毛泽东在理发、修面后，穿上这套特制的“毛式服”接见了尼克松。大家看到的仍是熟悉的领袖形象，并不知笔挺的衣服里裹着的是一个虚弱的躯体。毛泽东以惊人的毅力，敏捷的思维，幽默的谈吐与尼克松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谈。毛泽东同尼克松谈论了哲学、历史及两国关系等问题。2月28日，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从此，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前景，我国的对外工作随之取得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穿着一套灰色啥味呢中山服接见了来华访问的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这套衣服是七十年代初由北京红都服装店王庭森师傅裁制的。英国进口的啥味呢毛泽东在1972年2月会见尼克松时穿的又肥又大的中山服。布料，较薄，纯羊毛的。这套衣服可能是毛泽东七十年代初重病一场后制作的，因为当时主席身体严重浮肿，原先的衣服都穿不进，便赶制了几套衣服，所以，这套衣服与原来的衣服相比，就显得特别肥大。以前的衣服上衣胸围一般是110厘米左右，裤子腰围亦为110厘米，而这套衣服的上衣胸围为132厘米，裤腰围为135厘米。

当毛泽东在1960年以后把他洞悉乾坤的目光投向非洲时——特里尔称之为毛泽东发现非洲——，卡翁达就计划访华日程。

1967年卡翁达第一次访问中国，他是毛泽东最早接见的非洲国家首脑之一。卡翁达是戴着一枚毛泽东像章会见毛泽东的。

毛泽东与卡翁达会谈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国际形势。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走。

1974年，卡翁达在巴基斯坦作短暂停留后，途经新疆乌鲁木齐再访北京。

2月22日下午，毛泽东与卡翁达又一次会谈，卡翁达请毛泽东谈对当今世界格局的看法。毛泽东略为沉思片刻，用激昂的语调说道：“当今世界有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干涉别国内政；还有欧洲一些发达的国家，有的奉行中立，有的倾向苏、美；还有就是不发达国家。“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就是著名的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今天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毛泽东与卡翁达的这次会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毛泽东的这套啥味呢中山装便是这次会谈的重要见证物。

毛泽东喜爱灰色中山装，最后保存的遗体同样穿着他喜爱的灰色中山装。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派专人去上海挑选面料，从里到外为他做了全套新衣服，均为纯毛、真丝、纯棉质地，没有化纤。做这么多新衣服，大概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绝无仅有的一次没有征得他老人家的同意，若他有知，是决不会同意的，因为他生前最反对随便为他添置衣物。水晶棺中毛泽东的上衣后背和领子是打开的，因为当时遗体僵硬，为了便于着装，衣服后背同前页一样，做成扣钮扣的。为了固定衣领，使之不变形，领子里放置了两枚卡子，经过这番精心的设计，躺在水晶棺里的毛泽东仍是那么庄重，那么慈祥。

临终时穿的中山装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保存着毛泽东临终时穿的一套衣服，这是一套灰色毛料中山装，1976年在北京红都服装店制作。衣长76厘米，胸围130厘米。裤长111厘米，裤腰112厘米，上衣两袖从腋下线起全部剪开，两片前页剪掉。白色化纤衬领。裤子从裤腿前面剪开。衣、裤均有多处污渍。这套衣服伴随着毛泽东走完了他光辉的人生旅途的最后旅程。

进入七十年代，特别是1972年以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1972年1月，由于肺心病和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经过紧急抢救，才苏醒过来，但他的健康一日不如一日，一年不如一年。到1976年，主席显得越来越苍老、憔悴，由于长年累月地躺卧床上办公、看书，活动量减少，四肢肌肉萎缩，膝关节不能伸直。如果没有人搀扶，站起来都相当困难，走路就更不用说了。说话也很费劲，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肺心病不时困扰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

毛泽东病情恶化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治疗措施，特别医疗小组由北京、阜外、三一、三五等医院选派的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员组成，他们在主席书房的床边架起医疗器械，通过监视器，一刻不停地进行观察，氧气源源不断地从主席的鼻孔输送到体内。这时候，主席完全不能自己进食，医护人员为主席下了鼻饲，食物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成份精心配制。

毛泽东躺在床上动不了，鼻孔同时插着氧气、鼻饲两根管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没有停止工作，批阅大量文件，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竭尽全力地为党、为人民继续操劳。

治疗中的痛苦是难免的，可他从未皱过眉头，反而用幽默的言谈来宽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积极与医务人员配合。他总是说“我没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三二医院的专家姜泗长感慨他说：“我行医40年，给成千上万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像

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1976年7月28日，我国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地震波及到了首都北京。深夜，中南海游泳池主席住处大厅门窗上的玻璃“哗啦，哗啦啦”地震得粉碎，游泳池的房屋是木质结构的，年久失修，为了主席的安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立即作出决定：立即把主席转移到游泳池南边的“二二”，那里的房屋新建不久，相对来说要安全得多。警卫中队的战士们趁主席服了安眠药睡了后用担架把他抬到了“二二”。

毛主席醒来后发现眼前陌生的天花板，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儿来了？”等他弄清怎么回事后要求回游泳池。

华国锋亲自给主席作解释：“这是政治局常委作的决定，以保证到主席的安全。”

可是，主席还是执意要回去。

华国锋只好说：“等地震平静下来了，主席身体好些再回去。”

这期间，主席时刻关心受灾的地区和人民群众，当他知道这次地震伤亡

达 24 万，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时，不禁潸然泪下。8 月 4 日，毛主席派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传达自己对灾区人民的关切，慰问之情。

这时的主席虽然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但他的头脑清楚，思路清晰。

9 月 8 日，去世的前一天，主席一觉醒来，嘴里就咕噜咕噜地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身边工作人员马上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在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费了很大的力气半天才划了三条线，就再也写不动了。然后，又非常吃力地在木床上点了三下。工作人员马上领悟，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主席默默地点点头。

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民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正在日本进行大选，病重的主席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大选的情况。

这天，医务人员从监视器上发现主席的心脏有些异常。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医疗小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紧张地观察，密切注视着。

主席和往常一样服用了安眠药睡下了，没过多久，监视器再次显示心脏严重异常，医疗小组迅速实行抢救措施，人工呼吸，强心针……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1976 年 9 月 9 日零时 10 分，一颗博大的心停止了跳动。我们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慢慢地，主席的遗体开始僵硬。

处理后事的工作开始了，由于主席生前身体严重浮肿，此时，穿在身上的衣服已无法脱下来，工作人员只得用剪子小心翼翼把衣、裤剪开，他们强忍着悲痛，轻轻地、轻轻地，就像主席仍在安睡，生怕惊动了老人家，首先把穿在外面的灰色中山装剪下来，然后把棉毛衣、裤也慢慢剪开，换上了主席生前做好备用的崭新的中山装和棉毛衣裤。

保存在我馆的还有毛泽东临终时穿的棉毛衣、裤，床上垫的床单，枕巾等物品。

棉毛衣、裤为纯白的，较厚，两件衣，一条裤；衣长 85 厘米，胸围 170 厘米，袖长 96 厘米；裤长 129 厘米，裤腰围 116 米，很肥大，一件长衣从前面正中剪开，另一件从右侧剪至腋下，两袖从腋下袖口沿缝合处全部剪开，棉毛裤为宽裤腰，两侧嵌松紧带，棉毛衫、裤有大片大片的黄色、淡红色污迹，为药水所浸渍。

床单亦为纯白厚棉布，又宽又长，但已剪成形状很不规则，大小不一的四块。

情有独钟的棕色皮鞋

毛泽东平时不爱穿皮鞋，重要场合才穿穿，而且只穿棕色皮鞋很反感黑色皮鞋，遗物中仅有少数几双黑皮鞋。

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事前，毛泽东进去检查布置情况，他巡视了一遍，停在一台外国收音机前，皱起眉说：“中国也可以生产收音机，为什么放外国的？中国的‘东方红’不是更好吗？”毛泽东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不仅希望中国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富强昌盛，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民族之林，更希望中国人民自立、自尊，不依附于别人。所以，当罗瑞卿见到他穿着一双棕色皮鞋，对他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皮鞋吧？”时，毛泽东很敏感地问：“为什么？”

“按照国外惯例……”

“为什么要按国外惯例呢？”毛泽东不大以为然地轻踩一下皮鞋，“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人的习惯穿。”

他就穿着这双大头棕色皮鞋接待了以潇洒、富贵闻名于世的苏加诺。

此后，再无人敢在毛泽东面前提皮鞋颜色的问题，毛泽东穿着棕色皮鞋接见了一位又一位外宾。

毛泽东穿皮鞋很简便，皮鞋鞋带系得很松，穿时不用解鞋带，脚直接往里一伸就行，脱时一扯就出来。

毛泽东的一双皮鞋往往一穿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因为主席穿的时间少，更主要的是他觉得还能穿就不用换，能省则省。他遗下的皮鞋都很旧：鞋跟磨蚀了，鞋面起皱，掉漆，鞋口磨破。

在一次舞会上，舞伴说：“主席，你这双皮鞋这么旧了，还不换一双？”

“换什么？这皮鞋穿起来舒服！”主席兴趣很高，抬起脚，扬了扬那双连鞋带都没有系的皮鞋，乐哈哈地笑着说。

一双棕褐色的皮鞋，鞋底是有弹性的软橡胶制成，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就是穿着它登上了天安门，主持了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

这双皮鞋一穿就是十几年。一次，毛泽东准备接见外宾，卫士李银桥找出这双皮鞋，皮鞋鞋面已有了不少的皱折，那层具有亮光的皮面已褪了色，李银桥擦了两次油，皮鞋仍涩涩的，像苍老的皮肤涂上雪花膏也掩饰不住似的，皮鞋后跟磨去有1公分厚了，因为是软胶底，无法打补钉，穿着走路时，脚就往外偏。

李银桥一边擦皮鞋，一边跟旁边的人说，“我说给他老人家做双新的吧！可主席总是说‘还能穿嘛！’”

李银桥穿着一双入时的黑色包头皮鞋，擦得锃亮，看看自己的鞋，再看看主席的鞋，李银桥深有感慨他说：“毛主席的皮鞋，可比咱们的旧多啦！”然后又满含深情他说：“党和国家的主席啊！”

后来，虽然多次规劝主席换双新鞋，可他总是说：“我只穿出去见见客，开开会，要那么好的皮鞋子干什么？这双鞋穿起来很舒服，虽然很旧了，我很喜欢它！”

毛泽东穿皮鞋，不求质地品牌，唯求宽松舒适，他不喜欢穿新鞋，因为新鞋紧，夹脚，所以，毛泽东往往把新鞋让他人先穿。

“你们年轻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我们各取所好。”

有一次，主席看到周总理穿着一双网眼皮凉鞋，他想这种网眼可以散热透气，可能比一般皮鞋要舒适，于是，他问工作人员：“总理那双皮鞋是哪里做的？”工作人员打听后，告诉了主席：“是北京做的，师傅叫王凤德。”毛泽东点点头，没有作声。工作人员心里清楚：主席肯定喜欢那种鞋！于是找到王凤德。王师傅花了几天时间做出了一双外观雅致的棕色网眼皮凉鞋。棕色软橡胶鞋底，鞋尖与鞋后帮为棕色牛皮质地，鞋面中间部分为裁成2毫米左右宽的棕色鹿皮织成的网眼。试穿后，毛泽东感到十分舒适，对王凤德的手艺赞不绝口。

1963年夏，当毛泽东穿上这双鞋时又想起了做鞋师傅

问工作人员：“王凤德哪里去了？”还评价说：“他做的网眼皮鞋很好嘛！”

当毛泽东的这双鞋穿旧了后，工作人员又找王凤德做了一双同式样的皮凉鞋。因而，在毛泽东留下的皮鞋中有两双一模一样的凉鞋，只是一双很旧，一双还比较新。

毛泽东的皮鞋绝大部分为单皮鞋，只有一双皮棉鞋。这是一双棕色、高帮、毡子皮鞋，由于毛泽东穿鞋的原则是舒适、轻便，而皮棉鞋比较重，主席很少穿，鞋也就显得很新。

韶山冲里人爱穿的长统袜

毛泽东穿着方面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比如穿袜子，就很有特点。他无论春夏秋冬，总穿袜子，冬天穿厚的，夏天穿单纱薄袜，几乎不光着脚穿鞋，哪怕是穿拖鞋。而且，他的袜子是清一色的长统袜。

这是一种老式袜。袜统长及膝盖。在大约 50 年代以前，农民们普遍都穿这种袜。但自从中国的尼龙袜普及之后，它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即使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们也接受了新生事物，改穿尼龙袜。而毛泽东，堂堂国家主席，却仍穿着这种“古董”式的袜子，直至逝世，这或许又是毛泽东的一个有趣的性格特征。

毛泽东从不墨守陈规，是一位富于开拓创新精神的巨人，但另一方面，特别是穿着方面，却又如此固执。60 年代初，中国开始流行短统尼龙袜，在当时，有谁穿上一双尼龙袜，那可是很引人注目的，很值得骄傲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顺应这种潮流，经毛泽东同意后，给他买了几双尼龙袜。但毛泽东穿后，觉得脚发烧，便再也不肯穿尼龙袜，很坚决地拒绝了这种新生事物，继续穿着长统袜。

棉袜的袜口弹性不大，袜子经常松松地滑下来。1962 年埃德加·斯诺在中南海再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就这样描述：“他身穿一件领子扣紧的素色深灰呢料上衣，相同质料的裤子，毛的皮鞋已经需要擦油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

1959 年，毛泽东回故乡韶山，在故居前坪坐着照了一张像，相片上毛泽东的袜子也是松松地缩着。因而，每当毛泽东要参加重大活动时，工作人员就用别针把袜子别在衬裤上，防止下滑，以 1959 年 6 月，毛泽东与乡亲们合影，他脚上穿的便免“影响形象”，是韶山冲里人钟爱的长统袜。

清理毛泽东的袜子时，发现袜子数量虽多，可大部分都是破了洞或重新织补过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五、六十年代，主席的袜子破了，就由工作人员用碎布头什么的打个补丁，这样，只要坐下来，就会赫然露出补丁，所以，毛泽东接待外宾时，他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在沙发上要收回腿，一伸脚，就会‘露馅’了。”久而久之，这提醒的话精炼为一句：“小心，家丑不可外扬。”

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姚淑贤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长统袜上那块赫然醒目的大补丁时所产生的惊讶和感动：“他坐在沙发上和卫士们聊天，漫不经心地伸出两腿，于是，长统线袜露出来，脚腕处一块针线很粗的大补丁，似乎和脚跟处一块补丁连起来了。我望着那双粗线袜出神，连他们聊天的内容也没听进。”

简朴是毛泽东一贯的生活作风。1932 年，曾志在福建漳州见到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他脚上穿的黑线袜子，已经洗得又薄又稀了。毛泽东见曾志盯着他的袜子看，把脚一伸，说：“这双袜子，还是 29 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子珍把袜底从中间剪开，翻到两边，又缝了袜底。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不过，再不能换底了，袜面也太稀薄了，经不起洗了。”曾

志在忆起这件事时还深有感触他说：“主席这样简朴，有些人不相信，可我是亲眼所见，事实就是事实。毛主席的廉洁，在当时也是少有的。”

在延安时，毛主席的服务员李晋用自己纺的纱为主席织了双袜子，主席舍不得穿，让李晋纳了双布袜底，然后把织的袜子从底下剪开，翻起来缝上，再把布袜底缝到下面。主席说：“这样经磨耐穿。”大家知道主席这样改造了袜子，也都跟着学开了。

在毛泽东的故乡韶山，过去的几十年间，农民们一直沿用着这种办法制袜子，这样，一是暖和，二是耐穿。作为已经走出山沟沟的毛泽东却把这种地地道道的“土办法”继承着，发扬着。

但是，我们从这“土”里，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过去和延续，看到一个革命家的品格和追求。

接见尼克松时穿的千层底布鞋

毛泽东居家多穿布鞋、拖鞋。外事活动或其他较重要的场合才穿皮鞋。活动结束后，只要一上车或回到住地，立即换上布鞋或拖鞋。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介绍：毛泽东的布鞋一般是在北京大栅栏内联升鞋店订做。面料为黑色礼服呢，具有不沾灰的特点。鞋底是手工纳的，叫千层底，相当厚实。但毛泽东穿过的这些鞋的底大多已把外面的一层白色布全部磨掉了，露出了纳在里面的蓝色、红色、黑色碎布头，剩下薄薄的一层，有的甚至钉过底，足以说明主席穿用时间之长，也充分证明毛泽东时时处处勤俭节约。这种布鞋对于一个国家主席来说，多买几双新鞋，实在是无可厚非，但毛泽东却坚持不到破得不能再穿决不会允许为他添置新的。而且即使有双新鞋，毛泽东不是让别人先穿，就是留着送人。

在西柏坡时，毛岸英因自己的婚事与毛泽东赌气，一天，他明明是把自己脚上的鞋送了人，就赤着脚，走到了毛泽东的院子里。

毛泽东看他光着脚丫子，就奇怪地问他：“你为什么不穿鞋？”

毛岸英硬梆梆他说：“我没有鞋。”

毛泽东有点生气地责怪他：“公家发的鞋呢？”

毛岸英这才对毛泽东说了实话：“我看见一个脚上没有鞋穿的农民，怪可怜的，我就把我的鞋脱下来给他穿了。”

于是，毛泽东把自己保存的一双新鞋给了毛岸英。可他自己脚上穿的是一双什么鞋呢？岸英低下头一看，他爸爸脚上的鞋已经是前边露着脚趾头，后边露着脚后跟了。

原来，公家发给毛泽东的鞋，他一直保存着舍不得穿。但他却把节省下来的新鞋，经常给身边的同志穿。长征途中，毛泽东曾送了一双从江西带来的新布鞋给担任中央工作团主任的王观澜。王观澜说，“我的鞋同主席的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给的鞋子，走起路来似乎特别轻快。”转战陕北时，给过汪东兴一双新鞋，因为汪东兴特别费鞋，公家发的鞋不够他穿。这次，又把新鞋给毛岸英，自己仍穿着烂了的旧鞋。

1938年春，毛泽东写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后，又接着写《论持久战》。

一天，气温骤降，西北风刮得呜呜地叫。警卫怕毛泽东冷，生了一盆炭火，搁在他脚边。深夜，卫士给主席送晚餐，刚一进屋，便闻到一股烧破布的糊味，弯身一看，主席的棉鞋和裤边都冒烟了。主席这才反应过来，一边脱鞋，一边说：“这是怎么搞的？唉！棉鞋又烧了一个窟窿，太可惜啦！”“太对不起老乡了，又要难为他们帮我补啊！”

几天后，工作人员找老乡把这双穿了3个冬春，已补了多次的棉鞋重新补好了。毛泽东继续穿着。毛泽东到了晚年，穿布鞋的时候更多，这从毛泽东晚年的大量照片中可以看出来。五、六十年代，外出和见外宾还基本上穿皮鞋，70年代后，几乎不穿皮鞋。

在毛泽东留下的布鞋中，有一双特殊的鞋，比一般的鞋要长，要宽，有

28 厘米长， 10.2 厘米宽。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这是接见尼克松时穿过的鞋。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当时，毛泽东正是病重期间，双脚浮肿很厉害，原先的鞋都穿不进。工作人员画了鞋样，找内联升鞋店订做，但鞋店做不了这种特殊的鞋，后几经周折，经人介绍，找到了河北大兴县农村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鞋做得相当好，现保存的这双鞋做工很精细，完全可以与内联升鞋店的相媲美。2 月 12 日，毛泽东穿着这双鞋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与尼克松进行了原定 15 分钟，实际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历史性会见，翻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因而，这双布鞋便也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晚年启用的“豪华”理发箱

毛泽东遗物中，有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奢侈”的物品：一只棕色牛皮理发箱。据说，购买这只理发箱，事先并没有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毛泽东最早的理发师叫曹庆维。1949年在西柏坡时，一场滂沱大雨冲塌了两个窑洞，曹庆维被埋在洞中。毛泽东很动感情他说：“小曹前几天还给我理发，多可惜呀。告诉机关领导同志，一定要把曹庆维的后事处理好。我要去参加曹庆维的追悼会。”

毛泽东日理万机，常常在出席会议或会见外宾前一边理发，一边查阅有关资料，

之后，王惠于1949年秋天到毛泽东身边理发。当时装主席理发用具的是一个绿色帆布做的背式小布箱，使用多年，已陈旧得很不受看。1958年成都会议时，购买了这只小牛皮箱。当理发师王惠提着这只小皮箱走进毛主席的房间，毛主席一眼便发现了这只皮箱，幽默他说：“老王，你怎么洋起来了！”接着便带责备他说：“那个帆布箱呢？不能使用了吗？怎么换成这只皮箱啦，你搞的什么名堂？”老王喃喃地不知如何回答，无奈又将那只旧布箱换了回来。

50年代初，建国伊始，毛泽东外事活动频繁，每次会客前，王惠都要为主席剪发、刮脸，这时的王惠已上了岁数，光头，白须飘然，面孔清瘦，极像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了一副老花镜。但他即使戴了老花镜，视力也不济。理发时，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着眼睛，左瞧右瞧，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主席的头顶，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主席鬓发下沿，就那么把刀架在主席头上半天不动，好不容易才“刷”地剃一下。毛泽东看一眼手表：“你得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啊。”王惠换个位置，刀又架到主席头上，在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颤个不停，好半天又“刷”地一下，接着退后一步，欣赏杰作般地端详个没完。

“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么？”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仍然慢腾腾地：“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误你去就行么。”

反复折腾，左瞄右比，毛泽东哭笑不得：“我要你快一点！”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惠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后脑勺上拍了两下，像拍孩子一样随随便便，把在场的人惊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无可奈何地叹口长气。王惠边给毛泽东理发，边絮絮叨叨地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人家会说王惠不行，王惠也不光彩么……”

周福明是主席的最后一位理发师。1961年下半年正式调到主席身边工作。之前，也多次为主席理发，很合主席心意。

对于穿戴修饰，毛泽东向来是不讲究的。平日不受理发修面，爱留长发。外交场合或某些特别重大的活动，才理理发，修修面，但即使是这种时候，他也不像常人一样，正儿八经地坐着，他总是一边干着工作一边理发。安排会见外宾，在客人到达前约20分钟，主席才离开办公桌，坐在一把小沙发椅上，秘书送上该批外宾情况的资料，主席抓紧翻阅，周福明则给他理发、修

脸。毛泽东风趣地对周福明说：“我看我的资料，你理你的发，我们各办各的公，互不干涉。”这可难坏了周福明：主席下颌长有一颗大痣，稍有闪失，极易碰上，而且主席的头发右边厚，左边薄，不太好整理。幸好这位在火车上、轮船上都给主席理过发的周师傅技术精湛，离外宾到达还有两三分钟，毛主席停止看资料，发也正好理完。当毛泽东换好衣服，出现在书房兼会客厅时，客人也正好到达。

分秒必争，这就是毛泽东为国操劳、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的具体写照。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周福明以无比沉重的心情，默默地为主席理了最后一次发，修了最后一次面。周福明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

“为主席理发17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里如此沉重。我打开理发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和往常一样：围布、推子、梳子、剃须刀……”

“我感到眼前这一件件工具，是如此的亲切，就好像是一条传递自己对主席深切感情的纽带。

“这是我有生以来感觉难度最大的一次理发。此时的主席身体开始僵硬，右鬓和两耳后面的头发弯着腰是理不到的。为了不打扰主席，使他老人家感觉舒服，剃右鬓角的头发时，我干脆跪在地上，趴在床边为主席剃；剃两耳后面和后脑勺的头发时，我索性上到主席躺着的床两边，顺着他躺着的姿势，这边趴着理一下，那边趴着理。

“最后我端来一盆热水，用热毛巾热敷在主席的头发上，花白的头发经水一湿，似乎变得黑了，再用篦子反复地篦，立刻显得乌黑发亮。我又为主席精心地刮了胡子，擦了脸，主席又精神了。”

原来由帆布袋变为理发箱是在60年代，原先装理发工具的帆布箱实在破得无法用了，毛泽东才勉强同意启用这只牛皮理发箱，而且一直用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

这是一只长方形皮箱，长26厘米，宽40.5厘米，高13厘米。

由于使用时间长，箱内粉红色衬布已经污渍斑斑，现存箱内的理发工具有：推剪1把，剃刀1把，梳子2把，理发剪1把，磨剃刀布1块，黑色毛刷2把，生发油瓶2只，发乳瓶2只，粉盒1个，剃须膏1支，棉球1包，毛巾1条，一些很普通的理发工具，大概只有推剪和剃须刀稍好。毛巾上沾有不少毛发，经仔细辨认，一部分是毛刷上掉落的毛，另一部分则是头发，无疑是毛泽东的头发了。要说珍贵，大概这是最珍贵的了，其价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保健用的梳子和篦子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两种很普通，然而使用频率却很高的物件：梳子和篦子。梳子为普通塑料长梳，白色的、淡蓝色的，加起来有10来把。篦子为竹制的，新的、旧的有30多把。有一把篦子两端与脊均为白色硬塑。脊的一面写“常州梳篦厂出品工农商标”，一面则为毛泽东诗词中的诗句“无限风光在险峰”、“春风杨柳万千条”等及其写意画。

明代学者冷谦在“修龄要旨”之中提出“面宜多擦，发宜多梳，目宜常运，口宜常闭，津宜常咽，背宜常暖，腹宜常摩，皮肤宜常常干浴，’的养生之道。毛泽东或许是受到冷谦的影响，他认为：补脑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吃红烧肉，一个是梳头。他曾说：“梳头可以补脑，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头发生长，把有限的营养首先供应给大脑，帮助大脑恢复疲劳。”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吃红烧肉是为了补脑子，可是，战争年代，有时粮食都供应不上，一碗红烧肉，谈何容易。卫士常常为改善主席的生活而发愁。毛泽东就说：“脑子是要补，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给我梳梳头。”

因而，每当他长时间思考问题，感到头部不适，疲劳时，便要卫士帮他梳头，从前额部向后枕部缓缓反复梳，时间长短不定。他背靠椅子，上身后仰，双足前伸，双目闭合，身体完全舒展放松。

1948年5月起，我军与国民党数百万军队进入了大决战的时期，毛泽东倾注了全部精力来指挥战争，常常几天办公室的门都下出。卫士见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心里很着急，一时又想不出好办法让他睡觉或把他从那房子里拉出来散散心。一天，李银桥看到毛泽东批阅文件时，就上前扶他坐在躺椅上，这样，毛泽东看文件，李银桥站在身后为他篦头，毛泽东很乐意，他说：“银桥，你为我解决了一个难题，篦头是一种很好的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李银桥听后很高兴，可每次篦头后又很后悔，因为篦一次头，毛泽东就取消了一次睡眠。

在乎津战役进入后期的一天，李银桥又给毛泽东篦头，突然他看到毛泽东原本乌黑发亮的头发中出现了一根白发，惊叫起来：“主席，你有白发了！”毛泽东眉梢动了动：“拔下来吧！”李银桥当真拔下了白发拿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只用眼睛凝视了一下，乐观他说：“白一根头发，胜三大战役，值得！”

梳头，对毛泽东来说，能消除疲劳，还能平息火气。

毛泽东很难入睡，一旦睡着，就必须绝对安静，鸟叫声也会把他惊醒。只要他被吵醒了，必定脾气大发。

一次，毛泽东写文章写了两天三夜。

早晨，他终于躺上床，值班卫士李连成为他按摩两腿，先后给他吃了三次安眠药，毛泽东才慢慢地入睡了。

当时正是夏天，为了既遮光又通风，窗上的绒布帘取掉了，只有木质百叶窗。可李连成在毛泽东入睡前忘记把百叶窗关上。一道阳光刺目地射进来，过不多久就会照到毛泽东身上。李连成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一点一点地放百叶窗，突然，“咔嚓”一声，百叶窗滚落下来，如同平地里一声惊雷，把刚睡着的毛泽东震醒了。

“哪个？怎么回事？”

“说啊，怎么回事？”毛泽东坐起来，愤怒焦躁溢于言表。

“我，我关窗……”

“你蠢！早干什么去了？出去！你不要在这里值班了，你给我站着去！”

卫士长李银桥知道后，马上赶到毛泽东卧室，他知道，再叫毛泽东上床睡觉已毫无意义，短时间内他是无法入睡了。

于是，李银桥替他梳头。

毛泽东微闭双目，虽然怒气未消，但焦躁的心情已明显缓解。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心平气和，说：“好了，你去吧。叫小李来。”

李连成回到毛泽东卧室，刚一开口认错，毛泽东马上说：“你难，我也难。你有点小错，我的错比你大。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

“委屈你了，莫怪我了。我也是人么，有点脾气的人。我们要互相体谅。”

毛泽东是个有个性的人，他习惯了的东西，一旦被更换，他就觉得别扭。一次，毛泽东常用的一把梳子不见了，他要卫士去找。可怎么也找不到。卫士知道他的脾气，要找什么，你没找到，他就不高兴。实在找不到，卫士就到外边买了一把和原来一模一样的梳子。毛泽东拿起梳；边梳头边说：“我就喜欢这把梳子。”毛泽东的篦子都是从常州梳篦厂直接购买的。买来后，一般要放在白凡士林膏里泡上两年以上才用。一是耐用，二是油滑，不挂头发，更适合晚年毛泽东使用。毛泽东的最后一位理发师周福明回忆：主席60年代基本上还洗头，用一壶水、一个脸盆，就那么坐着洗，但越到老年越不愿动，连头都不爱洗了。周福明每天用篦子给主席篦头。这种又细又密齿的篦子，在北方很普遍。工作人员用这种简便的方法，天天篦一篦，保持主席头发的清洁。毛泽东到了晚年，活动量越来越小，工作却一如既往地繁重，因而，梳头便是最好的休息和消除疲劳，促进血液循环的方法。

毛泽东逝世后，周福明把毛泽东曾用过的这些梳子、篦子精心地收藏着，以留作永久的纪念。

开国大典上穿过的礼服

毛泽东的衣物中很有历史意义的一件，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穿的那套黄色美国将校呢礼服。

1949年3月23日，正是毛泽东渡黄河一周年的日子。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杨尚昆等以及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离开西柏坡，告别了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进驻北平。登车时，毛泽东精神亢奋，风趣他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啊！”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微笑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3月25日清晨，经过保定、涿县，毛泽东等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然后乘车来到颐和园，在益寿堂稍事休息。下午，驱车去西苑机场检阅了入城的人民解放军。检阅结束，毛泽东来到了他在北平的第一个驻地——香山双清别墅。

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房子，林木荫翳，郁郁苍苍。在这里，毛泽东以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成功地指挥了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战役。

渡江成功后，为了筹划开国大典，尽早结束无政府状态，7月间，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等秘密赴苏联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会谈。会谈中，刘少奇对斯大林说，从国际国内的条件看，我们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政府。斯大林认为，国家不可以长期无政府，否则，外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那样就被动了。刘少奇及时向国内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

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人士反复磋商，一致决定：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进北平后，经常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在见张澜前，毛泽东吩咐李银桥：“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点的衣服换换。”李银桥在毛泽东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李银桥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张澜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就这样，毛泽东穿着件补丁衣服会见了张澜。

要举行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了，而毛泽东仍是一套陈旧的灰布衣服。因此朱老总在常委会议上曾专门提出给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增加衣服的问题，理由是新中国的领导人穿的破破烂烂，影响国家形象。中央决定，为每位同志制作一套新衣服。

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给毛泽东送来了黄色的美国将校呢布料，经王府井雷蒙服装店王子清精心剪裁，毛泽东终于有了一套合身的像样的礼服了。

1949年10月1日，这天清晨6点多钟，毛泽东仍伏案办公，周恩来已经几次电话指示毛泽东的卫士催促主席休息。但毛泽东直到把事干完，才开始睡觉。

下午1点，毛泽东被卫士叫醒。毛泽东历来起床后都不会马上下地，总要在床上呆一个小时左右，喝茶读书，今天要参加开国大典，他也不改这一习惯。

1点半钟，在卫士的催促下，毛泽东提前下了地，穿好了那套专为参加开国大典缝制的礼眼。2点，步行到中南海勤政殿大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澜、李济深、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也陆续到达。在这里，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们宣布就职，并宣告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会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勤政殿门口分别登上汽车，出中南海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向南，由中山公园后面进了故宫阙右门，到天安门城楼的后边。

10月的北京，金风送爽，晴空万里。古老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装点一新，黄澄澄的琉璃瓦顶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夺目，红色的宫墙宽阔而庄重。城楼正面悬挂着8只绛红色的大型宫灯，下垂的金色流苏在微风中摆动，更添节日的喜庆、祥和气氛。城墙中央挂起了巨幅的毛泽东画像。盛大而隆重的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

3点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等以及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从天安门城楼西头的楼梯，一步一级登了100个台阶后，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广播里响起了响亮而激越的声音：“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顿时，天安门广场沸腾了，30万身着各色服装的群众高呼口号，掌声雷鸣，红旗飞舞。

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身着挺括的黄礼服，左胸前佩戴着写有“主席”二字的红色燕尾绸布胸标，阔步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刹那间，广场上欢声震天，呼声如潮。毛泽东表情庄严神圣，按照预定程序，按动了装在城楼上的电钮，亲手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同时，礼炮在军乐声中惊天动地地鸣响了。54门大炮，向着湛蓝的长空齐鸣28响。隆隆的炮声，震撼着天安门广场，震撼着三山五岳，震撼着全中国。54门大炮，象征着中国各民族的强大威力；28声礼炮声，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8个光荣辉煌的春秋。礼炮响过，毛泽东以高亢有力的声音向全世界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明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愿意与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接着，阅兵式开始。3个小时的阅兵式结束后，欢呼的群众开始游行，当群众经过天安门时、高兴、激动不已，呼喊声一阵高过一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面对群众的欢呼，毛泽东脸上始终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情不自禁地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城楼上一呼一应，天安门广场就像欢乐的大海，涌起了阵阵的波涛，人们跳跃着，舞蹈着，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之中。

大典结束后，毛泽东乘车回到菊香书屋，激动他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呀。”

由于叶子龙送的布料不少，大典之后，请王子清师傅又做了3套式样相同的衣服。

1953年7月，美帝国主义在板门店同中朝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抗美援朝取得胜利，毛泽东对卫士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

那时，人民解放军的军衣还没制定统一式样，人们对军装的概念只是以黄色为标准，因而，毛泽东对他那套开国大典上的黄呢子礼服也视为“军衣”。1954年初，毛泽东把这套礼服和另外3套式样相同的衣服分别送给了卫士长李银桥和副卫士长孙勇。李银桥特意挑选了毛泽东开国大典上穿过的礼服和另外一套。但李银桥身材比毛泽东矮小，礼服他穿上显得很肥大，于是他想把这套衣服改一改，尽管他爱人韩桂馨劝他别瞎改，但他到底把这套具有历史意义的衣服改成了适合他身体的衣服。殊不知，这一改，就改变了历史的真实。

1967年，这套衣服被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历史博物馆想收藏，但没能如愿。至今仍保存在天津历史博物馆。

轻、薄、软的内衣内裤

毛泽东喜穿轻、薄、软的内衣、内裤，因而他遗下的多为棉质或丝质的棉毛衫、裤，乔其纱衬衣、衬裤。厚重的衣服不怎么穿，而且也很少。1949年访苏时曾做了一件蓝黑呢皮毛大衣，在苏期间，毛泽东偶尔穿一穿，回国后便不再穿。大概是60年代初，江青自己做了几套丝棉衣服，觉得穿着很舒适，便也为主席做了两套，但主席试了一次，就不肯再穿，因为丝棉衣服，虽轻、却厚实，保暖，而毛泽东嫌里面烧得慌，难受。穿着薄薄的内衣、内裤，举手投足都很方便，毫无约束。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一般夏天穿乔其纱衬衣、衬裤或白纺绸，或白的确良衬衣，冬天穿棉毛衣裤。到70年代，全部穿棉毛衣裤，夏天是薄薄的单纱白棉毛衣裤。衣为无领圆口套头衫，前胸从领口往下有19厘米长开衩，钉三颗白色小有机扣，冬天则为稍厚的棉毛衣裤。

毛泽东穿着随便，但随便中包含着严谨。他总是长衣长裤长统袜，无论天气多热，都不曾穿短袖衫、短裤，更不会袒胸露怀。这是毛泽东穿着的又一原则：不露肉。

毛泽东居家或外出，无论衣服多么旧，但必须干净，决不能露肉。他的衣袖、裤腿也很少卷起，偶尔卷起，只要有女同志在场，便会下意识地将衣袖、裤腿放下来。1951年毛泽东与李敏、李纳、毛远新在北京香山的一张照片，大概是人们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卷起裤腿，露着小腿的照片。毛泽东的衣物中没有一件短袖衣，除了几条游泳短裤，也不再有其他短裤。最多的是冬天穿的棉毛衣、裤，夏天的乔其纱衬衣、裤。毛泽东爱出汗，一天要换几次衣服，因而同一型号的往往准备几套。棉毛衣裤缩水性强，衣服小了，而毛泽东又舍不得扔掉，只好请人接长、拼大，有时把两件普通的棉毛裤改为一件，三件棉毛衫改为两件，继续穿着。这种接长、拼大或改制的任务，一般是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出面，找北京针织厂，由他们承担。

毛泽东的内衣、裤不是白色，就是淡黄色。从他对衣物颜色的要求可以看出他偏爱冷色调：灰色外衣、白色内衣，棕色鞋子和袜子。这大概跟毛泽东怕热耐寒的生性有关，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通过颜色制造一个清凉的氛围，这样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休息起来感觉更舒畅。

在毛泽东的众多衣物中，只有一条游泳短裤颜色有些特别：它是玫瑰红的。在众多的冷色调衣物中，乍一见到这条鲜艳的短裤，大概都会怀疑它的主人是毛泽东。但据遗物知情人介绍，它确系毛泽东所有。

毛泽东虽自己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但并不说明他不喜爱艳丽的颜色，相反，每当看到别人穿着鲜艳的衣服，他总是以行家的目光大加赞赏。记得有位在他身边工作的女同志，一次穿了一条很亮丽的红色凡尔丁的连衣裙，鲜艳、明快，充满活力，毛泽东很欣赏。他那已显得灰暗的眼睛里放出了光彩。他说：“我就喜欢这样的玫瑰红，好看。”第二天，那位女同志换了套衣服，主席还问她为何没穿那条漂亮的裙子。

毛泽东到了晚年，渐渐也爱使用一些比较鲜艳的诸如窗帘、沙发套之类的东西来点缀他那素洁的居室。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回忆：主席晚年比较喜欢棕红色。这大概是越到老年，越渴望年轻、青春、活力，越向往热烈、欢快的缘故。晚年的毛泽东，重病在身，经常卧床不起，很少外出活动，

即使散散步也勉为其难，外界的花花草草，蓝天白云绿树，中南海清澈的湖水、清新的空气对他来说，也很难像从前一样，自由地享受了。深居简出，更缺乏常人所应有的天伦之乐，毛泽东便只能借助于他居室中的一点点亮丽来排遣心中的寂寞、凄凉。伟人有伟人的寂寞，这种寂寞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现留存的毛泽东的棉毛衣、裤，乔其纱衬衣、裤，白府绸衬衣等新的、旧的，约有 200 余件。这些衣服都很宽松、肥大，衣胸围一般为 126 厘米左右，裤长为 120 厘米左右，裤腰围达 110 厘米。

多饰梅花图案的生活用品

中国传统文人视梅花为花中“清客”，并把它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在大自然千姿百态的花卉中，毛泽东也最喜爱梅花，他用过的地毯、笔筒、茶杯、烟灰缸、饭碗上均可见花枝摇曳的梅花图案。上海宋庆龄故居的梅花地毯也是毛泽东所赠。这种雅致深婉的梅花“情结”，铭刻着一代伟人的生活情趣和人格追求。

0249_1

毛泽东用过的梅花地毯。

梅花与白雪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想到梅花，便会想到白雪。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短短四句诗，活现出梅花与白雪相依相伴的情缘。毛泽东爱梅花，也爱白雪，在大雪纷飞中赏梅，是其人生中审美之极致。

中国历代咏梅的佳作，毛泽东几乎都阅读并手书过。宋初林逋隐居西湖，终身不仕，以赏梅养鹤为娱，人称“梅妻鹤子”，其诗大都反映其隐逸生活和闲适心情，尤以咏梅著称，风格幽静淡远，艺术性很高。其《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最为人称颂。《毛泽东手书古诗选》一书中便有这两句。

1961年11月6日这天，毛泽东为查找明代高启咏梅花的一百诗，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三封信。早晨6点，他请田家英替他找来林逋（和靖）的诗文集。8点半，又写道：“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干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不久，又写信说：“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史馆老先生，便知。”田家英很快查情，该诗为明代高启《梅花》九首之一，后四句为“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台。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毛泽东欣喜非常，当天即用草书书写了全诗。

古代文人咏梅，风格多是幽静淡远，朦胧深婉，借梅花诉说“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畅”，至若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则更赋予梅花一种凄苦寂寥，顾影自怜的形象。诗虽然写得很有意境，但并未引起毛泽东的审美愉悦。在毛泽东看来，梅花最可贵的品格是做霜斗雪，风姿昂扬，它寄托着人类向困难、向逆境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为给梅花“平反”，毛泽东步陆游《卜算子·咏梅》原韵，“反其意而用之”创作了一百格调高昂，独有豪情的咏梅诗：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

1962年2月，毛泽东的大儿媳，于女儿刘松林在毛岸英牺牲12年后，终于与空军学院的教员杨茂之再结良缘。毛泽东十分欣慰，多年来困扰他的一桩心事总算了结了。毛泽东此时刚写了《咏梅》词，便给他们亲手抄录了一幅，作为贺礼。

毛泽东生前很喜欢听电影《红岩》中“江姐”的歌，江青有感于此，在1962年中南海的一次舞会上特意播放了“江姐”的唱片，并把歌词作品介绍给毛泽东。“江姐”在歌中唱道：“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封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这歌声唱出了梅花的高洁，也唱出了革命者的风骨。江姐的歌声之所以能打动毛泽东，就在于物态美与情态美在她的歌声中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和统一。

由于毛泽东对梅花有如此深的眷恋，所以，他所使用的东西也就多用梅花图案作装饰。当然，这些地毯呀、瓷器呀、笺筒茶杯等等，并不是毛泽东亲手挑选，购买的，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摸清了毛泽东兴趣、爱好，自然知道当买什么式样的东西，不该买什么式样的东西了。

像所有的老人都容易感时伤怀那样，毛泽东暮年也为孤独寂寞所困扰。为抒发郁积的心绪，毛泽东把眼光投向洪皓的《江梅引》、蒋捷的《梅花引》等借梅寄兴的诗作。“却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这样悲慨无边的诗句，与以前的毛泽东很难产生共鸣，但这时却紧紧攥住了毛泽东的心。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文心雕龙》中的名言：“写景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事过境迁，境随心换，同样是梅花，在不同的年龄段和历史时期，给予毛泽东以不同的感受和慰藉。

梅花，是毛泽东心灵的祭品，是毛泽东无言的墓志铭。

外巡游历篇

重上井冈山时坐过的吉姆车

毛泽东在 5、60 年代回湖南，以及 1965 年重上井冈山，坐的都是湖南省委为他准备的一辆银灰色苏制吉姆车，司机是赵毅雍。如今，这辆车作为毛泽东外巡见证之一，陈列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中。

1959 年 6 月下旬，毛泽东从北京南下河南、湖北等省巡视后，24 日抵长沙。他不进招待所休息，坚持留宿列车上。当时的长沙，气温已高达 30 多度，车箱里如同蒸笼，因为没有电扇和空调。毛泽东边看材料边摇纸扇，不时汗流浹背。工作人员想法在他的那节车箱放上一盆冰块，其实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下午，闷热难忍，毛泽东一头跳进湘江，畅游起来。游泳上岸，他突然对秘书高智说要回韶山看看，叫高智马上给杨尚昆同志打电话，说回韶山住几天后即上庐山开会。于是，毛泽东的专列开往湘潭，当晚住在列车上。第二天，省委派赵毅雍开着这辆吉姆车，送毛泽东回故乡。

毛泽东坐进银灰色的吉姆车中，只见车内干净整洁、宽大，前后两排暗红色沙发，两排沙发之间距离适中；中间放着他外出随身带的水箱。司机看上去不到 30 岁，动作利索，待人热情而不乏稳重。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车于才开出约 20 里地，毛泽东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不时地撩起窗帘往外看。为了中国革命，他已经整整 32 年没有回到生他养他的这方热土。历史的长河，在他泛舟的这一段掀起了澎湃的巨浪，多少往事涌到心头。他望望外面的田园，又瞧瞧前面的司机，仿佛在说：还应该开快点。其实他也知道，这个车是排在由三个车组成的车队中间，司机严格按照规定的车距，中速而稳健地行驶。行至银田，——属韶山的范围，车队放慢了速度。毛泽东则目不转睛地朝外看，沿途的乡亲，有的在整地，有的在积肥，忙得热火朝天……车子嘎地一声停住了，原来已到韶山招待所前坪。毛泽东来不及问司机打招呼，便迫不及待钻出车子，不停地向迎接他的人们点头、招手致意。

在故乡停留的三天之中，哪里有群众，毛主席就叫在哪里停车。27 日离开时，刚从招待所上车走下远，毛泽东看到招待所外道路两旁站着不少欢送的群众，马上又叫司机停车，他走下车来边和人们握手、合影，边步行向前，车子徐徐在后面跟上。这样走了很远一段路程，才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坐上汽车，又很快打开窗帘，向窗外的群众挥手致意。直到欢送的人们离远了，才回过头来，满意地对司机笑了笑。车行至宁乡县高桥、望城县白菩公社曹家坳时，又两次下车视察乡情，观看坑里禾苗长势，和农民群众亲切交谈。次日，毛泽东离开长沙，转道武汉上庐山。

1965 年 5 月，毛泽东在离别井冈山 38 年之后，“千里来寻故地”，重上井冈山。这次，毛泽东坐的仍是赵毅雍的吉姆车。

5 月 21 日，毛泽东乘 专列至株洲醴陵，下午 1 时改乘赵毅雍驾驶的吉姆车向茶陵进发。行至攸县境内的醴水河边，赵师傅提心吊胆紧握方向盘，认真对准角度，平稳地将车开上轮渡，顺利渡过醴水，他才松了一口气。晚上，毛泽东住在茶陵县委办公楼。第二天，从茶陵出发，绕道江西永新至宁冈。宁冈茅坪八角楼是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纪念地，车队径直开了进

去，前行的警卫人员、工作人员都下了车。但当赵毅雍准备停车时，毛泽东示意不下车。赵毅雍见机行事，开着车子在八角楼前的地坪上徐徐兜了个大圈，毛泽东撩开窗帘，浏览了一下谢氏慎公祠和八角楼。随后车子乘势掉了个头，奔上通往黄洋界的路。

车子穿梭在丛山峻岭中的盘山公路，“跃上葱茏五百旋”，登上黄洋界。毛泽东下车饱览当年哨口遗址、纪念丰碑的壮丽画卷。他高兴地与随行人员合影留念。但正当他准备上车继续前进时，赵毅雍发现车子竟发动不起来！这可把他急坏了。赵毅雍是个开车多年的老司机，这次被指定为毛泽东开车上井冈山，自知责任重大，所以一路上谨慎小心，车子开得又快又稳。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却出现了这个意外。他断定是刚才上山坡度大，转速较快，温度高，汽车的水箱开锅所致。山上又没有水源，所以很快有工作人员去报告主席，建议换乘另一辆车。毛泽东听后摇了摇头，说：“不要换车，这位司机很好，车也很好，我不赞成换。”说着他亲自走到赵毅雍面前安慰他说：“不要急，水箱开锅不要紧，加点冷水就行了。”又风趣地对工作人员说：“我水箱里有水，把我喝的凉水先给汽车喝。”司机照办，把为毛泽东准备的凉开水全倒进了汽车水箱，车子发动了，平稳下了黄洋界，安全开进了茨坪。毛泽东在茨坪住了7天，在他的挽留，车子一直没有离开，直至5月29日上午，送毛泽东至樟树专列，历时10天，经11县、市，行程1410华里。

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离开居住近4个月之久的杭州，踏上返回北京的征途。16日到达长沙，住省委九所三号楼。因天气太热，决定17日迁居韶山滴水洞。17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又乘坐赵毅雍驾驶的吉姆车行在通往滴水洞的专用公路上。

滴水洞位于韶山冲西北，是一个三面环山的狭长山谷。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曾在滴水洞口的韶山水库游泳。游罢上岸，夕阳西下，清风徐来，松竹摇曳。毛泽东乡情浓浓，指指翠绿的滴水洞山冲，对陪同前来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住好吗？”1960年5月中旬，毛泽东回湖南，又与张平化谈起韶山有个滴水洞，这个地方很好。张平化尔后专程到实地察看，发现果然是个好地方：这里环境幽静，树木葱茏，空气新鲜，泉水清甜，安全保密，在山谷中盖房子，飞机也无法侦察到。于是决定在此搞些建设。据说开始规划宏伟，准备在山谷里建一片片楼房，包括大礼堂和高级宾馆；在牛形山山顶建直升飞机场，从湘潭到邵阳的铁路干线上引一条支线，让火车直开滴水洞。但当时国家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这个计划无法实现，只能因陋就简，修建了一、二、三号主体工程，一号仿毛泽东中南海的住房式样，供毛泽东及中央首长使用，双回廊，内设主房、副房、会议室等。

毛泽东事先知道，这次回乡是住滴水洞。此时他压抑不住临近目的地的激动，情不自禁拉开了吉姆车的窗帘，伸着脑袋往外看，恰好被路边山脚打柴的一个小女孩瞥见。小女孩一溜烟跑回家，气喘吁吁地向人们宣布：“我看见毛主席了！毛主席到滴水洞去了！”

爆炸性的消息 像风一样传开。韶山人民立刻想到了毛泽东1959年的故园行，山村里又开始洋溢春节的气氛。但是，很快就有公安人员找到小女孩的家，告诉她：“你看错人了，车里坐的不是毛主席，你不准再乱讲了！”

韶山人民盼望毛泽东回来，但他们相信公安人员，山村又恢复了平静。其实，车里坐着的正是毛泽东，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左四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左五提皮包者为林克。

但毛泽东这次不能像7年前那样回到父老乡亲中去，按规定，他这次回韶山要求作到“绝对保密”。11天后，即6月28日，吉姆车拉严窗帘，载着毛泽东离开韶山，到长沙上了开往武汉的专列。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一信中写道：“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汉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10天了。”毛泽东按照“保密”的要求，称滴水洞为“西方的一个山洞”，这就是“西方山洞”之名的最初由来。

以后毛泽东来湖南，换上了“红旗”车，吉姆车退役了。1985年湖南电视台拍摄电视剧《故园行》，他们从株洲找到了这辆车，开到韶山，“假毛泽东”坐在真吉姆车上，还蛮像那么回事。拍摄完毕，吉姆车作为毛泽东遗物中唯一的交通工具陈列在纪念馆，天天与成千上万的观众见面。

巡视大江南北用的行李袋

在毛泽东遗物中，有10多个草绿色帆布行李袋，圆桶型，袋高约120厘米，直径为50—70厘米不等，口边一根扎实的锁绳。每次外巡，毛泽东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尽量减少所到地方的麻烦，凡能自带的生活用品尽量带齐。由于毛泽东外出时活动内容繁多，如开会、调查、处理国事、接待来访……且很多时候办公，留宿均在火车上，所以要带的行李特多，被褥、凉席、台灯、日常小用品、换洗衣服、礼服，樟木书箱，甚至炊具、餐具，食品蔬菜……每次外出，就像搬家，行李袋总是鼓鼓囊囊，又多又沉。

毛泽东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建国以后，为了探索社会主义革和建设的道路，他经常深入各地，有些年份有三分之一，甚至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京城以外度过，他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每次外出，毛泽东往往是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废寝忘食，席不暇暖。如1958年他先后6次离开北京到地方、到基层去。1、2、3、4月都在外地，先后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广州会议，8月又到河北、河南、山东，还举行了有名的北戴河会议。9月巡视了湖北、安徽、江苏、浙江，月底回京参加国庆9周年纪念活动又再出去，11月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然后再到武汉，召开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从1959年10月23日至1960年3月26日毛泽东外巡的日程表，我们更可了解他外巡的艰辛：

1959年10月23日：从北京坐火车出发，到天津（未下车，住在火车上）。

10月24日：天津—济南（住车上）。

10月25日：在济南（住车上）。

10月26日：济南—徐州（在徐州住火车上）。10月27日：徐州—合肥（住招待所）。

10月28日：在合肥（住火车上）。

10月29日：合肥—浴溪口—马鞍山—南京（住火车上）。10月30日：南京—上海（住火车上）。

10月31日：上海—杭州（住招待所）。

11月1日—1960年1月3日，在杭州（住招待所）。1月4日：杭州—上海（住招待所）。

1月5日—17日：在上海（住火车上）。

1月18日：上海—杭州（住招待所）。

1月19日—23日：在杭州（住招待所）。

1月24日：杭州—江西向塘（住火车上）。1月25日：江西向塘—株洲（住火车上）。

1月26日：株洲—衡阳（住火车上）。

1月27日：衡阳—广州（住招待所）。

1月31日—3月8日：在广州（住招待所）。3月9日：广州—衡阳（火车上）。

3月10日：衡阳—长沙（住火车上）。

3月11日：在长沙（住火车上）。

3月13日：长沙—江西向塘（住火车上）。
3月13日：向塘—浙江金华（住火车上）。
3月14日：金华—杭州（住招待所）。
3月15日：杭州—绍兴（住火车上）。
3月16日：绍兴—宁波（住火车上）。
3月17日：宁波—杭州（住招待所）。
3月18日：在杭州（住招待所）。
3月19日：杭州—上海（住火车上）。
3月20日：在上海（住火车上）。
3月21日：上海—徐州（住火车上）。
3月22日：徐州—天津（住火车上）。
3月23日—25日：在天津（住火车上）。
3月26日：天津—北京。

这次外巡历时5个月

零3天，其中停车开会、谈话59次，（专列上18次），视察工厂、公社、部队7次，研究政治经济学30次，审定毛选8次，看戏9次，爬山36次，游泳14次，与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外宾5次。外巡时间之长，活动范围之广、活动频率之高，都是历史上少有的。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主席的时间每分每秒都在利用着。比如1958年在武汉，9月15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的那一天就是这样安排的：清晨7时吃饭，并抓紧时间和主管工业的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话；紧接着和张治中谈话。约8时，接见在东湖养病的徐海东大将；然后到武汉重型机床厂视察，和广大职工见面；约9时半上车往黄石港，观看了小高炉群；路过下官一社时和田间农民谈话，了解棉花的播种面积，计划指标，具体措施等；然后坐车到大冶铁山，听汇报，看现场，和工人见面谈话。然后到黄石市听取市委汇报，吃中饭。饭后视察大冶钢厂，边听汇报边看厂房，到下午约2时半登上停泊在长江的江峡轮，迎着滂沱大雨畅游长江，然后上船离开武汉。

毛泽东一生俭朴，他走到哪里，就把这种优良传统带到哪里，给住地留下深刻的印象。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国途中视察哈尔滨，当地工作人员还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为他准备了松软的沙发床，豪华被套。毛泽东走过去看了看，笑着说：“我睡不惯这样的床铺，还是睡木板好。”于是警卫员只好帮助把沙发床撤下，换上木板床，从火车上取出自带的行李袋，拿出两条旧军用毛毯，一套薄棉布军用被褥，一对荞麦皮枕头。当时省、市负责人请毛泽东给省、市委题词，他欣然同意。他不无幽默地问：你们住的是楼房还是平房？有人回答说：“住楼房。”毛泽东笑了，说：“住楼房很容易出官僚主义啊！”随后拿起大楷羊毫在砚池中饱蘸浓墨，挥笔疾书，一气呵成。为省委题辞，“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学习”、“奋斗”，为市委题辞“发展生产”，为哈尔滨第二次团代会题辞“学习马列主义”。还为《松江日报》题写了报头。题完之后，他叫工作人员收拾行李，哈尔滨的同志这才仔细观看毛泽东的行李袋，出国访问回来的毛泽东，行李袋中装着的全部是出国时带走的那一批东西。

出巡必带的小水箱

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解放后，他虽国事繁忙，日理万机，但从没有放弃过调查研究。水箱是他外出调查时必带物品之一，这是工作人员专为解决毛泽东外出时喝水而制作的。

这个棕色牛皮制水箱，长 47.5 厘米，宽 15 厘米，高 29.5 厘米，盖上一提手，携带方便。打开盖来，箱中并排放两个水瓶，两个茶杯，可分别盛凉、热开水。箱前正中一小门，有一小抽屉，内常装火柴、烟、牙签、茶叶盒、食盐盒等小物品。每次外出前，工作人员将水壶灌满，一个杯子泡上茶，另一个装凉开水，凉开水中往往加上一点点盐。毛泽东步行极易出汗，在他出汗较多时，护士长随时会给他补充少量盐份。

毛泽东有一个生活习惯，出汗较多时就喝一点淡盐水，不论到什么地方，工作人员都给他带上食盐。这个装食盐的盒子是战争年代缴获的战利品。

这个水箱可算是毛泽东用的第三代装水产品了。开国大典时，卫士李家骥给毛泽东带水天安门，用的是一个蓝布套子，底端的小口袋分别装保温瓶和茶杯，另一个还装有一些麦片、点心之类，套口有根长背带，行动时一背就走，用时解开小带就可取出，还算方便。李家骥又要照顾毛泽东，自己又想观看盛况，他觉得背着个蓝布包套太不雅观，准备将其放在天安门城楼大厅后角，哪知还未放好就被汪东兴发现，严肃批评小李：“这些东西怎能乱放，这是主席的‘后勤’。”经一事，长一智，以后工作人员建议作个“雅观”点的水箱。第二代产品虽说是皮子作的，但作得大小，功能无法齐全。于是大家又建议了好几次，并就水箱的设计进行过讨论，这样才产生了这第三代产品，它跟随毛泽东到田头、地头、山头、工厂、学校、车上、船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一次，毛泽东到河南襄城县北小张庄向农民作调查，因谈话的人多，到 11 点 40 分才结束，县委领导请他在襄城吃了饭再走。毛泽东摇摇头说：“谢谢，不给地方添麻烦。”随即坐进汽车，回许昌。他实在又累又渴，上车就找水箱拿水喝。

1956 年初春，毛泽东围绕“十大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调查。1 月 5 日至 9 日，他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委书记会议，讨论修改“十七条”，

1 月 10 日，他从杭州来长沙，找省委负责同志和地市委书记十余人作调查，专列的客厅中放着一张长桌子，在毛泽东坐处，桌子上放着一大把削尖了的铅笔，一叠稿纸，一盘香烟，一杯茶水。毛泽东一一询问被调查人的姓名、年龄、学历、籍贯等一边用铅笔记着。当听说宁乡县珍洲农业社的农民组织起来后，农村有三分之一的劳力剩余时，毛泽东立即追问：怎样解决剩余劳力的问题？谈到“除四害”时，毛泽东问：“乌鸦要不要消灭？麻雀要不要消灭？狗要不要消灭？”当周小舟等说狗有两重性，一是看家，二是咬人，消灭它，群众会有意见时，毛泽东在草稿上将“狗”字删去了；当孙云英等说到“洞庭湖水面大，蚊子多，三年消灭不了”时，毛泽东当即在

草稿上改为“基本消灭”。1月中旬，毛泽东回到北京，25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发表《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演说，以此作为他这次调查工作的小结。

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时期。毛泽东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如1958年全年毛泽东几乎都在外面跑：新年刚过，就在杭州召开杭州会议，接着到湖南调查；2月到了东北，3月到四川考察，召开成都会议；4月到广东，5—6月又到杭州，8月到河南、山东、天津等地，9月到湖北、安徽，10月在河北，11月又到河南，12月再到湖北，真可谓马不停蹄。又如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北京，在天津、济南、徐州、合肥、南京、上海、杭州、江西向塘、株洲到广州，又从广州经衡阳、株洲、长沙、向塘、金华、杭州、绍兴、宁波、上海、徐州、天津返回北京。历时五个月零三天的调查研究活动中，参观、开会、谈话66次。一个月后，1960年4月28日毛泽东的专列又驶出北京，经天津、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北戴河等地，到8月17日返回北京，历时112天，再次进行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活动。1961年，是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这一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非常丰富，他的专列纵横驰骋、南来北往，时间也安排得相当紧凑。1月，毛泽东亲自组派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湖南、广东、浙江农村调查。2月6日，他在杭州听田家英汇报；2月中旬，他来长沙听胡乔木和湖南省委负责人汇报；2月下旬至3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召开一系列会议，又听陈伯达和有关省市情况汇报；之后，毛泽东又到湖南，花20多天时间在长沙亲自指导胡乔木调查组工作；9月出席庐山会议后又再次到湖南……

毛泽东作这些调查研究工作时是十分辛苦的。“列车停处调查始”，充分体现了他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独具特色。有时，他白天风尘仆仆到第一线视察，晚上则找有关人员开座谈会；有时连续听取汇报，批阅材料。在湖南听取宁乡县委书记汇报，整整3个小时不起身，边问边自己作记录。有次到四川隆昌了解炭黑生产情况，到达圣灯气矿已是下午6点10分，天下着雨，他毫不犹豫，一边看，一边问：“一个火房多少火嘴？”、“炭黑年产多少？”、“矿由谁设计？”。到7点20分，天已擦黑，雨下得更大，毛泽东的衣帽均被打湿。他从水箱中取出小毛巾擦擦脸上的水——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又端出箱中的杯子喝了几口水，还要去看远山的井。他到红光农业社调查，沿着一条小路直接走进社员的家，向社长、社员提出五、六十个问题，问得非常仔细，非常具体。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南、西南、华南“三南”会议上，他动员“省委书记要亲自作调查研究工作”、“应该到一个乡去住上7天10天时间，作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作官了，不作调查了。我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他要求下面的干部这样作，他决心自己带头作。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毛泽东专门就调查研究工作作了长篇讲话。他说：“现在我不反对带调查组，这回我是带了三个调查组，一个放在浙江，一个放在湖南，一个放在广东。依靠这三个调查组，我还是做间接调查，并没有直接调查。我要做点典型毛泽东用过的

暖水瓶。左右两个是在中南海丰泽园使用的，中间的是搬到游泳池以后用的。调查，只要求你们去做典型调查，自己当老爷，我看那不行。”会后毛泽东综合运用开座谈会、派调查组、现场调查、典型调查等形式继续大抓调查研究工作。

充当流动图书馆的樟木书箱

毛泽东勤奋好学，酷爱

读书。在中南海住处，他有藏书近 10 万册的书房，卧室的工作台上、茶几上、床上，到处都有书，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伴随着他的一生。每次外巡，书是他的行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所带之书易搬 不损，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建议为他制作一批樟木箱，专作外出装书之用，毛泽东欣然接受。开始，他们试制出一个长 76 厘米、高 60 厘米，宽 46 厘米的，形似农家的挑箱，由于箱子太深，装满书后两人都抬不动，查找也不便。后来他们加以改进，将箱子改为长 70—80 厘米、宽 50 厘米、高 30 厘米，每个能装书 60—70 斤，这样既便于搬运，又查找容易，且樟木散发阵阵清香，能防虫蛀。毛泽东很满意，箱子就跟着他穿梭于大江南北了。

毛泽东外出，多乘专列。列车一般配置七、八个车箱。他自己用一、两个车箱作卧室、会客室等。这两节车箱走道两旁，全是排列书架，架上整整齐齐摆满各种书刊。这些书就是从带来的樟木箱中取出放此的。一般情况下，木箱中带来的书又多半是从中南海毛泽东的床上挑选的——即他在家时正在读或经常读的书。包括马列经典、《鲁迅全集》、《唐诗别裁集》、《宋词别裁集》、《世界地图》、《中国分省地图》、《隋园诗话》和英语、工具书等，《二十四史》有选择地带，这次带这几本，下次带那几本。《旧唐书》带的次数极多；《诗韵》无论什么时候都喜带，书中有的韵字下，他作过好几种标记。遇有诗兴来潮，作诗填词，反复翻看，仔细斟酌、推敲。有一次，秘书田家英找来一本怀素碑帖册页，毛泽东爱不释手，走到哪里，带着看到哪里。由于翻看次数太多，书页很多地方都有破损，田家英又找人重新揭裱，装订成书本式。身边的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偏爱这本帖，他说：“此人是鄙人同乡。”并详细介绍怀素的身世及书法成就。

1954 年 12 月，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他们当时从北京带来的各种有关宪法的书就满满装了两樟木箱子。一到住地，毛泽东就叫拿出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学理论著作，认真阅读起来。

1959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外巡，交代逢先知要带的书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二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

《毛泽东选集》全部。

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艺术论》。

黑格尔的著作。

费尔巴哈的著作。

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

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杨献珍的哲学著作。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

从古典政治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一些主要著作。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

《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

《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

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

赵翼：《二十四史札记》。

西洋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日本史。

《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诗韵》、《词律》，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朱嘉：《楚辞集注》、《屈宋古音义》。

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古文辞类纂》、《六朝文絮》。

《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视、平衡、锅炉等）。苏联一学者给主席的信（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字帖、字画。

随行人员回忆说：这次毛泽东在外巡视 5 个月零 3 天，书带了 8 大箱。

毛泽东每到一地，除读自带的书外，还经常就地借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成都、庐山等地，都留下他借书的记载。1958 年，他首次到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3 月 4 日下午刚到，立即借来《四川省志》100 多本，借杜甫草堂各种版本的“杜诗”就有 12 部 108 本，还有《蜀本纪》、《华阳国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还要秘书借来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委托四川同志印成小册子，名为《苏报案》。散会时，光归还成都借书就满满装了一吉普车。

1965 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路过湖南茶陵，接待人员临时决定让他在县

委办公室住一晚。随行人员见住处条件很简陋，便决定不卸下樟木箱。谁知毛泽东刚刚落座，就找书看。县委书记马上找来《茶陵州志》。毛泽东躺在临时架起的木板床上，读这本志一直读到凌晨3点。

1974年冬，毛泽东来湖南养病，同样带着他的樟木箱，箱中装着马列著作和线装《史记》、《资治通鉴》、《全唐诗》等。虽然不及前几次多，但都是他一生爱看的书。当时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自己看书很费力，就叫工作人员给他念。这年11月19日江青给他写信时发牢骚，毛泽东在她的信上写道：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外巡时有一种书一般不放樟木箱，而是放在公文包里，这就是英语书。他年过花甲学英语。学得很投入，无论走到哪里，秘书林克——又是他的英语老师，总要在公文包里带着他的英语学习材料。毛泽东往往在刚刚起床后，饭前、饭后，游泳、爬山、散步前后，开会或接见外宾前后，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习英语，外巡时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都未曾中断。1957年3月17日20日，他4天时间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在成千或数千人干部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长篇讲演，工作十分紧张，但学习英语的兴趣不减。从徐州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航程只有不到一小时，他都用来学英语。真是“决心学习，至死方休。”由于他湖南乡音浓重，发音时常常“n”、“l”不分，因而他读英语时，常常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每当老师纠正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反复听老师讲发言要领，跟着老师读，反复练习，而绝不像有的人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经过勤奋努力，到晚年他可以借助字典比较顺畅地阅读政论文章和理论书籍了。

可挂礼服的特大皮箱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一个特大牛皮箱，这口箱子长 97 厘米、宽 69 厘米、高 41 厘米，据说制作它花了两整张大牛皮。因为箱子特大，制作又不同一般，箱底分作三格，可分装裤子，鞋袜等各种用品；尤其是盖的制作特殊：箱盖斜开，一头高，一头低，高头为开口。打开来看，可见挨上端盖口挂一天兰色布帘，撩开帘子上，有一长约 10 公分不锈钢挂架，下有三道宽松紧拉带。将熨烫好的礼服挂在架上，由于有松紧带网住，不至下吊，不会皱。再放下布帘子，防止落入灰尘。用它为毛泽东外巡时专装礼服，非常适用。

毛泽东外出，只要不见外宾，不出席重大场合，他的穿着如同在中南海自己家里，也不讲究。在招待所多数时他穿睡衣，踏拖鞋，到群众中去也就是穿白府绸衬衣、旧灰裤子、布鞋。但会见外宾又是他外巡期间常有的工作，所以他的礼服必须随时带着。往往出发前，工作人员将他的衣服熨烫平展，套上衣架，挂在大皮箱中，旅途中注意竖着搬运箱子，衣服在这大箱中不会折皱，随时可用，极为方便。

1960 年 4 月 28 日—8 月 17 日，毛泽东外巡 112 天，在各地接见外宾 15 次，共计 240 多人。毛泽东和他们进行交谈，还设宴招待。凡出席这些场合，出于外交礼节，毛泽东都换上皮箱中的毛式中山礼服。1974 年 10 月，毛泽东来长沙养病，住 114 天，抱病接待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及其随行人员、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主要成员、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及其随行人员、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克·明托夫及其随行人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一行。毛泽东的这些外事活动，电视台拍了新闻纪录片，报社记者也拍了不少照片。虽然毛泽东当时身患重病，但他强打精神，穿戴整洁，人们也看不出什么破绽。

1965 年 5 月，毛泽东来到长沙，住湖南省委 9 招待所 3 号楼。这天，风和日丽。毛泽东洗漱完毕，走出房间，舒展一下身体。他叫工作人员从箱子里拿出礼服，因为上午 10 点半钟，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要秘密来访，毛泽东将在这里会见他。

“毛泽东和胡志明是老朋友了，主席今天为何这么重视？”身边工作人员思忖着。

上午 10 点半钟，胡志明穿着米黄色咔叽中山装走进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在客厅门口迎接他，两人见面后握手拥抱，亲热异常。

胡志明这次秘密来访，是为了请求中国援越抗美。

毛泽东已经知道了越南的局势，开口便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吧。”

毛泽东乡音很重，但胡志明听得懂，他会汉语，会广东话，还会一点上海话。他向毛泽东叙说了一些越南的情况，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 12 条公路的示意图。毛泽东爽朗地答应了胡志

明的要求。修建河内以北的公路的条子很快转到周总理手中。5月25日，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接见了将与越南交通代表团会谈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商讨有关援越的涉外事宜，立即决定由中央、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小组”，这个小组由外交部、交通部等21个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组成，由杨成武、李天佑任正副组长，先抢修主要的5—7条公路，派兵8万。

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调动了中国的8万大军。难怪毛泽东这次提前叫工作人员准备礼服。

晚年的时光里，尽管毛泽东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衰老已无法抗拒，但这位非凡的伟人仍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世界面前保持着他特有的毅力和乐观幽默的形象。1972年初大病一场之后，毛泽东全身浮肿，为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又给他新做了一套大些的毛料中山装。以后外出，大皮箱中又增加了这套衣服。1974年在长沙休养，箱中就挂着这套衣服，还有一套豆色中山装。每次接见客人前，他叫工作人员帮着穿戴整齐、毫不疏忽。这年11月6日，毛泽东会见加蓬总统邦戈，在审阅新华社外发照片时，他发现自己显苍老、病态迹象，马上告诉秘书，以后再不要发他和外宾的合影照片，每次只发一张在门口同外宾握手的照片。这给拍摄新闻电影、电视带来很大困难。所以以后的有关报道只好这样来处理：毛泽东接见外宾时的谈话，由解说员解说，画面上就配上两国国旗迎风飘扬，汽车缓缓开进新华门或中南海，以此示意毛泽东接见外宾，和其亲切交谈。

1957 年赴莫斯科戴的礼帽

毛泽东遗物中有一顶特殊的礼帽。也是唯一的一顶礼帽。

1957 年 11 月 2 日—21 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40 周年庆祝活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戴着这顶精制的礼帽，格外引人注目。这顶黑棕色呢料礼帽，帽沿宽 7.5 厘米，帽顶下部装饰一条 4 厘米宽的同色绸带，闪光发亮，帽顶内部则围着同色宽度的牛皮带，带上印有银灰色字样：“鹿牌呢帽，公私合营上海中国瑞记制帽厂出品。”

11 月 2 日下午三点钟，毛泽东、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郭沫若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的“图 104”客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亲临机场迎接，在此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本来，毛泽东是不赞成搞这种欢迎形式的。快到出发的日子，有一天，毛泽东要李银桥转告杨尚昆，请他快与尤金联系，请尤金报告苏联领导人，能否把机场的迎宾仪式统统去掉，来接的人不要多，不要仪仗队，最好一下飞机就走”，但是这个意见没有被苏方采纳，毛泽东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机舱门开了！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头戴礼帽，脚蹬皮鞋，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走下扶梯，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马上走上前去，他们热烈地握手、拥抱，记者们咔嚓咔嚓地按动快门。一阵过后，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来到毛泽东跟前，请毛泽东检阅仪仗队。

毛泽东走到三军仪仗队前，来个立定，缓缓地将头上的礼帽摘下，随手交给身旁的翻译李越然，面对仪仗队的陆海空士兵，用激昂高亢的湖南腔，大声问候，“同志们好！”

“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虎威虎势，发出三声震耳的欢呼。

检阅完毕，赫鲁晓夫陪毛泽东上第一辆“吉斯”车，上车时，毛泽东戴上李越然送过来的礼帽。这样的场面很容易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第一次戴礼帽、乘飞机的情景。

那是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离开延安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这天上午 8 时 30 分，在延安枣园中央驻地，从院中那个老槐树往东数第 5 个窑洞的门轻轻开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从里走了出来，他们并排往前，边说边笑。突然，周恩来停下脚步，他上下打量一下毛泽东，好像刚刚发现毛泽东换了一套新衣服。

“是不是嫌我穿得太洋气？”毛泽东在延安一直穿粗棉布军装，戴灰军帽。这次去重庆谈判，叶剑英特地为他买了双皮鞋，在北京订做了一套蓝灰布中山装。

“我觉得主席戴的帽子好像不合适，有点小。”周恩来心细。

“噢？”毛泽东摸了摸头顶上的礼帽。这顶礼帽是江青昨天跑到苏联医生阿拉夫那里借的。

毛泽东当时只有军帽，很冷的天气则戴有长长帽耳的毡帽。这种毡帽是延安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自己生产的，由于原料不好，做工又差，做出来的毡帽，可想而知是个什么样子了。帽壳平塌塌的，帽沿往下吊，样子不好看，

大家都不愿戴。

有一天，警卫员从外面拿回来一顶这种帽子，一边给毛泽东看，一边反映大家的意见。并说：“这帽子戴着挺暖和的，可就是样子不好，一戴上就惹人发笑，所以没人肯戴。”

毛泽东听罢，把毡帽接过去，拿在手里看了看，然后笑着说：“这帽子不错呀，没人戴我戴。”说着，就把毡帽戴在头上，还故意到院子里走了一圈，让大家看，惹得人们都笑了。以后，毛泽东外出开会、作报告，还常常戴着这顶毡帽子。他带了头，大家也乐于戴了。后来，边区人民编了一段顺口溜：“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见了像龟孙子。”

说实在的，人要衣装，毛泽东戴上那红五星军帽的确比戴毡帽英俊多了，美国记者斯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1936年在保安，有一天，斯诺提出要给毛泽东照相，他欣然应允。在窑洞外选取了背景，斯诺突然发现毛泽东身穿着军装，但没戴帽子，头发又很长，他坚持要毛泽东戴上缀有红五星的军帽，当时毛泽东没带。斯诺灵机一动，迅速从自己头上摘下那顶崭新的军帽，戴在毛泽东的头上。快门响了，一张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诞生了。这个历史性镜头，于当年11月14日首次刊登于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从而流传于海内外。那顶红军帽在斯诺逝世后由其夫人赠给了中国政府。到重庆谈判，戴军帽当然不适合。

毛泽东接过帽子戴上，不大不小正合适。他幽默他说：“恩来，我可夺人所好喽！这顶帽子是不是专为我准备的？”接着，毛泽东又问：“恩来，那你戴什么呢？”

“我还有。再说，重庆我比你熟，总是可以搞到一顶的，这顶就送给你吧。”周恩来回答着。

“好，那我就戴吧。”毛泽东笑了笑。

1936年，斯诺为毛泽东拍下了这张头戴红星八角帽的照片。

9点多钟，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同乘一辆抗战期间由南洋华侨捐赠的救护车，直驶飞机场。毛泽东缓缓登上飞机，机场上成千上万送行的人们像是停止了呼吸，大家都在默默地为他祝福。毛泽东走到机舱口，停住了脚步，他回过头来，又一次深情地望了望这块用小米、南瓜养育中国革命的神圣土地，望了望成千上万涌过来送行的人群，百感交集。他慢慢摘下那顶盔式帽，庄重地举起来，高高地举过头顶，微笑着向送行的人们有力地挥动着，挥动着……

地上的人群沸腾了！

“吉斯”车咔嚓一声，停在毛泽东的下榻处，打断了毛泽东的回忆。

11月6日，毛泽东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典，他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满怀信心地预言：“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以后，毛泽东又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

代表会议，11月16日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上签字。

在苏联期间，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就很多问题和赫鲁晓夫、胡志明等进行了交谈，坦诚地发表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见解。比如，当说到苏联发射第二颗人造卫星时，毛泽东即席讲话说：“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天去呢？”谈到现代战争问题，他明确表示的态度是“一是反对，二是不怕。”谈到物质生活问题，毛泽东说：“人身上的热量是很有限度的，不能昼夜都吃，也不能同时穿10件皮大衣。”他的这些幽默、生动的发言常常引起会议代表的极大兴趣，使气氛大为活跃。

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红场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出发前，毛泽东穿上自己最喜欢的灰色中山装礼服，头戴礼帽，他感觉还有几分寒意，又穿上长灰夹大衣。

在列宁、斯大林陵墓前，毛泽东敬献了花圈，然后取下礼帽，毕恭毕敬三鞠躬，向伟大的导师表示沉痛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随后，他来到水晶棺前瞻仰列宁遗容。他向列宁山集会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盛赞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盛赞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世界革命所作出的巨大历史性贡献，并兴致勃勃地在红场摄影留念。

回韶山用过的纸扇和草帽

1959年6月25日傍晚，毛泽东在罗瑞卿、周小舟、王任重等陪同下，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从芦家湾到土地冲，从何家湾到韶山水库，整个山冲留下领袖和乡亲在一起的欢颜笑貌、乡音土语。数十年过去，作为当时情况见证的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他用过的纸扇和草帽。

1959年6月26日黎明5点多钟，天刚蒙蒙亮。毛泽东再也在招待所呆不住了，他独自从房间走了出来。值班服务员急忙敲响还在酣睡的随行人员的房门：“毛主席已经出去了，你们快起来呀！”陪同人员一骨碌爬起来，跑到招待所前的邮局处才赶上了他。

毛泽东径直朝土地冲的后山走去。他告诉韶山陪同毛继生：“今天我先到父母坟上看看。”毛继生马上上前带路。毛泽东的父母葬于土地冲南竹坵，经过两个茅封草掩的长山坡，来到土堆、土围的父母墓前。他把人们就地采摘的一把松枝敬献墓前，然后毕恭毕敬三鞠躬，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他还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我下次回来还得去看他们二位。”

毛泽东从坟前的小道上下坡，朝土地冲李文贵家走去。由于爬山，又急急下坡，毛泽东流汗了，陪同人员迅速送上擦汗的小毛巾，又送给他一把黑纸扇。这把扇子由随行人员从北京带来，它还是50年代初在杭州王子扇厂购买的，毛泽东很喜欢用它。当时他的住处还没有空调和电扇，毛泽东常常是一边轻轻摇着扇子，一边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或读书。后来居住条件改善了，但毛泽东仍然恋着这把扇子，每年夏天外出，他总叫工作人员带上它。有时看戏，一坐下去，卫士马上就把扇子从包里抽出递给他，在外巡视，走到哪里用到哪里。这样，这把扇子伴随他度过了20余个炎炎酷暑。

毛泽东刚接过扇子，一眼看见了在禾场上忙看的李文贵，便左手摇着扇子，右手向李文贵伸了过来。李文贵清早起来就在自己禾场边烧火土肥，他作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如此突然地出现在自己家门口，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对于毛泽东伸过的手，他一时无所措手足：自己满手泥土，如何是好。毛泽东明白了，赶紧上前一步，握紧了李文贵的手。且是那么坦然，那么诚挚。几个月前，他去湖北农村视察，邀请当地一些干部、农民代表上专列座谈。有个名叫晏桃香的姑娘正患感冒，人们怕她传染给毛泽东而不准备让她进车箱。毛泽东知道后，说：“怕什么，少奇同志患结核病多年，也没传染给我。”他让晏桃香坐在自己对面的位子上。不料，晏桃香刚坐下，正好打了个大喷嚏，喷得到处是唾沫星子，在坐的人都紧张起来，小晏更紧张了。毛泽东若无其事地笑了笑，说：“不要紧，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吗，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吗？比蒋委员长厉害吗？”毛泽东这么一说，车箱里气氛顿时缓和了。后来，毛泽东还说：“不要同不让她进来的入讲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

李文贵慌忙之中拖出几条板凳，就让毛泽东等在禾场上坐下了，毛泽东和他拉起了家常。

“你叫什么名字？”

“叫李文贵。”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叫李南华，早去世了。”

毛泽东点点头：“噢！噢！”“你现在家里几口人吃茶饭？”

这时，晨风吹过，烧火土肥的浓烟直向他们坐的这边扑过来。陪同人员示意换个地方坐，李文贵才发现自己疏忽，很不好意思。毛泽东用扇子拍拍烟，又把朝李文贵扑去的烟扇开，说：“我们不怕烟。”继续在原地听李文贵介绍农民的生产生活等情况。

谈过一阵，毛泽东起身。此时，曙光熹微，太阳渐渐升起，阳光洒向大地。工作人员又为毛泽东准备了一顶草帽——普通麦秆编织、直径为56厘米的黄色草帽。一见到它，人们会马上想起前一年毛泽东在河南许昌视察时的形象——一件普通白府绸衬衣，头戴一顶黄色草帽，笑嘻嘻地站在齐腰深的烟叶中、麦田中。

毛泽东在访问了邻舍谢家屋场后才向自己的故居走去。通往故居的小道上早已聚集了成百上千的人们，人们拥簇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顾不上戴草帽摇扇子，便头顶烈日，汗流不止。但他不停地向欢迎的群众交谈握手，问长问短。视察故居后，白府绸衬衣已被汗水浸湿，他坐在故居前坪的凳子上，拉开了扇子，快速摇动着。“咯多人，一个都不认得。”他笑着对围拢他的群众说。他爱抚地摸了摸身旁一学生的头，问：“你读什么书？”

“我在韶山学校读中学。”学生回答。

韶山学校是戴帽子的中学。”旁边有人插话。毛泽东听说，风趣地对学生说：

“那你还是这个帽子底下的啰！”人们哄堂大笑了！

韶山学校1952年新建时，恰好韶山有个老人去北京，乡亲们委托他请毛主席为新校题名。毛泽东听说家乡新建了学校，甚为高兴，欣然应允。他手拿笔问：“写什么字呢？”“写韶山小学4个字。”老人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沉思片刻，说：“写小学不好，现在是小学，以后还要办中学，办大学嘛，那不是又要写吗？干脆给你们写个韶山学校吧。”于是挥笔写下“韶山学校”4个大字。1958年，学校就在原来小学的基础上办了两个初中班，所以人们说是戴帽子的中学。即便如此，毛泽东想到自己对家乡的期望在逐步变为现实，也兴奋不已。他不顾炎热，收起纸扇，接过这个学生手中的书本翻起来，并指着书上的汉语拼音字母问：“这些字你认得吗？”“认得。”“你能背得吗？”“我都背得。”小孩引以自豪，大声回答着。毛泽东笑了，说：“那你不错，你的文化比我高，我还不认得呢。”周围的人们又是一阵大笑。接着，毛泽东又亲临学校，和学校师生合影。

毛泽东戴着草帽来到稻田边。

“这是种的什么品种？”他问毛继生，说的纯粹的韶山话。

“今年种了些南特号。”毛继生回答。

“估计产量会怎么样？”“可能比去年低点。”毛继生声音不大。

“什么原因？”

“一是群众对密植还未完全接受，二是肥料不足，三是水还冒过关。”

毛泽东听罢，用手拨开禾苗，观看密植情况。他见种的很密，问毛继生：

“你们今年插的是几几寸？”

“插的板板寸，只进得脚，踩不得田。”一农民抢着回答。

“板板寸是多少寸？”毛泽东追问。

“是三六寸，也有的四六寸。”

毛泽东取下草帽，顶着烈日又看了一些田，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毛继生说：“三六寸恐怕太密了。”他又说：“田里要增产，要和老农商量。老农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你们干部、老农、青年三者来一个三结合，共同研究，做到合理密植。”

毛泽东来到新修的水库观看，并下水游泳，还到何家湾看望烈士家属。

晚上，毛泽东邀请家乡的老地下党员、自卫队员、烈士家属、亲属、老贫农和乡村干部代表一起开座谈会，并宴请他们。

夜深了！毛泽东房间的灯还亮着。他在房间踱来踱去，轻轻摇着黑纸扇。回首往事，他完全没有睡意，不沾他的硬板床。

1927年他回故乡考察农民运动，离开时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问他何时再返故乡。他眼望蓝天，沉恩良久，回答说：“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需要几十年的时间。3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就不回韶山。”自那时以后22年，迎来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胜利。但因国事繁忙，到再返故乡时，果真长达32年。想到这些，不能不叫他百感交集，夜不能寐。直到黎明，毛泽东吟下著名的《七律·到韶山》：

“1959年6月25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32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获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秘密回韶山时穿的皮拖鞋

1966年6月毛泽东又

一次秘密回家乡，也是最后一次回韶山。在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有一双拖鞋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双鞋面、鞋底均为深棕色的牛皮拖鞋，鞋长28厘米，宽11.5厘米，鞋边缝线多处脱断，鞋面破损，看去穿着行走已极不方便。据考证，这双拖鞋还是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去莫斯科时，专列上专为他准备的。毛泽东穿着极为满意，以后便一直随身带用。

这次回韶山前，毛泽东先在长沙省委九所三号楼留住一晚，当时接待人员见他的拖鞋太破，建议换双新鞋回故乡。毛泽东看了看鞋，还是摇毛泽东1966年最后一次回韶山用过的皮拖鞋破旧得连鞋匠都不愿再补。摇头说：“鞋暂不换，但请你帮我拿给鞋匠补补。”工作人员只好遵令。谁知鞋匠接过鞋一看，见半截鞋面已有过几次修补的痕迹，鞋底也快磨穿，于是顺手将鞋往旁边地上一扔说：“这样破的鞋，实在不好再补，还是买双新的吧！”工作人员又不好说这是毛主席的鞋，只是再三求他说：“这鞋子的主人最喜欢这双鞋，硬舍不得丢，还是请您多费神，帮忙给补补吧。”好说歹说，鞋匠才给补了补。毛泽东韶山滴水洞外景见鞋修了修，还很满意哩！穿着它回韶山。在滴水洞，毛泽东穿的白衬衣后肩打了一个约3寸宽的补丁，韶山接待人员见后，找着卫士和秘书提意见，说：“主席的衬衣领补得这么厚，穿着会极不舒服的，你们为什么不给他老人家换换？！”秘书有冤难伸，说：“主席的脾气你不了解，他不肯换，你作主换了，也不会穿，严厉批评后，还得换回来。”卫士说：“我早给主席建议过，他不同意，说他这一路上又不接见外宾，穿这个衣服不是很好吗？现

在国家还困难，棉布也紧张。”其实，当时比起经济困难时期，情况要好得多，更何况国家再穷，也不会少国家领导人的几件衣服。而穿着随便，艰苦奋斗是毛泽东一贯的作风。1959年毛泽东第一次回韶山时，也穿同样的衬衣，当时招待所的服务员马保荣帮他洗衣服，她见主席的衬衣领补了又补，连洗都不好洗，穿上肯定很不舒服，她感动得流下泪来，也总和陪同人员谈起此事。那次陪毛泽东回乡的王任重有感而发，在留言簿上写下这样的留言：

韶山风光依旧，
人世几经沧桑。
壮志已成大业，
何须衣锦还乡。

毛泽东在韶山住了12天，一直穿着这双拖鞋，临走时又叫工作人员收起来，还是走到哪里穿到哪里。又有一次，毛泽东也是在长沙，身边工作人员周福明见南方潮湿，待他休息后马上把这鞋拿到阳台上吹吹风，晒晒太阳，待毛泽东快要起床时，周福明去为他拿鞋，结果发现鞋没了。他很着急，赶快询问住地值勤人员。值勤员一听，二话没说飞快跑出去把鞋捡了回来。原来，值勤人员在巡逻时，发现了阳台上的这双鞋，心想，谁把这样破的鞋放在主席住房附近，太不雅观，于是赶快把鞋扔到了垃圾坑里，哪里知道这竟是毛主席穿的鞋！

1967年，毛泽东从武汉到上海。在住处搬行李时，放拖鞋的旅行袋未封口，鞋从袋中滑出掉在通往卧室的路上。被住地警卫巡逻时发现，他们还来不及弄清此处怎么会有如此破烂不堪的拖鞋，赶紧捡起扔了。直到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清理行李时发现少了拖鞋在寻找打听时，扔鞋的战士先是大吃一惊，然后是恍然大悟，马上跑去捡回来。

长放床头的小药盒

在毛泽东的床头，总放着一个木制小药盒。毛泽东外巡，小药盒也跟着主人走南闯北。据工作人员回忆，这个小药盒还是1954年由中南海木工组制作的，当时刚刚过洁白的油漆，看上去很精致，招人喜爱。20多年后，小木盒上的油漆变成了土黄色，棱角的漆已脱落，显现出陈旧的本头本色，它作为领袖身体状况的见证之一，展现在人们面前。

毛泽东外出时用的药箱

打开盒盖，可见当时毛泽东日常用药情况：右侧放的外用药，有碘酒、脚气粉、龙胆紫等；左侧放的内服药，有复合维生素、米尔顿、南不受等。其余的格子里放着小钳子、棉球等小器械，这些药品，往往是由保健医生开出处方后从药房取出放进盒内的。毛泽东对他的医生说：“我看你们容易迷信药物，不要有点小病就用药。人还有抵抗力嘛，先让自身的抵抗力与细菌作战，能战胜就不要用药。如果抵抗力差，你再用药帮他一把，这也是自力更生为主嘛！”他还说：“我的生活里有四味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睡、能吃、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那孔夫子现在要活着该有二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甚么样子了？”“人哪有长生不死的。”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的小药盒常常药物很少，尤其是从来没有补药。

毛泽东有自己的医疗证，指定医院是北京医院，但他极少生病，也不愿意一点小病就叫医生看，所以很少去那里看病，而且也很不喜欢服药。遇有生病，首先总坚持用意志去战胜，实在不行，才要身边保健医生诊断，并要医生、护士及身边工作人员一再规劝，才服点药，有时还接受工作人员在医生指导下为他灌肠、按摩。惟有服安眠药很自觉。他长期操劳党和国家大事，睡眠严重不足。延安时期曾有过工作人员为毛泽东一星期内总共睡了20个小时觉而进行专门庆贺的故事；过度的紧张，使他患上失眠症，因此就常服用安眠药。有一次，傅连璋在清理战场上缴获的敌方药品中发现有一瓶安眠药，马上想到给毛泽东试试，谁知服用以后效果很好。想到能解决领袖的睡觉问题，傅医生像捡了大宝贝一样高兴，他一直精心为毛泽东保管着。毛泽东也极为满意，他高兴他说：“世界上发明安眠药的人真大有功劳！”

1961年，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有一天，毛泽东见护士长到来，他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语气沉重地找吴旭君谈话，“现在国家困难，各方面都要节约开支，要精兵简政，我要带头执行。你呢，也要帮帮我的忙。我的秘书、卫士都减少了，请你多承担些工作，既当护士长，再兼点医生方面的工作。我们订个约法三条：

第一，我发烧不超过三十八度五不许去找医生，小病就由你看；

第二，你学着搞些国际问题研究，每天抽时间看《参考资料》，把主要内容讲述给我听，还要和我一起读读英文；

第三，你也参加一些卫士的值班。行么？”他期待地望着吴旭君，直到她愉快地点头答应。

随着国事的操劳和年龄的增大，毛泽东的失眠症也越来越严重。50年代初，小药盒里常放“速可眠钠”、“安米妥钠”等药，后来，又不离“米尔顿”、“南不妥”等安眠药了。毛泽东临睡前约半小时，护士长或卫士送给他第一次服的药，服下后他停止手头工作，拿起毛笔，练练书法，此时写字可算消遣型，也就抄抄现成诗词，或临摹王羲之、王献之、怀素字贴。约20分钟后服第二次药，服后工作人员一般不再与之谈话，有时只由值班卫士帮他搞搞按摩，促进睡眠。正式入睡前，有时再服第三次药。服药多少，睡多长时间，由保健医生根据毛泽东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或协商而决定。

有段时间，毛泽东特别

爱吃一种霉豆腐。这种豆腐的作法是：买回鲜豆腐，撒上一些花椒粉，将豆腐放在较潮、阴的地方发霉，然后用菜叶子包上放进缸里腌，几天以后取出煎食。不久，保健医生发现毛泽东多痰。经化验是食这种豆腐所致，因此不同意再吃。毛泽东不高兴。接见尼克松后他请医务人员吃饭，第一个菜就叫上这种豆腐，医务人员无可奈何，不得不在药盒里增加点化痰的药。这个事很快被湖南人知道了，他们马上给毛泽东送去家乡产的大桔饼，说是常吃可以化痰止咳。也许毛泽东坚信有时土单方可以胜过西药丸，也许可以寄托愈老愈浓的思乡情，他停止服药盒的药丸，总叫工作人员切碎桔饼泡水喝，坚持到临终。在他的遗物中还有吃剩的3个半桔饼呢！

不知什么时候，毛泽东又患上脚气，于是药盒里又多了脚气粉。他听入说吃糙米可以治脚气，（也许这种传说正中毛泽东想吃糙米的1972年以后，毛泽东时常咳嗽。湖南乡亲特意为他制作了有止咳化痰功效的冰糖橘子饼和金橘饼，密封在这两只瓷缸里，用这个木箱送来北京。下怀），于是他跟护士长提出想吃点糙米饭。70年代的中国，大部分农村都普及打米机了，在北京要找糙米谈何容易。生活管理员想了个办法，他到郊区弄来谷子，叫警卫战士利用业余时间帮助脱壳，好不容易弄得一点货真价实的糙米，当香喷喷的糙米饭端到毛泽东面前时，他高兴得像小孩得了糖，扒了半碗饭还没夹菜呢！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缓缓驶进长沙，81岁高龄的他带着重病住进了省委九所，开始了为期114天的休养。随行人员仍旧把带来的药盒放在他的床头，盒子里的药品增加了！

岁月不饶人，自然规律无法抗拒。1971年春上，毛泽东生病了，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大叶性肺炎。之后，林彪事件又给他本来已衰老的身心造成了新的伤害，加速了他的衰老过程。此时，毛泽东变得沉默寡言，抑郁不欢，白发也骤增。在对待疾病的态度上，毛泽东的个性表现得很突出。有时坚持己见，且很固执；有时怀疑医生、药物的作用。他说：“医生的话只能信三分，最多信一半。”满以为自己的身体可抵抗住疾病的侵袭。正因为如此，他的病愈拖愈严重，以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受到病痛折磨。

1972年1月，由于肺心病招致严重缺氧，他突然休克，经全力抢救才脱险。以至2月份接见尼克松时，身体还十分虚弱，脸色腊黄，全身浮肿。需要秘书扶着才能站起，甚至连说话都有困难，1973年出席中共“十大”时，是等全体代表退场后才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离去的。

1974年初，毛泽东又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开始，他觉得自己看东西模糊、吃力，他把这一现象告诉身边的机要秘书，却又不让请医生治疗，不让告诉任何人，自己硬挺着。不久，眼睛几乎失明，这使习惯于自己批阅文

件、手不释卷的他极为痛苦，才不得不考虑治疗。医生会诊后，考虑到这种病需经过初发期、膨胀期、成熟期和过熟期几个阶段后方能实施手术治疗，于是毛泽东决定外出休养。7月他离开北京，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后便来到长沙。

这次外出，自他住下以后，每天都有一架飞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替他送来文件，又把批阅过的带回北京。结果他每天休息的时间很少，仍旧孜孜不倦。白内障给他带来的痛苦不小，他的眼睛已不能看文件、报纸之类费力的东西，“全靠身边工作人员给他念，秘书，医生、护士、服务员都给他念过文件、报纸，后来他自己还曾风趣地说，他在长沙是“听文件”。1975年7月23日，由我国著名的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做了眼睛手术。

眼睛复明后，很久没有看电影的毛泽东在1976年春节看了一部电影《难忘的战斗》。当看到解放军进城时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时，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临终前一天的护理记录真实地记载这位伟人的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不朽精神：

1976年9月8日：

零时零分：体温36.9，脉搏103次/分，呼吸21次/分，血压170/80（mmHg）。看文件14'。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有些微汗、生理盐水喷口腔6下。

零时50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0 30。辅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

1时10分，看文件15 3。

1时29分：血压150/70（mmHg），T波倒置，ST段压低0.15mv。（注：表示心肌缺血。）

1时40分，主席自己使劲。马上去看，发现尿床约200ml。

1时45分：血压180/80（mmHg）。看文件10。

2时零5分，脉搏116次/分。看文件9'，爽身粉擦大腿。

5时16分：有轻度紫绀（注：表示缺氧）。尿床200cc。

5时50分，换枕头及耳枕。看书7。

11时15分：体温37，脉搏102次/分，呼吸26次/分。双手双脚发凉。

11时21分：嘴唇紫绀明显。做呼吸器很短，不要。手指甲发绀。

11时50分：ST段压低加深0.3mv。（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

12时47分：看文件21'。液体滴数速（度）调至20gtt/分。（注：即每分钟20滴。）

13时15分：ST段压低0.3mv。出现二个室性早跳连续发生（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并有一定程度的心律失常。）

13时18分：看文件12'。

14时零4分：口唇、手指甲发绀明显，给做呼吸器1 27

14时零8分：继续做腹部人工辅助呼吸。

14时零9分：脉搏106次/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8。

14时35分：血压160/65（mmHg）。看文件23。按摩右上肢及双脚。

16时30分：ST段血压低0.1—0.2rnmv，室性早跳一次

16时37分：看文件30。（注：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此后，病情进一步加重，插上鼻咽管）。

□□以上护理记录摘自林克等著《历史的真实》

不肯与胡志明交换的竹拐杖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留下的拐杖一共有 5 根，有的雕刻极其精美，有的制作相当科学，但那些均只留下很少使用时磨损的痕迹，惟有一根竹拐杖，却得到毛泽东的偏爱，带着它南来北往，时而去领略青山的娇美，时而去欣赏故宫的国宝。

60 年代初毛泽东在杭

州爬丁家山时，工作人员从住地附近砍来竹子做成了这根竹拐杖。1965 年，胡志明在长沙要拿自己的漂亮拐杖与毛泽东的交换，毛泽东说，“不换，你的太漂亮了，我还是用我的讨饭棍好。”

50 年代初，毛泽东到杭州，他在工作之余建议去爬山。身边工作人员知道，毛泽东一生喜爱爬山，青年时代他曾在雷雨交加的黑夜爬上长沙岳麓山，说是体会“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情趣。建国以后每次外巡，只要条件允许，也都要登高山，攀险峰，眺望无限风光。

他们决定去爬丁家山。工作人员考虑到毛泽东年近古稀，行走不便，决定为他备根拐杖。他们就地取材，从住地附近砍了根竹子在底部绑上一块胶皮，以避碰撞声，且可防止打滑，再把竹节刨了刨，以免戳伤手。就这样做成了拐杖，把它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很高兴，称赞他们想得周到，既省钱，又适用。他拄着拐杖出发爬山时，工作人员还提出两个要求：第一，爬一个山，中途要稍停休息休息；第二，适当时候，要让医生查查脉搏、呼吸等情况。开始，他不同意，说医务人员是“小题大作”。他总是说：“我这辈子爬了不少山，累不坏。井冈山那么高，还不是靠两只脚走过来的！更不要说转战陕北了，那是怎样一种情况啊！”说到这里，毛泽东放下拐杖，坐在路旁的石块上，陷入了沉思……

1947 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 20 多万人进攻延安，我军在陕北仅 2 万余人，不足敌人的十分之一。于是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胡宗南匪军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又对我部进行围追堵截。毛泽东英明地采用了“蘑菇战术，将敌人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一天，部队冒着细雨，爬上王家湾两边的山梁。虽然是 6 月天，但细雨迷蒙的深夜，仍有几分凉意。越到山顶，风雨越大。路滑得一走一滑，天黑得伸手难见五指。牲口不能骑了，毛泽东下了马。大家要用担架抬他，他拒绝了，说：“我早说过不坐的，你们愿意扛就扛着吧。胡宗南一进攻，把我的身体锻炼得结实了，还得谢谢他呢！”说着，他步行着往上爬。随行人员为防止他滑倒，从路旁折下一根柳条棍，让他拄着。从此，就有了 54 岁的毛泽东拄着棍子打仗的故事。

想到这里，毛泽东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竹拐杖，起身继续往前爬。他步子不紧不慢，能持续很长时间，有相当的耐力，在保健医生的一再要求下，他让医生量了量脉搏。检查一切正常。爬山就成为经常性的活动了。他们从刘庄出发，有时去爬海拔 257 米的南高峰，有时去攀 314 米的北高峰，有时又去海拔 239 米的玉皇山。1959 年 11 月还乘车前往湖州市德清县登莫于山。登高望远，心旷神怡，毛泽东口诵《看山诗》一首：

“翻身跃入七人房，
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

风驰又已到钱塘。”

有了这根拐杖，行动起来放心多了。毛泽东逢人便扬起拐杖说：“三条腿总比两条腿稳当。”他还说：“杭州的山好，水好，人也好！我每次到浙江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走了，又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湖南、北京是我的第一、第二故乡，浙江杭州就是我的第三个家。”

随着时间的迁移，竹拐杖被主人摸得又光又亮。毛泽东拄着它登上过“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又撑着它爬上十三陵，就是到故宫看国宝，它也不曾离开主人手。由于关键时刻总得到它的支撑，借助它的力量，毛泽东对它的感情愈来愈深了。

1965年毛泽东在长沙会见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当时美国正扩大侵越战争规模，越南人民处于严重困难关头，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对越南党和国家提出的援助要求尽力予以支持。毛泽东还亲自到蓉园看望了胡志明，招待胡志明吃饭，请他观看湖南木偶戏，并和他一起合影留念。胡志明极为高兴，也很感激。分别时，他提出要用自己漂亮的拐杖与毛泽东的竹拐杖交换，作为这次会见的纪念。毛泽东拒绝了，他风趣地对胡志明说：“不换。你的太漂亮了，我还是用我的讨饭棍好。”

随后，毛泽东带着自己的竹拐杖重上井冈山。有一天，毛泽东拄着它攀登宾馆后山，爬上山坡，他高高地举起手中的拐杖，寓意深长他说：“这东西是个好武器，平时可以帮助我们走路，坏人来了可以用它自卫，打击敌人。”毛泽东说完又自信地往前走。井冈山陪同人员提醒他：“主席，那边没有路，不能去了！”毛泽东听罢，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嘛，我就不信前面没有路，有山就有路！”说着，他挥起拐杖拨开两边的荆棘，继续往前走，随即给随从人员踩出一条小路。恰好这时山坡的甬道上走过一群活泼可爱的幼儿园小朋友，他们朝着毛主席高喊：“毛主席！毛主席！”毛泽东只好停下频频向他们招手。

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回到韶山，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在韶山滴水洞住了12天。到达之前，韶山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作准备工作时，想到1959年毛泽东回故乡，清早爬上南竹托拜谒父母墓，山高路滑，很难上去，他们没想到要为他准备一根拐杖，还是村民庞阿公赶紧打发儿子庞景霞送去一根踩田棍。于是这次他们特意上长沙买了一根精致的雕花拐杖，放到他的房间里，告诉他外出时用。毛泽东感谢乡亲们想得周到，但没有接受拐杖，他仍旧拄着自己的竹拐杖，踏遍故乡的山山水水，离开时也绝没有忘记随身带着。

游泳前后用的温度计和草拖鞋

0312_1

毛泽东一生喜爱游泳，每逢外巡，只要有条件，他非游泳不可。池塘水库，大江河海，到处自下他中流击水、拨浪弄潮的身影。所以，外出的行李中，每次都少不了要带上草拖鞋和温度计。草拖鞋是游泳时下水前和上岸后要穿的，温度计是用来测量水温的。1954年毛泽东到北戴河。9月中旬，接连几天大风大雨，涛声像隆隆炮响，从大海那边一阵阵传来。雨刚停，毛泽东就提出去游泳。负责测水温的同志拿着温度计左量右量，水温不到20度。于是回来劝毛泽东说：

“今天不能去，水很凉的，会抽筋。”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么。”

事已至此，已无可挽回。随行人员和毛泽东一起扑向大海。他们时而拥上波峰，时而跌进波谷。

“你们不要紧张，我们只会被冲上岸，不会被拖进大海回不来。”毛泽东面对滚滚海浪，仍然一副轻松自在的安闲样子，与风浪中惊惶失措的青年人形成鲜明的反毛泽东游泳前用来测水温的温度计。差，他一边随波起伏，一边对年轻人说：“你们正年轻，要经风雨见世面。不要做温室里的花草，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并说：“凡事不冒险就不会成功，许多成就便是从冒险得来的。”此后，毛泽东更不愿意在小他里游泳了。

1956年夏，毛泽东来到广州。他在珠江口游泳后，向周小舟、王任重表示，还要到湘江、长江游泳。

罗瑞卿匆匆来劝毛泽东

不要到长江里游泳，毛泽东不听，坚持要游，罗瑞卿不答应，说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事。毛泽东大声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吓了一跳，显得有些不安。他怎么敢想毛泽东被淹死？他难堪地解释：“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证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责任，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毛泽东冷笑：“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房子还能塌呢！”

罗瑞卿见毛泽东真发火了，便退出来，退出来也不放行。某些场合，毛泽东还得服他管。直到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给身边工作人员讲话提到汪东兴、罗瑞卿时还曾这样说：“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他们提出什么不让我下长江游泳，出去必须是三辆汽车。我说政治局决议都可以改变，就是他们的规定一点也变不得，还规定什么只能在小游泳池游，只能在体育室活动。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

就是毛泽东狠狠批评，罗瑞卿坚持不松口，毛泽东也是无法行动的。这样相持不下，毛泽东还是游不成长江。于是他自己提出解决的办法，命令中央警卫团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去实地考察一下。

韩庆余带着温度计来到武汉，与武汉市公安局长等一起对长江水流、水温等情况进行测试、了解。韩队长本人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回来，他将情况向毛泽东作汇报：长江水温低，正涨水，浪大，水速快，漩涡多，江中还有江猪、血吸虫等，建议毛泽东不要到长江游泳。

听着，听着，毛泽东早已沉下脸来，皱起眉头问：“你下水没有？”

“没有下水。”韩队长老实摇头。

“没有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你不要在我这里呆了，你走吧。”毛泽东发怒了！接着又吩咐：“你把孙勇给我叫来！”

“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毛泽东又指着孙勇说。

孙勇带着毛泽东的意图去调查，除了测量水速、水温，自然下了水，游一趟回来，向毛泽东报告：“没问题，可以游。”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毛泽东故意大声说给阻止他游长江的人听。

事后毛泽东消了气，又说，其实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唉！就这件事办得不对。他不应该说假话，不该欺骗我。你们以后什么事都要讲真话。”

毛泽东满怀畅游长江的信心北上了！他决定继去年之后再次游湘江，为游长江作好准备。

5月30日，毛泽东乘坐的小汽轮划破黄色的湘江水，溅起无数朵水花，阳光谱成彩练，分外美观。触景生情，毛泽东吟诵出苏东坡的《前赤壁赋》：“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诵毕，毛泽东又作了一些解说，还对坐在他身旁的周小舟打趣道：“苏东坡驾一叶之扁舟，那说的是小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追求小我的自由。你已经不是小舟，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毛泽东想到马上要驰骋滚滚江水之中，格外兴奋，话也就多了起来。

午餐后，工作人员测得当时湘江水位为36.33米，流速每秒0.8米，水温为21.5度。整一点，毛泽东更衣，从猴子石下水，畅游到水陆洲。

5月31日，毛泽东谈笑风生登上长江中的一艘客船。他一看小木船上都是救生圈，还有许多年轻力壮的人，马上下命令了。他指着客轮周围的四只小木船说：“走开，都走开，不许那些船靠近！”

有关方面负责人不敢再惹毛泽东生气，那样游泳的乐趣就没了。于是指挥小船划走，只留下保健医生的一条船，不远不近悄悄尾随。

毛泽东从长江大桥桥墩处下水，纵身江中，轻松自如游起来。他边游边和身旁的人说笑，顺流而下游了十六、七里。客轮缓缓跟上，当他游得心满意足时，便靠过去，接他上船。回到宾馆，他兴奋自得他说：“罗部长不叫我去游，我偏去。还不是去了，一游就是十六、七里！明年6月份我还要去，把他也要拉下水去。”游过之后，毛泽东作《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抒发畅游长江成功后的喜悦。词中写道：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一试不可收，毛泽东4天之内3次横渡长江。据有关记载，毛泽东畅游长江竟达21次之多！1966年，73岁高龄的毛泽东以1小时零5分钟，在长江畅游近30华里！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以它的清明和变化莫测，给无数智者以启迪。老子曰：“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之下，欲先人，必以身之后。”《荀子·王制篇》中说：“贤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但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位智者比毛泽东更善于从水中吸取力量和智慧，并引发澎湃的诗情。水的宽阔浩渺给他以空间感和使命感，不禁“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水的流动不居

又给他以时间感和紧迫感，惊呼“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置身水中，毛泽东畅想天上与人间，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的关连，产生对宇宙万物生生不息，运转流变的叹服，对超越前人，创造奇迹的冲动。得益于水的滋润和启示，毛泽东才创作出了《沁园春·长沙》，《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等千古名作。如果说诗歌是毛泽东的语言故乡，那么水便是引发毛泽东浪漫诗情的温床。

毛泽东酷爱游泳，还因为游泳是他表达生存意志，确证和张扬自身力量的最佳方式。“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他青年时代的誓言。晚年毛泽东雄风犹在，对人生的体悟更为从容豁达，“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出言有九天俯视之慨。毛泽东不喜欢在游泳池或风平浪静的水面游泳。1954年，他在清华大学游泳馆游泳，3个月不间断，目的是研究水的“脾气”，进一步提高游泳技术；1974年，他去长沙游泳馆游泳，是因为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不得已而为之。他心中向往的是大江大河。事后，毛泽东以长江论美国，他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他还不忘向那些反对他游长江的人点破一个真理，即“凡水皆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除了一寸之水不可游，100温度之水不可游，零下之水结了冰不可游，有鲨鱼不可游，有漩涡不可游，除此之外，凡水皆是可游的，这是个真理。”

毛泽东借游泳谈政治，谈人生，有感而发，机锋甚健。他终身都在从水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游泳伴随他克服了人生道路上无数的暗礁和险滩，使之永葆年轻乐观的心态，向一切不可能的事物挑战。他征服了旧的对手后，又渴望新的对手，其人生境界就在这种循环中不断得以提升和趋于永恒，呈现出诗化和奇崛的景象。毛泽东借游泳强身健体，更借游泳怡情励志。对于他来说，游泳包涵了太多的人生底蕴和象征意义。

“微服私访”时戴的大口罩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6个口罩，这些原本雪白的纯棉制品，却已程度不同地变成了黄白色，显然是由于多次使用、消毒所致。其中两个明显大些，它们长19公分，宽14.5公分，成色较新，稍白，两边安装的松紧带弹性依然，说明生前用得不多。因为这是专为毛泽东外出时避人耳目而做的。

毛泽东历来向往言谈行动随心所欲，不受约束，尤爱和普通群众交往，和人民有着深厚的鱼水情谊。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住进了中南海，他便不可能再像战争年代那样想到哪便到哪，他的行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足迹遍布全国，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但是他没有随便见人民的自由，多数要经事先安排，就连火车专列上的服务员要见他，也须经卫士同意。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是个人，面对的却是组织决定。他能领导全国，却不能随便走出红墙一步。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1949年5月2日，毛泽东约柳亚子游颐和园，泛舟昆明湖，入园门时，有人认出了毛泽东，一片激动、惊讶的声音：“毛主席！”“是毛主席！”游园的人们迅速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聚集在昆明湖畔。毛泽东上岸后，立即被欢腾的人群包围，无数手臂伸出来争抢着同毛泽东握手。在卫士的保护下，毛泽东总算上了车。车上，毛泽东兴高采烈他说：“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游园。柳亚子先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

但是，随着这种热烈场面的一再出现，毛泽东的行动越来越不自由了。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有关部门规定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必戴上口罩，以避免麻烦。

1952年春，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安全部门一再坚持，必须戴上口罩，避免被人认出，形成拥挤局面，对主席安全不利。毛泽东虽极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妥协。那时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见到毛泽东肖像的却越来越多。毛泽东尽管戴着大口罩，把脸捂得严严实实，但在黄鹤楼时还是被一个小孩认出来了：

“毛主席！”

孩子的一声惊喜的叫喊，似乎传遍了整个黄鹤楼，正值春节，游人特多。刹时，人们像潮水般拥来，人挤人，都想拥到前面，看个清楚，看个真切。毛泽东的卫士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和李先念、杨尚昆、王任重等领导同志马上里外形成两层保护圈，环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流，拥来拥去，好不容易挤到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了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岸上掌声雷动，欢呼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陪同和警卫早已是大汗淋漓，惊魂未定，而毛泽东却开心他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看到这种热闹、融洽的场面，毛泽东是很高兴的，第二天，他跟大智街长谈话说：“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能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他更喜欢自由自在、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

1956年，毛泽东去机场为结束访华的印尼总统苏加诺送行。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对卫士说：“咱们找个饭馆吃饭。”毛泽东随卫士到了一家羊肉泡馍店。毛泽东不爱吃羊肉，但他很满意这个环境，他深情地环顾饭馆，仿佛他又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一个普通的人了，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街市的空气了。他还“微服私访”，到丁家花园看了一个丁老头养的菊花。这些活动对他来说真是莫大的享受，可惜机会太少。

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较量。在北戴河，他坚持“出去走走”，还发过脾气。有关部门怕他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走，但必须戴口罩，戴墨镜。毛泽东在田地里想和农民聊天，但戴着口罩、墨镜，身后还跟着一群人，谁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农民们看出了这“不速之客”是毛主席，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过来。为了安全，卫士和警卫不由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毛泽东发脾气也没用，个人必须服从组织。

1953年，毛泽东视察湖北黄石市钢铁厂，毛泽东步入高炉车间，车间里温度很高，从那高炉里喷出来的烟尘和带有硫磺味的气体，一阵阵袭来，刺激着咽喉和呼吸道，让人感到呼吸不畅，胸口发堵、发闷。为了让毛泽东少吸进点有害的烟尘，保健医生把事先准备好的口罩向毛泽东递去，当毛泽东发现了医生的动作后，立即用严厉的目光向医生扫射一眼，随着那像利剑的目光，毛泽东的右手手心向下，坚决而有力地摆动了一下。毛泽东宁肯吸进些有害的粉尘和气体，也决不会让这白得刺眼的口罩把他和工人群众隔离开来。

为了保密，为了安全，让毛泽东戴口罩，使他脱离人民群众，他是很反感的，但另外一种情况下，毛泽东却很主动。

有一年冬春之际，北京流行病毒性感冒，卫生部门要求人们外出戴口罩，减少传染机会，但有些人嫌麻烦，不愿戴。毛泽东听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过此事，因而，一次外出之前，他主动要了一只口罩，并要随行人员也自觉遵守规定，戴口罩出门。

毛泽东曾说过，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在戴不戴口罩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也是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对待的，而且态度鲜明。

闲暇时爱用的电唱收音机

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少有“洋”货。但有一台日本产直、交流小型电唱收音机，得到毛泽东的偏爱。这个机子长 33 厘米，宽 18 厘米，既能收音，又能放唱片。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市场上，就以它小巧轻便、多功能、音色好等特点被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选中，作为毛泽东外巡用品之一。毛泽东对外国产品，尤其是日常用品并不感兴趣，但见这个小小机子，可以收音，又可放唱片，声音很清楚，携带也方便，也就乐意接受了。他自己也知道，外出巡视时，常常在火车上办公、开会、食、住、行，这东西还真用得着。

的确，机子用得最多是在火车上。除此之外汽车上偶尔也用。一上火车，工作人员除安排好办公地点，摆好所带书籍之外，就会拿出这个小机子，放在适当位置。多数时候是装好电池，随时可用。当毛泽东工作、读书之余，他们有时打开机子的收音开关，让他听听新闻或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有时则在唱盘上放一个唱片，让他听听戏曲。唱片有时由毛泽东点名，有时则由工作人员选定。除了京剧、湘剧、相声等等之外，粤剧《母亲》、《五侯宴》、川剧《赵盼儿》、《拉郎配》、《拜月》、潞安鼓书《拙老婆》等都曾在这个电唱机上使毛泽东从繁重的国事操劳中得到休息和松弛。

毛泽东外巡如果下车住宿，这个小电唱机就清闲了。因为除了毛泽东指名点放唱片之外，工作人员不必安排多的节目。毛泽东每到一地，如有闲暇时间，则更喜欢观看地方戏剧。1954 年毛泽东到广州，特地观看了红线女演出，演出之前，他与江青和红线女一起吃饭，并和她一起谈论粤剧艺术的改革。在江西，毛泽东观看了江西省赣剧团演出的《还魂记》，他说：“演得很好嘛！它是明朝汤显祖写的。汤显祖是你们江西临州人，人称东方的莎士比亚。除了《还魂记》，还有《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统称临川四梦，都写得好。”毛泽东尤其偏爱家乡的湘剧、花鼓戏、皮影、木偶戏。花鼓戏《打铜锣》、木偶戏《追鱼记》、皮影戏《鹤与龟》、《两朋友》，他都喜欢，尤其爱湘剧《三女抢板》。他认为此戏反映的内容有共产主义风格，并亲自提议改名为《生死牌》，建议湖南省委组织人员重新修改，拍成电影。《生死牌》里有海瑞的形象，毛泽东再次观看后说：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讲真话不讲假话，反对官僚主义要有海瑞精神。

毛泽东非常关心地方演员。在地方看戏，结束时常与艺人握手道谢。《生死牌》的主演刘春泉，声音洪亮，口齿清晰，表演真切，毛泽东喜欢看她表演，多次请她演出，还指示湖南有关领导多关心文艺界人士。演这个剧的左大玠，也深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常看她的戏，还常与她交谈。有一次，毛泽东诙谐地问她：“你为什么姓左不姓右？”“爸爸姓左，我跟爸姓。”“你怎么老穿这件衣？”左大玠也很坦率：“穷呀！”说着伸出十个手指给毛泽东看：“一罗穷嘛！”同时反问毛泽东几个罗。毛泽东也伸出两手，让左大玠仔细辨认。左大玠左看右看，然后跳起来笑道：“整整十个罗，难怪当了‘皇帝’。”毛泽东和青年演员如此谈笑自如，平等风趣。

但是，1971年毛泽东巡视南方时，虽在火车上住，但很少用上这台电唱机。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带着汪东兴等少数工作人员，乘专列离京南巡，沿途停留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上海、济南等市，历时30天，行程十分紧张。他找来谈话的人多，谈话内容是把庐山会议上斗争的情况逐步向党的高级干部“吹风”，以利更好地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入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同时再教育和挽救林彪等人。这是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毛泽东只好亲自外出做工作。

毛泽东在“吹风”中讲到，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讲到这个问题时，他提出“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讲着讲着，毛泽东带头唱起了《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长沙他领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己一边唱一边挥手指挥。因这两首歌歌词较长，他自己、华国锋、汪东兴和卜占亚都记不全，唱不下来，汪东兴就把列车员和保健医生也叫来，大家一起唱，毛泽东仍然领着一边唱，一边解释。而后，他又反复讲到团结和纪律问题。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和人民。

说到这里，毛泽东敲了敲桌面，又说：现在有个坏现象，就是纪律涣散，党内有，军内也有。就是讲了没人听，听了不执行，或者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这是纪律问题，要进行整顿。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我过去讲过四句话，叫做：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被历史证明了的经验，是不应该忘记的。我这次离开北京谁也没告诉，希望你们也遵守纪律，也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约束自己。

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在了解了林彪一伙的一些可疑情况后，他沉着冷静、果断机智采取措施，改变原定巡视计划，提前于9月12日回到北京，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彻底破产。林彪一伙更加惊惶失措，乘机外逃，结果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由于毛泽东南巡“吹风”和随着“吹风”谈话精神的逐步贯彻，全党全军高级干部、全国人民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保证了全国政局的稳定，取得了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伟大胜利。

小电唱收音机成为毛泽东外巡的遗物之一，工作人员后悔的是，它缺少一种录音的功能，所以未能将毛泽东领唱歌曲的声音留下，这将是历史的遗憾。

视察三峡用过的望远镜

1958年毛泽东为治理三峡、规划长江重大决策进行实地考察，多次使用了这部望远镜——一部长12.5公分、宽10公分、高12.5公分的双筒黑色铁壳望远镜。由于以前就常常常用，望远镜的金属边有多处油漆脱落，皮套带多处磨损。

这年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成都会议——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根据周恩来的报告正式通过一个重要文件《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毛泽东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高兴他说道：“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南，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说完，他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会后，毛泽东从重庆顺长江而下，对三峡进行实地考察。

3月29日凌晨一点多钟，毛泽东健步登上江峡轮，他被安排坐在三楼船尾。和他坐在一起的有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等。落坐以后他们便和船上工作人员杨大福、石若仪聊了起来。

“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毛泽东转向女三副石若仪问。

“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石若仪倒也落落大方。

“学习驾驶困难吗？”毛泽东很关心。

“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

“是啊！”毛泽东赞同道：“当你对一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石若仪直点头，但恐怕她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段话岂止是对她一个人讲的？柯庆施、李井泉等肯定更能理解毛泽东讲这段话的含义，因为成都会议的精神肯定还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紧张地思考着，乘船就是为看三峡而来的。

江峡轮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航行进入了三峡。吃过早饭，毛泽东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随行人员帮他拿着望远镜紧跟。他接过望远镜，兴致勃勃观察起来：两岸悬崖壁立，奇峰连绵，山重水复，峰回路转，与长江一水相通。舟行江中，巫山十二峰历历在目，新滩、泄滩等处，更是江水湍急，漩涡相连。

毛泽东看着看着，往事不由涌上心头。那是1953年2月，他从武汉登上“长江舰”，向东顺流而下。他时而拿出这个望远镜遥望滚滚长江，时而又凝视当时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带去的三千里汉江地图。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水给北方呢？”毛泽东像是对林一山说，又像自言自语。

后来，长江建设者们很快找到了理想的引水通道，这就是兴建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壅高汉江水位，然后引水穿越汉淮分水岭，不用搞太大的工程，就可以自流引水到淮河、黄河和海河。

林一山又展开一幅《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略图》，汇报说：长江防洪的指导思想，是在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兴修一批梯级水库，拦蓄洪水。

毛泽东听说，放下望远镜，凝视万里长江图。突然，他左手叉腰，右手在图上画了一个大圆圈说：“太好了，太好了！修许多水库，都加在一起，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

林一山摇摇头，说：“抵不上。”

毛泽东指着三峡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是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很兴奋。毛泽东笑了：“好，我这回总算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了。”

毛泽东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这时，他从望远镜中看到江中心突兀一块大石头，直冲而来。说时迟，那时快，舵手稳操舵把，灵巧避过，大石头擦着船边掠去。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毛泽东回过头去又看那大石头，走远了，他又拿起望远镜看，好像要立刻看出个答案来。

船长把一切看在眼里。“要炸。解放后已经炸了不少了，今后还应炸。”他回答着毛泽东。

“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毛泽东对船长问道。

毛泽东遇事最爱听群众意见，善于集思广益，这时他很想听听船员们对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看法。

“我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方便了。”船长爽快地回答。

船要经过计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了。船长受命减低航速。毛泽东来到甲板上，拿起望远镜仔细将要修建的坝址看了又看，半天沉默不语，直到船驶出好远，他还在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观察着，好像真要找出自己最后下决心的根据。因为他在审阅《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时，在其中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1953年2月，毛泽东在“长沙号”舰上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汇报，提出兴建三峡大坝的远景设想。

江峡轮从巫峡经瞿塘峡到西陵峡，毛泽东干脆就把望远镜放在近处，就是在吴冷西、田家英他们和他谈论别的话题期间，他也忍不住拿起观赏江岸美景。

又经过两昼夜，江峡轮到达武汉。毛泽东不得不暂时集中精力召开4月1日开幕的汉口会议。但是，三峡的问题，始终纠缠在他的脑海中。

这年夏天，毛泽东又来到武汉，住东湖宾馆。他叫来林一山，专门汇报长江的泥沙问题，也就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林一山在汇报中说到：“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大约5亿吨，合4亿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200年才能淤死。”

毛泽东沉思以后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两百年太少了！

以后，毛泽东又乘船从黄石到安庆、从汉口到九江对长江进行考察，并亲自制定了修建三峡工程要做到“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在确定这个方针过程中，他摸过多少次望远镜，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读书求知篇

少年时代用过的小油灯

1906年秋至1909年夏，少年毛泽东停学在家。除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外，还坚持自学，经常在这盏小油灯下读书。

在此之前，毛泽东读了5年私塾，但是他的红漆书箱里，并没有多少书，除了有几本《诗经》、《论语》、《孟子》和别的经书外，仅有几本古典小说。这些书毛泽东都看过好几遍了，有的被他读得磨掉了封面，有的卷起了角。一天晚上，他随手拿起一本书看，却是《论语》上册，这是他几年前读过的，他一边看一边记，一边看一边想，突然，有几行大字，映入了他的眼帘：“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乎？’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看到这里，毛泽东开始怀疑起来了，他想，孔夫子据老师说是一位大圣人，为何说出如此的蠢话来？贫苦的人终年辛劳，吃不饱，穿不暖，他们怎么能够快乐呢？财主老爷看不起穷人，怎么会对他们讲礼遇呢？即算是有时假意奉迎，也是笑里藏刀。这位圣人，只怕是有点糊涂。他没有心思继续看下去，就把它扔进了书箱，另外再摸出别的书来看。

在挑灯夜读中，毛泽东喜欢看时人认为是不正经的“杂书”。白天下地劳动了一天，晚上还要帮父亲记账、算数，实在有点累。可是，像《西游记》、《三国演义》、《水符传》一类的中国旧小说，只要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常常看得津津有味，毫无睡意。父亲和母亲带着弟弟泽覃，住在隔壁房间，经常看见毛泽东的窗口还有灯光，就催促他早点休息。母亲担心他长期熬夜，会把身体搞垮，也催他快点睡觉。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继续读他的书。每天夜里，他都要坐在小油灯下读书至深夜。好多次都是父母亲催促过两三遍他才上床。

为了避免父母的催促，他经常佯装已经睡觉，却用自己床上的那条老蓝布印花被单，遮住窗户，不让灯光照射出去。他父亲是个十分精明的人，一点点响声都瞒不过他，虽然看不见灯光，却听见了儿子翻书的沙沙声。一次，他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走到外边，掀开那块遮挡的被单，看见毛泽东还在读书，认为他浪费了灯油，一下火冒三丈，几步冲进儿子的卧室，一把夺过毛泽东手上的书，气冲冲地对毛泽东说：“哪里这样不听话，一夜熬掉我一盏桐油，一个月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一份家当可能就败在你手里！”父亲边说边看书的封面，原来是一本《西游记》。这本书的内容他以前听人家讲过，说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保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历来不信佛，凡是抽签卜卦、念经拜佛的事，他一概不喜欢。现在，看见儿子在看唐僧取经的故事，他越发生气了。浪费了灯油且不说，看的又是这种“邪书”，他实在无法容忍。正当父亲要大发脾气的时候，毛泽东母亲文氏也走过来了，她站在丈夫和儿子中间，设法平息这场风波。她一边劝说孩子莫看书了，一边连推带劝把丈夫拉了出去。直到儿子卧室里熄灭了灯，确实已经睡觉了，他们才放心下来。

在这场小小的冲突之后，父亲也略改变了态度：只要儿子白天努力劳动，傍晚做完交待的事后，也就不再过分管儿子看书了。在这停学的几年中，毛泽东不读“四书”“五经”了，中国的古典小说，成了他主要的精神食粮。

三更灯火五更鸡，她一直是这样坚持着，每天日耕夜读，一点也不觉得疲倦。韶山冲的书看完了，他就到外地去借。这时他看过的书有：《说岳全传》、《水浒全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岳飞传》等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这些书籍，精华与糟粕并存，他有时候非常喜欢，有时候又令他气愤。他很喜欢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些不畏强暴的英雄好汉，十分痛恨高俅、童贯、蔡京这些欺压良民的奸臣贼子。他认为牛皋比岳飞有气魄，岳飞却比不上他。岳飞明知秦桧要害他，却偏要跑到风波亭去送死；牛皋的胆子大得多，他敢于拉起人马，上太行山落草……。

在贪读这些传奇小说和神话故事的过程中，少年毛泽东逐渐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书中叙述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什么种田的农民当不了书中的主人公呢？他带着这个简单而又难于解释的问题，询问了韶山村里的许多人，有同学，有老师，有长者，也有年轻人，大家都回答不出来，觉得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提过的怪问题。为此，他纳闷了两年。最后，还是他自己找出了答案，解决了这个疑问。他看到农民终年劳作，生活大部很苦，读不起书，不识字，就是识几个简单的字也不会著书立说，因此，写书的人一定不是农民。写书的人不种田，不了解农民，看不起他们，当然不会写、也写不出关于农民的书来。毛泽东深深地热爱着和他朝夕相处的农民，感到书中不写农民是不公平的，他暗暗发誓自己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写穷苦人的书。

毛泽东少年时代养成的夜读习惯，建国以后依然如故。毛泽东不知疲倦的读书精神，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盏不灭的灯光。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说：“每当毛主席日以继夜地工作之后，走下工作台，说要去睡觉休息了，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好像卸下了一天的重负。毛泽东在韶山读过的绘图评注《水浒传》一页。担，放松下来，脸上都堆起了笑容，像传递好消息一样，互相转告着：‘主席要休息啦！’但是，时间一长我们知道了，毛主席从办公室走进起居室，并不意味着他就要睡眠休息了，而常常是回到寝室之后，灯光仍然久久不息，这就告诉我们，他又转入了另外一种工作形式——正在看书学习哩！”“毛主席起居室的灯光成了我们观察他读书和睡眠的一个讯号。所以每当毛主席进入卧室后，值班卫士就把视线盯住在向南的窗子上，看着那从窗口射出来的灯光，如果这灯光1小时、2小时地亮着，或更长时间地亮着，说明他老人家正在顽强地学习着。”“毛主席右侧的床头上，放着盏台灯。只要他未在睡眠中，那台灯总是亮着的，伴着主席读书。在灯光下的书面被照得很醒目，主席半卧着，或叫作半坐着，或侧卧着，或用右肘支持着上身的重量，眼睛在灯罩上的阴影里，也有时下放到灯光的领域里读着，读着……”。这些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一首歌：《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歌词是：“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夜长明，伟大领袖灯前坐，铺开祖国锦绣前程。……警卫战士窗前过，心中歌唱《东方红》。”

早年读过的《诗经》、《论语》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诗经》，本名《诗经备旨》，全名为《经元堂诗经附考备旨》。石刻线装本，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霁阁邹梧冈编辑。封面有毛泽东用毛笔手书的“诗经一润芝”字样。内容为《国风》内的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和齐风。编辑方法“其全旨节旨列之于上，正文晰讲载之于下”。全书分为：“新增诗经补注附考备旨卷之一”、“诗经补注附考备旨卷之二”和“新增诗经补注附考备旨卷又二”3个部分。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论语》，现存下册，系宋朱熹所辑《论语集注》。石刻线装本。封面有毛泽东用毛笔书写的“论语下咏芝”。内容包括“论语卷之六——卷之十”。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举已经废除，学堂已经开设，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东瀛求学也成了一种潮流。但是在韶山这个偏僻闭塞的山冲，新思潮的冲击力却十分的微弱，在课堂上学生们读的仍然是“四书”“五经”。

毛泽东8岁开始读书，

就读于南岸私塾，启蒙老师邹春培。这所私塾十分正统，不容有丝毫外来的异端邪说，“四书”“五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毛泽东读书也是从“四书”“五经”开始的，受的是封建主义教育。邹春培也和当时许多塾师一样，只要求孩子们鹦鹉学舌般地朗读、背诵那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背诵时，老师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学生背着老师站立，气氛十分紧张，令初入学的儿童望而生畏。已熟读的课文往往吓得又忘记了。轮到毛泽东第一次背书时，他不按规矩肃立，仍旧纹丝不动。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与他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在一起。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邹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站起来，他毫无惧色地答道：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背。邹先生将此情形告诉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毛顺生认为毛泽东或许是背不出来。但邹先生却说他读几遍便能记住。毛顺生将信将疑，晚上课问孩子，果然背诵如流，他心中暗喜。

旧时私塾先生教《诗经》、《论语》这类古书，只照本宣科，不讲解经义，只让学生背诵，囫圇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毛泽东亦然。为了满足求知的欲望，他大量诵读时人认为是旁门邪道的杂书——中国旧小说，如《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常常看得如痴如醉。1906年秋，毛泽东寄读在堂兄毛宇居家。毛宇居门下共有9个学生，毛泽东是最淘气和最难管的一个。上课时，毛宇居认真领读，学生们抬头挺胸，跟着朗诵。毛泽东却不老实，读着读着，便偷偷地看起旧小说来。为遮人耳目，他把正书放在“杂书”之上，以蒙骗老师，但还是常被毛宇居发现。为了惩戒他，毛宇居就故意多点些经书叫他背，他都应付裕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少年毛泽东在韶山六处私塾，先后上了六年学，他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经

典——四书五经。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还追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尽管毛泽东对经书不感兴趣，但由于他能背诵如流，这使他受益匪浅，并使他对历史遗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兴趣有增无减，到老不衰，所以才有后来的对《诗经》、《论语》等经书名言警句、精采段落，可以随手拈来。在一次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谈到《诗经》时说：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是《诗》三百篇皆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名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抗统治者的。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时蜀国的韦庄，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妇吟》，是怀念君王的。

毛泽东还曾经为工作人员赴约会抄写《诗经》中的情诗。那是1956年的事，曾在毛泽东专列上当过服务员的姚淑贤，一天她跟随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在专列上，毛泽东问工作人员：“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姚淑贤脱口而出答道：“我有。”“跟什么人约会？”毛泽东认真望着姚淑贤，嘴里含着笑，带着亲切带着关心带着一点逗趣地追问。姚淑贤脸一热，感到十分腼腆，放低声音答道：“跟男朋友。”“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毛泽东有些着急，“你通知他了吗？”“没有。”小姚回答。“你这个小姚哪，要是不见不散可怎么办？”“你就连个电话也没给他打？”毛泽东继续关切地问道。“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对外人说了，”“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毛泽东听了姚的解说，摇了摇头，嘴里嘀咕着：“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晚上，姚淑贤将一把削好的铅笔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望着姚，忽然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只见毛泽东挑出一支铅笔，又铺开一张16开的白纸，一边写，一边自得其乐地吟诵，原来那是一首古诗：

“静女其妹，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给，拿回去给他看。”毛泽东将写好的诗递给姚。姚淑贤接过诗，反复读了两遍，转而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你为什么要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了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姚淑贤将毛泽东写的那张纸小心翼翼地打了个对折，揣到兜里，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把它藏到一本书中。从北戴河返回北京后，她便悄悄地带回家，交给男朋友看，并把失约的经过告诉了他。直到现在，毛泽东录写的诗一直珍藏在他们身边。

总之，少年私塾读孔夫子的书，于毛泽东一生治学行事，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给表兄文咏昌的还书便条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室里，我们能看到一张 1915 年 2 月 24 日毛泽东给表兄文咏昌的还书便条，这张便条是用毛笔写的，全文如下：

“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

这张便条现已成为珍贵的遗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少年毛泽东读书的缩影。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几次提到《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给予他的影响。他说：“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

晚上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

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入中国。《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盛世危言》是广东人郑观应前后花 30 年心血写成的，1893 年出版，辗转翻刻达十余万部。书的中心思想是：“富强救国”。郑观应在书中倾吐了许多促人警醒的“危言”，列举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抨击了清政府的顽固保守、政治腐败和种种弊害，要求改革图强。他呼吁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艺制造，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关于政教社会等学说，从政治上进行改良。郑观应在自序中说：“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侏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因此，他主张中国开议院，制宪法，仿行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并提出办报纸，开学堂，提高民族文化，主张既要讲武备，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兵战”，更应开矿山，修铁路，扶植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西方国家展开“商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振兴中华，抵抗外侮。

这是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早期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经过 1898 年的戊戌变法和 1900 年的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已宣告此路不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主张已经成为思想主流。但是对于僻处山村的毛泽东来说，却是全新的，闻所未闻的。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以至读了多遍，他被书中所描述的兴旺前景和作者的爱国热忱所振奋。他觉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大众，贫弱多难的国家，只有按这本书里提的主张才能拯救。认

为这本书比四书五经有用得多。从此毛泽东便开始注意阅读那些介绍新学，呼吁救亡图存的时务文章。

《新民丛报》于1902年创刊于日本横滨，由梁启超主编，初期连载过梁的《新民说》。其宗旨为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自然科学和学术文化知识，宣传维新，抨击清廷顽固派，对当时思想界产生过巨大影响。1903年后，因坚持立宪保皇，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受到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批判。1907年停刊。虽然毛泽东读时已是多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无论是内容还是从文体上看。对他来说仍然令其耳目一新。

小学堂读过的《新民丛报》目录（局部）丛报》第4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6节“论国家思想”。文中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梁启超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螫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在梁启超这段文字旁边，毛泽东批了一段话，发挥了梁启超的思想。批语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尽管毛泽东的思想没有超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也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毛泽东对政治见解最早的文字记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关于毛泽东这段批语的时间，过去人们都认定为是1910年下半年的事，通观全书批注，似可否定，因批注中还有涉及后一两年事的内容。

通过读《新民丛报》和梁启超等人的文章，尤其是梁启超笔端凝结的那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令毛泽东十分感动，因此，这时的毛泽东十分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早年还用“子任”作过笔名。

《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是毛泽东早年读过的。那时韶山冲里的读书人很少，且读书人家的藏书也极有限，差不多都让毛泽东读完了。他想读更多的书，就翻山越岭往返几十华里，到外婆家去，向舅舅和表哥们借书。毛泽东向表兄文咏昌借书时，文咏昌极为慎重。他说：“相公借书，老虎借猪，所以要先打条子后拿书！”因而毛泽东借书有借条，还书有便条，毛泽东还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或用手小心地压平，或用屁股坐平，然后“完璧归赵”。1915年寒假，毛泽东回家过春节，来到外祖母家，向八舅父母拜年，顺便向文咏昌归还他所借的书报，于是便有了开头的还书便条。

郑观应等人的著作，大大拓宽了毛泽东的眼界，激起了他复学的愿望。

本来，毛泽东 16 岁的时候，父亲要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但是已初具爱国思想的毛泽东，继续求学的愿望更加迫切。恰好在这时，表兄文咏昌告诉他，湘乡有一所新式学堂，注重西方新学，教学方法也是很“维新”的。胸怀救国救民志向的毛泽东，被这个新式学堂吸引住了，他决心违抗父命，去那里求学。

为了说服固执的父亲，毛泽东在母亲的支持下，请来了八舅文玉钦、堂叔毛麓钟、表兄王季范等人到家相劝，为他说情。大家众口一词，都说毛泽东聪明好学，若是进了洋学堂，日后定有大出息，可以比做米生意赚更多的钱。父亲毛顺生经过劝说，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便改变了主意，赞同了大家的意见。毛泽东的愿望实现了。

1910 年秋天，毛泽东离开了风气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就读东山小学是毛泽东早年的一大转折，不仅使他长了知识，还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使其在与闭塞的韶山冲的对比中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正是在这种向往的驱使下，他投身到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洪流中，可见，《盛世危言》等在毛泽东的人生历史上是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难怪几十年后，毛泽东仍对其念念不忘。

批注最多的《伦理学原理》

毛泽东读书，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看、思、写相结合，青年时代也是这样。他牢记古人“学而下恩则罔，恩而不学则殆”的名言，把学与思紧密结合起来。他学习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看书”的方法，喜欢在自己读过的书上批注，或打上各种各样的记号，并坚持写心得、日记。他批阅过的书籍和读书笔记、日记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篮，存放于韶山家中。可惜在1927年5月的马日事变后，

族人为了避免落入反动派之手，将其焚毁。幸存的他批阅过的《伦理学原理》，诚乃凤毛麟角，但仍不失为青年毛泽东读书艺术之花盛开时留下的最美的影象。

《伦理学原理》一书，是毛泽东1917年下学期至1918年上学期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过的“修身课”教材。“修身课”为杨昌济先生教授。该书为德国康德主义者泡尔生所著，先由日本的蟹江义译成日文，1908年，蔡元培又把它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属“心物二元论”著作，全书约10万字，毛泽东读后，在书中写了15,000余字的批注，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笔黑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读书符号。批注写在书的天头地头或字行之间空白处，均系毛笔小楷，最小的字像7号铅字，甚至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批注最多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共5900多字。批注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注者抒发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见解；少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段的提要。凡他认为原著中比较精辟的地方，都浓圈密点，批上“切论”、“此语甚精”、“此段可谓发挥尽致”、“精切详明”、“至真之理、至激之言”、“吾前所论与此立意全然相同”、“吾极立此说”、“此节议论透彻之至”、“此章说得最好”等语。对那些他认为不确切或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曾写下二万多字的批语，这是他批注的部分章节。错误的地方，他就批上“殊未必然”、“定然无益”、“此论大奇”。“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处吾又有不然之意见”等等。从批注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独立思考、勤奋刻苦的读书学习精神。

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批注的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存在与思维、实践与认识、“人为”与“天然”的问题。如：“学，皆起于实践”；“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等等。

二、“差别”、“比较”、对立统一和矛盾斗争。如：“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佛言混差别，不知其于道德善恶问题如何处之？”“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观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等等。

三、“成毁”、“生灭”、“因果”、“变革”。如，“凡自然界无无故而成者，无无故而毁者。人类无无故而生者，无无故而死者，其死既有故，

则其故即所以解释之点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则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等等。

四、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是与非、善与恶。如：“因应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也”；“先有某事实之观念，后乃发生向之之欲望”；“欲求某种效果，必行含有某种效果之行为”；“某事某物之善与不善，乃人所随意呼加，视其与人类生活之关系如何而定也，并非指其本体之实”。等等。

五、理想、信仰、道德、人生。如：“至善之理想之决定于人人，由于人类有同一意向”；“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等等。

六、“个人”、“自我”的地位和作用。如：“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等等。

毛泽东极爱读这本书。当时多数同学对哲学不感兴趣，听课不甚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课，勤作笔记，后来他根据这书中的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授课老师杨先生大加赞赏，打了100分。

毛泽东在这本书上的批注，尽管有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苛求一个师范学生。难能可贵的是他读书时的那一种认真严肃的态度。前人讲读书有四到，即所谓“眼到、耳到、手到、心到”，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当学生的时候手到、心到的功夫之深。

毛泽东批注的《伦理学原理》，既是研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珍贵资料，又是研究毛泽东治学经验的重要文献，也是古今中外读书史上的一件奇闻。

毛泽东批注过的这本书，后来被同学杨韶华借走。1950年9月15日，杨乘周世钊上北京之机，托周奉还于毛泽东。杨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藉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周世钊启程之前，将此书交给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锐一阅。李锐对毛泽东早年读书情况和生平活动很关心，他得到书后，对毛泽东读书的精神十分钦佩，但此时离周世钊赴京仅有3天时间了，于是托人将原书凡有批注的部分全部拍照，并放大成原书模样。由于李锐得到了这份极为珍贵的资料，促成了他写出《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李锐的这部书是50年代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最有份量、最有影响的著作。

毛泽东从周世钊手中收到这本书后，很高兴地又翻了翻书中的批注，微笑着对周先生说：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毛泽东还说，“这本书上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鲜，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兴趣。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

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养成的手中无笔不读书的良好习惯，一直到后来几十年他都坚持不废，并且使他受益颇多。“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少时誊抄的（离骚）与《九歌》

《离骚》为战国时期楚

人屈原所作，系《楚辞》中的一篇。在前半篇中，作者反复倾诉对于楚国命运的关怀，表达了他要求革新政治、与腐朽贵族集团斗争的强烈意志。后半篇又通过神游天上、追求理想的现实和失败后欲以身殉国的陈述，反映出他热爱楚国的思想感情。作品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象，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有深远影响。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热爱古典文学，尤其爱好中国古典诗词。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就阅读过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等作品。现在唯一保存下来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一本读书笔记，共 94 页，前边的 22 页就是工工整整抄录的屈原的名

篇《离骚》和《九歌》全文，在离骚正文的上面还批有各节提要。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还多次谈到《离骚》，主张对《离骚》赋予新的评价，并多次与罗章龙相约，去屈原的故居玉笥山等地访问。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以屈原作品为主的《楚辞》十分喜爱。1957 年 12 月，毛泽东请人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的作品，尽量收集给他。逢先知专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收集了古今各种有价值的《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 50 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有时读起来还入了迷。

1958 年 1 月 18 日凌晨，在广西南宁，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台湾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莫非国民党察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随行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大为紧张。那时，南宁没有军用机场和战斗机，他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空军部队紧急起飞，拦截国民党飞机。同时，对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卫士李银桥等人冲进毛泽东卧室，请他去防空洞。毛泽东当时正在读《楚辞》，他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

“主席，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青年时代手抄的《九歌》。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毛泽东指着李银桥的鼻子：“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李银桥说：“不行，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好……”

“去！”毛泽东不耐烦了。“把蜡烛点着！国民党的炸弹扔我脚底下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他的《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

以后，在 1959 年、1961 年，毛泽东又二次要《楚辞》，1961 年 6 月 16 日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朱熹的《楚辞集注》，在外出视察、开会期间，《楚辞集注》是毛泽东的必带书之一。甚至有一次，毛泽东服了安眠药后睡着了，《楚辞》仍然抓在手中，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在《楚辞》中，毛泽东最钟爱屈原的《离骚》。在 1958 年 1 月 12 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在明代陈第撰的《屈宋古音义》书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划。毛泽东读屈原的《离骚》，可谓“三温四复”，常读常新。

毛泽东读古书，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对《楚辞》及屈原的作品，总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还有新见解。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周世钊等人时，有人谈起屈原与屈瑕（楚武王封子瑕于屈，即为屈瑕，其后人便以“屈”为姓，屈原是其后裔）的关系，毛泽东说：“《楚辞》虽是古董，但却是历史，有读的价值。”

1964年8月，在北戴河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曾说过：“到现在，《天问》究竟讲什么，没有解释清楚。《天问》讲什么，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

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作的笔记中，也曾谈到过屈，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丢了官，‘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的好的文学作品。”

对于《离骚》，有人曾解释为离愁，也有人解释为遭忧的，近人认为是牢骚，毛泽东认为可能是牢骚，但也不一定。周谷城后来回忆与毛泽东谈《离骚》时的情景说：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到了上海，我在锦江饭店楼下晋见毛主席的当晚，应记者之约写了一首《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的词，第二天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毛主席见了这首诗后，便打电话召我。5月3日下午3时，我到毛主席的住处，他正坐在客厅里看报。我一人走进客厅，毛主席起来的第一句话即说：

“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我说：“只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

毛主席说：“总怕不止一首。”意思就是说我也像个常常写东西的人。我随即转述我对记者的那句话，“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毛主席笑着说：“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

我又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毛主席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我说：“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毛主席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谈至此，我向毛主席转述别人的意见，专讲字义：“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

毛主席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我于是进一步发表自己的意见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罗唆。牢罗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罗唆，可能就是发牢骚。”我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根

据，但主席仍然微笑着，没有说我荒唐。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楚辞》和屈原的作品，还向别人介绍或推荐其读，甚至还将其作为礼品送人，其中包括外国人。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尼总理尼赫鲁时，引用了屈原《九歌·大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话来表达自己对尼赫鲁的相识之情，

他还向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屈原。毛泽东说，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5月5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1958年9月，毛泽东去安徽，在合肥毛泽东问张治中读过《楚辞》没有，张治中回答说没有读过，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楚辞》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可以看看。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送给他一部《楚辞集注》，田中

问：“是送给我们大家的，还是送给我的？”毛泽东说：“就是送给你的。”田中很高兴。回国后田中把《楚辞集注》交由读卖新闻社复制，1973年9月16日，读卖新闻社社长台光雄通过我国外交部送给毛泽东《楚辞集注》复制本一部。

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家书》

毛泽东早年曾认真研读过晚清理学家、政治家曾国藩的著作，其中曾国藩家书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毛泽东当年阅读过的曾氏家书系清朝光绪己卯传忠书局刊印的木刻本《曾文正公家书》。至今仍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所收藏。在该书每卷的封面右下方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芝珍藏”正楷字样（咏芝为毛泽东早年使用过的名字之一）。书内多处有红笔圈

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字涤生，道光进士。在上个世纪五、六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因而声名赫赫，死后得“文正公”谥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民间流传的徽号则为“曾剃头”，反清志士叫他“卖国贼”。

曾国藩招募、训练和统帅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他在这一方面的名声掩盖了他在思想上、学术上的名声。其实，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是个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

《曾文正公家书》，是曾国藩在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前长达 30 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中，撰写的一千多封致祖父母、父母、叔父母、诸弟、妻子及儿辈的家信。它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的指陈，大到进德修业、经邦纬国之道的阐发，可谓事无巨细，一皆覆载。按照主题可划分为伦理、治学、修身、养身、朝政、宦务、军事、人事等方面。此后辗转流传，颇具影响。

过去研究早年毛泽东，由于众多的原因，大多回避研究与曾国藩的关系，有时即便接触，也只是浮光掠影，一带而过。其实，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一时对曾国藩可以说倾服备至。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毛泽东 1913 年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特别是杨昌济，他无论治学还是立身行事，都是以曾国藩作自己的表率。毛泽东是杨昌济极为着重的学生，因此杨也常常以曾国藩为榜样来勉励他。杨昌济在 1915 年 4 月 5 日的日记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杨昌济等人的影响下，当时毛泽东对曾国藩确实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 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毛泽东读曾国藩家书，估计是在 1913 年至 1915 年之间，因为在此期间于湖南一师主讲哲学、伦理学的杨昌济先生对曾国藩的推崇深深地影响了他。这在当时毛泽东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记录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等书中的材料，如《讲堂录》中提到“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悔之谓也，进步之谓也”。“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

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以及曾氏著名的修身“八本”等等。

曾国藩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弟弟曾国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毛泽东读了这些话后，以为是金玉之言，他用曾国藩的这个观点来检查自己，表达其今后治学与专心致志，而不再兼营并骛的愿望。他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中说道，“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溪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非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曾氏治学首推其“择书”说。在曾国藩家书中曾氏针对中国典籍浩如烟海的现实，主张以阅读本根之书为主，然后旁及其他，从而取得既约且博的效果。毛泽东颇受其启发，并进而对曾氏的《经史百家杂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毛泽东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

作比较，认为《杂钞》比《类纂》高明，这是极有见地的。他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在这一基础上，他把曾氏的这一读书方法称之为“中心统辖法”或“演绎法”。曾氏治学特别讲究“恒”字，指出“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恒为本”，这一治学方法也为青年毛泽东所接受。在1917年毛泽东为萧子升《一切入一》的自学笔记所写的序言中就比较集中地体现出来：“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必也有恒乎！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里，及门而复，虽矻矻而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尤其是毛泽东在该文中所说的：“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而成学”这句话，更是曾氏家书中“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然有益”的翻版。

伦理思想在曾国藩家书中有比较集中的反映。从总体上看，其伦理思想是反动的，守旧的。但是，由于曾国藩善于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其中又包含着某些积极的因素和成份。他重视人生理想，讲求精神境界和自我完善以及道德修养的一些方法与手段，如磨励意志、勤俭自持、力戒虚骄等，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一定影响。青年毛泽东颇为赞赏曾氏反省内求，日新又

新的自我修养方法。《讲堂录》即有“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死之谓也，进步之谓也”的记载。“刚”是曾国藩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主必须有倔强之气。”因此，十分重视磨励自己的意志，这与青年毛泽东的个性训练颇有相似之处，《讲堂录》中“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就明显地带有受曾氏影响的痕迹。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家书中那些广博渊厚的知识，通达圆润的文笔以及至多的至理箴言是如何吸引和启迪过毛泽东的。以至曾为新民学会会员的曾以鲁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所写的家书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曾氏家书的翻版，话虽有些刺耳，但确有几分道理存在。如在文风上，均以平实晓畅为主要特征。在内容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劝诫方面尤为显著。

由于年轻的毛泽东对《曾文正公家书》等印象深刻，因此后来在延安时，他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就是到了晚年，在 1969 年 1 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反复读过的《“左派”幼稚病》

作为无产阶级领袖的毛

泽东，极端重视马列著作的学习。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的读，认真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的读。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列宁的著作。对列宁的著作他读得最多，下功最大，解放战争时期重读过的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毛泽东喜欢读列宁的著作，一方面是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另一方面是因为列宁的作品，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别人，1948年4月21日毛泽东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封面上的批语。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在列宁的著作中，《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又是读得最多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在1920年4月写成的。5月12日又增补了一部分。同年6月首先用俄文出版，7月又以德、法、英等国文字相继出版。全书共十节，另加增补五节。列宁在书中总结了俄国1905年、1917年2月、10月等三次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初期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基本原则，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争取群众的经验。由于这本书内容特别丰富，颇富战斗性，因而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是在中央苏区读到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他用的这两本书还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两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划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这说明，到那时为止，这两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但这两本书早已丢失，这是非常可惜的。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的以及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彭德怀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借不已。”从彭德怀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左派”幼稚病》等书已有了深刻的理解。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过的刘英曾亲眼目睹毛泽东读《“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时的感人情景。她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也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画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的书仍

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一次，毛泽东对刘英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泽东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由此可见，毛泽东读马列书的精神实在可敬。后来，毛泽东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1964年3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在延安整风期间，为了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毛泽东在给党内同志的信中又提出全党同志都应当认真学习《“左派”幼稚病》等4本书，毛泽东推荐这些书，不仅是要求大家从中学习政治理论，而是着重要求大家通过这些书的学习来学习马列的思想方法。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上，毛泽东又特别提出要全党同志读《“左派”幼稚病》等5本马列著作。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当时革命斗争需要，毛泽东重新阅读了《“左派”幼稚病》这本书。1948年4月，正当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乘胜前进之时，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什塞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三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1948年4月21日。”中宣部在6月1日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左派”幼稚病》等12本马列主义著作，胡乔木写了12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4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给七届二中全会代表。由毛泽东起名的《干部必读》，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出要学习《“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主义著作的意见，以期指导工作，适应新形势，开拓新局面，完成新任务。

毛泽东重视阅读马列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但他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被马克思主义一些个别论断所束缚。他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大胆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他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延安读过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美国记者斯诺在他的

《西行漫记》中说过：“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

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事实确实如此，在哲学这块知识领域中，毛泽东是化大力气系统研究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他读哲学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以及中闰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和当代国外哲学家的著作。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精读过的一本哲学教科书。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批是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6人合写的著作，他们都是批判德波林的积极分子，时称“少壮派哲学家”。1932年9月，中国学者李达及其学生雷仲坚通过日译本转译成中文，由上海笔耕堂出版。李达在“译者例言”中称，这本书是苏联“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苏联哲学教科书，在中国颇有影响，受到中国理论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读这本书的，他读的是1935年6月的第三版和1936年12月的第四版。1936年8月14日他在致易礼容的信中说，“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信中所指译著，即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这本书十分用功，这从他所作的大量的批注中可以看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近600页，27万字，毛泽东对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批注了四通。第一、二遍是用黑铅笔批注的，第三遍是用红蓝铅笔批注的，第四遍是用毛笔批注的。第一次铅笔批划，每页都有，最后一次用毛笔批划文字较多。在《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版）中毛泽东的批语有12,000字左右，其中最长的一条批语，有1,200字左右。在这本书的末页背面上端用毛笔写了两行字。第一行是“1936， 11”；第二行是“1937.4.4”。说明他经过多次研读。据郭化若回忆：西安事变后，他在毛泽东办公室内，曾看到桌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翻开一看，开头和其它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和旁批，……这些旁批后来发展成为毛泽东的光辉著作《实践论》。

毛泽东的批注，可分为文字批语和读书符号两大类。批语中有对原文内容的复述、提要归纳、概括和发挥。批语中较多的是他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写下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他在批注中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当时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需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间接的发生影响。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是内的原因。他结合“矛盾的主导方面”这一概念的学习，分析中国抗战形势写下了如下批注：“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又如他写了“中国的主观主义者”、“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延安的形式主义者”等批注批评党内“左”

右倾机会主义者，说他们一般是脱离个别（脱离实际）的，毛泽东在批读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上，也留下许多批注笔迹。从批注的内容分析，如其中提到“三三制”、“三月参政会”等看，读第

四版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当在 1941 年 3 月以后。

他对该书第四版，似是重点批读。全书批注约 1200 字，在第一章“唯物论与唯心论”，第四章“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和第五章“可能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内，毛泽东用笔不多。大部分写在第六章即最后一章“唯物辩证与形式论理学”内，约有 900 字，占全书批注的三分之二。

在这些批注中所包含的观点和思想，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哲学论著中没有或少见的。如在总结哲学史上的众多派别、思想时，他认为可以区分唯心辩证、唯物辩证、唯心形式、唯物形式四种。四者之中，只有唯物辩证是正确的。关于认识的两个过程，毛泽东提出：“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这种运用矛盾问题精髓的原理来分析由认识和实践这对矛盾运动变化产生的两个认识过程的做法，也是十分独特的，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毛泽东还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看法。读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五章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内容时，他写了如下批注：“唯物辩证法怎样的发展了呢？并且怎样才能发展呢？在那从生活割离了的静悄悄的哲学研究的书斋中发展的呢？抑在革命的斗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之中发展的呢？”“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离开了革命斗争实践，就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可言。

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批注，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中国主观主义”的批评。他指出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在读到第六章论述指导科学认识发展的、归根到底不是理论而是实践的内容时，毛泽东又联系王明的路线错误作分析。“相反，中国主观主义者说，指导方面不是实践，而是理论”，即是说，中国的主观主义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把实践而是把理论当作认识的根源。他还说：“中国主观主义者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短短数语，然而对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1941 年 11 月 1 日，毛泽东起草了发给各地高级学习组的“理论研究材料目录”中，把该书第六章列为重点学习材料。

毛泽东通过发愤读书，特别是有关哲学方面的书籍，理论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这样杰出的哲学著作，成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

毛泽东最熟悉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具有渊博的知识，这是由于他对历史科学终生不辍的刻苦攻读和钻研，对历史知识的不断探求。他数十年如一日，无论是在战争环境下，还是和平建设时期，

克服重重困难，阅读了卷帙浩繁的史书，特别是二十四史。毛泽东曾经说过，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二十四史是从西汉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开始，经过二千多年来由历朝著名历史学家们精心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合集，它由《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组成。它记载了四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史实。全书共3，200百多卷，800余册，约4，000万字，是一部史料极为丰富的历史巨著。

毛泽东嗜爱二十四史，早在青年学生时代，毛泽东就读过二十四史中的不少名篇。如《史记》中的《伯夷列传》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陆续添置了一些古书，1952年买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这部书他都通读了一遍，重点篇章还研读过二遍、三遍、四遍。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作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或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有不少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不少册的封面上，有他用不同颜色铅笔划着多次阅读过的圈记。有些册的封面上，写满了他关注的历史人物目录。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月再阅”。“1975.9月再阅”。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1975·8”。这些字迹笔划颤抖，却很清晰，是他逝世前一年亲笔写下的读二十四史这部书的真实记录。由于翻阅太多，有些书页翻烂了，装订线也断了。

毛泽东研究历史，喜欢在广泛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多思多想，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毛泽东对《汉书》、《后汉书》及其颜师古、李贤等人的汉书注本作过认真比较与研究，他在《后汉书》91卷至94卷第21册的封面上写道：“《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他还在《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这样批注道：“李贤好，刘敞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李贤的《后汉书注》，刘敞的《西汉·东汉刊误》以及他在《资治通鉴》中专修汉史的著述，究竟好在哪里？他们两人一为唐朝太子，一为北宋史家，相距甚远，但他们编书注史的共同特点是千方百计搜集史料，对原著进行大量补充、订正，并无一般学者偏重考订文字。所以毛泽东称他们注史好就好在“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对两部《汉书》的某些篇章，毛泽东也作过评论：“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毛泽东认为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对新、旧《唐书》毛泽东也下了功夫，他评论：《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但他并不全盘否定《新唐书》，认为该书中《严郢传》“此

篇写得不错”；《吴通玄传》“这篇写得好”。毛泽东以史学家的禀赋。政治家的眼光研读《南史》与《北史》后，充分肯定：“《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写得更好些。”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十分注重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他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毛泽东主张对曹操的评价要实事求是，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肯定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他对历史上那些博学多才、思想宏伟、出类拔萃而命途多舛的神奇人物，推崇备至。他称道西汉的贾谊“英俊天才”。《新唐书·徐有功传》记载武则天时的执法大臣徐有功，耿直公正，不计得失，不畏权贵，在酷吏来俊臣、周兴罗织罪名，制造冤案时，挽救了不少人，毛泽东在其守法护法，为法献身的事迹处圈圈点点，并满怀激情地联想到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为正义、为真理、为信仰而壮烈牺牲的事迹。他说，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一伟夫！”他不止一次读过《史记》，对《陈涉世家》尤有深情，用红黑两色铅笔，在书的天头地脚，作了不少批划和批注。毛泽东认为陈胜、吴广有二误。陈胜还是雇农时，对伙伴们说“苟富贵，勿相忘”。及至起义胜利，立国称王，他未忘前言，接待旧时相识，使之出入朝廷。但当有人挑动他：“你的老相识太愚蠢无知了，尽谈些当年你当雇农时穷困潦倒的丑事，这会影响你的威望呀。”陈胜听后，竟不念阶级深情，杀了旧相识。此后，他的老朋友们没有人再敢接近了。毛泽东在这段文字天头上，批写了“一误”两个大字。此文的另一段记载陈胜任朱彦、胡武为人事和监察官员。这两人大权在握后，专擅朝政，胡作非为。陈胜对这类专横跋扈、残害忠良的酷吏，不仅不撤职查办，反而给其加官晋级，因此，许多将领都不愿再追随他了。司马迁痛苦地提出：“此其所以败也。”毛泽东又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批注“二误”两个大字。毛泽东用“二误”简明扼要地总结了秦末农民起义失败的二个致命错误。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陈胜、吴广起义亡秦的历史功绩仍然是肯定的。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善于同实际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斗争服务，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50年代末，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出水后休息时，两人坐在遮阳伞下谈古论今。毛泽东手里拿着《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说：“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边疆屯田，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分之一、二。”毛泽东令人信服他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后来他还不止一次提到这个历史事例。

韦睿是南朝梁武时征战四方，战绩辉煌的名将，深受梁武帝器重。《南史》作者李延寿以翔实的史料，简洁的文笔，再现了韦睿的形象，毛泽东透过千年历史尘沙，发掘出韦睿身上的许多闪光点。他赏识韦睿的军事才能；肯定他豁达大度，团结同仁的作风；赞扬他洁廉克己，爱兵如子的德性；对他深入实际，躬自调查，也给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在书中批注道：“我党

干部应学韦睿的作风。”

“梁上君子”的典故，为许多人所熟悉，但是这个历史掌故出自何处，了解它的人并不多。据《后汉书·陈寔传》载：东汉灵帝时有个叫陈寔的人，自幼家贫，但立志好学，为人公正、秉直。一天有小偷入其室，趴在梁上待机行事，被陈寔发现。他没有大喊捉贼，而是从床上起来，叫醒子孙，对他们训话：“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听后，从梁上跳下来，向陈寔叩头认错。陈寔教育他说：“看你不像是个作恶之人，应当改恶从善，不再行窃了。”还送给他两正绢。毛泽东读后，写了这样的批语“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南史·孔靖传》中，作者称赞孔靖的孙子琇之“有吏能”，在他任县官时，判处偷了邻居一捆稻子的十岁小孩入狱，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毛泽东读到这里，认为这种形式逻辑的推论是错误的。他联系到现实说，应该警惕的是，像琇之的这种错误推论“今犹有之！”

毛泽东每逢谈到对当前工作者教益、借鉴的篇章时，都及时加以推荐。50年代末，他建议大家读《三国志·郭嘉传》。郭嘉足智多谋，达于事理，是曹操的谋臣。曹操称雄一方，很多方面得益于郭嘉。在我国大规模经济刚刚开始，国内外面临着许多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多么希望党的干部既有高涨的革命热情，又有求实的科学态度，象郭嘉那样，说话办事多思多谋，少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啊！

1958年4月，毛泽东读过《汉书·贾谊传》和《史记·贾生列传》后，写信给自己的秘书、极有才气的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还说：“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爱读《三国》的毛泽东，非常赞赏行伍出身的东吴大将吕蒙年长仍发奋学习的精神。1958年他到安徽视察，同行的有张治中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在火车上闲谈时，毛泽东介绍说：三国的“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接着他提出要求：“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毛泽东还当面向罗瑞卿荐读《吕蒙传》。他告诫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罗瑞卿回京后，挤出时间熟读了《吕蒙传》，又差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给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

1965年，毛泽东读了《后汉书》的《黄琼传》、《李固传》后，对其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敢于斗争的事例十分赞赏，认为值得一读，特向他的战友们推荐。亲手批了“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领导人，十分重视，都在百忙中认真阅读了这两个传记。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研读和理解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许多方面实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近代的革命家中，是不多见的。

通读过 17 遍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为北宋时期司马光及其助手参考正史、野史 300 余种，呕心沥血，历时 19 年完成的编年史巨著。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 955 年），

记载了 1362 年的史事，共有 294 卷。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都十分推崇此书。宋神宗读过这部史书后，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而命名为“《资治通鉴》”。该书搜集的史料极为丰富，保存了不少佚书资料，有的既有史实又有论断，它把分散的史料用编年的方式，按时间顺序，叙述各种史事的发展变化，前因后果脉络清晰，给人以完整系统的概念，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创举。

毛泽东十分爱读这部史料丰富的历史名著，在他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也有标点平装本，出差视察随身带，休息睡觉时床头总放着这部书。他还多次向人们推荐阅读，他一生曾圈点、阅读过该书 17 遍。

1954 年冬，毛泽东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接着毛泽东把标点《资治通鉴》的任务交给了吴晗。后来，他又向吴晗提起：“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觉得《历代舆地图》这部书正符合毛泽东的要求，因此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这部书加以改造，按今制绘制印刷。毛泽东便把这件事也交给吴晗来组织。同年十月，由吴晗出面在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召集部分史学家，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杨守敬地图委员会，次年又成立校对小组，全书 1956 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1960 年 12 月，毛泽东在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过：“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他正是用这种指导思想来读《资治通鉴》的。

据毛泽东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给孟锦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那是 1975 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卧室里休息，同护士孟锦云讲《资治通鉴》，他指着桌子上放着的《资治通鉴》问道：“孟夫子，你知道这部书我读了多少遍？”不等小孟回答，毛泽东便又接着说：“17 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那个时间啰。”毛泽东问小孟关于这部书知道多少，小孟回答说只知道是历史书，听老师讲是司马光写的。毛泽东继续追问书的内容，小孟只得羞怯地摇摇头。毛泽东见其不好意思，便鼓励她下决心读一读这部书，如果不能全读，读读某些部分也好，因为这部书读上一遍，得好几年时间。但是读与不读不大一样，要趁自己年轻。毛泽东还问小孟有没有决心，小孟认为可以

试试看，但不一定有那个毅力。毛泽东像老师辅导学生一样，十分认真他说：“孟夫子，你有个词可用错了。不是毅力，而是兴趣。因为有了兴趣，读书就不会感到累了。就会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轻松，像休息一样。”小孟说自己对历史书提不起兴趣，读不进去。毛泽东并不责怪她，并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毛泽东还问小孟，自己的观点对不对。小孟连连点头，觉得主席讲的一定对。毛泽东笑了笑说：“我说的就都对呀？那我不成了圣人啦。历史上没有什么圣人，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都对的圣人不会有。我说的有一半对，我就心满意足啰。就是书上说的，也有不少屁话，不能都信。”“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是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生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能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是白读了。”小孟向毛泽东谈了自己读书的情况，她说自己读书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不同看法。毛泽东告诉小孟，不要以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现在我们现代人写书对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也不可能完全客观，代代相传的东西也可能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捧，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谁的呢？所以需要怀疑，就要去找别的史料对照。

后来，毛泽东在指导小孟读《资治通鉴》时，还回答了小孟提出的许多关于该书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小孟问为什么《资治通鉴》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毛泽东认为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玉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说到《通鉴》上记载的三岁小皇帝，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呀，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

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拉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当孟锦云提到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时，毛泽东解释说：“这两个人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孟锦云还向毛泽东提出关于武则天的问题。她说：“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皇帝，可真不简单啊！”对于武则天，毛泽东是很注意研究的。他觉得武则天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他还说：“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人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毛泽东还曾经给孟锦云讲过关于武则天的一些故事。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有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毛泽东还认为：“《通鉴》里面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与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天下永远姓

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毛泽东还说：“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名君都离不开秀才啊！”

当谈到《资治通鉴》的编写和司马迁受宫刑之后完成《史记》时，毛泽东感慨万千，他佩服司马光的决心和毅力，佩服司马迁在逆境中奋斗。他说：“司马光可说是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资治通鉴》这部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书中有不少页都用透明

胶带粘住，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

长相左右的《鲁迅全集》

中国现代作家中，毛泽

东最喜欢的是鲁迅。他对鲁迅的认识，主要是从其言行中获得的，也就是说通过阅读鲁迅的著作逐步加深的。他赏识鲁迅的书，据熟悉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徐中远介绍，读鲁迅的书是他终身的爱好。还在延安时期，1938年1月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可见在此之前，毛泽东就已经读过一些鲁迅的著作，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他无法系统地读到鲁迅的著作。这年8月，我国第一部《鲁迅全集》由上海出版，通过党的地下组织，由上海辗转到达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这套书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共20卷，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以及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

其中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纪念本为“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58号。该书封面为紫色，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黑色一样的布料包角，做工十分精细，装帧别致。

毛泽东对于这套精装别致的《鲁迅全集》十分珍爱，他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在那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不少的书籍和用品都散失了，可是这套《鲁迅全集》却一直伴随着他。建国后毛泽东住进中南海丰泽园，有一天，他在书房里阅读这套书，一边翻阅，一边饱含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路上还要和敌人交火。这些书都是分给战士们背着，他们又要行军，又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些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出访前夕，

他亲手挑了几本鲁迅的书带走。在赴莫斯科途中，他有时还读鲁迅的著作。到了莫斯科，虽然有不少外事活动，可他还是利用零星的空余时间阅读。有一天，毛泽东外事活动回到住地，离开饭的时间不到半小时。这时他还拿了一本鲁迅著作读了起来。开饭的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把饭菜放在桌上，他都顾不上吃。于是，工作人员便轻轻地走近他身边，催他吃饭，毛泽东说：“还有一点，看完就吃。”他边看边自言自语：说得好！说得好！一直把剩下的书看完才吃饭。在吃饭时，他还津津乐道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在50年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并发行了单行本。毛泽东对这套新版的《鲁迅全集》亦很珍爱，把它放在床上，许多文章他读过多次。

70年代初，毛泽东年近80，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天天躺在床上坚持读鲁迅著作和各种书籍。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本）。该书共收鲁迅手稿29篇，都是从尚未刊印的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得到这本书后，不分昼夜，一有空就翻阅。手稿选集里有的字写得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一行一行往下看，一边看还不时用笔在上面圈圈划划。

毛泽东自1971年生病以后，大部躺在床上，借助放大镜看单行本的鲁迅

著作。后来视力越来越差，看书越来越吃力。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央办公厅同意，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地将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由于是大字，原来一卷的内容现在要印成数个分册，印刷任务很大。为了让毛泽东早日读到《鲁迅全集》的大字本，便采取印好一卷送一卷的办法。毛泽东则收到一卷就看一卷。毛泽东对这种新印的大字本看得很快，常常是这一卷看完了，下一卷还没有送到。有一次，新到的一卷看完后，他还想继续看，可是书又没到，便风趣他说：我又“断炊”了。待毛泽东收到全书时，他也差不多读完了。

毛泽东读鲁迅的书认真、仔细。他对鲁迅的每本集子以及许多文章，何时写，何时编，何时出版，都十分注意。如在《且介亭杂文》的封面上，他写有：“1934年作，1935年12月编”；在《彷徨》的封面上批有：“1924—1925年，1926年8月出版”，等等。《二心集》中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原书副标题只写了“3月2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他阅读后在“3月2日”前加了“1930”四个字。对于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讹的地方，毛泽东也把它一一改正过来。

如《二心集》中的《唐朝的钉梢》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里面有张泌《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毛泽东看后，认为“消息未通何计从”的“从”字，从诗词音韵的平仄看，显然是错了，于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将“从”字改为“是”字。经查证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从”字确是“是”字之误。后来，在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时已将其改正。

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非常熟悉，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讲话

、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有很高的评价。

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讲话，深刻地论述了鲁迅三个方面的特点，并将其概括为伟大的“鲁迅精神”。毛泽东称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说他“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5年4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讲到“治病救人”的问题时，用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作譬喻，教育全党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的人，我们要团结一致。”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不许别人革命”。“要给人出路。阿Q要准许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鲁迅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

毛泽东非常赞赏鲁迅的诗，不仅细心地阅读，不少诗他都能背下来，在练习书法时，常常要书写鲁迅的诗，有时友人请他题字、题词时，他就常录鲁迅的诗相赠。对鲁迅《自嘲》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用得最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8年，在湖北武汉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力全会演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登台接见，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他写几个字。当晚，毛泽东就书写了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前面还有小引：“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说，好吧。因写如右。”落款是“毛泽东，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还多次书写鲁迅的诗句赠给来访的外国朋友。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欢鲁迅，喜欢鲁迅的著作，同时他号召大家学习鲁迅，读一点鲁迅的书。1957年3月6日至13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召集过一次新闻、出版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在谈到写文章及写杂文等问题时，毛泽东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是好。你们赞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刚，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鲁迅的著作，伴随毛泽东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夕，在他卧室的床上、桌子上、书架上许多地方都摆放着鲁迅的书，前面这张他手里拿着正在翻看的书，就是《鲁迅全集》中的一册。

最推崇的古典小说《红楼梦》

清人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是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一部巨著。写作于十八世纪中叶的乾隆时代。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着重描写贾家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揭露了地主阶级贵族集团内部的荒淫腐败，互相倾轧的内幕以及他们残酷剥削下层民众的本质，歌颂了具有反叛精神的贵族青年和某些奴婢的反抗行为，广泛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对封建礼教等地主阶级传统思想进行了批判。作品语言优美生动，善于刻画人物，塑造了许多具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全书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情节曲折，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现实主义的高峰。但其

中也反映了作者为封建制度“补天”的幻想和某些虚无主义思想。尽管如此，它仍不愧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毛泽东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是他一生中最喜爱读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他说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讲看《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它，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书，建国以前他便多次阅读过，建国以后，《红楼梦》更是他的案头必备之书。据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藏书目录，他翻阅或收藏过的版本就有十多种，如《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全图足本红楼复梦》、《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等，还有根据《红楼梦》的人物和故事加工或改写的作品。如：《红楼梦补》、《续红楼梦》、《红楼幻梦》、《红楼真梦》、《红楼圆梦》等，据毛泽东自己说，《红楼梦》他至少看过五遍。他不仅自己多次读，还常常鼓励自己的亲属，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党内高级干部认真阅读《红楼梦》，借此提高文学素养，并加深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毛泽东最早读《红楼梦》，估计是1911年到长沙以后。在韶山私塾读书时，毛泽东就极爱看中国旧小说，但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没有提到那时读过《红楼梦》。毛岸青、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说：“《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爸爸在少年时代就看过”。根据这一回忆，笔者认为，毛泽东最早读《红楼梦》极有可能是1912年在湖南图书馆半年的自学生活中。

在井冈山时期，有一次，毛泽东与贺子珍谈论起《红楼梦》。贺子珍谈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红楼梦》时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一听，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反驳贺子珍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难得的一本好书呢！《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次会中休息时，毛泽东与贺龙等人一起在散步闲谈。毛泽东说，中国有三部小说：《红楼梦》、《三国》、《水浒》，“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贺龙连忙说：“没看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毛泽东问徐海东：“海东同志，你可看过这三本书？”徐海东如实回答道：“没看过《红楼梦》。”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此后，徐海东把这次谈话牢记在

心，一次生病期间，他在病床上读完了《红楼梦》。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休养时，一天早晨，他和卫士张仙朋等人去登北高峰。他们一面登山，一面谈古论今。他问张仙朋等看过《红楼梦》没有，大家都说看过，有的说看过一遍，有的说看过两遍。毛泽东转而问身边的一位老大夫看过几遍，有什么感想。老大夫回答看过两遍，并说：“我发现贾府里那些人都挺讲卫生的，他们每次饭前都要洗手。”老大夫话音刚落，毛泽东就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了起来。有人开玩笑说，老大夫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到处宣传讲卫生。毛泽东则笑着对大家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呢！”接着他还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一代名将许世友，战功赫赫，但刁文不足。1973年12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在座的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你能看点《红楼梦》吗？要看五遍。”随、陆、绛、灌分别指汉代的随同、陆贾、周勃（曾被封绛侯）、灌婴，毛泽东借古喻今，希望许世友能成为文武双全的人物。紧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如果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毫不犹豫地答道：“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毛泽东点点头，然后鼓励他说：“不怕啊！你就当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还有一次，毛泽东与许世友谈话，问许世友读过《红楼梦》没有。许世友告诉毛泽东他读过。毛泽东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许世友坚持看五遍。还说“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你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你只讲武，爱打仗，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毛泽东希望许世友多看点书。后来有人开玩笑地问许世友《红楼梦》读了没有，他说已经读了六遍。

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许多人都回忆过毛泽东启发他们读《红楼梦》。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孙女王海容，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她曾回忆说：“你要不读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主义。”薛焰是从事公安工作的，一次，毛泽东游泳后在岸上休息时间问他读过《红楼梦》没有。薛焰回答说：“这是一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一听，认真他说：“搞公安就不要看？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条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至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这里面有你们学习的，书内有四大家族，你知道吗？”此后，薛焰多次仔细阅读过它。

对《红楼梦》这部书，尽管喜欢的人甚众，但各人所得不同，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毛泽东读《红楼梦》，是把它当历史来读。1961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回顾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他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都是封建家庭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乾隆时代是文化专制主义时代，这对他的创作构思产生了

很大影响。毛泽东还说：“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来掩盖它。”

从这个与众不同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第四回“薄命芦花偏逢薄命郎，葫僧乱判葫芦案”。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毛泽东和几个哲学工作者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讲护官符，其中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就讲不通。”

毛泽东读《红楼梦》读得十分精细，常能从其中挖掘出一些有

价值的内涵。1959年12月至1960年

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说：“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饬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他还注意到书中描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根基家长制的动摇，认为：“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宠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最高的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毛泽东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塑造和语言十分欣赏，他多次讲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1937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艺”作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演讲时，谈到《红楼梦》的细节描写时说：书上描写贾琏从尤二姐那里回去的时候，“跨马认蹬而去”，非有经验写不出“认蹬”二字。他以此说明要写出耐人寻味、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在1973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饶有兴趣地提起《红楼梦》中的一个细节描写：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备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描写。他还常在讲话和文章中引用《红楼梦》中的语言或故事，以帮助说理，增加语言表达效果，并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在“三反”时，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党的干部警惕受人包围；在1957年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为说明大国的事情并不那么好办，他用了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在同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用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在访苏的时候，用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在1958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事物的转化。

《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已构成了一门专门学问——红学。由于毛泽东喜爱《红楼梦》，所以他也极关心《红楼梦》的研究，

对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红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了如指掌，是个名符其实的“红学通”。红学各家虽然各有发明，从最早的评点派，到后来的索隐派，以至胡适、俞平伯考证派的新红学等，都没有像毛泽东这样把它当作一部清代社会史来读，他对《红楼梦》的见解，可谓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学英语用的单词卡片

毛泽东历来重视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学习，主张把学习本国语言与外国语言结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1958年1月，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语，争取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又重申了这一建议。到了70年代，他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学习英语。

马克思说过，外语是人生战斗的一种武器。同样，毛泽东学习英语也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早在学生时代，他便有学习一种外国语直接了解世界的打算。那时，他读报纸、看地图，常把各国的城市、港口、山脉、河流译成英文，既了解时事，又熟悉了地理，还学习了英文，一举三得，可

惜，他的英语学习被动荡的革命生涯所打断。在延安时期，他又自学过一段英语。1946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著名的论断。当时翻译把“纸老虎”这个词译成“scare—crow”。毛泽东立即打断谈话，问斯特朗“‘Scare—crow’是什么东西？”斯特朗回答说：“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在田里吓唬乌鸦。”毛泽东听后，立即表示这样翻译不够确切。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作成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接着，毛泽东就自己用英语说：“纸老虎（Paper—tiger）”这几个字。然而，由于当时严酷战争环境，他的学习受到很大限制。

全国解放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学习英语便成了他的一种爱好，虽然工作繁忙，但他每天仍然坚持学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英语。毛泽东学英语，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他经常利用刚刚起床，在人睡之前，在饭前饭后，在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学英语。1959年11月，他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他往往坐下来学习英语。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趣最高的时候，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挤时间学英语。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时工作非常紧张，但在旅行中他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1958年9月，他在巡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时，沿途参观工厂、矿山、学校等，大部分行程是乘汽车，每天坐车长达六七小时，途中十分辛苦，即便如此，学起英语来他仍很有精神。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十二国、拉丁美洲八国四批外宾后，也多次学习英语。同年5月27日，他在上海会见蒙哥马利，两人谈得很融洽，休息时又读了一会儿英语。

更令人难忘的是，即使在飞机上的短暂时间或出国访问期间，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丝毫未减，有时甚至达到旁若无人的境地。

一次，他乘飞机时在用心学英语，对送来的茶水、糖果、点心都顾不上吃，年轻的服务员禁不住好奇地问：“毛主席，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

要学英语？”毛泽东温和地微笑道：“这是斗争的需要啊！”据他的秘书林克回忆，1957年3月19日11时至12时，由徐州飞往南京途中，毛泽东书写了元人萨都刺的《徐州怀古》词后，即学英语。3月20日13时至14时，由南京飞往上海途中，他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学英语。有一回，他乘坐的飞机落地已经十多分钟了，人们还不见他下来，走进机舱一看，他正在聚精会神地读外语，竟没有察觉到飞机已经到达目的地。这年11月，他到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会议期间，他的英语学习也没有中断过。

帮助毛泽东学英语的是谁？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在五六十年代，是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后来还有唐闻生等人。前面这些卡片就是林克、唐闻生给毛泽东写的，毛泽东学完一张就换一张。林克是1954年秋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工作，主要任务是研究国际形势和重要动向，筛选文件。同时毛泽东还交给林克教他学英文的任务。在第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你教我学英语好吗？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喽！”

毛泽东学英语是非常刻苦的，那时他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多。于是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新华社的英文新闻和政论文章入手，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以后，毛泽东给秘书林克写信：“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二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为盼！”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以后，12月17日，他又写信说：“莫斯科声明英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送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毛泽东还读过一些马列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一些讨论形式逻辑的英译本。

在阅读马列经典著作英译本时，毛泽东曾遇到不少困难，因为

这些经典著作英译本的文字比一般政

论文章的英文要艰深些，生词也多些，但是，毛泽东知难而进。1959年1月，一位外宾问他学习英文的情况时，他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定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因此，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本字典，一部汉英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以备经常查阅。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都带着字典。

据林克回忆，考虑到毛泽东工作繁重，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林克常常事先代为查好字典，以卡片的形式抄出来。但毛泽东往往还要亲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标和注解。为了学习英语的需要，自1961年到1964年，他多次要过各种辞典和工具书，如《英华大辞典》（郑易和、曹成修主编）、林语堂《汉英词典》、《现代汉英辞典》（王云五校订，王学哲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汉英大辞典》、《综合英汉大辞典》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汉英分类词汇手册》（北京外国语学院编）、《汉语时事用语辞汇》等。对当时收集到的汉英辞典，他都不满意，曾希望能出一部好的汉英辞典。

毛泽东说话，带有非常浓重的湖南口音，影响他英语发音的准确性，他就让林克领读。有时他自己再练几遍，请秘书听他的发音是否符合标准，并

让秘书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以便掌握发音要领。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在秘书领读、解释字义和语法结构之后，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1975年12月，毛泽东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当他读完翻译成中文的尼克松来信时，曾用英语读着信上方的来信日期。朱莉吃了一惊，她说毛泽东的“英语清楚而准确”。这是与毛泽东平时的勤学苦练分不开的。据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有一段时间，他每晚都要学习英语，背诵单词，让他休息时，他就会风趣他说：“看书是用眼睛，现在是用嘴巴，这样可以使两种神经交替休息嘛。”

毛泽东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他非常熟悉，学习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句型变化和句子的结构以及英语词类的形式变化上。有些文章和经典著作，他学习过多遍。《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1956年5月10日开始读第一遍；1959年10月31日开始读第二遍；1961年10月9日开始读第三遍。他反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记忆和加深了解。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的研究，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后来由于他工作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

特制的放大镜与专印大字本书

毛泽东到了晚年，虽然身体衰老，病魔缠身，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愿望不见低落，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天天读书。平装小字本的书戴高度数的眼镜都无法看了，他就借助于放大镜。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泽东遗物展》陈列室，陈列着一枚毛泽东当年阅读书报时用过的放大镜。据他身边工

作人员回忆：“这种放大镜是后来在上海做的。以前的那个是象牙柄的，很重，是九三学社送给毛主席的。由于用的时间长，镜框都裂开了，我们只好拿到光学仪器厂去修理，由于不好公开这是毛主席的用物，我们就把镜柄上的字用白胶布缠上了，说是一个外宾下午二点要离开，请抓紧时间修好。可等我们一走，人家就把胶布撕开，知道了这是毛主席用的放大镜。于是马上重新调整了放大镜的倍数，把镜面加大，把象牙柄改成了优质塑料柄，还新做了圆形柄和葫芦形柄两种放大镜。我们按约来取回放大镜时，厂里的师傅们把这两把新做的和修好的放大镜一并交给了我们。由于新放大镜柄框用塑料制成，比原来要轻便，同时镜面加大，倍数增高，毛主席使用后很喜欢。”毛泽东看书学习没有固定的地方，办公桌、饭桌、床上、沙发上等，到处都是他读书的地方，所以工作人员在大厅和房间里各放了一把放大镜。这样，毛泽东用起来很方便。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工作人员也总忘不了随身带着放大镜。因为，他们担心毛泽东用地方上提供的放大镜会不方便，同时也给地方上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后来，用放大镜看书毛泽东都十分吃力了，于是，他就叫工作人员用自己的稿费把书印成平装大字本或线装大字本来阅读。他要读什么书，除身边有的他自己信手拈来就看外，其余他要看的书都由秘书们负责提供和查找。一次，毛泽东要看《容斋随笔》大字本，工作人员跑到毛泽东的藏书库寻找，由于书库刚搬运，书籍未来得及整理，该书一时找不出来，于是他们就与北京图书馆联系，请求速帮助找一部大字线装《容斋随笔》。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找到了这本书，线装大字本的《容斋随笔》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印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听说是为毛泽东专门印的，他们接到任务后，全社上下欢欣鼓舞，印刷厂的工人们自愿加班加点，按时将书送到了毛泽东的住地。即使如此，有一些文件仍然来不及印成大字本，没有办法，只好由身边的工作人员读给他听。重要的文件和参考消息，有时毛泽东非要自己看不行，工作人员就采用大字抄摘，或者印放大件来解决。

为了方便老同志阅读马列著作，毛泽东曾经提议印制马列著作大字本。1963年时，毛泽东曾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7月11日，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管理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学马列著作问题做出布置时，提出30本书都要出大字本。8月4日，他又专门为印马列著作大字本问题写信给周扬，并且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应分装四本或八本，使每本书重量减轻。毛泽东对印大字本关照得如此细密周到，是为了便利一些老干部阅读，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毛泽东还曾提出对一些杂志也要印刷大字本，如《化石》、《动物学杂志》

等等。

两副特制的单腿眼镜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两副奇特的单腿眼镜，还有几副质地不同、种类各异的眼镜。这些眼镜有近视镜，也有老花镜。从外观上

看，有褐色塑框眼镜、金丝眼镜等。尽

管毛泽东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多光彩照人的相片，但由于他在公开场合下不戴眼镜，所以他戴眼镜的照片是找不到的。

毛泽东使用的两副只有一条腿的眼镜，其中一副只有左腿，另一副则只有右腿。它是毛泽东晚年戴着办公、学习的老花眼镜。晚年毛泽东喜欢躺在床上看书，由于视力不行，必须戴上眼镜才可以看得清楚。但戴上眼镜后侧卧着看书又极不方便，于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便为他想了这个办法。他们找到北京光明眼镜店，打磨了两副单腿眼镜。眼镜做好后，毛泽东试戴了一段时间，十分满意。从此以后，当他侧卧着看书的时候，就专门戴这两副镶着金边的眼镜。侧到右边时戴左边有腿的，侧到左边时就戴右边有腿的，以防太阳穴被镜腿压迫。

一次，他戴上单腿眼镜，捧着书贪婪地阅读，医务人员看见了，不忍心他再受读书之累，只好把书拿走，并劝告毛泽东说：“主席，为了您的健康，你不要再读了。”在这种时候，毛泽东有些茫然了，他的意志和毅力是坚强的，几十年来，谁曾能阻止过他的行动呢？如今医生竟敢连书也不准他读了，他伤心地流下了眼泪：“我一辈子就是爱读书，可现在……”

毛泽东有躺着看书的习惯，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他怎么样形成这种习惯，也没有人去考究过。但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看到毛泽东躺着看书，从健康角度考虑，对此曾进行过一番研究。他回忆说：“作为一个保健医生，我倒也考虑过躺着看书生理学上的意义。躺着看书这与小学生时代的观点完全相反，也是与我这位曾经是眼科医生的看法不同，躺着看书对视力不利，因为很难保持两只眼睛同时处于等距离的状态下看东西。对小学生来说，看书时要求端坐，上身保持笔直的状态，书本的平面应与人的面部保持平行，因此要求桌面有个倾斜度。距离保持在30厘米为度。如果看到孩子躺着看书，我会把他们赶起来，让他们坐正看书的。”

“毛主席看书的姿式（躺着）合理吗？是生理上的要求，还是不良习惯？”

“从生理要求来看，人体处在卧位时，由于流体力学的关系，以及地心引力的作用，大脑得到的血液流量，当然要比坐着或站着要多了，也就是说，大脑得到的营养也多，因而躺着看书的坚持力强，记忆力好，读书效率高，不易疲劳。这对于年轻的人来说，这种差别并不明显。”

“从前，我曾经试验过，但都是失败的记录。我躺着一看书，马上就想入睡。这样说来，毛泽东喜欢卧位读书，不是一种不良习惯，而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生理上的要求。”

长期的工作、读书，使毛泽东积劳成疾，作为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从1971年开始，毛泽东经常害病。1974年春，他开始觉得自己看东西模糊，吃力了。8月，毛泽东在湖北武汉他下榻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轻重不一。

毛泽东患眼病，几乎近于失明，这对于一位多年亲自批阅文件，亲自动手写文章的人，一位手不释卷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没有比这更痛苦更难忍的了。由于视力原因，从这时开始由工作人员为他读文件、读书报。周恩来总理闻讯后，万分焦急，情急之中便将自己使用过多年的一副褐色塑料框的近视眼镜送给了毛泽东，并给工作人员写了一封信。他说：“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的，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老年性白内障这种眼病，是在黑眼珠的瞳孔位出现白色反光，使晶状体变混浊。毛泽东的眼病确诊后，从医学上看，没有快速见效的治疗办法，因为这种病要经过几个阶段：初发期，膨胀期，成熟期和过熟期。经过这几个时期后，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才能考虑治疗措施。这就是说得了这种病只能等待，待其成熟了才能采取手术措施。在这漫漫的“黑夜”中，毛泽东以顽强的毅力，乐观地对待疾病，到了1975年，他的右眼白内障已经到了成熟期。为使毛泽东尽快恢复视力，保健大夫请来了北京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的眼科专家为毛泽东会诊。

1975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经中央批准，并经毛泽东同意，为毛泽东实施了白内障手术，并获得成功。

一周后，当医护人员为毛泽东摘掉蒙在眼睛上的纱布时，他激动地指着在场工作人员的衣服，准确地说出了图案和颜色。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从此他结束了600多个不明的日日夜夜。

毛泽东视力稍有恢复，就宛如平常一样开始看书阅读，医生规定他每天用眼的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他半开玩笑对医生说：“你们的话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他还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把读书当作是比吃饭、睡觉还重要的事情。一次，他跟医生玩起了“迷藏”，医生在他身旁时，他就顺从地闭目养神；可只要医生一离开，他就会立即从枕头底下掏出书来看。有一天，医生发现了这个“秘密”，蹑足走近他。他正读得入神，当看到医生用责备的神态盯住他时，他竟一时手足无措起来。就像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掩盖错误，尴尬地笑着说：“今天刚看了一会……”

医生们除了限制毛泽东看书用眼的时间外，还是生怕他术后视力恢复不好。于是便决定由唐大夫给毛泽东配制一副金丝眼镜，以防读书时眼睛过度疲劳。但是毛泽东不乐意戴眼镜，加上金丝眼镜太重，架子又太轻，初戴时极不舒服，毛泽东很少戴它，即使被迫戴上也是极不情愿。待到视力恢复如常，毛泽东便摘下这副眼镜，从此没有再戴。

强身怡情篇

晚年偏爱的玫瑰红游泳裤

毛泽东终身爱好游泳。他晚年的两条玫瑰红游泳裤，不仅是他终身爱好游泳的见证，而且是他晚年心态和情感的外化。

按常理，生长在山区的人一般不擅游泳，但在湘中韶山长大的毛泽东却与游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最喜爱的体育项目便是游泳。北戴河、长江、珠江、钱塘江、湘江、邕江和韶山水库等地都留下了他劈波斩浪的英姿。

说来也巧，“毛泽东”，“毛润之”当中的“泽”字和“润”字竟都与“水”有关联，更给这位“润泽东方”的伟人频添了几份神奇色彩。水是生命之源，万物之母，毛泽东对水有割舍不断的爱恋。1963年，文豪郭沫若在参观毛泽东旧居时，陪同人员向他介绍了毛泽东少年时代游泳的故事，他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是少年游小塘，青年游湘江，老年游长江。”这句话概括了毛泽东一生的游泳历程，也展现了毛泽东愈老愈爱搏击风浪，愈老愈渴望挑战的性格，他的心永远是年轻的。

毛泽东在穿着上有自己的特点。他从来不穿短袖衣，认为短袖衣露肉，对人不礼貌。他平时穿的裤子，无论外裤还是内裤也都是长条的，唯独游泳裤除外。他的遗物中有6条游泳短裤，其中4条为白色，平纹棉布制，另外2条为红色，斜纹棉布制。腰围均为110厘米，配有带铝质扣搭的松紧带。裤腰为缝纫机缝制，有多个布拌，

裤的其余接缝均为手工缝制。此外，遗物中还有毛泽东测量水温的温度计和上下岸穿的草拖鞋。

建国后，毛泽东游泳一直穿白色的游泳短裤。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再次畅游长江时，还是穿的白色游泳裤。毛泽东喜欢在涨大水时游泳，所以裤子泛黄，上岸后要用硼酸洗，很不方便。直到60年代末在上海，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对他说：“您一生喜欢游泳，但却没有一条像样的游泳短裤，现在应该做两条好点的了。做红颜色的，漂亮的，怎么样？”毛泽东一向生活节俭，很少做新衣服，但这回毛泽东笑了笑，点头答应了。

毛泽东晚年偏爱红色，特别是玫瑰红，地毯，沙发，窗帘等都喜用玫瑰红的。玫瑰以它的浓艳火热，历来被人视为爱情的信物和象征。毛泽东晚年偏爱红色，与对爱妻杨开慧的怀念息息相关，因为杨开慧小名“霞姑”，又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吴旭君向毛泽东提议做红色游泳裤，正说到毛泽东的心坎上。这两条红色游泳裤做工精细，且比原来的白色游泳短裤软厚些，毛泽东很满意，此后游泳便

穿红色的游泳裤。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期间，虽已是病魔缠身，老态龙钟，但仍穿着心爱的玫瑰红游泳裤，在长沙游泳馆游了一次，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游泳。

杨开慧以她雅丽如仙的气质，给毛泽东永远留下了青春的明丽。她虽然过早地离他而去，但她的形象已深深印在毛泽东的脑海之中。与晚年江青的刻薄乖戾，挑剔任性，毫无女性特征相比，杨开慧是青春的化身，她的举止

打扮成了晚年毛泽东评判女性美丑的标准。1975年毛泽东做过白内障手术后不久，护士孟锦云穿着一条米黄色的裙子出现在他面前，毛泽东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她，然后摇摇头说：“这条裙子的颜色不好看，你去做条红裙子穿吧，玫瑰红的，算我送给你。”于是，小孟去做了件红色凡尔丁的连衣裙，做好之后，立刻穿上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着看着，已显得灰暗的眼睛放出了光彩，说：“我就喜欢这样的玫瑰红，好看。”

红色的游泳裤，红色的连衣裙……，寄托着毛泽东对青春的礼赞。

锻炼身体的乒乓球台和球拍

在众多的体育项目中，除了游泳，另一项为毛泽东喜爱的项目是打乒乓球。毛泽东打乒乓球，最早可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条件简陋，球拍是一块光木板，没有胶面。住进中南海后，毛泽东每周总要打两、三次乒乓球，一般都在睡觉前打，借以缓和一天紧张的

脑力劳动所引起的神经兴奋。毛泽东外巡各地时也喜欢打乒乓球，在他常住的几个地方，如北戴河、武汉东湖、杭州西湖等地都备有乒乓球室。60年代初修建的韶山滴水洞别墅中也有一乒乓球室。1966年6月，毛泽东在此住了十天，深居简出，筹划大计，其间唯一的运动项目便是打乒乓球。

毛泽东打乒乓球有个特点。在打之前，衣袋里装上满满两袋子球，陪打的工作人员也装满两袋子，掉在地上就不捡了，这样既可免捡球之麻烦，又可保持运动的连续性，直到把袋里的球打完为止。毛泽东在延安时是直握球拍，后来改成横握球拍。有时扣上一个好球，高兴的会笑上老半天。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1971年3月21日，由毛泽东决定派出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日开幕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代表团一离开北京，毛泽东就对护士长吴旭君说：“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3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像着了魔似的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清晨，他迫不及待地将吴旭君找来，要他报告《参考消息》上一些国际上的大事，吴旭君讲的是头天下午版的情况，当天的《参考》还没有来，听完吴旭君的汇报，他不耐烦地说：“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立即就送来，我等着看。”吴旭君给毛打开床头的壁灯，又给他点上一支雪茄烟，紧接着就给徐业夫打电话“催清样”。徐回电话说：“我交待新华社，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西门收发室，你让值班的警卫去取。”吴旭君回到毛泽东卧室，禁不住好奇地问：“主席，你怎么这样关心对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

毛泽东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是不是铁板一块。”

世乒赛期间，毛泽东每天要吴旭君给他介绍情况，谈得吴旭君口干舌燥。有一次，《参考》里有条消息，大意是说4月4日，美国队三号选手格伦·科恩去馆场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嬉皮士，留有长发。当时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幅一尺多长的杭州织绵送给了科恩。科恩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紧张，庄则栋此举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就这么一个花絮，毛泽东听了眼睛一亮，立即叫吴旭君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后，他满脸堆笑他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4月6日这一天，世乒赛行将结束，毛泽东把一份中国外交部和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给吴旭君看。文件上周恩来已经圈阅，并批下“拟同意”。毛泽东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毛嘱咐吴旭君将文件退外交部。

但那些天，吴旭君总发现毛泽东心事重重。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11点多，毛泽东在安眠药的作用下昏昏欲睡，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但他突然用低沉而含糊的声音叫吴旭君给外交部王海容打电话，“邀请美国队访华”。毛泽东曾说吃了安眠药后讲的话不算数，吴旭君生怕犯错，壮起胆子问：“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队访华，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毛把手一挥：“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吴旭君打电话告诉王海容后，王海容说：“唉呀！现在都快12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可怜的王海容忙了半夜。

第二天毛泽东醒来后，吴旭君再次问起他说的话是否算数，得到确证后，吴旭君笑着说：“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却没睡。”毛泽东咯咯地笑出声来，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泽东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20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如约访华，这对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一个有力的暗示，知道中美之间将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是有名的“乒乓外交”。同年7月，基辛格这位神秘的西方客人踏上了中国的国土，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为尼克松访华铺平了道路。中美之间经历长期的对峙后，终于迎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蜜月”时期。历史的进程常常是微妙的，事物的偶然性有时会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如果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不上错中国的汽车，会有“乒乓外交”吗？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似乎平凡但实际上是十分关键的瞬间。毛泽东用小球推动大球，为他的乒乓球运动画上了一个惊叹号，他没有高超的球技，但却真正领悟到了乒乓球运动的另一种真谛。

“甲字第1号”持枪证

毛泽东第一次摸枪是在湖南新军当普通列兵时。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湖南是第一个响应的省份。当时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受革命党人来校演讲的鼓舞，决定同其它几位朋友去参加革命军。那时新成立了一支学生军，但毛泽东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于是决心参加正规军。他参军后被编入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每月军饷7元。正规军配发有枪支，毛泽东每天操着枪支与新军战友作列队和射击训练，平生第一次学会了打枪。

毛泽东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创造了无数战争史上的奇迹。他还针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际，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但他一生除井冈山时期外，其它时间几乎不摸枪，而专注于用理论武装全党、让党来管好枪、指挥枪。

195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按规定给毛泽东签发了一个持枪证。毛泽东拥有许多“第一”的殊荣，他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是第一号，各种会议的代表证是第一号，持枪证也是“甲字第1号”。持枪证“注意”栏目中注明：“本区门卫，检验放行。机密证件，随身携带。如有遗失，绝不补发。”但实际上并未给毛泽东配枪，所以持枪证中的枪证、枪号和子弹等栏都是空白。这个持枪证可说是有名无实，徒有其“证”。因实际上来配枪，即使万一遗失，也不至于为“绝不补发”而犯愁。

毛泽东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的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如昨”，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从未受过一处枪伤。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对卫士李银桥回忆，有次他和朱德在井冈山遭敌人伏击，幸好贺子珍是神枪手，在情势危急之中击退敌人，安全转移。他赞叹道：“贺子珍的枪法真准啊！”长征路上，张国焘闹分裂，毛泽东曾请来六七十名四方面军的干部作思想工作，其中有一位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李特。

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人们都知道他脾气暴躁，喜欢骂人。当毛泽东对他们讲南下是没有出路之时，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的罪行，右手下意识地去抽腰带上的左轮手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把李特紧紧抱住，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后果。

枪在战争中是一种进攻武器，但在和平年代却是一种体育锻炼的工具，属于军事体育。毛泽东虽然没有喜欢练射击的浓厚兴趣，更不会去围田狩猎，但他关心士兵，关心他们手中的枪。有一次他在观看了军队的实弹射击后，亲手检视了新发明的自动步枪，那动作，那神态，还真有点“行家里手”的味道。

两副澳门出产的牛骨麻将牌

毛泽东遗物中有两副麻将牌，一副为牛骨质地，橙色，装在有金属搭扣的棕色牛皮箱中；另一副为塑料质地，呈淡绿色，装在带拉链的棕色牛皮箱中。箱子中间都重叠套着四个方盒，便于分门别类地放置麻将的筒、索、万、风等各种牌型。箱子的其它空隙放有骰子、筹码以及用来算番的象牙签，从用英文写的打牌“指南”上看，这两副麻将均出自澳门的三友麻雀象牙庄。

毛泽东一生长于思考，常能从平凡的事情中悟出许多道理，并把它们和现实社会政治生活联系起来。对他来说，运动和娱乐也都不是单纯的。他畅游长江后，便以长江论美国，说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并不可怕，我们顶了美国几下，也没有啥。他长年坚持打乒乓球，结果导演了一场新颖别致的“乒乓外交”。他玩麻将牌，则把“打平和”的思维用于搞统一战线，一时传为美谈。

1949年，是人民解放战争决胜的一年。元旦，蒋介石发出和谈声明，21日即“引退”在幕后指挥，由李宗仁代理总统。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批驳了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并提出了八项求和条件。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李宗仁同意以共产党提出的八条为基础举行和平谈判。

在组织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团时，李宗仁打电话找到了曾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等职，1948年秋辞职回到长沙的刘斐，要他充任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于是，刘斐便和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等于1949年4月1日到达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举行和平谈判。

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国民党谈判代表中属于桂系的刘斐和黄绍竑。这是一个晴朗的春日，风情气爽，但刘斐的心却怎么也难以排除那几分忐忑不安之感，因为这毕竟是一位国民党的将领去见共产党的领袖啊！

到了毛泽东住地，刚下车，毛泽东便迎了上来，和他们热情握手、问候。这直观的第一印象，使刘斐对毛泽东顿生了几分敬意。毛泽东问刘斐：“你是湖南人吧？”

“是，我是醴陵人。和主席是邻县老乡。”

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高兴地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听了毛泽东的话语，刘斐的紧张心情缓和了许多，他对毛泽东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来搞和谈，人民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习惯地打着手势讲道：“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在国民党的派系里，刘斐虽属桂系，但他多年与湘派的程潜私交甚厚，在他辞去国防部参谋次长回到长沙后，与程潜往来更多了。程潜能把程明仁由武汉调回长沙，还多亏刘斐从中周旋，才通过了白崇禧这一关。那时，刘斐一方面看到国民党蒋介石必然失败的下场，同时又受到程潜的影响，也就萌生了投靠共产党以求出路之意。当然，他也和国民党其它要员一样，对于决定后半生命运的举动，是慎之又慎的，所以尽管有走向光明之意，但真的

要做了，却又顾虑重重，在北京谈判期间，刘斐确实是自相矛盾的。在谈判桌上，他尾国民党的代表，总要为国民党争得一点好处，但离开谈判桌，却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归宿，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这使他的思想斗争激烈得难以承受，对前途感到茫然无着。

毛泽东留他们一起吃顿饭，边吃边谈。当谈到个人爱好时，刘斐灵机一动，便想把自己的疑虑用说笑的方式说给毛泽东，并探察毛泽东的态度。

刘斐有些拘谨的问毛泽东：“你会打麻将吗？”

毛泽东随口答道：“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接着问：“你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泽东立刻明白了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笑得差点把饭喷出来，立即回答道：“平和，平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行了。”

一语双关，点破迷津。

刘斐满意地大笑起来。他佩服毛泽东思维敏捷，同时又感激毛泽东那寓意深长的回答解除了他的许多顾虑，从而坚定了他向共产党靠拢的决心，于是，立刻说道：“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

由于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刘斐下定决心，留在了北平。

建国后，工作之余，经别人邀请，毛泽东也偶尔打打麻将，可是有时正打在兴头上，他却忽然站起来向大家告退。开始时大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问题，次数多了，便发现了秘密。

原来，毛泽东打麻将既是为了换换脑筋，也是为了清理一下自己思考某个问题的思路。凡是在他站起不打时，就是他在思想上弄清或发现了一个正在考虑的关键问题，故而急忙起身，赶到办公桌前继续紧张工作。

有时打着麻将，他也借题发挥，讲些引人深思的哲理。一天，毛泽东和叶剑英等人打麻将。第一盘开始时，毛泽东幽默地说：“咱们今天‘搬砖头，喽！”大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句笑话罢了，谁知他又连说了几遍“搬砖头喽”，“搬砖头喽”！

毛泽东察觉到在座的人不理解，就解释说：“打麻将好比面对着这么一堆‘砖头’。这堆‘砖头’好比一项艰巨的工作。对这项艰巨的工作，不仅要用气力一次次，一探探地把它搬完，还要开动脑筋，发挥智慧，施展才干，就像调兵遣将，进攻敌人一样，灵活运用这一块块‘砖头’，使它们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作用。你们说，对不对？”

大家这才明白他一再说“搬砖头”的含义，都笑了起来。

这次麻将一连打了数盘，毛泽东越打越有兴趣，不像往常那样中途告退。他边打边说：“打麻将这里边有辩证法，有人一看手中的‘点数’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一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也会变成最坏的，最坏的也会变成最好的，事在人为！”说到这里，他爽朗地哈哈大笑、接着站起身来，向在座的人说了声“对不起”，迈起匆匆的脚步，向着他的办公室走去。

还有一次，他竟然把麻将同反封建迷信连了起来，他说麻将和神一样，都是人做的，目的都有用，不过用处不同。人们打麻将是为了消遣和娱乐，而神则不同。人们创造神是为了征服自然，主宰世界，借他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人们创造的龙王就是为了让上天行好事，四方呈吉祥。据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们回忆，多少年来，毛泽东从不单纯为玩而玩，他在紧张的读书、工作、写作之余，总是寓工作于娱乐之中，把娱乐看成带休息的思维和工作。

偶尔玩玩的扑克牌

中共领导人的业余爱好是丰富多彩的，陈毅擅围棋，周恩来精于象棋和跳舞，邓小平是桥牌宿将，毛泽东的兴趣更为广泛，他不仅喜欢听京剧、游泳和打乒乓球，还喜欢打扑克牌。工作之余，他

常与江青、李敏、李讷以及罗瑞卿、汪东兴、李银桥、张仙朋等身边工作人员打扑克，四个人围成一桌，或各自为战争上游，或两人配对坐庄家，轮不到上场的则在旁边观战助战，其乐也融融。

但是，扑克这东西除了给毛泽东带来享受，也带来了麻烦和不安。江青打扑克的兴趣甚浓，但缺乏应有的牌场风度，动不动就摔扑克，发脾气，弄得与她打牌的人很不愉快。毛泽东就此规劝过江青，无奈收效不大。

有次，毛泽东对其机要秘书高智诉苦衷：“我只管两个半人。”

“你管人多呢，全国都得管。”高智说。

“我管不了，我只管你一个，罗光禄一个。”高智与罗光禄是当时毛泽东的两个机要秘书。

“那么还有半个呢？”

“江青我只能管半个。”毛泽东说着，长叹了一口气。

“全管了吧，她是你老婆。”

“我管不了，我管半个，那半个随她去。”

毛泽东讲的是大实话，江青个性强，脾气不好，毛泽东对她是“有看法而没办法”，有时还免不了吵一架。

“听说支部改选了，有哪几个支部委员？”毛泽东问道。

毛泽东所在支部称中央第一办公室，由他和江青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所组成。高智作了回答，并提到自己是组织兼宣传委员。

毛泽东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他高兴地说：“宣传委员好么，我管不了的你能管。”

高智事后想了想，前不久江青为了打扑克的事，跟卫士吵架，吵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不得不分散精力处理家庭纠纷，不能再让这些事干扰毛泽东的工作了。可江青打牌，又喜欢责怪别人出错牌，搞得卫士们都不愿意与她玩。于是，高智就找田云玉、封耀松、张仙朋等卫士谈话，给他们讲明道理，要他们陪江青打好牌，别给毛泽东添麻烦。

潇洒写春秋的文房四宝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收藏的毛泽东遗物中，有毛泽东一生常伴常依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笔、墨、纸、砚，历来被中国文人称为“文房四宝”。称它们为“宝”，不是因为稀有和价昂，而是因为著书立说，吟诗作赋，绘画写字，都少不了他们。古人以“砚田”，“笔耕”代指文人的创作生涯；赞誉优秀的文学作品，谓之“笔精墨妙”，“如椽大笔”，“生花妙笔”，“洛阳纸贵”。如文章细碎拖拉，人们读后会皱眉说：“笔墨委琐”，“赘笔冗墨”，批评不学无术的笨伯，称为“胸无点墨”等等。

《论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毛泽东读书写作，历来重视工具，他对文房四宝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井冈山时，贺子珍见毛泽东爱好书法，用江西农村的蓝土布，为毛泽东缝制了一个多用挎包，内有一个专装“文房四宝”的大小多层口袋，毛泽东赞赏他说：“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红军时期，毛泽东不论走到哪里，他的警卫员的首要任务便是将“文房四宝”摆好。他向警卫员陈昌奉交代：“我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把‘文房四宝’摆好，随时可以工作，看书，学习。”

建国以后，在毛泽东那铺有绿色绒布的办公桌上，文房四宝占据着最显眼的位置。他用文房四宝写出了一篇篇宏文大作，也用文房四宝摘取了书法艺术的皇冠。

毛泽东一生大部用毛笔和铅笔写字，极少有钢笔。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便有他用过的10多支毛笔，多出自鸠居堂、青莲阁、朴园等老字号笔店，而且是经老胡开文、张大千、李福寿等名家精选的，包括长峰狼毫、羊毫、鸡狼毫、紫毫等多种质地，上面刻有“曲水清赏”，“师万物”等字样，看上去古色古香。毛泽东喜爱用狼毫笔，因为狼毫比羊毫硬，有劲，写出来的字漂亮。毛泽东用的铅笔原来主要是德国生产的，当国产“中华”牌铅笔问世后，毛泽东便开始用“中华”牌铅笔，他对国货是一往情深的。毛泽东遗物中，有上海“中华”、“五星”牌铅笔，其中一支中华牌笔上有“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字，长12.9厘米，围4.8厘米。还有一支棕色圆形5B德国制铅笔，长17.3厘米，围0.7厘米。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回忆，他的一项额外任务便是为毛泽东削铅笔，一次削好几十支。出巡时也将铅笔预备好，到住处后，在床头、办公桌，乃至厕所等地方各放几支，以便随时随地取用方便。

毛泽东遗物中的墨盒均为铜制，大、小均呈正方形，正面或为北京万寿山等风景画，或为北齐时颜推之的家训。墨盒中放有丝棉，防止墨汁外溢。毛泽东原先都用小铜墨盒，有一次，毛泽东到杭州，住进汪庄招待所，看到所里准备的一个大铜墨盒，用起来很方便，就对工作人员讲：“你去请示一下领导，我们换一个墨盒用，看行不行。”所负责人听后说：“主席需要，拿走就是了。”就这样，毛泽东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小铜墨盒留在汪庄，换回了那个大的。

毛泽东练习书法多用宣纸，但也用信纸或其它纸张。有次邵华去中南海毛泽东书房时，便看到信纸上写得密密麻麻，大多是一首首唐诗宋词。毛泽东“性不好束缚”，有时兴致来了，随便拿张纸便可尽情挥洒，而不拘泥于从从容容地铺展宣纸。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现收藏有毛泽东未用完的宣纸，因年久受潮，宣纸泛黄，并有霉变的痕迹。

毛泽东有许多研墨的砚台，其中最最精美的当属齐白石送的“片真老空石”，现收藏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研墨需要水，工作人员为他专门准备了一个茶壶式的水注。他写毛笔字时，工作人员在旁边帮助铺纸，并用水注往墨盒里注水。有时来不及，就随手端起茶杯，把茶水倒进墨盒，调和调和即用。由于砚台研墨费时又费事，1960年以后，毛泽东就几乎不用砚台了。

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中国书法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作为中国文化独有的一部分，书法是节奏化、音乐化的形象艺术，它超越表象模拟而直指心性，人的生命感悟和心胸襟怀通过书法的线条、布局和气韵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毛泽东终身爱好书法艺术，吸纳百家之长，自成风格，堪称当代最杰出的书法家。

革命战争年代，军情极为紧迫，毛泽东坚持见缝插针地练习书法。行军所到之处，凡庙宇、关隘等有前人书法碑刻的地方，他都尽可能参观浏览，悉心揣摩。1935年2月下旬，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时，毛泽东来到娄山关上，见一高高的石碑上刻有“娄山关”三个大字，称赞这三个大字写得苍劲挺拔，不断用手指在笔划上临摹运笔写字，时时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和修建于何代？”

毛泽东认为，练习书法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健身之法。书法练久了，会生出无限兴味。但练习书法要讲究方法，讲究神韵。他曾对贺子珍讲：“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炼。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学帖要发挥。”五十年代，毛泽东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便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

建国以后，毛泽东一方面广为搜求名家碑帖，另一方面在继承基础上刻意创新。1956年前后，他请秘书把能够找到的历代名人字帖，墨迹都买来，揣摩研究。他常说，这样又学写字，又读诗文，是一举两得。在众多书体中，毛泽东尤钟情草书，东晋以来各代书法家王羲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頫、解缙、张弼、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直至近代于右任的草书作品，毛泽东都接触并研习过。他与黄炎培之间发生的王羲之真迹“风波”，便是他迷恋草书的一个最好的印证。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要求借来练习一个月，黄答应了。由于作品太珍贵，一个月借期未到，黄炎培便多次催讨，毛泽东竟有些生气了，他说：“讲好了是一个月，一个月未到便催讨，是他失信，一个月到了未还，是我失信，谁失信都不好。”转念一想，他又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毛泽东最喜爱怀素的草书，田家英曾说：“毛主席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势。”

毛泽东对书法精益求精，凡遇请他题词的，他都尽可能多写几幅，让人家从中挑选。有次，北京医院请他题写匾额，他从笔架上抽出一支较粗的兼

毫毛笔，很快写了三幅“北京医院”的横幅，之后将三张写好的字一一横摆开来，铺满了整个写字台。毛泽东站在转椅前一张一张地逐字审视了一遍，然后对保健医生王鹤滨说：“这两张拿去，由他们选一张用。”其它如给湘潭大学，韶山学校题词时，毛泽东也是这样，自己不辞辛苦，为的是使索句求字者称心满意。

精选并手书的古诗词

有人曾问著名“红学”专家俞平伯对毛泽东诗词有何感受，俞先生脱口而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诗言志，任何诗人都离不开个人的出身环境，时代遭遇和学识修养，毛泽东在这三者的结合上无人可以与之比拟。尽管历史上流传有不少英雄人物的佳作，但豪放有余，却无毛的海阔心胸。”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广泛阅读了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对于毛泽东一生之中阅读了多少诗同这个问题，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管理图书的张贻玖作过研究和统计：在毛泽东的藏书当中，他亲自圈划批注过的有 1180 首诗， 378 首词， 12 首曲， 20 篇赋，总计为 1590 首。其中唐诗约 600 首，汉、魏、南北朝时期诗人的作品 150 多首，明诗近 200 首。鲁迅诗中圈划过的有 44 首。

以上仅限于毛泽东在解放之后逐渐积集起来的藏书中圈划过的诗词。至于毛泽东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究竟有多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包括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毛泽东究竟读过多少古曲或近代及国外的诗词，就无法统计了。

毛泽东对于《诗经》，他喜欢朱熹的《诗集传》。至于《楚辞》，他虽然也注意各种版本，但较重视朱熹的《楚辞集注》，并把这本注本赠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在汉魏六朝诗人中，毛泽东特别喜欢曹操的诗，尤其是《观沧海》、《龟虽寿》诸篇，不仅吟诵，而且手抄。他也喜欢《木兰诗》，《敕勒歌》。清人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收六朝之诗甚多，是毛泽东床头案前常翻的书。

毛泽东于唐诗中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这与他的个性、性格很有关系。他喜欢李白的诗，正看出他豪放的一面。他平时喜欢烟酒，书法追踪怀素的“狂草”，都可与此相印证。他喜欢李贺的诗，正见出他想象力丰富的一面。他的不少诗作，如《蝶恋花·答李淑一》，都极尽想象之能事，堪称“毛氏神话”。他喜欢李商隐的诗，又可见其缠绵悱恻的一面，他早年与杨开慧分离时所写的《贺新郎》，就有李商隐的缠绵悱恻之致。

毛泽东喜欢“三李”，也不排斥杜甫，曾手录杜甫诗歌多首。他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就谈到杜甫的《北征》。有一次，毛泽东问刘大杰先生的籍贯，刘大杰回答说“岳阳”时，毛泽东马上信口多，号称“千家”，而李白诗的注家太少，仅有四五家，有点为此不平。在他看来，李白的价值与成就，丝毫不在社诗之下。后来郭沫若就是按照毛泽东这个意思，写了《李白与杜甫》一书。

毛泽东似乎不太喜欢宋诗，以为“味同嚼蜡”，不及唐诗。但他对宋词却十分喜爱。据说长征时，他在马背上经常带有两本书，一是《资治通鉴》，另一本便是南宋词人张炎编的《词源》。在北宋词人中，他较喜欢苏轼、范仲淹、柳永等；至于南宋词人，他偏爱辛弃疾、岳飞、陆游、陈亮、刘过、张孝祥、崔与之。他去世前一年，还经常用手拍桌击节，高声吟诵岳飞的《满江红》，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读过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和《唐宋名家词

选》，1956年还专门宴请过龙榆生。他也读过不少新诗，如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等的作品，但他不喜欢。他以为中国新诗的出路在于古典诗词与民歌。

毛泽东有较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写诗填词是他最钟情的文学形式。他的一生，不仅在临窗伏案时，而且在戎马倥偬间，也不辍吟哦或默诵，尤其到建国以后，于日理万机之余，常常沉浸在诗词艺术氛围中。可以说，古典诗词成了他的审美趣味中心，至少是中心的一个重要主面。从《三百篇》到《人境庐》，一切伟大和杰出的诗人，他无不结识神交，所有重要和优秀的诗篇，他尽都搜求饱览。毛泽东工作之余，凭记忆写下大量古诗词，《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即其中的一部分，仅此一部分凡 117 首，上起于宋玉的《大言赋·句》，下迄于林则徐的《出嘉峪关感赋》，即包罗了两千余年间 58 位作家的作品。论者以为，在一般人所目及的古诗词选本中，尚未有任何一家的本子，在浩如烟海的旧籍中，选得如此之精严！其功力和识见颇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之遗风。且就书法而言，因是在“工作之余”随意所为，故更得天趣之妙。

毛泽东精选并手书的诗词，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振拨幽滞，宏奖人材。他于古诗词中披沙拣金，发现了许多为世人所忽视，所遗忘的诗词精品。1957年1月，毛泽东与袁水柏、臧克家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1961年11月6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三封信，查找高启的咏梅花的一首诗，并于当天用草书写了该诗：“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裁。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台。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诗前特加一个小注：“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高启的梅花诗，无论就格律，文藻意境来说，都堪称上品，而高启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为后人所忽视，其姓名几为今日一些学者所不知。毛泽东于被遗忘的寂芜中发现了这棵异卉奇葩，其涉猎面之广，洞察力之深，于此可知。

文化部组织录制的古诗词磁带

古诗词在毛泽东晚年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们伴随毛泽东度过了孤独难耐，力不从心的黄昏岁月，让他那颗负担太重的心灵稍许得到了些宽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珍藏的古诗词磁带共有 59 盒，上有编号是 1975 年上半年文化部为毛泽东“秘密”录制的，有着非常突出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毛泽东从 1971 年重病缠身到 1976 年 9 月 9 日溘然长逝，是被亿万中国人民誉为“红太阳”的老人家“太阳落山”，生命之光暗淡直至消失的 5 年。

1971 年，对毛泽东来说，是残酷的一年。林彪，这位他亲手栽培的爱将，亲自选定并被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竟然抢班夺权，铤而走险后又驾机叛逃，这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太残忍了。为此毛泽东大病一场，从此，身体状况急剧下降，面容衰老，精神憔悴。环顾左右，只有几个工作人员，深宫大院隔断了与人民的联系。国有疑难，天意难问；知音杳渺，不胜高寒，毛泽东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倦怠。

从 1971 年春天起，毛泽东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开始只是因为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而且越来越重，长期不见好转，后经医生诊断为“大叶性肺炎”。以后毛泽东所患各种老年病越来越多。1974 年初，毛泽东又添了一种严重的疾病，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吃力了。据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回忆：“主席不仅在战争和恶劣的环境下曾以超人的毅力去克服困难，对待疾病，他也同样忍受得住。他硬挺着，不让我急急忙忙为他请医生看病，也不让我告诉别人他看不见了。”由于看书看报阅文件都无能为力，他只好以耳代目，让身边工作人员为他读。心烦之余，他便通过古诗词以遣怀，但身边工作人员读起来显然不够味，于是就想听曲子。当时中央领导十分关心毛泽东的病情，希望能尽量解除他看不见的痛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部抽调文艺界名流，组织为毛泽东录制古诗词曲子。因为当时社会上对毛泽东还是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无人知道毛泽东已重病缠身，所以为毛泽东制作古诗词曲子，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录音工作由当时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歌唱演员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李炳淑、李元华、方洋、计镇华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有琵琶演员刘德海、王范弟，二胡演员闵惠芬、许蒋德，笛子演员张晓辉等。

中国文化瑰宝中的宋词，每个词牌都有固定的乐曲，故当时作词叫“填词”，可惜这些乐谱都已失传了。因此，为毛泽东录制古诗词曲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翻译”词牌。文化部从上海音乐学院调来两名音乐家廉颇和周大风，由他们“翻译”古书《粹金词谱》中古代的音阶标记，再根据个人的理解谱成演员们能读懂能演奏的简谱或五线谱。“翻译”当然是十分艰难的，不仅要分析出古代的音阶，又要适合该词在现代演唱中的情感。

两名音乐家“翻译”一首词，便交给坐阵指挥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于

会泳又召开音乐行家“诸葛亮会”，分析每首词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于会泳曾任上海京剧院院长，又是著名的作曲家，他在听取其它专家意见的同时，也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泽东非常喜欢两名音乐家翻译和于会泳修改的词曲。

为便于演唱者更准确地把握诗词的含意和意境，又从北京大学调来4名古典文学教授讲解古词，每录一首古词曲，先由教授为演

员讲解如何理解这首词，把每首词的历史背景，内容意境分析得透彻晓畅，让演员进入“角色”。

每首诗词曲都是渐起音乐，然后是报诗词的题目、作者，再就是配乐的演唱。曲子录好后都制作几份，除送毛泽东处，周恩来等政治局的常委也每人送一盘，录一盘便送一盘。由于录制工作极端保密，所以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少有人知晓当中的内情。

为毛泽东秘密录制的古诗词曲，用的是上海牌录音磁带，纸盒装，纸盒上标有“上海革新塑料厂”字样，并有一首毛泽东语录：“努力学习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古诗词曲大部分是风格沉雄悲壮之作，如岳飞的《满江红·写怀》、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萨都刺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陆游的《渔家傲》等等，小部分是悲春伤秋、缠绵悱恻之作，如洪皓的《江梅引·忆江梅》、秦观的《鹊桥仙》以及白居易的《琵琶行》等。《琵琶行》的乐曲根据《春江花月夜》改编而成，很得毛泽东的喜爱。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很喜欢为他录制的古诗词曲，有时兴之所至，还改动词中的个别句子，让录制组重录。他最爱听的有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干的《贺新郎》、杨春霞演唱的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磁带盒子上用铅笔标有“ ”形字样）、岳美缇演唱的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磁带盒子中有“1975.4.4 正品”字样）、岳美缇演唱的萨都刺的《满江红·金陵怀古》、计镇华演唱的陆游的《渔家傲》、以及方洋演唱的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等，只有在《胡笳十八拍》磁带盒子上标有用红铅笔写的“不好”字样。

由于当时所录古诗词曲仅限于送毛泽东及其它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又未曾再版发行，因此现存古诗词曲磁带的数量是很少的。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珍藏的古诗词曲质量完好，播放时音质纯正，令人心旷神怡，现在对古诗同曲磁带按照珍贵文物保护的要求进行了妥善保护。

百听不厌的词曲《满江红》

文化部录制的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是晚年毛泽东最喜爱的一首古诗词曲。这首诗词曲曾分别有蔡瑶先、岳美缇、计镇华三位杰出演唱家的演唱。比较而言，毛泽东又最推崇岳美缇的演唱。在有岳美缇演唱的那盘磁带盒子上标有有铅笔写的“试录”二字，并注有“1975年3月13日正品”字样。

《满江红》原曲调早已失传，但在清代乾隆元年（1736年）有位叫王善的音乐家出于对岳飞的敬慕，曾为岳飞的《满江红·写怀》谱曲。王善创作时曾说：“岳飞精忠正大之气，英雄壮烈之辞，可与日月同辉。余敬写于弦辙，以与抑企之思。”由于王善的谱曲很切合岳飞原词的风格，所以文化部在录制这首古诗词曲时，基本上是依据王善的谱曲加工完成的。上海昆曲演员，岳飞第27代孙岳美缇的演唱高亢有力，响遏行云，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宽阔胸怀和凌云壮志。

1975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同意为他做白内障手术。等在外面的医生，护士还有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都在讨论这次手术的有关问题，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成功率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给毛泽东做眼睛手术的主刀是唐由之大夫。当他在1975年春天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见他身材高大，便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叫“唐由之”。毛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个‘由之’的名字。”随后毛泽东富有感情地背诵了鲁迅悼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当时唐大夫未完全听清楚，在其要求下，毛泽东在一张白纸上亲手写下这首诗，赠给唐由之，唐由之是北京广安门医院医术严谨而熟练的专家，他知道大家的心情以及对他的期望。但他冷静对待这一切，他对这次手术不打保票，不把话说满，他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顶多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

据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回忆，对于生老病死，毛泽东总是抱着乐观，自然的态度，他从没有因为这些年病魔缠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就在他将要做眼睛手术时，他仍将满怀信心和壮志凌云的气氛带给我们。他让我去放一首曲子，这就是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

毛泽东听着铿锵的乐曲，迈着蹒跚的步伐来到手术室，耳边回荡着岳飞的心海潮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的激越情怀和大无畏精神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医务人员。满身披挂的唐大夫从容镇定地为毛泽东做了白内障针拨手术。

这次手术如同大家所希望的那样，非常成功。一周后毛泽东摘掉蒙在眼睛上的纱布，他眨眨眼，看着看看，突然激动地指着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衣服，准确地说出了颜色和图案。他又指指墙壁说：“那是白的。”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满江红》，这首曾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的杰作，帮助

毛泽东走出了 600 多天不明的日日夜夜。

反复听过的《贺新郎》

在文化部为毛泽东录制的古诗词曲中，有一首古诗词曲曾被毛泽东反复听了整整一天，这便是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保存的该诗词曲来看，文化部曾确定蔡瑶先用南曲、北曲两种方案演唱，南曲的演唱时间为5分1秒，北曲的演唱时间为2分55秒。

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是一首送别诗，它在慨叹国事日非的同时，寄托了對抗金主战派人物胡铨的深切同情和无限期望。曾在样板戏《海港》中饰方海珍的蔡瑶先，以激昂悲愤的情感演唱了这首词作：“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孤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文化大革命”中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是林彪和江青等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失误造成的。陈毅元帅逝世后，毛泽东出乎人意料地出席追悼会，他握住陈毅夫人张茜的手，不住地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同时在这个追悼会上，毛泽东向西哈努克亲王通报了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并且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1974年夏，毛泽东召集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开会，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发表谈话，谈到贺龙问题，毛泽东说：“我看贺龙的案子搞错了，我负责恢复他的名誉。”又表示“杨、余、傅都要翻案……在上海，是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我向同志们作自我批评。”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悔意，也许正是他喜爱这首《贺新郎》的重要根源。“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在听这首曲子里，毛泽东肯定为国家失去许多的“砥柱”而感到不安。老年人本来就容易伤心动情，加之“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对他的影响，从来乐观的毛泽东，多少年来高唱“人定胜天”，“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战歌，如今却真切地感受到了“天意从来高难问”，未来历史在他眼里呈现出一种恍惚难

定的图景。“梦绕神州路，怅秋风……”，梅花独自愁的无边悲慨裹挟着毛泽东。但理性的力量仍然在与落寞的情感相较量，毛泽东心中憧憬的是“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张元干对胡铨的殷殷期望和砥砺，唤起他心海最后的潮期。

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国家的又一“砥柱”倾倒了，毛泽东很难过。据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那一天，毛泽东不怎么吃东西，也不说话，将《贺新郎》录音带整整放了一天。他时而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严肃悲痛，借这首词中的某些句子寄托自己对董必武和其它战友的怀念。过不了几天，他又把词的最末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让录制组重录，说是原来的两句“举大白，听金缕”太伤感了。

赞不绝口的侯宝林相声

在建国初期，几乎在每次听京剧折子戏时，毛泽东都建议负责节目安排的人，在戏的中间穿插几段相声以活跃气氛，松弛脑筋。那时，演京剧的大多是梅兰芳、周信芳、吴素秋等梨园名角，而被邀表演相声的，则十之八九为侯宝林、郭启儒一对老搭档。毛泽东曾说：“相声这一行很好，能促使人欢乐，能促使人们从反面中吸取教训，能促使人们鼓起革命的精神，做好工作。”

毛泽东遗物中，共有相声磁带 76 盘，包括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相声艺术家侯宝林、郭启儒、郭全宝、赵振铎等的代表作。毛泽东尤爱听侯宝林的相声，共听过 150 多个段子，其中 100 多段是传统的，50 段左右是新创作的。前者如《关公战秦琼》、《字象》等，后者有《艾森豪威尔外传》、《宽打窄用》、《离婚前奏曲》等。50 到 60 年代，侯宝林经常把自己满意的相声带子送给毛泽东欣赏。当时的磁带都是单轮、纸盒装，播放时将磁带安放在录放机的左边转轴上，然后用手将带头缠绕在录音机右边的轮盘上。录放机有二部，分别产自日本和德国。

全国刚解放时，文艺工作者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同志作慰问演出，一般都是被安排在“国统”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剧场坐位都是木排椅。在前面第三排的中间，放着两把藤椅，一把是毛泽东的，一把是朱老总的。有一次，前边的节目演完了，许多人以为演出结束，纷纷离座。毛泽东也拿起雨衣挽在左臂上，一边鼓掌，一边站起身来。但这时报幕员又出来了。“噢，还有侯宝林的相声，不可不看，不看遗憾那！”他一边对朱老总说，一边又把雨衣放回原处。人们一看主席没动，也都纷纷落座。在一个段子结束后，毛泽东带头鼓掌，侯宝林不得不又加了一个小段。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一直等演员出来谢了幕，才离开剧场。他曾不止一次地称赞侯宝林“是个人材，是个语言学家”。

相声以引人发笑为主要特色。听相声，恐怕人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开口大笑，除非相声本身不精彩，不然，就真的有些怪了。可是，毛泽东偏偏就是听相声不大笑的人。这倒不是因为毛泽东感情不丰富，据说有一次在看京剧《铡美案》时，他泣泪涟涟，甚至在结束后，还沉浸在满腔悲愤之中。毛泽东之所以不笑，是怕影响自己特别是别人听戏。侯宝林在演出中发现，有许多次，他都看到在全剧场被自己的幽默逗得哄堂大笑时，唯有毛泽东一人努力克制自己，不肯笑出声来，以致常常把脸憋得通红。当然，也有一次例外，那是侯宝林七拼八凑的一首打油诗，让毛泽东纵情地笑了。所谓“诗”就是这么四句：“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毛泽东忍俊不禁，一直乐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一边揉眼睛一边摆手，好象是在解释：这一下我可真的忍不住了。

毛泽东听相声，不仅喜欢风趣幽默，也非常注重它的知识性和教育性，所以他在相声段子上是很讲究的。《关公战秦琼》是过去的艺人根据民间笑话改编而成的。侯宝林在这个基础上，在演出中，又

不断整理加工，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性。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段子，一般

相声，他很少听两遍，只有这个节目，在一次演出后，他又要求重演了一遍。毛泽东看后感慨地说：我们党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瞎指挥，绝不能不懂装懂，依靠权势发号施令。侯宝林为了向毛泽东介绍相声过去的表演形式，他和几个老演员一起特意挖掘出《字象》这个传统的三人相声。这个段子早年撂地演出时，演员要在地上用白沙撒字，这个方法在舞台上演出时就不行了。为了能让毛泽东看到这个形式，侯宝林绞尽脑汁，跑了许多地方，才找到了一块汉白玉石头，现砸现磨，筛出粉末，装在缝制的三个小布口袋里。演出后，果然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

毛泽东对侯宝林非常关心。1956年间，侯宝林潜心研究相声艺术，在《北京文艺》上一连发表了《相声的结构》，《相声的语言》等几篇文章。时隔不久，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看到侯宝林，说：“噢，你那几篇文章我看过了。你写那么多的东西，是不是想当相声博士啊！”

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大如前了。他怅然若失地对人说：“我好久没有见到侯宝林了。”殊不知，在那个非常时期，侯宝林不仅无法知道毛泽东想听相声的愿望，而且，即使知道了，从死里逃生的他，也无法进入中南海去献艺了。第四届人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听说侯宝林受到了冲击，很是关心，亲自提名选他人大代表，那一次，毛泽东共提了10个人。

有人问侯宝林，你给毛泽东说相声有什么感想？他回答说，当时我有两种心情。一种心情是我对毛泽东同志十分敬仰，很愿意拿我们的相声艺术，使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能休息松弛一下，能笑一笑。另一种心情是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相声，也是为了了解这一个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情况，鼓励我们对它进行革新，使它成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发挥出更大的战斗作用。毛主席生前喜爱看我的相声，这是对我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在旧社会只读过3个月小学的曲艺演员的多大的关心和鼓励啊！

越听越爱听”的高派京剧

被称为，“国粹”的京剧，是毛泽东最喜爱的艺术形式。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收藏的毛泽东遗物中，有磁带 447 盒，唱片 1644 张，相当于一部分内容便是京剧，包括各个流派，各个名角的作品，由此可以想见毛泽东对京剧喜爱的程度。

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偏爱不同的戏。转战陕北时，爱听《空城计》，《草船借箭》，他经常念《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句道白：“司马懿的兵来得好快呀！”念完了就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爱听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和程砚秋的《荒山泪》，高兴了也哼几句《群英会》。大军过江前后及进京以后，他多次看梅兰芳演唱的《霸王别姬》。

毛泽东是一位业余的京剧行家，对京剧的历史、流派、唱腔、程式比较熟悉。他曾谈到京剧是在安徽的徽班二黄和湖北汉剧西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为京剧唱腔主要就是两个：西皮，反西皮；二黄，反二黄。他平时看戏听曲，很注意一些调式、板式乃至唱词和戏剧冲突的设计。早在延安时期，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便称毛泽东是一位“戏曲鉴赏家”。

毛泽东又是一位富于欣赏个性的京剧迷。京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流派，毛泽东认为京剧有流派是好事，梅派、程派、高派，谭派等都有其独到之处，不一定是打乱仗闹独立，越是自成一派，注意总结经验，越能提高艺术水平。但作为个人来说，毛泽东又有他的偏好，承认自己“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在京剧的十几个程式中，他说他不太喜欢摇板、散板和慢板。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已经把华北京剧团的演出日程安排好了。警卫排长阎长林跟毛泽东提起看戏的事。阎长林说：“华北京剧团要给咱们进行慰问演出了，听说这个剧团演得不错，还有一些名角呢？”

“有什么名角？”毛泽东问。

“听说，主角有李和曾，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名。”

毛泽东说：“噢，他可能是以后才出名的。以前的老名角，我还知道一些，现在能看到以前的那些老艺术家唱戏也不容易了。”

这次慰问演出的场地是东柏坡的大礼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都来了。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高庆奎的高足李和曾演宋江。毛泽东赞扬李和曾说：“唱得不错。我很多年还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唱戏呢。”又说：“这个人唱得好，但这出戏点得不够好，只是逗笑的戏，政治内容虽说也不错，就是没有很好地表现出主角的唱功来。唱哪出戏，最好让主角自报。他认为哪出戏唱得最好，就叫他演哪出戏才好。”

最后一出戏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毛泽东爱看这出戏，听李和曾唱的时候，他不断鼓掌，并侧身对周恩来说：“唱得真好啊！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赞许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劲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来就是科班出身。”

周恩来说：“你说得对，李和曾是属于高派艺术。听他的介绍，他9岁就进了北京中华戏剧专科学校学戏，学了8年毕业以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向高庆奎学了3年戏，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主席，明天晚上想看他们演什么戏？”

毛泽东说：“明天晚上我来看戏，演什么戏由他们自己定，他们认为什么戏演得好，就演什么戏。”

在返回西柏坡的路上，毛泽东和身边的人员谈起戏来，他问：“你们说，今天的戏演得怎么样？”

阎长林回答：“演得不错，扮演诸葛亮的李和曾唱得最好。特别是他的唱腔，是那么洪亮，宽厚，听起来真带劲。”

毛泽东说：“这就叫高派唱腔。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明天咱们还来看戏，明天早点来，还是走路来。”

第二天晚上演出的剧目有《孔雀东南飞》、《打渔杀家》、《哭秦庭》。《哭秦庭》由李和曾主演。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念念不忘李和曾，他对身边的人讲：“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京剧界也有好多流派，马派、谭派、梅派、程派、高派，他们都培养了自己的艺术家。”

毛泽东保存了许多高派唱腔资料，如《逍遥津》、《斩黄袍》、《珠帘寨》、《胭粉计》、《鱼藏剑》、《七擒孟获》、《辕门斩子》、《汾河湾》、《八大锤》等。高庆奎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逍遥津》，内容讲

汉献帝写血书给伏皇后之父伏完，嘱其邀约孙权，刘备里应外合除掉曹操，不意事机泄露，曹操杀害了伏皇后、伏完及其二子。这是一出悲剧戏，格调苍凉悲凄，撼人心魄。毛泽东保存的该戏的磁带和唱片有两种，一种是高庆奎和李和曾的原唱，一种是闵惠芬的二胡独奏，没有唱腔。毛泽东时常要听这出戏，如1972年，毛泽东在同《龙江颂》剧组有关人员谈话时，便即兴听了《逍遥津》、《斩黄袍》等高派戏曲的唱片。工作人员为了查我方便，特意在两种磁带和唱片上打上了红色标记。毛泽东遗物中的磁带和唱片，现在播放起来大都音质纯正，如裂玉帛，但播放《逍遥津》，无论是音质还是节奏都有些走样，这显然是反复播放后带子损伤造成的。

毛泽东相关心李和曾的身体、生活和艺术各方面的情况。有次，毛泽东对李和曾说：“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言行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很好研究。”毛泽东还曾从艺术和史料的角度与李和曾就某些剧目进行商榷。50年代，有一次，他听了李和曾清唱《李陵碑》中那段反二黄唱腔后，很风趣地对李和曾说：“杨老令公八个儿子死了四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忠心报国，坚贞不屈的将领，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唱的有悲有愤，是对的，应该这样唱。”过了些日子，李和曾又为毛泽东清唱，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李和曾说：上次，你唱的《李陵碑》唱词里有一句“方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这个人，是否改成“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李和曾觉得很有道理，以后就按照毛泽东改的词去唱了。

刻骨铭心的京剧《霸王别姬》

毛泽东保存了许多梅兰芳的京剧唱腔资料，其中最令他喜爱并受益的莫过于《霸王别姬》。毛泽东遗物中的《霸王别姬》，用日本近代树脂株式会社的磁气录音带录制，梅兰芳剧团乐队演奏。磁带

盒子中有红色的“ ”字形标记，这是毛泽东经常要听，工作人员为查找方便用铅笔画上的。工作之余，毛泽东时常播放这部带子，边哼唱边回味。《霸王别姬》深刻的主题和浓郁的艺术感染力使他刻骨铭心。他曾把《霸王别姬》当作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自勉勉人，教育全党，以期做到警钟长鸣。

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讲到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批评一些省委、地委、县委和第一书记搞“一言堂”，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称这样的第一书记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而应当叫“霸王”。接着，他援引历史典故，对比了西楚霸王项羽的独断专行和刘邦的从谏如流，并说：“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之所以讲得如此厉害，无非是想把一些人戳得痛一些，让这些人好好地想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

1949年4月，正是人民解放军过江，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关键时期。当时住在北京西郊双清别墅的毛泽东，每日焦急关注着战争的进展情况。一天，毛泽东提前吃过晚饭，就在院中散步。他问身边的阎长林：“今天晚上要去看戏，你知道了吗？”

“知道了，都准备好了。”

“几点钟出发？”毛泽东又问。

阎长林说：“路不好走，在路上估计需要一个小时。我们六点半出发，就可以按时到达。”

毛泽东说：“看戏也是工作啊。我们今天去看闻名中外的梅兰芳先生演的拿手好戏《霸王别姬》。这位戏剧界的名人可不简单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梅兰芳先生就留须隐居，再也不演戏了。他不顾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罢歌歇舞。这位艺术家的这种民族气节是多么可贵呵。我们今天去看他的演出，就是提倡这种民族感、正义感，号召人们向他学习。

在汽车上，毛泽东对同去看戏的警卫人员说，梅兰芳这种有名望的艺人，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竟然留须隐居，再也不出面演戏了。这在中国人民当中，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当晚，梅兰芳演虞姬，刘连荣演西楚霸王项羽，刘连荣也是京剧界的名流。演出快结束时，阎长林请毛泽东早点退场，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提前走不好，那样做不礼貌。”在回去的路上，毛泽东赞叹：“这真是高水平的艺术表演。今后，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戏剧家，在政治上将要有地位了，将要受人尊敬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肯定我国的戏剧能很好地发展起来，能够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49年4月底，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从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兴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中提出要“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进京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观看《霸王别姬》这出戏。一次，看到楚霸王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与虞姬生离死别，毛泽东的眼睫毛抖个不停，眼眶里湿漉漉的。他用一个指头按住李银桥胸前的钮扣，用沙哑的声音说：“不要学楚霸王，我们都不要学。”

《霸王别姬》给毛泽东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除了用人，把握时机外，毛泽东对项羽穷途末路时悲唱“虞姬虞姬奈若何”也大不以为然，更不赞同项羽的自刎之举。清代吴景旭《历代诗话》中有《二乔》一则，从社牧的《赤壁》说到《乌江亭》一诗：“胜败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论者认为：“项羽以八千子弟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毛泽东读至此，揽笔批下四字：“此说亦迂”。在他看来，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坚韧不拔，便终能成就大业。

以战略眼光看《穆桂英挂帅》

在梅兰芳表演的京剧作品中，除了《霸王别姬》，另一部受毛泽东欣赏并珍藏了唱片资料的当属传统剧目《穆桂英挂帅》。建国10周年之际，毛泽东看了该剧后对梅兰芳说：“这个戏很好。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活40年的集中表演，也是你老年的代表作。”毛泽东遗物中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唱片，为中国唱片厂制造，为 $33\frac{1}{3}$ /分密纹唱片。装唱片的纸袋，一面为剧照，一面为说明和唱词，从说明来看，唱片正面播放时间为12分12秒，配有两段唱词，唱片反面播放时间为8分20秒，配有一段唱词。

毛泽东最早观看《穆桂英挂帅》演出当是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为欢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假座中央干部学校举办为期三天的文艺晚会，特邀在重庆的各界人士参加。第一天晚上招待美国大使赫尔利；第二天晚上招待英国大使许阁森；第三天晚上招待苏联大使罗申，并邀请了毛泽东。

晚上六点半左右，毛泽东与罗申大使乘坐的轿车停在中央干部学校大礼堂门前。蒋介石即从休息室出外迎接毛泽东和罗申大使。当毛泽东与蒋介石步入剧场时，全场起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开演前，蒋介石上台致欢迎词，毛泽东致谢词。那天晚上演出的是京剧《穆桂英挂帅》。毛泽东坐在蒋介石与罗申大使中间。周恩来与宋庆龄均未出席。九时许，舞台休息，毛泽东与罗申大使离座告辞，蒋介石亲自送他们上车，尔后又返回座位继续观看京剧。

建国特别是“反右”斗争开展以后，毛泽东出于“古为今用”的考虑，在对一些牛鬼蛇神的剧目大张挞伐，并贬低一些缠绵悱恻的才子佳人戏的同时，称赞和推荐了一些虎虎生气的武旦和刀马旦戏，即以勇武仗义的女性为主角，情节多为战争，表演着重武打的剧目，如《穆桂英挂帅》、《泗州城》等。其目的是鉴于紧张的国际局势，提倡全民皆兵。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直言告诫：我们应该做战争的准备，要武装起来，全民皆兵。前天你们唱的《泗州城》的戏，要学唱，多唱打仗的戏，少唱点《梁山伯与祝英台》。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我就赞成唱点穆桂英，《泗州城》那些讲打的戏。《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可以唱，要少一点，祝英台太斯文了。女将穆桂英比较好，还有花木兰。为进一步扩大穆桂英的影响，1959年4月24日，毛泽东特急给周恩来一信，说：“曾在郑州看过河南豫剧《破洪州》颇好，说穆桂英挂帅的事，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扮穆桂英。可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民代表演一次。

《穆桂英挂帅》中的主人公穆桂英在杨家将男儿为国捐躯，后继乏人的情况下，毅然挂帅出征抗辽，大破天门阵，其勇于斗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与毛泽东的个性及政治思维方式产生了强烈共鸣。除此之外，该剧也突出反映了毛泽东的妇女解放观念。全民是否“皆

兵”，对壮民男子来说不存疑问，关键在于占“半边天”的妇女。故而

毛泽东没有那些特别强调具有同样主题的武生戏，而是推荐穆桂英、花木兰这些几乎已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妇女英雄的“原型”人物，以及《泗州城》中那些敢爱敢恨，兴涛动波，水淹泗州的水母娘娘来壮气壮胆，激发全民意志。毛泽东历来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中妇女受压迫最深，妇女的解放是劳动人民解放的重要尺度。用穆桂英、花木兰这些巾帼英雄感召妇女，激励妇女，其宣传感染效应是巨大的。女民兵兴起后，毛泽东特意赋诗一首以彰其迹：“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练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字里行间，跃动着对现代穆桂英、花木兰的呼唤和深情。

每看必流泪的《白蛇传》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收藏的毛泽东遗物中，据粗略估计，共有唱片和磁带2千多张（盒），其中占第一位的便是戏剧。毛泽东看过并喜爱的戏剧剧目，几乎都有相应的磁带或唱片，常常是一个剧目，既有磁带又有唱片，既有不同流派的演唱又有同一流派不同个人的演唱。对于喜爱的剧目，毛泽东时常是看了又听，听了又看，充分领略其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拿传统神话戏曲《白蛇传》来说，毛泽东早在1953年到1954年就连续看了多遍，身边保存的该剧的唱片资料，也包括京剧、粤剧、越剧等多种唱腔。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又一次提出看《白蛇传》，并留下了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

前文说过，毛泽东是一位很有个性的戏剧爱好者。他的个性不仅仅体现在对戏剧的流派、唱腔、内容、程式等的偏好和独特见解，而且还体现了他在欣赏过程中的情感和行为特征之中。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欣赏情节紧张斗争激烈的戏剧时，常常忍不住要掉泪，对受压迫、受剥削的人物形象更是倾注深情。有次看《铡美案》，大部分时间他泣泪涟涟，终场了还显示出十分悲愤的样子。1953年到1954年，他每次看《白蛇传》都流泪，鼻子呼呼地透不过气。

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主席准备娱乐活动，征求他的意见，他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

晚上，李银桥随毛泽东驱车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毛泽东就座的前排摆放的是单人沙发，李银桥照例坐在他身边，因为值班卫士是24小时不离主席身边的。毛泽东肚子大，坐下后皮带就勒腰，所以他一坐，李银桥便照惯例帮他松了腰带。

演出开始了。

毛泽东很容易入戏，一支烟没吸完，便拧息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再也不曾抽烟。他就那么睁大眼睛看，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时而扼腕叹息，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老和尚法海一出场，他的脸色立即阴沉下来，嘴唇微微张开，下唇不时轻轻地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

随着剧情的展开，许仙和白娘子开始了痛苦的生死离别。毛泽东完全进入到戏的情节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积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顺脸滚下，落在胸襟上。

毛泽东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已经是一道一道地往下淌。他鼻子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附近市委领导的目光朝他这边稍触即逝。李银桥觉得有责任维护主席的“领袖风度”，便轻轻地咳了一下，不想咳声没唤醒毛泽东，却招来了几道目光。

毛泽东旁若无人，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擤鼻涕，李银桥只盼戏快些演完。

就在法海将白娘子收钵镇压在雷锋塔下的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就在毛泽东立起身的一刹那，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直落到脚面。李银

桥像被人捅了一棍子似的纵身扑向前，抓住裤子，一把提上来。他带着自责与惶恐，用颤抖的手匆匆地帮毛泽东系好腰带。他为没有维护好领袖形象而深深不安。

毛泽东却丝毫没有责怪李银桥的意思，似乎没有觉得掉了裤子，他还沉浸在剧情中。只有当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时，才将毛泽东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他回到现实中了。

毛泽东同演员见面时，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娘子”握手，没有理睬那个倒媚的老和尚“法海”。

毛泽东看戏“旁若无人”，平时哼唱戏剧时也“我行我素”，怡然自得，只是在记不清唱词时，才想到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提示后，仍由他一人自娱自乐，如果工作人跟着他哼唱，他会显得不高兴。为便于晚年毛泽东听好戏剧，有关部门曾将戏剧唱词印成大字本，他一边听时，一边可以对照看唱词，免去了有时听不清的遗憾。

种类繁多的地方戏唱腔资料

中国各个地方富有特色的方言和语言表达方式，特别是不同的民情、风俗和地域文化，形成了许多为当地观众熟悉和欢迎的地方剧种。

毛泽东也很熟悉一些地方剧种的风格特色，他绝不因为自己喜欢京剧而排斥和轻视地方剧种。一次在湖北视察工作，他主动提出要看已流传不广的原始黄梅戏，特别喜欢乡土风味很浓，且被当时一些人认为有“黄色”之嫌的传统剧目《张二女推车》，观看时连说“有意思，有意思”，认为这种土里土气的戏让人看了有亲切感，体现了劳动人民本色，于老四，张二女这一对情人，留姓氏排行下留名，可见是一对劳动者，要不张二女怎么会推车呢？1969年秋，他在杭州听了“改革越剧”《红灯记》后说：我不赞成把越剧改成不像越剧。各地方剧种应有自己的特点，不然，要那么多地方戏干什么。一个剧种就够了嘛。

在毛泽东遗物中，有种类繁多的地方戏唱腔资料，包括湘剧、晋剧、越剧、昆曲、粤剧、豫剧、楚剧，秦腔、锡剧、祁剧、河北梆子，甚至还有广东的潮剧、江西的采茶戏和闽南的高甲戏，可以说是中国地方戏剧宝贵的“资料库”，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偏于京剧，不废百家的戏剧审美观。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时常在留声机里放昆曲和秦腔，建国后，随着条件的改善，他搜求了范围极其广泛的地方戏唱腔资料。可以随兴所致地欣赏和品评。他到一些地方视察、开会，都乐意欣赏当地的地方戏，并发表了大量的观感。

1959年，他看完后，便称赞戏中衡山县令黄伯贤将亲女儿黄秀兰代替被冤枉的王玉环赴法场的义举，说这种舍己救人的高尚思想，值得学习。该戏的末尾有南包公海瑞出场。这个人物引起毛泽

东的兴趣。第二天，他专心阅读了《明史》中的海瑞传。之后，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海瑞还把这个话写进上疏里，后来被关进了监狱。有一天，牢头给他端了酒、菜来，才知道嘉靖已经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全吐了。可见海瑞对嘉靖皇帝忠心耿耿。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海瑞这种精神，说他“刚直不阿，直言敢谏”。1956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看了昆曲《十五贯》，并由他们倡导在全国文艺界引起轰动。毛泽东对该戏的称道，主要是认为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他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

《打金枝》是晋剧的代表作。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很喜爱这出戏。他曾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议论过《打金枝》，说：郭子仪的儿子与皇帝的女儿结婚后闹矛盾，郭子仪便和皇帝各自批评自己的孩子，解决得很好。又说：郭子仪很有政治头脑，当时有人告他有谋反之心，郭听后就便门户洞开，任人参观。1956年在武汉看了沈云陔主演的楚剧

《庵堂认母》后，毛泽东说沈演得好，唱腔象程砚秋，圆润深厚，我看程砚秋比梅兰芳唱得好。

毛泽东同情什么，赞美什么，厌恶什么，最真实地反映在他艺术体验

心态中。越剧《西厢记》毛泽东看过和听过多次，留下的印象也极为深刻。一次会议上，他讲了《西厢记》中张生和惠明和尚的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找人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可又无人敢突围出去，于是开群众会议。这时，很不起眼的杂役僧惠明挺身而出，杀出重围，搬了兵，解了围。毛泽东接着说：惠明见义勇为，勇敢大胆，是个坚定之人，希望中国多出点惠明。《西厢记》还有个小人物特别为毛泽东欣赏，这便是崔莺莺的丫环红娘，说她是个有名的人物，是个青年，是个奴隶，为了成全别人，自己受拷打，不屈服，反过来把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老夫人责备了一通。你们说，究竟是红娘学问好，还是老夫人的学问好？《西厢记》还促使毛泽东总结了一条旧社会的规律，即“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是愚蠢些。”之所以贫贱者胜过高贵者，是因为前者“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冲突律”是戏剧的基本特征之一，可以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毛泽东对于地方戏，也主要钟情那些两派斗争激烈的剧目和情节。1962年8月5日，在一次谈话中谈到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无冲突论”是不对的。如戏，总有一点别扭才有“戏”。《西厢记》中老夫人代表封建势力，是对立面，有了老夫人才有戏，不然光有莺莺、红娘、张生三个人打成一片，没有对立面，还有什么戏呀！《宝莲灯》也是这样，里面有一个二郎神与三圣母的矛盾。冲突越多，越激烈，戏就越有意思，人们也就越愿意看。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与何其芳等的谈话中，津津乐道广西“彩调”《刘三姐》中的主人公反压迫的革命行动。与《刘三姐》相比，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的戏剧冲突不鲜明，毛泽东虽然也爱看，但并没有留下什么评论。

生前赏识的现代京剧唱片

毛泽东迷恋京剧艺术，到晚年甚至直接倡导了一场“京剧革命”，产生了现代京剧。其得失成败尚待后人评说，但无论如何，毛泽东倡导的这场“京剧革命”称得上是一次文化“探险”工程，也

是一次“旧瓶装新酒”的大胆尝试。毛泽东遗物中，有较完整的现代京剧唱片资料，包括《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等广为人知的样板剧目。睹物思人，睹物思史，这些遗物作为生动的实体见证，铭记着它们的主人与现代京剧的神交苦恋和历史渊源。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从抗战的要求出发，提出一切文艺样式都应该体现出适应时代需要的内容，只要对抗战有利，“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艺”的讲话中特别提到：在旧戏中也要加上抗敌和民族英雄的故事。次年4月参加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晚会上谈到戏曲内容太旧时，又说：“如果加进抗日内容，就成了革命的戏了。”在其倡导下，边区“文协”筹办了以利用旧形式，改进民间传统戏曲为宗旨的“民族娱乐改进会。”

旧瓶装新酒，无疑是毛泽东关于戏曲改革的最初思路。建国初期的1951年4月，毛泽东在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所作的题词，则把最初的思路提炼到“推陈出新”的理论高度。基于这样的文化观念，毛泽东晚年倡导了一场震撼神州的“京剧革命”。

“京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便主张以现实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代替传统京剧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三大题材内容，在内容上彻底更新。与此同时，他又强调尊重京剧本身的艺术规律，对台步，对韵白，对唱腔，对水袖，对脸谱，以及锣鼓点，京胡声等京剧形式“基本上要保留”。70年代，他在湖南看了一出戏后说，京剧本来的风格，唱腔，要保留百分之七十，京剧要象京剧，老同志要带好新同志。所谓“要保留百分之七十”，就意味着百分之三十可以更新，一成不变是不行的。毛泽东对此也是有感而发。196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有个人与毛泽东谈话时，收音机里播放着京剧唱段，毛泽东问他能否听懂，他摇摇头，并说曾在看旧戏时睡着了。毛泽东接着说：看，你们有文化的人都听不懂，广大群众就更没有法子听了，要改革。

但是，“京剧革命”并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所设定的模式而展开。特别是由于江青、柯庆施之流的鼓噪，“京剧革命”很快发展到对声腔动作、服装道具等艺术形式的彻底“革命”，现代京剧也摇身一变而为“样板戏”。所谓“样板”，从创作角度讲，恰恰是戏曲形式成了“样板”。对于戏改走人“样板”一途，毛泽东陷入两难评价。他对江青之流搞样板戏唯我独尊的做法，是不满意的。在1972年7月30日接见《龙江颂》剧组有关人员时，他明确提出：现在的戏太少了，只有几个京剧，看来，还是要说话。说人家演样板戏是反样板戏，不要那么讲。1969年秋天在杭州接见浙江文艺界人士，有人提到是江青创造了样板戏，他却说：不是，戏原来就有，是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在此期间，毛泽东先后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

《奇袭白虎团》等剧目，有的在以后又再看过，几乎对每一种剧目都发表了观感。

1964年7月17日，毛泽东观看了《智取威虎山》。他认为反面人物的戏太重，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他还建议将杨子荣“打虎上山”唱词中“迎来春天换人间”的“春天”改为“春色”。1969年6月，江青、姚文元曾特别召开会议，宣称《智取威虎山》与小说《林海雪原》有“质的区别”，要改名。改名是“质的飞跃”，于是将

“威虎山”改成“飞谷山”，杨子荣改成“梁志彤”，忙了一阵，被毛泽东发现后予以制止了。

同年7月23日，毛泽东看了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很高兴。他指出胡传魁、阿庆嫂，刁德一塑造得好，兵的形象不够丰满。指导员的音乐形象不成功。这个戏的风格，后边是闹剧，戏是两截。他建议秘密工作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戏名还是叫《沙家浜》好，事情都出在这里嘛！他还指出，不要亮相是不对的，指导员和兵一起，没亮相，开打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的。

1964年8月10日晚，在北戴河，毛泽东观看了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奇袭白虎团》，在整个演出中，毛泽东兴致很高、当听到剧中人严伟才说，“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叫做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时，毛泽东笑了，说：“这些话不都是我讲的吗？”毛泽东希望这个戏修改时要做到“声情并茂”。

隔了一天，8月12日，毛泽东观看了山东淄博、青岛京剧团合演的《红嫂》，同样非常高兴。最后，有同志请示他还上不上台接见演员时，他爽朗地说：“省里剧团我上了台，地区来的怎能不上呢？上！”此外，他还特意招呼：“你们团还有没来的人吗？”有人回答：“还有几个道具工人。”毛泽东说：“来，都叫来，见见面嘛！”剧团里的人兴奋得一夜未合眼。一天，李讷到剧组去玩，演员们问她。“毛主席喜欢不喜欢我们的戏？”李讷微微一笑：“我听爸爸讲，山东一下子出了两个好戏，不简单。”

1964年11月6日晚，在中南海小礼堂，毛泽东观看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出的《红灯记》。新华社摄影记者江宁生，那天专摄毛泽东观戏过程中的镜头。据他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基本上没看戏，一直观察毛主席的表情。大幕一拉开，他老人家就聚精会神地看起来。演到说家史和刑场那两场戏，我还看到毛泽东眼角上渗出了泪水。中间休息时，大家请毛主席去休息室坐坐，他好像还沉浸在剧情中，轻轻地摇摇头说：‘你们休息吧……，这是我离毛泽东最近的一次，深深感到他老人家感情非常丰富。二十多年了，我始终忘不了这一幕。’”

毛泽东不喜欢单纯的悲剧，他乐于在剧烈的戏剧冲突中看到昂然奋发的战斗精神和富于光明前景的未来。关于《红灯记》他曾说过：我原想李玉和一家三口都不要死，否则看了太悲，但那时的情况又确实如此，敌人对我们太惨，很厉害，都改掉了可能不行。为此，他欣赏《沙家浜》，认为它讲斗争，但未死人，一般人爱看。他还为《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单人独马打入

匪巢，后来栾平又跑上山来，差点把杨搞得十分担心，认为是人为的搞了些紧张。这些，都反映出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欣赏个性。

以“民乐”为主的音乐磁带

在艺术天地里，毛泽东涉猎甚广。他不仅是一代卓绝的诗人、书法家和戏曲鉴赏家，而且还是一位颇有个性化的音乐爱好者，特别钟情民族音乐。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便开始收集音乐戏剧唱片。工作之余，他常用江青从上海带来的一部美国产留声机播放唱片，在陕北那种艰苦环境下，这种享受多少给紧张而简陋的生活注入了一些优雅情调。

1941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有了一部手摇式电唱机，但是缺乏唱片。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把自己保存的20多张音乐、戏曲唱片送给了广播电台，让延安民众从广播中听到这些唱片上的节目。并当面嘱咐电台的同志要搞好广播工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用过的开始曲——《渔光曲》就是来自这批唱片之中。当人们从广播中听到《渔光曲》婉转悠扬的旋律时，感到分外亲切，知道新华电台开始广播了。

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收藏的毛泽东遗物中，有300多张音乐舞曲唱片，其中外国音乐约占六分之一，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马赛曲》、《我的太阳》、《女神圆舞曲》、《杜鹃圆舞曲》、《永久的爱情》、《夫人，我吻你的手》、《梦幻梦幻》、《吉普赛游戏》、《意大利花园》等。其余则都为民族音乐，荟萃了中国历史上的音乐精华，按演奏的乐器归类，即可罗列如下数种：

古筝演奏：《高山流水》、《渔舟唱晚》、《海青拿天鹅》、《广陵散》。

琵琶演奏：《十面埋伏》、《月儿高》、《夕阳箫鼓》、《大浪淘沙》、《倒垂帘》、《天山之春》。

二胡演奏：《听松》、《江河水》、《空山鸟语》、《赛马》、《喜送公粮》。

笛子演奏：《梅花三弄》、《运粮忙》。

木琴演奏：《快乐的女战士》。

钢琴演奏：《北风吹》。

小提琴演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盼东方出太阳》。

在中国的地方音乐中，毛泽东最喜爱广东音乐，他保存的广东音乐唱片有《柳浪闻莺》、《宝鸭穿莲》、《雁落平沙》、《阳春白雪》、《走马》、《春到人间》、《步步高》、《纺织忙》、《孔雀开屏》、《胡笳十八拍》等。一个人收藏什么，收藏多少，总是与其兴趣爱好密切相关的，知人论世，不可不察其物。毛泽东不喜爱话剧，认为话剧表演太坐实，韵味不够，故其遗物中绝少有话剧作品。

毛泽东保存的舞曲唱片，多为风格节奏欢快热烈的作品，如《喜相逢》、《喜洋洋》、《少女欢乐舞》、《赣南采茶》、《摘棉花》、《牧羊女》、《浏阳河》、《丰收乐》、《三八作风》、《剪窗花》等。说起毛泽东跳舞的故事，那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人们渴望在九死一生的战略大转移后得到一些松弛和欢乐，而那时又有不少进步青年特别是知识女性慕名来到延安，于是，跳舞特别是跳交际舞一时在延安颇有流行之势。

毛泽东一生戎马倥偬，几十年不涉足大城市的舞场，对跳舞自然不感兴趣，甚至从未想到过要跳舞。到达延安后，他的业余活动是听京戏，打乒乓球，悄然兴起的跳舞风并未引起他的多大注意。但是环境变了，身为共产党的领袖不会跳舞，自然会有许多人自觉地去弥补这个缺陷。江青、朱仲丽，还有史沫特莱等轮番怂恿和鼓励毛泽东跳舞，毛泽东身不由己，只好半推半就地走上了习舞之路。

一个晴朗，微风拂面的夜晚，夕阳使窑洞外的山坡染上一抹殷红。江青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朱仲丽连哄带拖地把毛泽东请出来学跳舞。窑洞外放着三把椅子，椅子上放着留声机和几张旧唱片。朱仲丽说：“主席，我愿意当您的舞伴。您在百忙中，应该抽点儿时间休息一下，轻松一下，锻炼一下身体呀！江青同志早就招呼我陪你学跳舞，你怎么今日才抽出身呀！”

“我不知跳舞有什么好处？”毛泽东笑着问。

“第一，跳舞可以活动下肢，尤其是腿跟子，还可以起到娱乐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种社交形式，有人还把跳舞当作一种高雅的情趣加以享受。”朱仲丽认真地对毛泽东讲。

毛泽东首先由江青带着，跟着音乐迈步子，朱仲丽在一旁打拍子。这是一张维也纳狐步舞曲唱片，面对欢快优美的旋律，毛泽东不知如何举措。他被江青拉着转了几圈便有些不耐烦了，把手一甩，往藤椅上一坐，就下意识地摸烟了。接着江青邀请朱仲丽跳了一曲，毛泽东吸着烟，看得很认真，像是发现了一种美。当朱仲丽教他学时，毛泽东来了兴致。

“你的脚，要灵活些，别像士兵操练似的，要把脚尖抬一点，擦着地板跳，就好看，还要学会转圈子，朝左朝后。”毛泽东被朱仲丽搞得团团转，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啊，不知跳舞还有这么多奥妙，你这个女娃子，权力真大，竟成了我的指挥官了。”

美国妇女活动家史沫特莱带着政治和个人的热情，在三十年代曾试图让毛泽东唱歌跳舞。她曾告诫毛泽东跳舞要用心而不是用脚，因而使毛的舞技有了一些长进，但她始终感觉到毛泽东的“高做和自重妨碍了他的跳舞。”

杨家岭礼堂盖起来后，每星期举行一次舞会，乐队很简单，三把胡琴，一个三弦，一个小提琴，演奏者都是中央机要科的年轻人。有次，毛泽东刚到舞场，洋味十足的上海青年吴莉莉大方地走过来邀请毛泽东跳舞，毛先是一怔，然后下意识地摇摇手，说自己不会跳舞。

“您能写出《实践论》，难道学不会走舞步吗？”吴莉莉出口不凡。

“啊啊，是应该实践，应该实践”。毛泽东一边说，一边被动地下了舞池。

毛泽东感觉自己与舞伴跳得不太协调，为冲淡一下别扭的气氛，他说出一句风趣的话：“我们不是在跳舞，倒像是拼刺刀。”

“我可不敢和您拼刺刀。”吴莉莉笑着说。

毛泽东哈哈大笑：“你这个小布尔乔亚，不值得和我一拼。能和我者毛拼一拼的是蒋介石。”周围的人一下子笑了起来。吴莉莉结识毛泽东以后，又多次和毛泽东共舞，教会了他好几种舞步。

在5、60年代，中共领导人跳舞的兴趣很浓，跳舞的地点就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和春藕斋。首长们来跳舞的时间很有规律，除开节庆日，朱德一般

是晚上七点半到舞场，九点左右离开。刘少奇来得稍晚，走得也稍晚，因为他经常要等毛泽东来，汇报些情况。毛泽东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经常是十点以后才来，十二点以后离开舞厅去办公。

当时，负责陪同中央首长跳舞的常常是空政文工团的女团员们。有天，年方十六的小演员王学文受领导安排，陪毛泽东跳舞。当毛泽东进来时，王学文痴痴地站着，忘记了周围，忘了自己，忘了一切，她眼里心里只剩下那个从记事起就熟悉了的形象，好一阵才回到现实中来。

当一曲新维也纳圆舞曲响起来后，小王羞怯地挽着毛泽东步下舞池，开始跳起舞来。毛泽东跳舞时喜欢亲切地和舞伴聊天，问问舞伴的年龄，籍贯和生活工作情况，不时来点幽默，以消除对方的紧张感，这次也不例外。他望着小王稚气未脱的脸，轻声问道：“你

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我叫王学文，十六。”

“当兵了，不能学文不学武啊。”毛泽东一句诙谐的话，使小王的紧张感消除了一大半。接着，毛泽东又问起小王的籍贯、工作和家庭情况，谈着笑着，小王的身心变得完全舒展起来，舞姿优美动人，敏捷洒脱。毛泽东穿着一双棕色的大皮鞋，鞋底很厚，跳舞时迈着大步，像车轮一样沉重有声。

毛泽东不善跳舞，只能跳慢三、慢四和曳步舞。但他有个绝招，一曲终了时，能准确无误的将舞伴送到原来的座位。王学文正跳得尽兴，毛泽东的手忽然在她肩上一按，她身不由己地坐下去，定定神，发现自己正坐在原来的地方。毛泽东微笑点头致礼，独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

对毛泽东来说，跳舞不仅是娱乐，而且还是接触群众，了解下情的好机会。1962年12月，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的崔英曾在两次周末舞会上与毛泽东跳舞。第一次跳舞时，毛泽东得知崔英的爱人1960年下放安徽锻炼期间，因医疗事故而去世的经过后，关心地询问她生活是否有困难，并勉励她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见崔英仍在流泪，毛泽东微笑着握着她的手，又用左手扶着她的肩说：“多好听的中国民族乐曲呀，快去跳舞吧，去找大家玩吧。”毛泽东的关怀使崔英大受感动和鼓舞。两周后的又一次周末舞会上，当慢四步舞曲响起来后，崔英快步走到毛泽东身边，请他跳舞。两人踏着舞曲节奏，缓缓慢步。崔英趁机向毛泽东介绍了反右派运动中，某些地方党委不执行政策，把一些好同志无端打成右派的情况。毛泽东突然停止了舞步，当即要崔英把各地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送给他，以便对真正划错的右派进行平反。

响彻天际的《东方红》卫星乐曲

毛泽东遗物中有两盘特殊的磁带，那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原始记录，也是毛泽东关注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物证。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为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令全世界人民惊奇的是，这颗卫星还用2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了那首根据陕北的信天游改编的《东方红》乐曲；从4月25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天广播由卫星发回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讯号。

此时此地，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诞生于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古老而又新鲜的乐曲，萦徊，婉转，足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激情，而用卫星播放音乐，也可谓中外音乐史上一大创举和人间奇迹。

4月25日，毛泽东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呈毛主席：

呈上“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出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录音胶带一盘。

请收。

致以

革命敬礼！

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

1970年4月25日

4月28日，毛泽东又收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的一封信，并送给他一盘磁带。

这是一盘老式圆盘形磁带，呈棕色，塑料质地。据信中说，这是“东方红一号”卫星飞经首都北京和海南岛上空时直接收录、未加剪接的录音胶带。

毛泽东在卫星上天的那一刻，与全国人民一道分享了这胜利的幸福。他曾讥刺苏联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他要让中国的卫星翱翔天宇，他也要让中国的红旗永远飘扬。

26日，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分别致电毛泽东，热烈祝贺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仇视中国的一些国家则对此深感惊讶，但当他们收听到中国卫星发回的歌唱毛泽东的那首乐曲和遥测讯号，他们不得不相信：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

收支家政篇

“第一家庭”的日常开支表

日常开支表是毛泽东一家生活帐中的一种。

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珍藏的毛泽东遗物中，有一套较完整的毛泽东一家的生活帐。作为毛泽东家庭日常生活情况的真实记录，生活帐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有助于人们更真切地了解毛泽东的家政家计、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和人际交往。

1990年10月，当中南海毛泽东遗物的交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周，即将接近尾声时，原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忽然想起，可能还有些生活帐之类的东西，存放在中央警卫局大楼的地下室。随后，有关人员征得中央办公厅的同意后前往查找。进入地下室一间摆放毛泽东餐具的房子，只见一个大柜子角上堆放着一握尘封已久的纸张。翻开一看，都是毛泽东一家的生活帐，上面还有原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的签字。显而易见，这是一

份险些被遗忘的珍贵历史文物。如不及时“抢救”出来，任其尘封受潮，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去的同志喜出望外，来不及细看便全部接收了下来。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一级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沈庆林、阮家新、万岗、苏东海、夏传鑫等鉴定，毛泽东一家的生活帐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毛泽东一家的生活帐，记载时间最早的为1952年，止于1977年1月。生活帐包括日常杂费开支表、生活费收支表报、物品分类帐、粮食食品帐，以及单据和票证。其中日常杂费开支表以其具体、详细最引人注目。

日常杂费开支表共4本。1本为黑色隐花硬皮“现金日记簿”，载1955年8月1日至1956年3月21日毛泽东一家购买洗衣粉、针线等日用品开支情况；2本为北京成文厚帐簿文具店出品的软皮现金日记簿，载1963年11月16日至1968年1月22日毛泽东及其家人、身边工作人员购买洗涤用品和锅碗瓢盆、医药费的各项支出；1本为绿色硬皮本，记载1968年2月8日到1970年1月20日为毛泽东购买茶叶、葡萄糖、头油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情况。

据毛泽东生活秘书吴连登等回忆，除外出没带帐本，以及外出期间请在京同志买东西只登总帐外，其余一切用度均逐日逐项登记在册，这与日常杂费开支表的内容是相吻合的。从表中可看出，不管是购买大宗物品，还是购买针线纸笔，肥皂头油，也不管是请客看戏，还是修理收音机，换洗窗帘桌布，事无巨细，开支多少都有明确记载。如1963年11月23日，毛泽东购买乒乓球12个，每个0.2元，共2.4元；1969年10月20日至12月7日，毛泽东在武汉时付洗衣费，12次共2.10元；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和江青交纳本月党费共20元；1976年4月27日，毛泽东购买双响炮50个，共10元。

作为农民的儿子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终身保持着节俭朴素的生活习惯，自己用过的东西，即使是一支钢笔也舍不得丢掉。他的衣服鞋帽，许多都是补了又补，一件睡衣打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也打了53个补丁，一双旧拖鞋烂得连鞋匠都不愿再修。日常杂费开支表中有关修理物品的记载随

处可见。如 1963 年 11 月 24 日，修小锅换底 1 个，用去 1.10 元； 1964 年 5 月，毛泽东的皮凉鞋换底，用去手工费 2 元；毛泽东有一只瑞士产欧米嘎手表，此表是 1945 年 8 月重庆国共会谈时郭沫若送给他的，此后毛泽东便一直将其戴到临终，其间手表坏了多次，便派人去钟表店修理，前后用去了几十元修理费。

在毛泽东看来，浪费是最大的可耻，因此，凡是能节省的就尽量节省，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支。

江青喜欢看戏、买唱片和摄影。日常杂费开支表有关这些费用都有记载。如 1963 年 12 月 1 日到 12 月 6 日，江青在一周内看戏 5 次，花费 17.8 元。1963 年 12 月 17 日，江青买京剧名角裘盛戎唱片 13 张，共 3.4 元。江青花费最多的是摄影，如 1964 年元月 25 日登记，江青买胶卷 10 个，共 62.2 元。1964 年元月 1 日登记，江青洗照片用去 105 元。据 1963 年 11 月 16 日到 1964 年元月 16 日的统计，江青在两个月内用于摄影的费用达 227.1 元。有次江青买了照相器材，毛泽东还批评了她。江青在摄影方面的花费较多，毛泽东便在穿戴方面给她一些限制。江青手头拮据了，在穿戴方面有时只好降心相从，通过染、整，改来变换衣服的式样和颜色，如将长袖改成短袖，将中山装改成西服，将白的染成灰的。1964 年 12 月 4 日，江青染裤子用去 0.9 元，1963 年 12 月 3 日修改衣服用去 22 元，1965 年 2 月 9 日染头巾用去 1.6 元。爱穿戴是女人的天性，江青既然在穿戴上受限制，所以有时难免在心理上产生不平衡。当王光美穿着旗袍，戴着金项链随刘少奇出访印尼大出风头时，江青嫉妒得要命。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她不惜支持红卫兵给王光美戴上乒乓球做的“项链”进行批斗。

由于工作关系，毛泽东常常要留客人吃饭。他请客一般都是四菜一汤，他自己点一个菜，请客人点一个菜，然后配两个素菜，一碗汤，只有个别情况例外。日常杂费开支表中，记载了毛泽东宴请某些特别客人的费用。如 1965 年，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辗转回到故土。毛泽东在 7 月底热情接待了李宗仁，对他改善海峡两岸关系的真诚态度和爱国爱乡之情给予了高度评价。会见后毛泽东请李宗仁吃饭，招待费共 50 元。

向中央警卫局上报的生活费报表

1962年以前，毛泽东一家没有定制的收支报表。这年春天，毛泽东把汪东兴找去、说发现自己身边有“老鼠”，提出整顿思想作风，逮住“老鼠”。于是，由汪东兴牵头，毛泽东所在党支部（当时称中央第一办公室）开展整风自查活动，毛泽东对某些身边工作人员趁随他外出活动时无偿索要地方财物，买东西走后门不给钱、少给钱作了批评、还清退了个别有贪污和读职行为的工作人员。对下面工作人员的多吃多占，毛泽东拿出自己的稿费一路赔下去，共赔了2万多元。与此同时，毛泽东建议，对自己一家的收支认真填写报表，每个季度向中央警卫局财务处上报。生活费收支报表共42本，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用横格薄纸自制而成，封面上写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活费报表”等字，并有汪东兴、张耀祠等人的签

字。内容为1962年到1975年（缺1974年）的月度报表、季度报表或年度报表。其中1962年3本，报表10张，1963~1970年每年4本，分别为12张、12张、12张、8张、11张、8张、5张、6张。1971年3本，共9张，1972年2本共11张，1973年1本，共9张，1975年1本，共7张。其中1968年8月以后的是与江青分开独立上报的，江青另有生活费收支报表。

毛泽东一家的收入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工资，一项是稿费。1955年7月中国实行薪金制，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每月工资为243元，由中央警卫局财务处发放。毛泽东的工资数额以后一直未变动，江青的工资从1968年3月起调整为342.7元。除了工资，均没有额外的补助。实行薪金制之初，李银桥草拟了一个《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把毛泽东、江青工资的开支分为主食（450元）、副食品（120元）、日用品（15元）、杂支零用（18元）、房租费（49.63元），党费（20元），李敏、李讷读书和生活费（每人每月25元）、李云露生活费（江青姐姐，30元）等9个项目，请毛泽东、江青阅示。江青在自己的名字

上画了圈，毛泽东批示：“照办”。毛泽东的稿费由中央特别会计室管理，在50年代即达100万元，当生活费不足时便从稿费中列支，毛泽东每年用于自家生活的不到1万元。未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动用稿费。

从生活费收支报表中可以看出每个月毛泽东一家收支的大致情况，如1968年1月：

收入：上月接转 14095.45 元
毛泽东工资 404.8 元
江青工资 243 元
支出：月房租费 125.02 元
送王季范、章士钊：4400.00 元
12月，1月党费 40.00 元
日用消费品 92.96 元
液化气 9.6 元

伙食 659.13 元

毛泽东生活费报表中的开支项目，每个月不尽相同，如医药费一般是几个月集中在一个月上报，党费一般是一个月上报一次，但也有二个月集中上报一次的。毛泽东和江青的党费大都一起交，每月共 20 元，有专门的党费帐簿登记。韶

山毛泽东纪念馆保存的党费帐

簿封面上写有“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毛泽东语录，党费帐簿内芯写有 4 页半，详细记载了 1968 年 1 月~1976 年毛泽东、江青每月缴纳党费的数额，最后一次交党费的登记时间为“1976.9.7”。

应当说明的是，毛泽东生活费报表中的开支，并不完全是他一家的开支，其中还包括招待一些客人特别是民主人士的费用，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夜餐费、部分医药费和出差补助费。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工作人员工资低，工作既辛苦又没有规律，还有的家庭负担沉重，毛泽东是体谅他们，感激他们的。生活帐反映，毛泽东身边许多工作人员如高成堂、舒世俊、孙玉兰、周福明、王恩谱、王宇清、吴连登、叶子龙等均在毛泽东的收入中报销过医药费和出差补助费。根据日常杂费开支表 1965 年 2 月 24 日到 6 月 30 的统计，毛泽东付工作人员医药费 72.8 元，出差补助费 280.35 元。

据毛泽东生活秘书回忆，毛泽东一般不看生活费收支报表，只有当钱不够用时才翻翻生活帐，并叮嘱工作人员注意节约。

与老百姓同样使用的各种票证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如今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购物方式，但在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国人购物却不能如此简便，人民币必须找各种票证帮衬，才能完成购物的过程。如今 30 岁以上的中国人无不对购货证，以及购货券、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等票证记忆犹新。

也许人们难以置信，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家庭”，毛泽东一家也和寻常百姓家一样使用各种定额的票证，并曾为买一点茶叶，买一床蚊帐缺少票证而东拼西凑，但这却是历史的真实。毛泽东遗物中的各种票证以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足以打消人们在此问题上的一切疑惑。

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珍藏的毛泽东遗物中，有毛泽东个人购货证两个。其中 1964 年“北京市个人购货证”1 个，浅黄色、长 9.5 厘米，宽 6.5 厘米，封面“姓名”一栏用蓝色墨水笔填着“李德胜”，单位一栏为蓝色打印字“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发证时期为“1964 年 1 月 1 日”。盖红色圆形“北京市西城区百货管理处票证专用章”。1965 年“北京市个人购货证”1 个，白色，长 9.5 厘米，宽 6.5 厘米，封面“姓名”栏用蓝色墨水填着“李松前”（毛泽东化名之一），单位及盖章与上相同。

毛泽东遗留下的购货券共有 166 张，其中 1971 年北京购货券 163 张，长 5 厘米，宽 10.6 厘米，绝大部分较新，有两张有明显折痕及污迹，另有 11 张的正面或反面用蓝色圆芯笔写有 20、22、27、30、31、34、35、39、56、57、71 等数字。1962 年北京购货券“日用工业品券”2 张，一张为棕色花纹的“0.5 张券”，长 4.5 厘米，宽 9.5 厘米，一张为暗红色花纹券，长 5 厘米，宽 10 厘米。1972 年 1 张，为蓝色花纹的“0.1 张券”，长 4.2 厘米，宽 9.2 厘米。

毛泽东遗留下的北京棉花票共有 18 张，其中 1967 年 1 张，1968 年 1 张，1969 年到 1976 年每年 2 张，1971 年到 1976 年为“壹人券”。北京市布票共 35 张，其中 1966 年 2 张，为“伍市寸”票。1968 年 2 张，为“壹市寸”票。1970 年 3 张，为“壹市寸”票。1971 年 7 张，1 张“拾市尺”、2 张“壹市尺”，4 张“壹市寸”。1972 年 4 张，2 张为“捌市尺”，2 张“壹市寸”。1973 年 6 张，2 张“拾市尺”，2 张“捌市尺”，2 张“壹市寸”。1974 年 6 张，2 张“拾市尺”，2 张“捌市尺”，2 张“壹市寸”。1975 年 5 张，1 张“拾市尺”，2 张“捌市尺”，2 张“壹市寸”。逐项加起来，共留下布票 128.7 市尺。

据毛泽东生活秘书吴连登回忆，毛泽东一家也时常有票证不够用的时候，有次江青买蚊帐，布票不足，临时找他凑了一些才买回蚊帐。毛泽东建国以后春秋两季一直穿的睡衣，补了 67 个补丁，领子全换过，袖子已面目全非。1962 年，工作人员劝他换件新的，他说：“我们国家还很穷，发的布票很少，你不也穿着补丁衣服吗？我就不能穿？因为我是主席？我看还是应该节省点，不要作新的，破了再补嘛。”睡衣太破旧了，洗衣店没法子洗，只好请工作人员来洗，在泡好洗衣粉的水里抖一抖，漂一漂。不敢用手拧，一拧就碎了。

毛泽东遗物中有粮票 156 张，其中全国通用粮票 155 张，为 1965 年，

1966年印制，142张为“伍市斤”票，9张为“叁市斤”票，3张为“壹市斤”票，1张为“半市斤”票，共计740.5市斤。北京市地方粮票1张，为1974年印制的“贰市两”票。

毛泽东每月的粮食定额为24斤。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就餐时吃菜吃得较多，米饭只要一两左右，一天不过三两，所以能节余一些给李敏、李讷等子女，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北大读书的女儿李讷平时回家，都是和工作人员一起在大灶用餐。有一次周末回家，毛泽东看到孩子饥肠辘辘，狼吞虎咽的样子，自己的饭也让给李讷吃了。晚上，工作人员对毛泽东说：“主席，李讷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不可以”，毛泽东接着说：“同全国人民相比，她还算好一些。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份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毛泽东经常要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地处理国内外事务，也时常外出巡视调查，无论走到哪里，该自己付粮票的都自己付。从1964年7月23日到9月22日的两个月间，毛泽东便给人民大会堂交纳便餐粮票5.5斤。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现保存有毛泽东交粮票收据93张，涉及上海锦江饭店，湖南省委接待处等数十家单位。在廉洁自律方面，毛泽东无愧为全党的表率。

毛泽东遗物中，尚有两张肉票，为1963年11月票。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严重经济困难，加之苏联卡中国的脖子，中国人面临着度荒还债的严峻局面，能有粮吃就算上好的了，吃肉变成了一个奢侈的梦。毛泽东爱吃肉，尤爱吃红烧肉，但在那种情况下，他宁愿与人民同甘共苦。1960年12月27日，毛泽东对卫士张仙朋说：“我不吃猪肉和鸡了，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看有米饭，有青菜，有盐有油，就可以了。”一次，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开会，到了深夜，张仙朋与服务人员商量，趁着开会，给中央领导作些包子，多少放点猪肉。当他们把夜餐送上以后，不多时，周总理出来了，悄悄问他们：“主席说了不吃猪肉，怎么包子里放肉了？”他们回答说：“主席几天没有吃肉了，今天开会，我们想让主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吃点。”总理听了，点了点头，但又严肃他说：“以后没有主席的话，可不要搞了。”张仙朋等工作人员曾一起向毛泽东说：“您这样下去，会把身体弄垮的，全国人民每人省下一口也愿意让您吃得好一点。”毛泽东坚决不肯，他说：“全国的老百姓都是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不舒服啊！”

井冈山交际处开具的伙食发票

毛泽东历来提倡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在他的遗物中，留下很多各地招待所开给他交钱交粮的发票、收据，正是他外巡期间身体力行不搞特殊化的铁证。

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 1965 年 5 月 29 日开出 00006482 号发票，上面写着：首长伙食费，7 天，每天 2.5 元，合计 17.50 元； 00006484 号发票上写着：首长交粮票 23 斤；收款人为雷良钊。这就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交钱交粮的收据。

1965 年 5 月 22 日，毛泽东住进了井冈山宾馆一楼 115 房间。在此之前，负责毛泽东这次外巡工作的汪东兴、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先来宾馆打了招呼，他们交待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的工作人员说：首长来井冈山，在宾馆食宿，一切得按规定办。江西省委办公厅负责人找到井冈山宾馆管理员，具体交代说：“在宾馆食宿，食品专由你采购，每天按两元伍角的伙食标准，素菜中要有辣椒、小碗豆、竹笋、豆豉之类；再准备些猪肉、鳝鱼、泥鳅、猪油渣之类的荤菜；菜要新鲜，随时都要准备好，拿得出。”管理员心里明白了好几分，他频频点头，并立即带领宾馆职工紧张地忙碌起来。当他准备就绪时，毛泽东乘坐的吉姆车开进了茨坪。

茨坪宾馆座落在青松翠竹之中，刚刚落成不久，显得格外干净、舒适。毛泽东走进 115 房间，工作人员招呼他坐下，稍稍休息。环顾四周，他脸上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笑容，说：“这可和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上山一千多里路走了半个月，这次坐汽车两天就到，还是机械化好。”

一会，通知开餐。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井冈山人那种高兴劲，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他们想：第一餐饭，我们一定得使毛主席满意。考虑到首长长途跋涉，肯定疲劳不堪。于是他们在桌上摆上了茅台酒、香烟、苹果及丰富菜肴。汪东兴发现后，立即找到管理员，说：“首长每餐四菜一汤，每天两元伍角伙食费标准，一路上都没喝酒，你们快将烟、酒、水果都收进去吧。”结果，餐桌上只有四个小碟盛菜，一个瓷碗装汤。厨师把饭菜做好了，由服务员用竹篮子将装有菜、汤的小碟、瓷碗送过去，等他吃光又将小碟、瓷碗提回厨房。

午休后，汪东兴前往毛泽东住处，问他休息怎样，对饭菜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说：“可以。休息也好。这里现在的气候适宜，不冷不热。”还问随行人员休息得好不好。

以后几天毛泽东叫随行人员外出参观，自己留在宾馆审批文件。饭前饭后，经常由汪东兴、张平化、刘俊秀等陪着外出散步。一次他兴致勃勃，一口气讲了当年井冈山红军的来历与组成情况后，深情他说：“我离开井冈山已经 38 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回忆起 38 年前的这段历史，心情总是非常激动的。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早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 38 年啊！”

又有一天，毛泽东外出散步，望着崇山峻岭他停止了脚步又讲了起来：“井冈山是座好山，地形条件好，群众基础好。当时我们在井冈山生活条件

是艰苦的，住的是破草房，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说到这里，他突然转过脸问井冈山陪同：“井冈山现在还产红米么？”毛泽东在中南海，一直常吃红米、红薯、芋头、玉米棒等，可到井冈山来了，还未见到给他吃红米饭哩。“有，有！”陪回答应着。

“去年您吃的红米就是从江西买去的。”汪东兴插话。第二天，毛泽东的饭桌上又多了一碗红米饭。

毛泽东虽然身居井冈山，但工作仍十分紧张。他叫汪东兴与党中央、周总理时刻保持联系，告诉他们他在井冈山平安无恙，如有重要文件，可派飞机送南昌后转送井冈山。以后，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来电、来信，批阅文件，还要阅读大量书报，常常忙到深夜。

5月29日，井冈山天空万里无云，地上欢声雷动。毛泽东神采奕奕，健步来到井冈山宾馆餐厅大门前，先接见了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井冈山管理局的党政军中层以上干部及宁冈县委成员，同他们合影留念。接着，毛泽东走向欢呼的群众，他不断地向人们招手、鼓掌，笑容满面地和他们在一起。

故地重游，毛泽东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三首新词，以表达对井冈山的怀念与赞美之情。离开茨坪前，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带着钱和粮票走进了宾馆会计室，找会计雷良钊结算伙食帐。这个当了6年会计、业务拔尖的年轻人这下难住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钱、粮。他说：38年前，毛

主席在我们井冈山吃红

米饭、南瓜汤，为穷人打天下。如今他老人家故地重游，是对我们井冈山人民的最大关怀。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他老人家，仅仅严格按你们的规定为他作点普通饭菜，才十几块钱，叫我们怎么忍心收下？管理员承认雷会计说的句句在理，但他仍然耐心地解释说：“首长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有严格的约法和开支规定，这是纪律，我必须遵守。这约法中写着：

“凡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代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

“严格认真地执行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中五条指示。不得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公私不分，铺张浪费。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托你们为首长做饭菜，钱、粮票必须付清，请你收下吧。”

雷会计还是摇着头。

管理员又说：“毛主席最反对搞特殊化。前几年，他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随他外出巡视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东西，后来我们在院内整风时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帮助。毛主席知道被揭露的事实后，非常气愤，不顾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随后，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近2万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你说，我能不交清钱、粮离开井冈山吗？”

听着管理员的这番话，雷良钊还能说什么呢，他噙着热泪，开出了前面所提的两张发票。

收取与处理礼品的清单

作为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伟人，毛泽东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延安时期以来特别是建国以后，国内外人士给毛泽东赠送了不计其数的礼品。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现在保存着两份礼品清单。一份清单上记载着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送给毛泽东5箱橘子共90斤，中南海供应科从外交部礼宾司取回，登记时间为1972年2月5日，上有汪东兴的签字。另一份清单登记了1958年到1959年中外人士送给毛泽东的部分礼品，抄自中央秘书室。上面有汪东兴的签字，汪东兴并在清单上批

送给毛泽东的礼品，多经中央秘书室办理，但也有由警卫局供应处以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办理的。礼品的种类可谓无所不包，应有尽有。仅从上述1958年到1959年的部分礼品清单看，就有广播收音机、摄影软片、立体幻灯机、兔毛背心、雨衣、地毯、枕席、龙须草席、海产标本、人参、鹿茸、酒杯等物品，共计40余种。这些礼品大部分是单位送的，但也有个人送的，如1959年11月25日，香港太古船坞的杨慎德便送给毛泽东仿古玉鲁两件，玉扁笄一件；1959年10月17日，上海的黄正和送给毛泽东刻有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永久牌钢笔一支；1959年10月15日，西安的谢芒锐送给毛泽东象牙筷子一双；1958年12月10日，唐山杨庆俭送毛泽东人参两棵；1958年12月29日，甘肃谢成德送毛泽东熊掌鹿茸5斤，等等。

对于送来的礼品，只有极少数几件，如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

包，齐白石送的砚台等被毛泽东留作自用外，其余一切都照章交公并造表注册。毛泽东留下这极少数几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送礼人有着特殊的私交。由于形成了制度，所以许多礼品未经毛泽东过目便已上交国库。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们经常看到外国领导人把珍贵礼品送给毛泽东，但毛泽东只浏览一下后便嘱咐交公。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送给主席个人的，劝主席留用一些，毛泽东说：“不行，这是送给国家主席的。如果我不是国家主席，就不会有人给我送礼了。如果你当了国家主席，他们也会送你的。”

对于热爱毛泽东的人来说，毛泽东的健康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从心底祝愿“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并把他们认为最好的补品送给毛泽东。这样一来，补品就成了礼品中很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但是，毛泽东从来不用人参、鹿茸、灵芝之类的补品，对送来的这些高级补品全部交公。有次，护士孟锦云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吃点高级补品，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有些所谓高级的东西，我可并不认为它们有什么特殊之处，只不过物以稀为贵罢了，虽仍有些人有一种很特殊的心理，如果这种食品皇帝皇后吃过，什么名人大官吃过，它的名望也就高贵起来，甚至使得高不可攀，神乎其神，所以，那些有了权，有了钱的人是绝不肯放过它的，仿佛吃了皇帝吃过的东西自己便成了皇帝，吃了名人吃过的东西，自己便成了名人，这叫沾光吧。”说到

兴浓处，毛泽东来了一句玩笑话：“本人生来不高贵，故高贵之物，不敢问津。”

对于补品，毛泽东的观点是：“补品能少吃便少吃，当然最好不吃，战胜疾病，保持健康，主要还得靠自己身体的力量，这叫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用的最好的补品恐怕就是葡萄糖了，这还是出自保健医生的建议，认为喝红茶放点葡萄糖有益健康。

1964年，有人曾给毛泽东送去燕窝32.5公斤，咖啡豆47斤。毛泽东推脱不掉，便派生活秘书将这些礼物交给人民大会堂餐厅科。餐 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观看缅甸联邦总理吴努赠送的礼品。

厅科负责人李发昌开具收条并加盖公章后，毛泽东才放了心。这张收据现保存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处理礼品的清单，铭记着毛泽东不朽的人格力量和领袖风范。

7 张建国初期的人民币

在毛泽东的数千件遗物中，有七张很不起眼的人民币，其中5张是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发行的200元、100元、50元旧币，两张是中国人民银行1953年发行的2元、5角新币。

毛泽东的钱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项收入是每月工资，一项收入是稿费。在建国初期，每月工资收支由卫士长李银桥负责，稿费收支则由秘书负责。

毛泽东最讨厌钱。他可以同自己的政敌蒋介石握手，但他从来不摸钱。他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北京后就更不摸钱了。

据李银桥回忆，在毛泽东的经济支出表中，专有一项是帮助生活困难同志的。还在50年代，一位陕北籍的战士张瑞歧，在转战陕北期间一直在警卫排负责毛泽东等人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于年纪偏大，把毛泽东护送到北京后，便解甲归田了。回家后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他写信告诉毛泽东自己的情况，毛泽东见到信后，立即吩咐李银桥给张瑞歧寄钱，以帮助其度过难关。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银桥从毛泽东的工资节余中取出几百元，装入一个牛皮纸袋，准备交毛泽东过目，以便使他放心。当时，毛

泽东正在看文件，见李银桥递过

来的牛皮纸袋，以为是文件，于是像平常接公文一样，准备掏出来看。李银桥告诉毛泽东，这是给老张的钱，请主席过过目。李银桥话音未落，毛泽东神色有变，就像无意中抓了一只癞蛤蟆那么糟糕，一下子就把牛皮纸袋扔开了。还说：“拿开！交待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边说边皱着眉头搓了搓手，好像是把他的指头弄脏了。以后，毛泽东再吩咐寄钱给别人，李银桥也不再拿去让他过目了。

实行薪金制以后，毛泽东身边的卫士田云玉，工资定得偏低，只有37元5角。到1956年调整工资时，有人提议给他升两级。报告上

去后，领导经过全面平衡，认为其他中央领导的卫士也有类似情况，不能因为田云玉在毛泽东身边当卫士就可以长两级，因此只同意升一级。为此，田云玉找警卫局的领导闹情绪，还哭了鼻子，但还是没有长两级。1957年反右运动时，中南海机关贴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专讲这件事的，题目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田云玉哭哭啼啼要两级。

毛泽东看到了大字报，笑着对大家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提级时。”第二天，轮到田云玉值班时，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望着他，并把他叫到自己身边。毛泽东对田云玉说：“小田，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我准备从我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不要国家来负担，我来负担。你看多少钱合适？”毛泽东突如其来的问话，使田云玉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毛泽东看出了田的心事，直接问他：“我给你60元钱可不可以？”田云玉心想：拿了主席的工资大概不会再算国家干部了吧？万一主席不在了……他绕山绕水地喃喃：“这怎么行啊？主席，那样我不就成了你私人的人了？”

毛泽东怔了怔，点点头，看来显然没有想到这一层。接着说：“你考虑得很好。唉，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是我拿它也没有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有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以前我在北平工作的时候，只有8元钱。到街上买过一次包子，那包子好吃极了。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吃饺子吧？有一次我坐火车去上海，坐火车也没钱，借了人家的钱去上海。结果在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子丢了，到浦口下车才知道。正好碰了熟人，又借了钱，才买了鞋买了票，这么才进了上海。钱就是这么讨厌，可是没有还不行。”后来，每当小田家有困难时，毛泽东就叫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送钱过去，但毛泽东自己照例不会摸钱。

李银桥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后，1964年夏天他去北京看望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了解到李的家乡遭了灾，便吩咐秘书从自己稿费中付给1000元帮助李银桥。秘书将装好钱的牛皮纸袋放到毛泽东桌子上，毛泽东远远比划手势叫李银桥拿去。李银桥执意不肯，毛泽东有点生气了，说：“怎么，你是要让我摸钱吗？”边说边作出要抓那只牛皮纸袋的样子。李银桥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无奈，只好赶紧拿起那装有1000元的牛皮纸袋。毛泽东见状，高兴他说：“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就讨厌钱。”

毛泽东的工资，除去家庭生活费用开支，湖南老家亲友来访在京的花销，往返路费，买土特产送行，资助身边工作人员等外，还曾用它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办业余学校。参加这个业余学校学习的有70多人，每人的课本、笔墨、作业本、字典、地图等，以及请来的老师的工资都是从毛泽东的工资中支付的，这个学校从1954年一直办到1957年才结束。这样，毛泽东生前工资所剩无几，有时工资不够时，大一些的费用就从稿费中支付。

毛泽东拥有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稿费，但他都将其交给了中央特别会计室，由他们保管。这些稿费，一般是用来给毛泽东买书，晚年印大字本书，派人下去搞调查研究，退赔身边工作人员下去时多吃多占、招待客人等。除此之外，还用它为贺子珍买药，晚年江青

曾伸手向毛泽东

要过钱，毛泽东批给她3万元。毛泽东去世前后，中央办公厅还曾给李敏、李讷、毛岸青、贺子珍等人送过现金和家电产品，这些也是从稿费中开支的。

直到现在，毛泽东逝世已经20年了，他所存的稿费仍然由中央特别会计室保管和掌握。至于现金，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中仅找到这建国初期的7张人民币。

与江青“分开”后的家庭生活帐

毛泽东与江青虽然在延安结为夫妻，但随着江青历史和缺点的暴露，毛泽东越来越为这次婚姻感到后悔。还在建国以前，他就向卫士李银桥但露了这种心迹，承认自己当初与江青结合是草率了一些，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又不便离婚，只能“凑合着过”。建国以后直到60年代初，毛泽东虽然与江青时不闹矛盾，但基本上还吃住在一起，生活帐也是统一的，两人收入加在一起共同使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与江青虽然在政治上联系密切，但在生活上的矛盾已难以调和，以致从1968年8月开始在生活收支上互相独立，互不干涉。

毛泽东与江青在生活上互相独立后，孩子的生活费仍主要由毛泽东承担。江青给李讷买一些娱乐用品和衣服，同时负担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由于收支互相独立，避免了不少家庭矛盾和纠纷。江青在用钱方面也“自由”了许多，无论摄影还是买衣服都不必向毛泽东要钱，也不会受毛泽东的限制。江青晚年添置了许多漂亮的连衣裙，这在与毛泽东共同生活时是难以做到的。毛泽东与江青在生活上互相独立后的收支情况可以1975年9月为例：

1975年9月：

收入：上月接转 1165.06 元

毛泽东工资 404.8 元

江青工资（缺）

支出：月房租费 39.46 元

伙食费 391.91 元

水果 23.75 元

煤气 3.7 元

日用品开支 113.06 元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保存的江青的生活帐，是在接收中南海毛泽东生活帐时一并发现和接受下来的。其主要内容为1968年8月到1975年11月江青生活费收支报表，多为月度报表，也有季度甚至半年度的报表，格式、项目以及制表人、负责人签章与毛泽东生活费收支报表大致相同。制表人刘元祥为中央警卫局财务处工作人员，负责人毛维忠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江青生活费收支报表除1973年内容完整外，其它年度均有个别月份内容不齐。从报表数量来看，1968年到1975年，分别为4份，4份，7份，9份，8份，9份，7份和6份。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报表的开头均写有“敬爱的江青同志生活费收支报表”字样。“四人帮”被粉碎后，江青原身边工作人员为表明与她划清界线，在报表封面江青的名字上划有叉叉。

江青的收入与毛泽东一样，也是两项，一项为稿费，一项为工资。江青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工资从1968

年3月开始由原来的243元

调整到342.70元。稿费绝大部分来自发表的摄影作品，但金额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相比。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现存有两张由广州羊城晚报寄给江青的稿酬通知单，一张为1957年1月21日签发，投稿者姓名栏写有“李平”（江青笔名），投稿内容为“挣静的珠江”、“落日亭亭”、“靓装羊城”三幅摄影作品。分别登在1月13日，14日和16日的报纸上。每幅照片10元，共30

元。另一张为 1961 年 1 月 11 日签发，投稿者姓名仍为“李平”，内容为“珠江小景”照片 3 张，稿酬共 15 元。稿酬通知单上注有“经手人孙勇”和“江青同志稿费收入”。

从生活费收支报表可看出江青日常生活的大致情况，如 1968 年 8 月 2 日～1968 年 9 月 23 日：

项目	单据	收入	支出	结余	备考
结转稿费		713.14 元			
结转工资	1	2398.90 元			68 年 3～9 月工资
工资	1	342.70 元			10 月份
党费	2		20.00 元		8、9 月份
日用品开支	19		162.37 元		
伙食费支出	50		136.75 元		8 月 2 日～9 月 23 日
合计	73	3454.74 元	319.12 元	3135.62 元	

江青的最大业余爱好是摄影，为此花的钱很多。江青生活费收支报表反映，在没有摄影支出的情况下，她的每月开支很少有超过工资数额的，但一旦有摄影支出，其数额往往是其工资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下列一份表格便是最好的说明：

收入：1970 年 10 月份

支出：1970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4 日

项目	单据	收方	付方	余额	备注
上月按转		6788.49 元			
工资	1	342.70 元			10 月份
收报胶卷款	1	822.68 元			
缴党费	4		40.00 元		7～10 月份
买戏票支出	1		74.40 元		
胶卷放大纸	1		4748.28 元		
生活费支出					
其中伙食费	129		255.86 元		7 月 1 日～10 月 4 日
茶叶费			59.20 元		
水果费			28.07 元		
日用品支出	20		78.83 元		
合计	157	7953.86 元	5284.64 元	2669.22 元	

另从一份遗留下来的材料看，江青从 1976 年 8 月份开始还增加了几项支出，汽油费每月交 10 元，所住中南海 201 房租每月 12.43 元，其它还有水费（每月 0.27 元）、洗澡费（0.50 元）、电费（4.20 元）、家具费（2.33 元）、暖气费（每月 5.15 元，每年收 4 个月）等，但这些增加的支出没交多久，江

青即被逮捕，再也无法在中南海呆下去了。

精心保存的岸英衣物

1990年，中南海中共中央警卫局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发现了毛泽东精心收藏的毛岸英的一批遗物。这真是令人有些意外，因为到毛泽东去世时，其子已牺牲整整26年了！毛泽东竟还舍不得丢弃这些东西。按照韶山风俗，逝者生前遗物，特别是衣物，往往随之销毁（焚烧），以免生者伤心。可是毛泽东几十年了，还不愿丢掉儿子的物什。毛泽东是一位大战略家，又是一位人中伟丈夫，同时心细如丝，这中间隐藏的创痛与对儿子无尽的思恋，难以言说……

1950年10月15日，毛岸英随志愿军总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1月25日，抗美援朝第二战役打响。这天上午11点左右，4架美军轰炸机掠过志愿军总部向北飞去，突然又从北边飞回，迅疾飞

临作战室上空，疯狂地倾泻了上百颗凝固汽油弹，此时，毛岸英刚登记、发完有3个A字的加急电报，炸弹就暴雨般落下，他与另一位参谋高瑞欣陷入一片火海……

毛岸英牺牲了，年仅28岁！这是毛泽东一家牺牲的第六位亲人。毛泽东在北京新6所1号楼，从叶子龙和江青口中得知这一噩耗，怔怔地在沙发上坐了半晌，良久，才点燃一支烟，使劲抽起来，一支接一支，最后长叹一声：

“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心情沉重：

“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请求处分……”

毛泽东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只是其中之一……”

1954年12月，志愿军总部发电军委总干部部，询问如何安置毛岸英遗骨。总干部部复电要求运回北京，彭德怀认为不妥，24日写信给周恩来：“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周恩来将此信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表示同意，于是，在朝鲜平安道桧全郡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出现了一座“毛岸英烈士之墓。”

毛岸英安息于异国他乡，而他的一批生前遗物送回了祖国，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睹物思人，他将巨大的悲痛埋藏心灵深处，他愿一个人独自承受这种痛苦，他没有将这些遗物交给岸英的妻子刘松林，直到1990年，毛泽东去世14年之后，中央警卫局才将这些遗物转交刘松林，同年，刘松林又将毛岸英的遗物分别捐赠给毛岸英母家板仓和父家韶山。其中韶山收藏的有：

毛岸英在朝鲜穿过的衬衣，为白棉布底，印赭色细方格，商标为一树叶，标有“荣新内衣厂出品”字样，左胸口袋，长袖，有7粒小白白色胶扣，其中袖口两粒；领口有“130114领衬”字样。领口严重发黄，衣下摆也发黄，衣

前胸有黄迹。

毛岸英参加志愿军后戴的蓝色棉帽，帽顶径 20 厘米，面料为蓝色，帽舌有较密机缝的线，两边有护耳和后帽沿，帽里为灰色，有螺旋形机缝线。

毛岸英在朝鲜穿过的灰色纱袜，长 57 厘米，底长 24 厘米，为长筒袜，纱织，袜底前部，后跟各有一个黑布补丁。磨损严重，已褪色。

毛岸英在朝鲜穿过的浅蓝色长袖改短袖衬衣，长 62 厘米，肩宽 39 厘米，袖长 53 厘米，胸围 92 厘米。这本是一件长袖衣，剪下的袖子中一只已剪去约长 24X 宽 7 厘米补在衣领上，为浅蓝色竖条格，左胸有 1 个口袋；有白色胶扣 5 粒，袖子上有小白胶扣两粒。

另一件鹅黄色短袖衬衣，长 64 厘米，肩宽 38 厘米，袖长 17 厘米，胸围 110 厘米。为棉质。商标为“冠军 champion DAHJRMG”。有 1 只口袋，5 粒白色胶扣。领口已磨损，衣正身有黄斑。

毛岸英在朝鲜用过的一条白毛巾为棉质，长 71 厘米，宽 27 厘米。呈长方形，两头有穗，在毛巾一头的右下角盖了一个浅黑色菱形章，上面的字迹已模糊。这条毛巾已严重磨损，多处有大、小破洞，并有大面积黄斑。

与杨开慧共用过的文件箱

全国解放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等单位曾赴长沙板仓征集文物资料，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和嫂子李崇德捐献出他们精心保存的几件烈士衣服，以及一只长方形的旧箱子。这只旧箱子是杨开慧的随身之物，原来是用来装首饰的。毛泽东主持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两人曾用这只箱子装过文件。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按中央指示，回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嘱咐保姆孙嫂带着毛岸英先回长沙板仓，自己则带着岸青、岸龙随毛泽东一起来到长沙。当毛泽东在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后，便星夜送杨开慧母子去板仓，行李中便有那只装文件的箱子。第二天清早，毛泽东便匆匆离开，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去了，此行成为他与爱妻杨开慧的永诀。从此，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留在板仓，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她仍用那只从武汉带回的箱子装党的文件和材料，也装自己平时写的一些诗文手稿和未发出的信件。1928年，她写了一首题为《偶感》的五言长诗，以寄托自己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诗中写道：“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翻，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可见，惆怅无已时！”诗中的“足疾”，是指毛泽东送她回板仓时引发的脚病，她在一年后犹念及此，这种细腻真挚的情感，是人间妻子献给丈夫的最动人的心曲。

作为名门闺秀的杨开慧，集中了她所处时代女性的一切优秀品质：美丽、善良、知书达理，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毛泽东深爱她，而她也把自己全部的爱献给了毛泽东。她曾以饱含情感的笔墨追述了自己与毛泽东的爱恋历程：“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头，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1921年春节前夕，这对热恋情人非常自然地缔结了姻缘，没有举行任何的仪式，更没有购买什么像样的家什炫示于众，因为他们反对一切“俗人之举”。

中国共产党成立3个多月后，杨开慧离开她执教的岳云中学，同毛泽东一道住进长沙小吴门清水塘，算是正式有了一个“家”。这个“家”是一幢两进三开间的小木板平房，里面陈设十分简单，除了一张床，一个办公桌和几条凳子，没有其它显眼的东西。当时毛泽东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和一师附小主事，他的为数不多的薪金便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杨开慧虽出身名门，但却立志要像“平民”一样生活，她穿得最多的是大布衣。现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保存的她曾穿过的一件夹袄，长120厘米，腰宽42厘米，下摆宽70厘米，外层为白色绛底碎花棉布，里层为深褐色竖条状驼线，长袖，圆领，这件衣服就算是她最好的了。她把一切精力放在协助毛

泽东工作上，选阅、剪辑每天的报纸刊物，帮助毛泽东抄写拟定的文件，还出外担负联络任务。到了晚上，她还要为前来清水塘开会的人站岗放哨，为经常通宵工作的毛泽东准备夜餐和烘笼。为弥补中共湘区区委会的经费短缺，她甚至动员母亲拿出父亲去世时亲友送的奠仪、募捐款给毛泽东做革命活动经费。1922年10月，她生下第一个儿子毛岸英，1923年11月2日生下第二个儿子毛岸青，毛泽东事务繁忙，无暇顾及家庭生活，压在杨开慧身上的工作和生活负担很重，其间虽与毛泽东产生过一些误解，但杨开慧还是含辛茹苦地挺过来了。

1924年杨开慧离开清水塘处，随毛泽东辗转于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直到1927年“八七”会议后返回板仓故乡。在这3年多时间里，唯有1925年8月到1926年底在广州时，生活比较安定和舒适。建国初期，毛泽东曾就降低家庭伙食费开支问题对保健医生王鹤滨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在国民政府当一名宣传部长，我和爱人杨开慧同志，还有一个孩子（那时岸青不在广州），又请了一个人帮忙，一共四口，那时官没有现在大，薪水没有现在多，但生活过得满不错的，每月还有节余。现在呢？周围工作的同志是国家管的，汽车是国家管的，再花费那样多，就不应该了。”

杨开慧回到板仓后的几年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靠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从上海寄钱接济她。她在给李一纯的信中不无辛酸他说：“由于泽民的家庭观念，我还没有饿饭……孙嫂不要我的工钱。”她甚至用包过东西的皱巴巴的纸片写信给李淑一，要李淑一给买些纸笔和读物寄给她。尽管如此，杨开慧仍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斗争。1930年夏，国民党清乡队在板仓附近大肆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有人劝杨开慧设法去井冈山，她没有同意。她一边掩护其他同志转移，一方面做各种应变的准备。危险之际，她没有忘记装在从武汉带回的那只箱

子中的文件和手稿，为使这些东西免于落入敌人之手，她将党的文件密封在一个蓝花瓷坛里，埋在菜土底下，将一些没有发出的信和诗文手稿，藏在住房的夹壁墙内。1930年，杨开慧不幸被捕，敌人将她的老屋搜了个遍，包括那只文件箱，但没有捞到半点东西。同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经历了一个月苦难的狱中生活后，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当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时，悲痛他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他又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以“骄杨”喻爱妻，安抚烈士的忠魂。

后 记

为了学习毛泽东、纪念毛泽东，同时也为了配合已开办的《毛泽东遗物展》，进一步发挥毛泽东遗物的社会教育作用，我馆组织编委会，由刘斌珍担任主编，田余粮、胡长明任副主编，组织馆业务骨干集体编写了《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

经编委会授意，胡长明同志起草了一个关于全书结构、提纲和实施步骤的初步方案，并负责具体组织、落实等事务。初步方案拿出后，馆负责人刘斌珍、田余粮多次组织编委会修改、补充和完善。长沙的黄海舟同志及郭金才同志对本书提纲、内容和形式设计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96年初正式开始写作，具体分工是：龙剑宇（人际交往篇）、夏佑新（饮食起居篇）、吴波（穿戴修饰篇）、刘斌珍（外巡游历篇）、田余粮（读书求知篇）、胡长明（强身怡情篇）、胡长明、田余粮（收支家政篇）。本书内容主要采用的是遗物调查资料，同时也参考了一些相关的著作和文章。中央党史研究室郑惠同志审阅了全部书稿，并对本书作了较高的评价；徐涛、吴旭君同志除审阅全稿外，还对诸多史实、提法等作了具体的修正。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编写、出版的同志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毛泽东遗物事典》的问世，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年届八旬，仍欣然担任顾问，并题写了书名，本书其他顾问：徐涛、吴旭君、张玉凤、吴连登、周福明同志以及名誉主编毕剑横同志，均寄来热情洋溢的信件，支持编写出版《毛泽东遗物事典》，并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责任编辑杨柏榕以及黄海舟、郭金才同志为书稿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由于我们资料的局限，时间的仓促，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1996年10月

